# 第一章：谁是野蛮人？

中国很大 中国是如何变得如此大的？

全球北方的三个庞大国家——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这与全球南方的国家如印度，澳大利亚和巴西等不同，后者的形态受到殖民历史的影响。 这些北方的大国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有着激烈的领土扩张的共享历史，这些历史以国家支持的暴力、种族灭绝和原住民的流离失所为标志。 在十八世纪，中国将其影响力延伸到了西部中亚、蒙古和西藏，而俄罗斯则将其统治范围扩大到了东部中亚、高加索地区和西伯利亚。 在同一时期，美国向西扩大了其领土，夺取了曾经属于美洲原住民的领土，并在1763年吞并了新法兰西（New France）和1821年吞并了新西班牙（New Spain）。 因此，这三个陆地帝国在其原始核心地区之外实现了巨大的扩张。 在十八世纪，中国扩大了其在西部中亚、蒙古和西藏的影响力，而俄罗斯则扩大了其在东部中亚、高加索地区和西伯利亚的统治。在同一时期，美国向西扩大了其领土，夺取了曾经属于美洲原住民的领土，并在1763年吞并了新法兰西，在1821年吞并了新西班牙。因此，这三个陆地帝国在其原始的中心地带之外实现了巨大的扩张。早期现代的领土扩张是殖民过程吗？我们如何区分早期现代的领土帝国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帝国？在领土扩张期间，谁是野蛮人？

关于早期现代土地帝国扩张的学术文献应该更加一致。 关于美国和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以及他们边疆的条件，有大量的历史文件和研究。 这些研究提供了关于这些广大帝国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关键信息。 相比于美国和俄罗斯，以前对于清朝中国的领土扩张的关注是稀缺的。 有大量的历史文件和研究关于美国和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以及他们边疆的条件。这些研究提供了关于这些广大帝国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关键信息。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以前对清朝中国的领土扩张的关注很少。这本书揭示了清朝的领土扩张及其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持久影响，最明显的是“蛮夷”地区在清朝领土内的消失。

## 中央王国

这个词组“中央王国”已经出现在一些最近的书名中，比如肯德尔·约翰逊的《新中央王国：中国与早期美国的自由贸易浪漫史》，约翰·庞弗雷特的《美丽的国家和中央王国：美国和中国，从1776年到现在》，以及斯科特·肯尼迪的《超越中央王国：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比较视角》。 这个词语“中央王国”已经出现在一些最近的书名中，比如肯德尔·约翰逊的《新中央王国：中国和早期美国的自由贸易浪漫史》，约翰·庞弗雷特的《美丽的国家和中央王国：美国和中国，从1776年到现在》，以及斯科特·肯尼迪的《超越中央王国：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比较视角》。这些标题中的“中央王国”可能带有一种讽刺的色彩，或者作者可能希望唤起一种古老的命名感。 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大多数读者可能会立即将“中央王国”解读为对“中国”的历史参考。

“中华王国”的隐喻是现代美国汉学的起点。 1848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兼汉学家塞缪尔·威尔斯·威廉姆斯（1812-1884）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中央王国：对中国帝国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调查》。 修订版于1871年出版，增加了新的插图和中国帝国的新地图。 在威廉姆斯撰写《中华帝国》期间，他目睹了英国对中国的海军战役的重大积累。 他目睹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海军如何击败了清朝的中国海军。 用他自己的话说，威廉姆斯在中国的生活与中国的开放相交叠。

在第一版（1848年）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定义了写这本书的两个目标。 在第一版（1848年）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定义了写这本书的两个目标。首先是提供关于中国“最真实、重要且最新”的信息。 在第一版（1848年）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定义了写这本书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提供关于中国“最真实、最重要、最新”的信息。第二个是消除对中国人的讽刺画像。 在第一版（1848年）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定义了写这本书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提供关于中国“最真实、最重要、最新”的信息。第二个是消除对中国人的讽刺形象。这种讽刺形象是这样的：“总的来说，中国人是一个无趣、怪诞、未开化的‘猪眼’民族，人们嘲笑他们没有任何风险；他们是一个‘雨伞种族’，‘长尾天人’，既自负又无知，几乎无法改进。”威廉姆斯希望审视中国的地理，并记录中华帝国的每一个方面，以避免这种对中国人民的普遍而常见的印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威廉姆斯采用了"中华"这个中立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从"人民自己最常用的对国家的称呼"中引申出来的。同样重要的是，威廉姆斯是第一个在他的时代反对对中国人广泛的种族主义和负面刻板印象的先驱。 然而，作为一个新教传教士，威廉姆斯认为中国人“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占据中间地位——中国是现存的最文明的异教国家，其制度和文学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称威廉姆斯为科学汉学的先驱。

"中央王国"是对清朝中国的第一次现代描述，它大胆地宣称中国的自治性和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孤立。 "中央王国"是对清朝中国的第一次现代描述，它大胆地宣称中国的自治性和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孤立。直到二战结束，它仍然在英语世界中作为对中国的有影响力的描述。 在这个挑衅性的分析中，威廉姆斯首次将清朝中国描绘为地理上孤立的“中央王国：”

它的文明是在自身的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它的政府在不了解或参考任何其他王国的情况下塑造出来的；它的文学没有借鉴其他国家学者的才华或研究；它的语言在符号、结构和古老性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居民以他们的勤劳、和平、数量和特殊习惯而著名。

威廉姆斯的科学汉学风格与阿诺德·J的风格相似。 威廉姆斯的科学汉学风格的推进方式就像阿诺德·J·托因比（1889-1975）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的方式一样。 威廉姆斯和托因比相信文明源于其特定的环境条件，源于环境和人类努力的持续互动。 威廉姆斯和托因比相信文明源于特定的环境条件，源于环境和人类努力的持续互动。在他的简洁描绘和后来的详细解释中，威廉姆斯避免了自负，专注于对中国文明的实证检查。 他的传统汉学包括了许多方面，包括地理、人口、自然历史、治理和法律、教育、语言、建筑、服装、饮食和社会规范。 他认为，中原王朝在其历史上已经走上了一条自给自足和孤立的道路，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脱节。 他是强调中国次大陆的地理环境如何培养出中华中心主义观点的先驱。 威廉姆斯的工作深深影响了汉学领域，他关于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观念成为了许多后续关于中国文明研究的基础。

受威廉姆斯影响的人中，有约翰·K。 在受到威廉姆斯影响的人中，约翰·K·费尔班克（1907-1991）是最有影响力的。 在受到威廉姆斯影响的人中，约翰·K·费尔班克（1907-1991）是最有影响力的。由约翰·费尔班克编辑的论文集，被称为《中国世界秩序》，于1968年出版，将中国中心主义重新塑造为东亚的国际秩序。 在受到威廉姆斯影响的人中，约翰·K·费尔班克（1907-1991）是最有影响力的。约翰·费尔班克编辑的论文集，被称为《中国世界秩序》，于1968年出版，将中国中心主义重新塑造为东亚的国际秩序。东亚的所有社会，包括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和小岛王国琉球，都源于古代中国文明。 这意味着韩国，越南和琉球的政治精英共享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早期的现代日本并不符合这个模型），并且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是一种等级制度，其中较小的国家向更大的霸权国家进贡。 这个体系为霸权国家和朝贡国家都提供了一些好处。 对于霸权国家来说，朝贡体系提供了收入来源和合法性。 对于朝贡国来说，朝贡体系提供了安全保障和进入霸权国市场的通道。 朝贡体系由于几个原因维持了东亚的稳定。 首先，霸权国家总是一个可以阻止其他国家侵略的大国。 首先，宗主国总是能够阻止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的大国。其次，朝贡体系提供了一套规则和准则，规范了各国之间的关系。 朝贡体系由于几个原因维持了东亚的稳定。首先，霸权国家总是能够阻止其他国家的侵略。其次，朝贡体系提供了一套规则和准则，规范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第三，朝贡体系足够灵活，能够适应权力平衡的变化。

约翰·金·费尔班克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者。 约翰·金·费尔班克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指导和公众参与在20世纪中叶极大地塑造了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从而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约翰·金·费尔班克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指导和公众参与在20世纪中叶极大地塑造了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从而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约翰·金·费尔班克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指导和公众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对中国的理解，从而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972年，美中关系发生了重大事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关系新阶段的开始。 他的学术研究、指导和公众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对中国的理解，从而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972年，美中关系发生了重大事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作为中国问题的领先专家，费尔班克可能对这些发展发表了评论，并可能以非官方身份进行了咨询。 约翰·费尔班克的教学和著作给了美国 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有了重要的了解。 通过他的工作，他帮助在美国培养了对中国更为细致入微和了解的认识。 约翰·费尔班克的教诲和著作为美国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提供了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的重要见解。通过他的工作，他帮助在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的时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更为细致和了解。

来自塞缪尔W 从Samuel W Williams到John K 从塞缪尔·威廉姆斯到约翰·费尔班克，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形象在北美一直持续存在。 正如斯科特·肯尼迪所建议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中国的历史现实，而更多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中央王国情结的理解。 冷战时代的中央王国观念仍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的概念最近引发了一种特殊的幽灵——所谓的"中国恐慌"——这一直在模糊我们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认知。 中华帝国情结可能不过是我们集体的和谐幻觉。

## 中国的崛起：

我们时代中国的崛起为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带来了新的、全面的视角。

与“政治权力的兴衰”这种传统叙事不同，一些直言不讳的学者们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机器。 与“政治权力的兴衰”这种传统叙事不同，一些直言不讳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机器。张维为可能是近期对中国崛起进行辩护的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 在他的书《中国浪潮：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张炜炜将中国的崛起重新定义为超越西方政治概念的文明国家。 对于张，理解中国独特体系的关键在于其悠久的“文明国家”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 在他看来，文明国家与西方主权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他的观点中，文明国家与西方主权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主权国家是基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文明国家则是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有机关系。 对于张先生来说，理解中国独特制度的关键在于其悠久的“文明国家”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至少。在他看来，文明国家与西方主权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主权国家是基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文明国家则是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有机关系。主权国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而文明国家则是建立在集体权利之上。 在张的观点中，文明国家相较于主权国家有几个优势。 首先，它更有效率，因为它不需要经历繁琐的个人合同形成过程。 第二，它更稳定，因为它是基于团体团结，而不是个人权利。 在张的观点中，文明国家相较于主权国家有几个优势。首先，它更有效率，因为它不需要经历繁琐的个人合同形成过程。其次，它更稳定，因为它基于团体团结而非个人权利。第三，它更公正，因为它考虑的是团体的利益而非个人的利益。 第四，它更加和平，因为它不需要借助武力来维持秩序。 最后，它更具可持续性，因为它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问题。 那么，这一切与中国的崛起有什么关系呢？张认为，文明国家特别适合管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关键在于可扩展性。 文明国家可以扩大规模来管理大面积的领土和大量的人口，因为它是基于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 那么，这一切与中国的崛起有什么关系呢？张认为，文明国家特别适合管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关键在于可扩展性。文明国家可以扩大规模，管理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因为它是基于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相比之下，主权国家受到合同中可以容纳的个人数量的限制。 因此，文明国家更有能力管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文明国家可以扩大规模，管理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因为它是基于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的。相比之下，主权国家受到能够适应合同的个人数量的限制。因此，文明国家更适合管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另一方面，主权国家更适合管理小国。

相反，克里斯托弗·科克的《文明国家的崛起》批评了那些自称为文明国家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和伊朗。 相反，克里斯托弗·科克的《文明国家的崛起》批评了那些自称为文明国家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和伊朗。科克认为这些国家是主权国家，他们挪用文明的语言来合法化他们的统治。 相反，克里斯托弗·科克的《文明国家的崛起》批评了那些自称为文明国家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和伊朗。科克认为这些国家是主权国家，他们挪用了文明的语言来合法化他们的统治。他认为文明国家是一个神话，中国与其他任何主权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相反，克里斯托弗·科克的《文明国家的崛起》批评了那些自称为文明国家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和伊朗。科克认为这些国家是主权国家，他们挪用了文明的语言来合法化他们的统治。他认为文明国家是一个神话，中国与其他任何主权国家没有区别。作为对科克的书的回应，张维为写了《中国视野：文明国家的荣耀与梦想》。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文明国家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政治体系。 例如，世纪末的日本，尽管在美学、品味、文化和语言上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仍通过模仿西方大国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作为回应Coker的书，张维为写了《中国视野：文明国家的荣耀与梦想》。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文明国家并非神话，而是一种前瞻性的政治制度。例如，世纪末的日本，尽管在美学、品味、文化和语言上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仍通过模仿西方大国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如今，日本是G7的成员国，其行为举止就像一个西方大国。 而且，日本的大多数学者并不将其视为文明国家。

哲学家赵汀阳是所有为中国崛起辩护的人中最具权威性的来源。 他创新且有争议的书籍《天下体系》于2005年首次出版，并于2011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在这个时期（2005-2011年），来自英语世界、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和印度的许多批判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真地参与了对这本书的批判性讨论。 英文翻译版本于2021年出版：《天下体系：可能的世界秩序》。 赵的书是关于中国如何引领世界的。 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将成为主导力量，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形式，他称之为“天下”（中文词组，“天下为公”）。 赵博士认为，天下是唯一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全球治理形式。 赵的书是关于中国如何引领世界的。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中国将成为主导力量的新时代，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形式，他称之为“天下”。赵认为，“天下”是唯一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全球治理形式。世界需要一种更多极化的全球治理形式来进行区域合作。 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将成为主导力量，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形式，他称之为“天下”（中文词语，意为“天下所有”）。 赵认为，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不同文明传统的霸权国家，才能引领世界走向繁荣的未来。

中国是如何实现如此自信的国际地位的呢？中国已经在系统和大规模的层面上实现了工业化，并已经开始挑战美国的科技霸权。 中国是如何实现如此自信的国际地位的？中国已经在系统和大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化，并已经挑战了美国的科技霸权。然而，中国的经济扩张需要时间来发生。 中国是如何实现如此自信的国际地位的？中国已经在系统和大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化，并开始挑战美国的科技霸权。然而，中国的经济扩张需要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其后苏联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原始积累为基础，令国际社会震惊的是，它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扩张。 中国是如何实现如此自信的国际地位的呢？中国已经在系统和大规模的层面上实现了工业化，并已经开始挑战美国的科技霸权。然而，中国的经济扩张需要时间来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其基于后苏联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原始积累的快速经济扩张，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震惊了国际社会。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后殖民地国家不同，这些国家无法摆脱对美国的资本供应和控制，中国的两位数扩张却是自给自足的。 中国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并在三十年里向美国销售了一切。 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是相互联系的。 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后殖民地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资本供应和控制无可救药地依赖，中国的两位数扩张却是自给自足的。中国把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并在三十年里把所有东西都卖给了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是相互联系的。中国重返全球资本主义离不开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当美国在2008年陷入次贷危机时，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中美共生关系开始瓦解。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超过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国的政府对这种减速做出的回应是投资于交通运输以及商业和住宅物业，这导致了债务问题和房地产泡沫。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超过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反应，投资于交通和商业及住宅物业，导致了债务问题和房地产泡沫。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打压异议并加强对公民的监控。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社会仍然相对稳定，政府的民众支持是坚不可摧的。 然而，最近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 因此，许多中国观察家都在怀疑中国能否在2035年前保持其经济扩张。 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超过了日本。

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发展之一。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转变成了全球经济强国。 中国的外交影响力正在扩大，其军事能力正在增强，其国际经济影响力也在增长。 其年轻人和企业家的活力，市场的活力，以及中国领导层的信心，都表明这个国家正在重新定义在全球事务中的主要参与者的含义。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改变了全球力量的平衡，并引发了对中国意图的担忧。 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不平等、环境恶化、人口萎缩和腐败等问题。 尽管中国目前并未被视为超级大国，但其潜力已经引起了世界上唯一的现存超级大国及其主导地位的担忧。

鉴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将在塑造21世纪起着关键的作用。 "中国恐惧症"和"中国痴迷症"的新浪潮目前正在渗透我们的知识性对话和公共讨论中。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对中国有可能破坏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深感忧虑。 与此同时，中国设想自己从历史废墟中崛起，寻求重拾18世纪的黄金时代。 我在这里所描绘的关系，即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与18世纪清朝中国的领土扩张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中国的战略抱负常常回溯到其过去的繁荣时期。 然而，我并不是在借用中国的雄心壮志来证明我的观点，而是要揭示这是一种体现在重燃过去帝国辉煌的政治抱负。 我在这里所描绘的相关性，即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与18世纪清朝中国的领土扩张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的战略抱负经常回溯到其过去的繁荣时期。然而，我并不是为了证明我的方法而引用中国的野心，而是为了揭示它作为重燃过去帝国辉煌的政治抱负。当习近平主席将中国梦概括为未来的愿景时，他的目标——不同于闪耀的山城——基本上指向了18世纪中国在全球的顶峰的复兴。

鉴于当前的政治环境，我们如何在考虑到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的同时，重新评估十八世纪中国的历史？我们现在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观点，超越“中华帝国情结”。将中国视为一个过于多疑、以自我为中心、居高临下的超级大国只会加剧对中国的恐惧；将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投射到清朝中国，是误解其早期现代性的第一步。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处理与邻国和从属实体的关系时，从清朝开始，一直遵循着等级分明、以民族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他们现在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

随着中国的崛起反驳了某些东方主义的偏见，例如错误地认为其文字系统或儒家价值观可能会阻碍现代科学的发展，令人惊讶的是，这反而加强了人们对中国可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恐惧。 虽然我不愿将这种对中国的信心激增贴上“中华优越论”的标签，但我怀疑西方的许多人可能会倾向于这样的解读。 当我们面对中国的卓越成就，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怀疑其全球意图时，消除关于中华帝国复杂性和其近代历史上的中国世界秩序的神话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这很关键？因为现在是揭示中国早期现代地缘政治思维的时刻，理解他们如何如此迅速和持续地达到当前地位。 直到现在，我们西方人仍然缺乏足够的政治词汇来准确描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种欧亚视角并非凭空出现。 只有当我们公正地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我们才能有意义地与他们交往，对吗？

这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用于分析近代早期中国的地缘政治策略和领土意识形态。 这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近代早期中国的地缘政治策略和领土意识形态。我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历史叙述，使用三组二元对立：（1）划定已知世界与领土的界限，（2）区分农业区与干旱区，以及（3）区分文明与野蛮。 虽然这些类别是为了分析而设计的，但它们经常重叠和交织，甚至可能颠倒。 这本书的目标是展示如何利用这些二元范畴，相较于传统的中央王国和中国世界秩序的分析框架，能更准确地描绘早期现代中国的地缘政治。

## 领土与已知世界：

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的广阔领域中，存在着一个被低估的模糊地带，即国家可以施加其权威的实际领土与被认知的“已知世界”或“天下”之间的区别。后者包括古代统治者认知并理解的地区，但却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 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的广泛领域中，存在着一个被低估的模糊地带，即国家可以施加其权威的实际领土与被认知的“已知世界”或“天下”之间的区别，这包括古代统治者认知和理解的，但超出他们控制的地区。实际的领土空间和已知世界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明确的，可能是故意保持这种状态，以掩盖特定的细节。 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提供了对国家的有影响力和全面的定义。 他将国家描述为“在给定领土内成功主张合法使用物理力量的垄断权的人类社区”。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明白，“合法使用物理力量”在定义他们的领土上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他们也通过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姿态，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明的典范。 马克斯·韦伯，一位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对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且全面的定义。他将国家描述为“成功主张在特定领土内合法使用武力垄断的人类社区”。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明白，“合法使用武力”在定义他们的领土上至关重要。然而，他们也展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姿态，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明的典范。这种区别在我们考虑汉朝向他们称之为“西域”（我们现在称之为中亚）派遣使者时尤为明显。 这些"西域"对汉朝的统治者来说是他们已知世界的一部分，但他们却没有任何手段来对其进行控制。

来自华北平原的古代统治者自称为已知世界的君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天下的一切。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早期的中国国家在他们的领域内非常先进且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古代中国统治者的权力仅限于华北平原的几个河流盆地，他们经常需要帮助来管理他们的附庸。 他们声称自己是已知世界的保护者，这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际的。 因此，理解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区域和“已知世界”（天下）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

在十三世纪，从蒙古统治者及其顾问的角度来看，似乎蒙古政权已经成功地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占领或统治了这些领土。 蒙古人的中国和波斯顾问感到惊讶，他们试图在任何可获取的书面资源中记录下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举。 特别是波斯文本，详细描述了西亚和中亚的人文和文化地理。 波斯和中国的顾问充分了解已知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人可以控制他们在中亚或西亚的领土。 蒙古人继承了中国宋朝的行政体系，并在中国的元朝领土内进行统治，但并未统治中亚。 直到清朝征服中亚，中国才能够对该地区进行控制和占领。

在这本书中，我大量关注了清朝的政治治理和军事策略，以及其真正控制下的地理范围。 在对18世纪中国的政治实体及其与其统治的实际领土的关系进行详细研究后，“中央王国”的概念在历史叙述中逐渐消散。 面对十八世纪清朝的大规模扩张，中国世界秩序的观念在逻辑上显得不合理。 因此，实际的地缘政治浮出水面，为当今中国的领土野心提供了有意义的背景。

## 农业区与干旱区：

在1923年，著名的中国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勾勒出一条简单却令人惊讶的线，将中国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和人口区域。 这条被称为胡焕庸线的划分，揭示了中国各地人口密度和土地分布的鲜明对比。 线的东侧人口密度明显较大，容纳了超过13亿人口。 与此同时，西部人口稀少，只有大约3亿居民，东西人口比例超过四比一。 现在被称为胡焕庸线，这条划分线揭示了中国各地人口密度和土地分布的鲜明对比。线的东侧人口密度显著较高，容纳了超过13亿人口。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只有大约3亿居民，这是一个超过四比一的鲜明比例。胡焕庸线是一个区分中国农业区和干旱贫瘠区的界线。

中国人口众多和人口较少的地区，或者说农业和干旱地区之间的对比，进一步被他们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所强调。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居民数量已经减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7.399亿。 中国的努力占全球减贫工作的70%以上。 中国用于减轻贫困的方法包括以发展为重点的方法，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提升能力，鼓励多元实体参与扶贫工作，以及保持对创新和这些倡议的持续改进的关注。 尽管中国的扶贫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些迫在眉睫的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财政投入对减贫影响的递减，可能对贫困人口内在动力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市场力量和社会实体在减贫中的参与不足。 把握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人口众多和人口较少的地区如何在今天仍保持政治重要性至关重要。

在他的开创性著作《论中国人口》中，胡主张，由于中国的广大面积和多样化地理环境，任何政策或发展计划都会对胡焕庸线的每一侧产生不同的影响。 无论中国发生什么——战争、饥荒或自然灾害——这条线，象征着中国的生态和人口结构，都会持续存在。 这种结构的持久简单性令人震惊。 中国的人口从1923年的4亿增长到2020年的14亿，然而，胡焕庸线，最初在1923年构想出来，至今仍然具有相关性。 尽管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化经济体，但胡焕庸所确定的人口结构限制仍然存在。 尽管在高速铁路和转基因食品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中国人口还是没有克服这些持久的界限。 中国的人口从1923年的4亿增长到2020年的14亿，然而，胡焕庸线，首次在1923年被提出，如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个国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化经济体，但胡焕庸所指出的人口结构限制仍然存在。尽管中国在高速铁路和转基因食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中国人口并未能克服这些长期存在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胡焕庸线也强调了佛教-萨满教草原世界和儒家中国之间的历史二元性。 这两个世界——拥有各自独特的生态系统、人口、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如何能够持续共存甚至融合至今呢？

鉴于胡焕庸线所强调的结构和地理限制，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朝军队是如何成功征服并占领中亚，以及如何创造现代中国领土的。 在十八世纪初，清朝的军事行动使中国的领土增加了超过200万平方公里。 然而，由于这些新获得的地区具有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将它们融入清朝帝国带来了挑战。 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试图将他们的臣民统一为单一的汉族身份。 然而，由于这些新获得的地区拥有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将它们融入清朝帝国带来了挑战。清朝统治者并未试图将他们的臣民统一为单一的汉族身份。相反，他们采取了文化和宗教宽容政策，承认中国大陆的定居农业社会和草原上的游牧社会之间的鲜明差异。 詹姆斯·米尔沃德在他的分析中将其称为“民族政策”。 清朝统治者并未试图将其臣民统一为单一的汉族身份。相反，他们实行了一种文化和宗教宽容政策，承认中国大陆的定居农业社会和草原上的游牧社会之间的鲜明差异。詹姆斯·米尔沃德在他的分析中称这为“民族政策”。到大约1820年清朝领土扩张的结束时，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国家的东半部，即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这个地区通常被称为中国本土（也包括今天的满洲）。 清朝领土的西半部，即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包括辽阔的西藏高原、戈壁沙漠和蒙古-满洲草原，人口稀少。

清朝统治者开创了一种创新的地理观点，为二十世纪的胡焕庸线奠定了基础。 清朝统治者开创了一种创新的地理观点，为二十世纪的胡焕庸线奠定了基础。 前明帝国的空间观念是以一个中心点及其周围为基础的，将北京定位为核心，所有其他地区都被视为附属或附庸。 然而，来自东北的满族人自然倾向于从南北区域的角度来看待空间。 他们迅速认识到需要更新明朝对中国领土的认识，以准确反映其实际的地理现实。 因此，满族人引入了一种新的地理结构，基于农业区和干旱区的区别。 然而，来自东北的满族人自然倾向于从北方和南方的角度来看待空间。他们迅速承认需要更新明朝对中国家园的概念，以准确反映其实际的地理现实。因此，满族人引入了一种基于农业和干旱区域区别的新颖地理结构。这个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两个部分，就像胡焕庸线一样清晰。 在农业和人口密集的一侧，清帝国将其称为“统一区”，完全由儒家官僚治理，包括十八个省的大约1500个县。 在农业丰富且人口密集的地方，清朝将其称为“统一区”，完全由儒家官僚机构管理，大约包括十八个省的1500个县。在人口稀少、干旱且资源匮乏的地区，清朝将其称为“边疆区”。清军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而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则负责政治和法律体系。 这个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两个部分，就像胡焕庸线一样清晰。在农业发达且人口密集的一侧，清朝将其称为“统一区”，完全由儒家官僚机构管理，大约包括十八个省的1500个县。在人口稀少、干旱、资源匮乏的地区，清朝将其称为“边疆区”。清军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而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则负责政治和法律体系。这两个区域——统一区和边疆区——共同构成了清朝的领土。

其次，清朝的学者们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时间框架，将他们的新领土帝国置于中国历史之中。 清朝统治精英如何通过威望、地位、婚姻、族裔和荣誉等重叠的关联，构建他们对满族、蒙古族和汉族贵族的政治权威？清朝的统治精英群体最初是一个军事联盟的统治者——这是一个源于游牧草原式战争的军事等级制度，随着清朝的军事成功而演变。 清朝在征服中国本土后，儒家官僚机构对"天命"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以赋予满族和蒙古族政治合法性。 清朝的世界君主制需要不断调整和适应基于经典经文的儒家普世主张，反之亦然。 天命无疑是中国、满族和蒙古族统治精英的合法性来源。 清朝的世界主义统治性质使清朝国家在清朝统治精英有机会时向中亚西扩。

因此，这本书主要关注清朝君主与儒家官僚的合作。 因此，这本书主要关注清朝皇权与儒家官僚制度的合作，并根据对儒家经典的新解释，重新构思了中国历史的时间分期。 因此，这本书主要关注清朝君主与儒家官僚的合作。清朝君主与儒家官僚的合作根据儒家经典的新解释，重新构想了中国历史的时间分期。伴随着新的空间框架，清朝学者制定了一个新的空间-时间框架，以描述和赞美他们所处时代和地点的清朝统治的普世性质。 清朝帝国考虑到其在地球上的实际地缘政治位置，并重新考虑了清朝帝国在儒家语言框架下的中国历史中的时间位置。 结果是对儒家普世主义的空间-时间框架的初步重构。 这种普遍主义不能简化为中国的世界秩序。

## 文明对野蛮：

标题“等待野蛮人”最初是借用了君士坦丁·F所写的一首诗的名字。 标题“等待野蛮人”最初是借用了君士坦丁·卡瓦菲的一首诗。 标题“等待野蛮人”最初是从君士坦丁·卡瓦菲的一首诗中借用的。我采用这个标题来传达我的中心论点：清朝在东亚建立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个结构基于其对世界秩序和政治地理的普遍认知。 标题“等待野蛮人”最初是从康斯坦丁·卡瓦菲的一首诗中借用的。我采用这个标题来传达我的中心论点：清朝在东亚建立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个结构基于其对世界秩序和政治地理的普遍认知。卡瓦菲诗集的第一部完整收集是由纽约文化评论家丹尼尔·门德尔松翻译和整理的；我依赖的就是他的翻译。 Mendelsohn巧妙且毫不费力地在古代和现代的精英和主流文化之间导航。 他对《阿凡达》、《我是传奇》等热门电影，以及《权力的游戏》、《广告狂人》等电视剧的敏锐分析，让我对他的洞察力印象深刻。 在他的散文集的引言部分，也同样以“等待野蛮人”为标题，Mendelsohn概括了Cavafy在1904年首次发表的著名诗歌，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从这个角度来看，卡瓦菲的诗描绘了“一个珍贵的文明被野蛮的原始力量悬而未决地威胁的困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受到关注的珍贵文明可能并不一定处于崩溃的边缘，或者受到这种粗暴的野蛮力量的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看，卡瓦菲的诗描绘了“一个珍贵的文明被野蛮的原始力量悬而未决地威胁的困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受到珍视的文明可能并不一定处于崩溃的边缘，或者受到这种粗暴的野蛮力量的威胁。相反，这种即将到来的危险和灾难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植根于毫无根据的恐惧或误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卡瓦菲的诗描绘了“一个珍贵的文明被野蛮的原始力量悬崖勒马的困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受到珍视的文明可能并不一定处于崩溃的边缘，或者受到这种粗暴的野蛮力量的威胁。相反，这种即将到来的危险和灾难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植根于毫无根据的恐惧或误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卡瓦菲的诗描绘了“一个珍贵的文明被野蛮的原始力量悬崖勒马的困境”。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个受人珍视的文明可能并不一定处于崩溃的边缘，或者受到这种粗暴的野蛮力量的威胁。相反，这种即将来临的危险和灾难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植根于毫无根据的恐惧或误解。 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探讨了这首诗主要且更普遍的解读中所固有的模糊性。 在Coetzee于1980年出版的获奖小说中，一个未命名的叙述者讲述了一个中年法官在帝国殖民地的一个偏远沙漠哨所的故事。 法官在帝国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权威或影响力。 帝国对外来者持怀疑态度，常常将他们描绘为残忍和敌对。 故事从新任治安官的任命开始，他渴望向帝国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逐渐开始质疑帝国抹黑和虐待野蛮人的政策。 他与一个来自野蛮部落的年轻女子建立了联系，她是被折磨的俘虏，被带到了这个前哨。 他对这个野蛮女人产生了矛盾的非性和性的感情，同时他对野蛮人的同情心也在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治安官开始认识到帝国的残忍和不公。 他对抗帝国的行为导致了他被捕和折磨。 最终，总督被从监狱中释放，并返回到了被帝国摧毁的边陲小镇，他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科茨西的小说《等待野蛮人》的标题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它描绘了一个文明帝国害怕被所谓的野蛮外部力量所淹没。 帝国对野蛮人的严酷和冷酷的待遇源于他们将他们视为不文明的看法。 中央的困境出现了：面对所谓的低等、野蛮的外来者，应该怎么做？对于法官来说，当他的人民的残忍和不公显现出来时，他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根据门德尔松的说法，库切的阅读并不是卡瓦菲的诗的唯一解读。 第二种更积极的阅读如下：

在康斯坦丁·卡瓦菲的《等待野蛮人》中，一个非常宏伟和复杂的文化的代表们，虽然没有命名，但显然是罗马，他们在城门口以极其庄重的态度集结，从皇帝到他的各种官员，都在等待着（同样没有命名的）“野蛮人”的使者的到来。……只有在诗的最后一行，卡瓦菲才给这个过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你会发现，皇帝和其他人都在期待野蛮人的到来。 在康斯坦丁·卡瓦菲的《等待野蛮人》中，一个非常宏大和复杂的文化的代表们，虽然没有命名，但显然是罗马，他们在城市大门口以极其庄重的态度集结，从皇帝到各种官员，都在等待着（同样没有命名的）“野蛮人”的使者的到来。……只有在诗的最后一行，卡瓦菲才给这个过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你会发现，皇帝和其他人都在期待野蛮人的到来。"也许这些人，"叙述者在最后一行叹息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这首诗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期望的困惑。 所以，这首诗以多种方式表达了混乱的期望。当然，有等待的皇帝和他的人民的失望的期待，但更重要的是，也许还有诗的读者奇怪的落空的期待，这些期待是由那个声音洪亮，充满预兆，现在已经出名的标题所设定的。 所以，这首诗以多种方式表达了混乱的期望。当然，有等待的皇帝和他的人民的失望的期待，但更重要的是，也许有诗的读者的奇怪的落空的期待，这些期待是由那个庄重的，充满预兆的，现在已经出名的标题所设定的。脱离了其背景，"等待野蛮人"这个短语已经被用作从J的小说标题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 Coetzee到一首由英国乐队The Libertines演唱的歌曲的标题，都让人产生了一种期待，即等待着一些即将到来的重大事件。 当然，有等待的皇帝和他的人民的失望的期待，但也许更多的是，诗的读者的奇怪的落空的期待，这些期待是由那个声音洪亮，充满预兆，现在已经出名的标题所设定的。脱离了其背景，"等待野蛮人"这个短语，已经被用作从J M Coetzee的小说标题，到巴黎一家时尚男装店的名字，似乎是在讲述一个珍贵的文明被野蛮的力量危险地围攻的困境。 从其背景中剥离出来，“等待野蛮人”的短语，已被用作各种事物，从J M Coetzee的小说标题到巴黎一家时尚男装店的名字，似乎都在讲述一个珍贵文明被野蛮力量危险围攻的困境。然而，Cavafy本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卡瓦菲本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在1904年写下的一段笔记（也就是他发表这首诗的那一年）表明，对他来说，这首诗“一点也不违背我的乐观主义观念”，实际上，它代表了“向善的进步中的一个片段”。

第二种解释被封装在诗的结尾对句中，代表了卡瓦菲的个人观点，门德尔松将其识别为“通往美好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正如门德尔松所强调的，这首诗体现了落空的期望。 第二种解释被包含在诗的结尾对句中，代表了卡瓦菲的个人观点，门德尔松将其识别为“朝向美好的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正如门德尔松所强调的，这首诗体现了落空的期望，而不是描绘文明受到攻击的困境，而是描绘了朝向更大的善的进步。 在这种解释中，标题暗示了从文明到野蛮的连续性。 文明化的人，由帝国象征，已经磨练了他们的文化并培育了他们的文明。 他们居住在城市中，并维持着复杂的社会结构。 在这种解释中，标题暗示了从文明到野蛮的连续性。文明，由帝国象征，已经磨练了他们的文化并培育了他们的文明。他们居住在城市，并维持复杂的社会结构。他们也是那些将野蛮人视为低等和威胁的人。 根据这种解释，门德尔松建议，“等待野蛮人”的标题象征着在一个停滞和衰老的文明中期待变革的希望，因为期待野蛮人的到来代表着向积极结果的进步。 在这个观点中，等待的皇帝和他的公民不仅仅是在等待野蛮人的到来。 他们期待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根据这种解释，门德尔松建议，“等待野蛮人”的标题象征着在一个停滞和衰老的文明中期待变革的希望，因为期待野蛮人的到来代表着朝着积极结果的进步。在这个观点中，等待的皇帝和他的公民不仅仅是在等待野蛮人的到来。他们期待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种未明确的期待可能被认为是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观点中，等待的皇帝和他的公民不仅仅在等待野蛮人的到来。他们期待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种未明确的期待可能被认为是新时代的开始。这种解释更符合卡瓦菲在他的一生中的乐观进步主义。

“等待野蛮人”的微妙译解与本书中提出的论点相吻合。 清朝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部被打乱和破坏期望的编年史，最终导致接受，适应，并克服了蛮族的边界。 我们是在反思明朝的结束，而不是清朝的开始吗？或者是十七、十八世纪满汉族群之间的民族紧张关系？我们是否在考虑满汉族对中亚人的军事行动，他们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清朝视角中被视为野蛮人？那么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冲突呢？或者我们是在将今天的中国与二十世纪的过去版本进行比较？这些类比确实引发了思考，但每一种比较都提出了其独特的问题。

明朝的崩溃并非由于所谓的"野蛮"外来者的行为，而是由于其对所谓的"野蛮人"的自私和无情的政策。最初被视为外来者的人最终重新定义了“野蛮人”这个词。 明朝的崩溃并非由于被视为野蛮的外来者的行为，而是由于其对所谓的“野蛮人”的自私和无情的政策。最初被视为外来者的人最终夺回了“野蛮人”的称号。清朝的建立是基于其征服和殖民了“文明先进的中国人”的成就。 帝国试图消除的正是那些为其辉煌奠定基础的人。 随着清帝国的扩张，其世界性的活力也随之繁荣起来。 在十九世纪的欧美帝国主义下，中国沿海地区受到半殖民地的压迫，使其曾经的世界性精神受到了压制。 帝国的自我毁灭倾向最终导致了它的覆灭。 在当前盛行的中国民族主义中，人们对新型世界主义的渴望日益增长。

## 书籍大纲：

这本书分为五章，以这个介绍作为第一章开始。

在第二章“中国历史中的想象领土”中，我深入探讨了中国复杂的地理和政治叙事。 在第二章“中国历史中的想象领土”中，我深入探讨了中国复杂的地理和政治叙事。深入研究其帝国遗产，揭示出四个独特的“想象领土”，这些领土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第二章“中国历史中的想象领土”中，我深入探讨了中国复杂的地理和政治叙事。深入研究其帝国遗产，揭示出四个独特的“想象领土”，这些领土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中最重要的领土是备受尊崇的《春秋》。 在第二章“中国历史中的想象领土”中，我深入探讨了中国复杂的地理和政治叙事。深入研究其帝国遗产，揭示了四个不同的“想象领土”，这些领土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领土中最重要的是备受尊崇的《春秋》。这部古代经典产生了三种主要的解释：公羊、谷梁和左氏的观点。 公羊观点明确划分了文明的中国中心地区和被视为野蛮的外部地区。 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化的对比，并引入了“大同”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观念，即中国的中央政权视自己为文明的典范，而周围的地区则被视为野蛮。

十一世纪的黎明标志着第二个想象领土的出现，这与新儒家的崛起相吻合。 这种思想浪潮进一步加大了崇尚的儒家理想和被贬低的野蛮行为之间的区别。 这个思潮强调了崇高的儒家理想和被贬低的野蛮行为之间的区别。像朱熹这样的重要人物，作为这个运动的基石，提出了圣人之道触手可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思想。 十一世纪初的黎明标志着第二个想象领域的出现，与新儒家的崛起相吻合。这个思想浪潮强调了崇高的儒家理想和被贬低的野蛮行为之间的区别。像朱熹这样的重要人物，作为这个运动的基石，提出了圣人之道在每个人的触手可及之内，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种开创性的思想。虽然新儒家并未得到普遍接受，但它在早期现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种哲学强调了代际价值观的连续性，减少了地理边界的重要性。 在这个叙述中，政治权力认为自己体现了美德，而不论其地理领域。

在十三世纪，面对不断扩张的蒙古元帝国的背景下，第三个领土开始成形。 波斯天文学家贾马尔·阿尔·迪恩倡导为蒙古帝国创建大联盟文档。 这部伟大的作品，得到了儒家学者徐有仁的深入洞察，赞美了蒙古帝国的宽宏大量。 在徐的介绍性言论中，他将蒙古帝国的领土范围与其中国的前任进行了比较，强调了蒙古人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通过这个叙述，蒙古的征服成为了历史的里程碑，象征着美德。 这为未来的朝代设定了基调，即将政治权威、领土征服和扩张与德政相等同。

明朝（1368-1644年），在洪武和永乐等皇帝的领导下，最初倡导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统治哲学。 然而，在土木之役这一标志性事件中，正统皇帝被俘后，局势发生了剧变。 然而，土木之变这一关键事件的发生，使得形势发生了剧变，这一事件的标志是正统皇帝被俘。这个转折点催生了《大明总督文书》，这部文书强调了中国文明与东南亚所认为的野蛮实体之间的区别。 明朝（1368-1644年），在洪武和永乐等皇帝的领导下，最初倡导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统治哲学。然而，土木之困后，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以正统皇帝被俘为标志。这个转折点催生了《大明宪文》，强调了中国文明与东南亚所认为的野蛮实体之间的区别。这种重新定位将焦点从世界主义互动转向加强中国内地与东南亚野蛮人的对抗，这是在试图穿越草原并消除蒙古威胁的尝试失败后的结果。 在这个叙述中，政治权力将自己视为中国身份的灯塔，锚定在一个明确定义的领域内。

第三章，“清朝的大地测量”，深入探讨了清朝通过全面的大地测量来增强其领土记录的努力，尤其是在其领土迅速扩张的时期。 康熙皇帝的统治在统一广大的中国领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面对并克服吴三桂领导的联盟发动的内战等难题的同时，康熙皇帝也关注那些吴三桂可能与罗曼诺夫俄国结盟的边疆地区。 皇帝开始穿越各种地形，战略性地将军队部署对抗准噶尔蒙古人的军队。 承认了耶稣会士费尔南多·维尔比斯特的技术专长，康熙任命他改进武器并制作全球地图。 在承认耶稣会士费尔南多·维尔比斯特的技术专长后，康熙任命他改进武器并制作全球地图。维尔比斯特的作品《世界全描》基于托勒密的地理学，强调了地球的球形性和天文制图的重要性。 这项工作也符合康熙对边疆的战略愿景。

早在1672年，康熙皇帝就展示出了他对地图制作的浓厚兴趣，开始在紫禁城的入口处进行测量。 在战胜吴三桂的内战后，康熙于1681年进行了“东巡”，目的是精细地绘制满洲领土的地图。 大清大同文献馆在帝国的制图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696年，面对中亚地区日益升级的地缘政治挑战，康熙皇帝发起了对准噶尔蒙古的重大军事进攻。 此外，他们还对满洲和内蒙古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随着18世纪的到来，皇帝发起了一系列详细的大地测量探索，最终导致了康熙地图集的创建。

在雍正和乾隆皇帝的统治期间，清朝与耶稣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雍正和乾隆皇帝的统治期间，清朝与耶稣会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雍正限制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但他却重视他们在制图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在乾隆时期，明显地从耶稣会的影响中脱离出来，转向更“中央和正统的方法（中法）”。

面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复杂性，清朝抓住了内部纷争的机会，导致了军事征服和民族并吞。 大清帝国在1756年，1759年和1772年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大地测量探索，将中亚地区纳入了他们的地图表示中。 这些调查被视为战略军事行动，对塑造中国的现代边界起到了关键作用。 清朝帝国的精细大地测量工作改变了其对自身领土和邻国的认识。 以下章节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对特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转变之旅。

表单底部

在第四章"探索黄河源头"中，我研究了关注黄河源头的大地测量调查的文化含义。 在雍正皇帝的书《解惑》中，这本书在概念上为这次探索做了准备，作为对当时盛行的反满情绪的反驳。 皇帝特别针对学者陆留良的观点，他认为满洲人是野蛮人。 在这本书中，皇帝为满族的合法统治地位进行了辩护，并挑战了将他们描绘为野蛮人的儒家观点。 雍正皇帝的书《解惑论》在概念上为这次探索做了准备，作为对当时盛行的反满情绪的反驳。皇帝特别针对学者陆留良的观点，他认为满族人是野蛮人。通过这本书，皇帝为满族的合法统治辩护，并挑战了将他们描绘为野蛮人的儒家观点。这本出版物强调了清朝对反满抵抗的决心，重塑了儒家批评的边界，旨在赢得地方精英的支持，并强调了国家和地方领导层之间的优先事项的对比。

雍正皇帝质疑了一个观点，即统治者的出生地决定了他们的合法性，他主张，一个宽大的皇帝应该监督农业和游牧地区。 雍正皇帝质疑了一个观点，即统治者的出生地决定了他们的合法性，他主张，一个宽大的皇帝应该监督农业和游牧地区。他试图改变“野蛮人”的主流观点，并认为一个人的地理根源不应决定他们的统治权。 然而，他的继任者，乾隆皇帝，在1735年禁止了这本书，因为它对皇室血统的描绘不利。 他的才华横溢的顾问齐昭南支持皇帝关于地理的观点。 在1736年，齐昭南在宫廷特殊考试中表现出色，开始在清朝宫廷任职。 他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写了《水道要网》。 这部作品详细介绍了清朝鼎盛时期中国和中亚的水道，突出了清朝广泛的领土扩张。 然而，由于对他家族的文学审查，齐的声誉面临挑战。

在清朝中国，纪昀的圈子，包括戴震，引入了对历史记录中地理解释的创新方法，塑造了清朝的领土理解。 在清朝，纪昀的圈子，包括戴震，引入了对历史记录中地理解释的创新方法，塑造了清朝的领土理解。纪昀在返回中亚后，加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团队，这是一个庞大的皇家图书馆项目，旨在加强清朝君主与儒家的联系，同时精心排除了任何反满洲的内容。 在1782年，乾隆皇帝启动了寻找黄河源头的项目。 阿米塔，一位受到信任的皇家侍卫，确定了天池为黄河的源头。 随后，一个新的知识项目开始了。 在1782年，乾隆皇帝启动了追溯黄河源头的项目。一位受信任的皇家卫兵阿米塔确定了天池就是河流的源头。随后，一项新的知识项目开始了。这项由纪昀主管的工作旨在纠正历史上的错误，并展示黄河是如何从中亚开始，蜿蜒穿越中国的。 这强调了理解领土完整性和中亚地区的重要性，标志着清朝对该地区观念的进步转变。

在第五章"巩固内外领域"中，我通过分析《地球插图与解释》一书，研究了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的政治意义。 在第五章“巩固内外领域”中，我通过分析《地球插图与解释》一书，研究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政治意义。这本书为儒家学者简化了大地测量学。 在1745年抵达北京的耶稣会数学家米歇尔·贝诺伊斯特，对制图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设计皇家圆明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第五章"巩固内外领域"中，我通过分析《地球的插图和解释》一书，研究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政治意义。这本书为儒家学者简化了大地测量学。耶稣会数学家米歇尔·贝诺伊斯特于1745年抵达北京，对制图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设计皇家圆明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工作最终为乾隆皇帝制作了世界地图，并撰写了《地球的插图和解释》。 阮元，1764年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1789年加入了著名的翰林院。 他与乾隆皇帝的亲信和珅的密切关系，提升了他的影响力。 然而，和珅的倒台由于他们的密切关系影响了阮元的职业生涯。 在1799年，阮元赞助出版了《地理图说》。

在书的引言中，阮承认欧洲人在宇宙理解方面的精通。 在书的引言中，阮承认欧洲人对宇宙理解的精通。他鼓励学者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这种知识。 在书的引言中，阮承认欧洲人对宇宙理解的精通。他鼓励学者们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这些知识。虽然许多历史学家错误地将阮的观点视为种族中心主义，但它更符合伏尔泰的“宽容”原则，对宝贵的外国见解表示宽容。 阮的目标是使用中国的天文和计时方法，向本地学者阐明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 这部作品，《地球的插图和解释》，详细描绘了我们的星球，展示了其形状、子午线和纬度划分。 在地球被认识为是球形且可测量的情况下，清帝国重新设想了其地缘政治边界，区分了其农业（内部）和干旱（外部）领土。 接下来的两个例子展示了清朝对这些内部和外部领土的意识形态统一。

尽管面临财政困扰和政治模糊，齐士义仍撰写了一部关于中亚的重要著作，名为《我在西部地区所听到和目睹的记录》。 尽管面临财政困境和政治模糊，齐士义还是创作了一部关于中亚的重要著作，名为《我在西部地区听到和目睹的记录》。这部作品深入理解了早期现代地理测量学，详细描述了新疆的地理、邻近的政权、军事行动和文化见解。 尽管面临财政困境和政治模糊，齐士义仍创作了一部关于中亚的重要著作，名为《我在西部地区听到和目睹的记录》。这部作品深入理解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详细描述了新疆的地理，其邻近的政权，军事行动和文化见解。齐士义的作品强调了天山等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并突出了清朝在中亚的雄心。 在1777年的嘉峪关以外，存在三个不同的群体：蒙古人，维吾尔穆斯林和藏族人。 这项工作深入理解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详细介绍了新疆的地理，其邻近的政权，军事行动和文化见解。齐士义的作品强调了像天山这样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并突出了清朝在中亚的野心。1777年，嘉峪关以外存在三个不同的群体：蒙古人，维吾尔穆斯林和藏族人。齐士义的著作详细介绍了维吾尔穆斯林，他们的风俗，传统和在准噶尔蒙古人统治下的历史。 他描绘了清朝的征服是维吾尔人的解放。

在1787年，朱桂和王忠就下扬子江流域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对话。 在1787年，朱桂和王忠就下扬子江流域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对话。这种地缘政治的突出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清朝对附近的阮朝、朝鲜和德川日本等国家的承认，认为它们是儒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787年，朱桂和王忠就长江下游流域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对话。这种地缘政治的突出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清朝对附近的阮朝、朝鲜和德川日本等国家作为儒家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认可。清朝官员阮元强调该地区的生态和地缘政治价值，将焦点从传统的等级制度转移到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从“三江”辩论中得到启示。 阮元主张将现代的记载与古代的文本进行比较，以了解生态变化。 他观察到沿海贸易中心相较于传统内陆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清朝官员阮元强调该地区的生态和地缘政治价值，从传统的等级制度转向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从“三江”辩论中汲取启示。阮元主张将现代记载与古代文本进行比较，以了解生态变化。他注意到沿海贸易中心相对于传统的内陆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清帝国明确界定了其领土边界，强调了其凝聚力和明确的边界。

我的书深入探讨了清朝作为欧亚大陆主要大国崛起期间，中国早期现代的地缘政治观。 然而，随着1850年左右清帝国的衰落，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变。 然而，随着1850年左右清朝的衰落，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二十世纪的临近，现代民族国家、庞大的工业帝国和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开始塑造全球格局，世界大战的威胁也日益临近。 因此，现代地缘政治冲到了中国的优先事项的最前沿，使清朝时代曾经盛行的地缘政治观念黯然失色。

# 第二章：中国历史中的想象领土

本章介绍了从轴心时代到近代早期，四种重叠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想象领土”的历史。 这一章节介绍了从轴心时代到近代早期，四种重叠的看待中国“想象领土”的历史。这些想象的领土是根据地方当局给出的测量数据编制的，然后被合法化并强加给人民以支持现有的秩序。 这一章介绍了从轴心时代到近代早期，四种重叠的看待中国“想象的领土”的历史。这些想象的领土是根据地方当局给出的测量数据编制的，然后被合法化并强加给人民以支持现有的秩序。换句话说，古代中国的想象领土具有实证输入。 这并不是像创世神话或诗歌中对宇宙或神灵的随意或创造性的想象。 这些想象的领土，是根据地方当局给出的测量数据编制的，然后被合法化并强加给人民，以支持现有的秩序。换句话说，古代中国的想象领土有实证输入。它不是对宇宙或神灵的随机或创造性的想象，如在创世神话或诗歌中。古代中国的国家深深地投入于绘制他们政治权威的范围和影响力。 虽然考古发现表明日晷和尺子是这些古代国家常用的工具，但古代中国帝国的规模超过了这些工具提供精确或可靠测量的能力，无论是天体领域还是地理景观。 这些测量宇宙的限制非常明显，如《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所示。 然而，中国帝国的政治格局源于一个独特的文明同心层次系统，使其既不同于地中海世界，也不同于日本群岛。 然而，中国帝国的政治格局源于一个独特的文明同心层次系统，使其既不同于地中海世界，也不同于日本群岛。

想象的领土历史包括四种在时间顺序上重叠的空间表现形式。 中国的政治权力比其他地区更早地集中了对其领土的空间表现，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 中国政治权力的早熟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录。 因此，中国的空间表征与西方的领土发展不同，后者经历了封建主义阶段，如封建或商业土地所有权，或者中世纪欧洲或日本的县或地区的行政插图。 相反，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并未经历地中海或日本的经验。

## 文明的理想？

古代的智慧能否继续激励我们？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53年出版了《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在其中他引入了古代世界轴心时代的概念。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53年出版了《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在其中他引入了古代世界的轴心时期的概念。当代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对古典时期的划分也呼应了这一观点。 在轴心时代，各种超越性的思想在所有主要的欧亚文明中独立地出现。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说法，轴心时代“成为了一个酵母，将人类引入了世界历史的单一语境中”。 根据贾斯珀斯的说法，轴心时代“成为了一个酵母，将人类带入了世界历史的单一语境中。”对于我们来说，它成为了一个衡量标准，我们用它来衡量整个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意义。”这样的普遍主义并不是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是对世界历史实际发展的实证研究的结果。 贾斯珀斯概述了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 根据贾斯珀斯的说法，轴心时代“成为一种发酵剂，将人类引入世界历史的单一语境中。”对于我们来说，它成为了一种衡量各种人类整体历史意义的标准。”这种普遍主义并非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是对世界历史实际发展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贾斯珀斯概述了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他描述了世界历史的第一阶段，即在欧亚大陆上发展各种文明。 他描述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为轴心时期（大约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第一个统一体开始形成，同时在欧亚大陆爆发，并达到了最高的普遍哲学反思水平。 贾斯珀斯概述了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他将世界历史的第一阶段描述为在欧亚大陆上发展各种文明。在第二阶段，即轴心时期（大致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人类的第一次统一在欧亚大陆上同时爆发，并达到了最高的普遍哲学反思水平。这种哲学反思将成为未来超验和普遍观念的基础。 然后，世界文明以其高古代的传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在第三阶段，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的智识成就（包括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作为一位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战争的犹太哲学家，贾斯珀并未谈论二十世纪的世界欧洲化或西方衰落。 他的哲学渴望驱使他期待着一个“第二次轴心时期”，这将再次揭示人类的团结。

中国的轴心时代与通常被称为战国时期的时代相吻合，该时期从公元前770年持续到公元前256年。 在这段时间里，不同规模和实力的国家在华北平原和扬子江流域并存、竞争并结成联盟。 就像希腊的城邦一样，这个古代中国的多国体系催生了丰富多彩的事件和人物，包括国王和哲学家，战士和刺客，以及毫无意义的残忍和崇高的牺牲。 这也是孔子和其他重要思想家诞生的时代，使其成为中国知识史上的关键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不同大小和实力的国家在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并存，竞争，形成联盟。就像希腊的城邦一样，中国古代的多国体系催生了丰富多彩的事件和人物，包括国王和哲学家，战士和刺客，无意义的残忍和崇高的牺牲。这也是孔子和其他重要思想家诞生的时代，使其成为中国知识史上的关键时期。当秦国雄心勃勃的国王征服了所有其他政治对手，并宣布自己为秦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21-206年）时，丰富多彩的国际政治结束了。 然而，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然而，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混乱的战争再次爆发。 当秦的雄心勃勃的国王征服了所有其他的政治对手，并宣布自己为秦帝国（公元前221-206年）的第一位皇帝时，多彩的州际政治就结束了。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混乱的战争再次爆发。刘家最终打败了所有的对手，由刘家创立的汉帝国在公元前206年左右崭露头角，标志着中国帝制体系的开始。 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统一的时代已经开始。

轴心时代在汉帝国建立了新的政治凝聚力的时代结束。 像西方的罗马帝国一样，汉朝在中国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基础，包括标准化的行政语言。 汉帝国的政治影响力遍布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其核心选民群体由居住在华北平原的一些贵族家庭组成。 汉皇帝和这些贵族家庭将儒家五经（被尊为圣经）封为经典。 他们贬低了早期的战国和分裂时期（轴心时期）的其他思想体系。 通过这样做，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第一个帝国正统。 从一开始，五经项目就突显出鉴别“真实”文本和伪造品的困难。 尽管对五经进行了确立和标准化，但几个版本和随之产生的解释仍然并存。 它们中的许多相互矛盾。 在汉朝，贵族家庭的学者将每个家庭的世袭学问描述为“古学”，这是一个泛指一切的术语，范围从古代的工具、武器、战车、建筑和礼器，到轴心时代之前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制度。 “古学”这个词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成为了古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类别。 每当经典文本引发争议时，这个词就会被时不时地引用，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古代学习的目标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 古代学习的目标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其目的是发现始于汉字文明的政治和社会系统的真实和完美设计，这与卡尔·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哲学思考的活力和多样性的描述有所不同。 古代中国的一个关键思想，源于秦汉统一前持续了一千年的多个并存国家的竞争（即轴心时期），是一个新的区分原则：如何将中国文明与野蛮区分开来。 这个观念或政治议程，源于一个特定的衰落背景：周朝的创始家族已经失去了所有国家的尊重。 对孔子来说，值得赞扬的政治顾问管仲（公元前720-645年），被认为是负责东方齐国崛起的人。 是时候呼吁恢复对周朝领主失去的尊重了。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口号——尊重[周]王并击退野蛮人——它促进了多个国家的和平共存。 它提升了齐国的领导地位。 所有的中国和野蛮国家都在天下共存，但文明国家应与野蛮国家有所不同。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口号 - 尊重[周]王并抵制野蛮人 - 它促进了多个国家的和平共存。它将齐国提升到领导地位。所有的中国和野蛮国家都在天下共存，但文明国家应与野蛮人有所不同。口号是“尊重国王”，这有助于转移人们对各竞争国家之间潜在和实际冲突的注意力。 口号的另一半，“抵御野蛮人”，暗示了华北平原多个国家体系与北部边疆的野蛮人区分开来的明确且可行的方法。

这种种族优越主义在古代世界并不罕见。 承认历史景观比农业文明与边疆游牧部落之间的简单划分更为微妙和模糊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斯·迪·科斯莫所描绘的，从中亚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中心的发展是一个复杂且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华北平原的各个地区，多个民族可能长期共存并相互交融。 城邦经常模糊了农业和游牧生活方式之间的界限。 人们通常会用特定的国家来标识自己，比如齐人（来自齐国）或者赵人（来自赵国）。 在每个国家的政治边界内，边缘的游牧群体可能逐渐过渡到农业生活方式，成为齐人或赵人。 统一的“中国领土”可能更多的是城邦统治者的理想追求，而非政治现实。 “尊重[周]王，抵制野蛮人”的口号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并在秦帝国统一之前具有特定的战略含义。 在汉朝，这个口号在确定经典经文时焕发了新的生命。 这种政治策略对汉朝的官僚国家来说更为合适。

汉朝的官僚政权将儒家的《五经》奉为正统并加以制度化。 汉朝的官僚制国家将儒家的《五经》奉为正统，并将其制度化。自那时以来，《五经》已经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正统的基础，并与中国政治制度的新配置共同发展。 儒家的《五经》比圣经和古兰经更丰富多样，但比梵文经典的多样性要少，后者是印度教、耆那教和大乘佛教的神圣经文。 更重要的是，五经已经成为儒家普世治理模式的源泉。 自那时起，儒家的五经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正统的基础，并与中国政治制度的新配置共同演变。儒家五经比圣经和古兰经更丰富多样，但比梵文经文少，后者是印度教、耆那教和大乘佛教的神圣经文。更重要的是，五经已经成为儒家普世统治模式的来源。为了解决天命和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等关键概念，中国的政治权力一直以五经为依据来构建其合法性。 儒家的“五经”比圣经和古兰经更丰富多彩，但比梵文经文的多样性要少，后者是印度教、耆那教和大乘佛教的神圣经文。更重要的是，“五经”已经成为儒家普世统治模式的来源。为了解决天命和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等关键概念，中国的政治权力一直以“五经”为依据来构建其合法性。当草原群体统治中国大陆的部分或全部地区，如鲜卑的拓跋氏族、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他们都遵循儒家的普世统治模式。 并且他们用儒家经典语言来证明他们的权威。 因此，经典研究（或其解释学）逐渐成为政治辩论、争论、谈判和妥协的舞台。 当草原群体统治中国亚大陆的部分或全部地区时，如鲜卑的拓跋氏族、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他们都秉承了儒家的普世统治模式。他们用儒家经典语言来证明他们的权威。因此，经典研究（或其诠释学）逐渐成为政治辩论、争论、谈判和妥协的舞台。五经的解释也成为了思想领域的创新中心和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符号学。 研究帝制中国的政治或学术辩论通常意味着在适当的背景下解读古典研究和讨论。 因此，古典研究（或其诠释学）已逐渐成为政治辩论、争论、谈判和妥协的舞台。五经的诠释也已成为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中政治辞令的创新中心。研究帝制中国的政治或学术辩论通常意味着在适当的背景下解读古典研究和讨论。历史学家本杰明·施瓦茨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古典研究在政治中的独特意义，即知识和政治历史的探究或领域。 这也是历史学家本杰明·艾尔曼在经典、政治和士绅亲属关系的三角关系中所描述的。

儒家的五经包括《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和《春秋》。 《诗经》是中国古代农民和贵族创作的诗歌集。 《尚书》包括了古代国家的各种记录功能和事务，如战争、祭祀和税收。 《易经》是一本古老的中国占卜手册，使用二进制符号来代表宇宙中的所有事物。 《礼记》包含了祖先祭祀、繁复的仪式、特殊场合的礼仪、尊老和贤德、观天、射箭比赛仪式等内容。 《春秋》一书，又称鲁国的《春秋》（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包含了鲁国视角下的简短的诸侯政治记录。

在哪里可以找到被认为最具权威性的文本，用以区分文明和野蛮的领域？这些文本在现实世界的政治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

在《五经》中，孔子赞扬《春秋》是表达他政治观点最合适的载体。 因此，解读《春秋》成为了解释孔子微妙的影射和线索的宏大含义的代名词。 要解码并揭示孔子的政治计划，就是要展开一份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施或实现的神圣政治蓝图。 《春秋》在古代中国激发了三种解释传统，或者说是对孔子理想治理计划的三种竞争解释——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每一种都由汉朝的一个或几个贵族家族倡导。 文明领域的完美治理也意味着将其文明传播给野蛮人。 在这方面，“尊王攘夷”成为了《春秋》的中心主题，也是官方儒家和帝国权力正统的基本思想。 自汉帝国以来，中国的每一个政权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声称继承和尊重《春秋》隐含计划的行动。 这也成为了历史上游牧民族征服中国时无法避免且棘手的意识形态问题。

《公羊传》是《春秋》的一种传统，它是第一部赋予皇家正统观念明确区分的经典，即将优越的中国文明与劣质的蛮夷领域区分开来。 《公羊传》的春秋传统是第一部赋予皇家正统观念明确区分的经典，它将优越的中国文明与劣质的蛮族领域区分开来。《公羊传》通过同时从宇宙和政治的角度定义文明来实现这一点。 根据公羊传统，每位国王都会在他统治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他的统治。 春秋公羊传是第一部赋予皇家正统观念明确区分的经典，区分了优越的中国文明和低等的蛮夷领域。公羊传通过同时在宇宙和政治方面定义文明来实现这一点。根据公羊传的传统，每位国王都在他统治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他的统治。政治权力的启动发生在春天，这时所有的生物都开始生长，宇宙能量开始恢复。 政权应与宇宙同步，以显示其开始和联合。 根据公羊传统，每位国王都会在他统治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他的统治。政权的启动发生在春天，当一切生物开始生长，宇宙能量开始再生。政权应与宇宙同步，以显示其开始和联合。在古代中国，这种同步需要无与伦比的文化精炼和仪式细节。 公羊的唯一标准是通过文化的精细程度来区分文明与野蛮。

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的是"大一统"（"大联合和开始"），这是经典学者何休（129-182年）在公羊学派中阐述的。 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的是“大一统”（“大联合和开始”），这是经典学者何休（129-182）在公羊学派中提出的。何休的解释既包含时间上的统一，也包含空间上的统一。 宇宙必须赋予天子一种宏大的统一和开端的意识，从而展开儒家文明的领域。 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的是“大一统”（“大联合和开始”），这是由公羊学派的经典学者何休（129-182）阐述的。何休的解释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必须赋予天子一种宏大的联合和开始的感觉，从而展开儒家文明的领域。这个短语已经与管仲的“尊王攘夷”密切相关。对大一统领域的含糊和模棱两可的指涉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儒家的。 他们在汉朝都是模糊的，几乎可以互换。 帝国领域的文化一致性最初是次要的，对这种宏伟和权力展示的渴望是帝国话语中的主要和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句话已经与管仲的“尊周王，抵御蛮夷”紧密相连。对于大同与开端的领域的含糊和模棱两可的指代可以是中国的或者儒家的。在汉朝帝国，它们既模糊又几乎可以互换。帝国领域的文化一致性最初是次要的，对于如此宏伟和权力展示的渴望是帝国话语中的一个主要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可以说，到了中国帝国的第二个千年，集体达到“大同与开端”的水平的渴望几乎已经变得自动化和标准化了。 官员和官僚们，受过儒家经典的训练，通常知道如何以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一点，并对统治者口头上表示赞同。

因此，文明领域是相对的空间定义，决定了什么算作中国的领域。 因此，“大同与开端”已经成为了中国领域扩张的期望结果。 它也成为了文化统一的历法和地理扩展。 "大同与开端"的定义可能是约翰·费尔班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中最准确的空间隐喻。 在[确定他的日期]何休对公羊传统的解释中，鲁城国家以种族中心的方式扩大其文明领域的三个连续阶段。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心是鲁城邦，而不是一个被称为“中国”的政治实体，甚至不是中华文明：

根据几代人前传下来的事情，祖先们看到了从混乱中出现的政治秩序的开始。 根据几代人前传下来的事情，祖先们看到了从混乱中出现的政治秩序的开始。 因此，只有鲁国属于文明领域，其他所有的城邦都不在其中。

根据早期几代人的传言，先驱者们看到了秩序和和平的扩展。 根据早期几代人的传言，先驱者们看到了秩序和和平的扩张。因此，他们将所有的城邦都纳入了文明领域，而将野蛮人排除在领域之外。

根据当前这一代人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实现了伟大的和平与秩序。 野蛮人已经文明化并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开明的境界之中。 没有远近之分，也没有文明与野蛮之别。

这个乌托邦的原型在《春秋编年史》中确实是一个文明理想。 这个乌托邦的原型在《春秋编年史》中确实是一个文明理想。文明领域始于一个城邦（鲁），并有更多的城邦加入他们的文明行列。 谁决定哪个城邦可以加入文明的地位？最终，甚至野蛮人也可以提升到文明的水平。 在野蛮人的潜力中没有生物学或种族的含义。 宏大的联合和开端是一个空间、时间和文化的统一，包裹在一个文明理想中。

何修对文明领域内外的空间区分在中国后续的知识和政治历史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何休对文明领域内外的空间区分在中国后续的知识和政治历史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皇权应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保护文明领域免受野蛮人的侵犯，或者将野蛮人融入开明的统治中。 这是为政治权力辩护文明使命的一种积极立场。 许多历史学家也指出，何休在这里揭示的计划与后汉与游牧的匈奴山地战士的斗争有很大关系。

顾良传统描绘了一个理想主义且略有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文明与野蛮可以共存并共同努力。 吴王夫差（在位）是榜样。 吴王夫差（公元前495-473年在位） 位于今天的长江下游的吴国，按照鲁国的标准被认为是野蛮的，鲁国位于今天的山东省中部平原。 鲁公曾与吴王夫差和晋公在中原文明领域的一部分相遇，与黄池见面。 这次罕见的蛮族和文明领导人的聚会是会议的亮点，他们以良好的礼仪执行了会议，并注意了细节。 智者孔子评论道：夫差王并未谈及礼节，但他的行为却恰到好处。 多么伟大的事情啊！孔子赞扬了文明人和野蛮人能够共同合作，理解正确礼仪的含义和影响。 古梁传规定了一个理想的政治世界，其中野蛮人不再是不文明的。 暗示地，公梁传统对野蛮人的抵抗最小，并鼓励政治权力容忍野蛮的领导者。

根据左传的传统，相反的，春秋编年史描述了在文明领域中发现的中国城邦。 根据左传的传统，相反的，《春秋》描述了位于文明领域的中国城邦。它将领域之外的每个政治团体视为野蛮人。 根据左传的传统，恰恰相反，春秋编年史描述了在文明领域中发现的中国城邦。它将领域之外的每个政治团体视为野蛮人。左传传统如何区分中国人和非中国人，非常像公羊传统发展的第二阶段。 更重要的是，左传为妖魔化野蛮人铺平了道路。 例如，后汉的官方历史学家班固（32-92年）意识到了汉帝国边境以北的严重威胁——匈奴（被视为汉帝国的死敌的古代游牧帝国）。 班固把匈奴蛮族描绘成“贪婪和自私”。这种妖魔化的政治导致了分裂和恐惧。

班固详细地描述了这些野蛮的野兽是什么样的：他们把头发放下来，穿着衣服不合适。 班固详细地描述了这些野蛮兽人的丑陋形象：他们把头发放下来，穿着不整齐的衣服。他们看起来像人，但他们有动物的心和脑。 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吃不同的食物，说外语，有奇怪的习俗。 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北方的寒冷田野上，追逐水源和草地。 他们狩猎并在帐篷里睡觉。 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寒冷的田野上，追逐水源和草地。他们狩猎并在帐篷里睡觉。天地将他们与我们隔开。 因此，古代的圣王将他们视为动物。 圣王从未与他们和平共处或发动战争。 试图与他们和平相处将导致浪费金钱并被欺骗。 另一方面，与他们开战将导致我们的军队疲惫不堪，却一无所获。 他们的土地无法耕种，他们的人民既不文明也不服从。 因此，他们在开明的领域之外，而不是之内。 他们是缺乏人类情感的神秘生物。 他们的土地无法耕种，他们的人民既不文明也不服从。因此，他们在开明的领域之外，而不是之内。他们是缺乏人类情感的神秘生物。我们的政治和文化无法触及他们，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日历和规定。换句话说，班固认为野蛮人是另类，决定性的不同，且低于中国人。 班固甚至将野蛮人贬低到动物王国的水平。 自从班固的经典表述以来，野蛮人的非人化成为了中国帝国的反复出现的修辞。

更重要的是，班固注意到了与游牧势力有关的深刻边疆现实。 更重要的是，班固注意到了与游牧势力的深刻边疆现实，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打败他们。 环境历史学家肯尼斯·蔡斯，他非常关注农业区和干旱区之间的边界地区，已经以更一般和比较的方式在欧亚大陆上证明了这一点。

所有三种《春秋》编年史传统都赞同将中国领土的同心圆比喻性地扩大。 文明圈内是中国，应由政治权力的大联合开始治理。 在中国境外的人无疑是野蛮的，从有可能被文明化的对象到无法驯服的次人类动物，野蛮的范围非常广泛。 历史学家约翰·费尔班克采用了这个古典模型，并将其转化为清朝中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理由。 在《中国世界秩序》中，费正清既讨论了中国领土集中扩张的理论，也探讨了其实践。 春秋编年史是其起源，后来发展成更复杂的版本，但仍然是春秋编年史规定的同心圆。 然而，费正清指出，清朝的对外关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外交和礼仪行动。 然而，费正清在清朝的外交和礼仪行动中注意到了多样性。费正清非常谨慎，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初步框架”。他的卷子中的大多数贡献者，包括杨联陞、王赓武和马克·曼考尔，都对这个初步框架表达了一定的健康怀疑。 费正清的一些学生，追随者和崇拜者经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古代中国的初步框架。 费尔班克非常谨慎，将他的理论称为“初步框架”。他的卷子中的大多数贡献者，包括杨联胜、王赓武和马克·曼考尔，都在他们的贡献中对这个初步框架表达了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费尔班克的一些学生、追随者和崇拜者常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古代中国的初步框架。它是一个文明理想，被刻在《春秋》上。 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空间想象和领土隐喻。 正如李零多次从文本和考古证据中争论的那样，这种扩展的同心圆或完美正方形的空间隐喻在古代中国的宇宙和宇宙地理的想象中是灵活且普遍的。 平坦的方形地球是华北平原居民古代宇宙观的基础。 他们要求这个平坦、方形的地球有一个中心，他们的文明就从这个中心展开。 古代的宇宙观念比起后来在帝国中国出现的标准化历史，更缺乏凝聚力，更具推测性，也不够规范化。

中国古代文明理想无疑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在中国政治中以各种方式和方式被赞美、挪用、滥用和扭曲，包括现代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约翰·费尔班克正确地指出了文明理想在中国帝国历史中的引用是如何变得有影响力的。 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初，约翰·费尔班克的初步框架无疑已经过时。 最近学术界在模拟"东亚朝贡关系"方面的研究潮也已经偏离了费正清的初步框架。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展示中国的政治权力如何采用不同的框架来设想帝国领土，并探索他们在东亚和世界的空间想象。

## 大禹的痕迹？

大禹治水。

传说中的新石器时代统治者——大禹，因为成功治理了中国的洪水而享有盛誉。 在蒙古入侵的前夕，尽管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游牧统治者征服或控制了几个世纪，但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中国地图描绘为“大禹的痕迹”（禹迹）。 这种空间表达方式的优点在于其在空间上的模糊性和灵活性。 与许多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似乎认为自公元前200年至1900年的帝国国家已经接受了大禹的痕迹，我认为这是十三世纪的独特发明和运用。

要研究中国帝国历史中的这种空间表现，我们必须探索中国历史的不同划时期方法，以便为这个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要研究中国帝国历史中的这种空间表现，我们必须探索中国历史的不同划时期方法，以便从新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 例如，历史学家莫里斯·罗萨比将蒙古之前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 例如，历史学家莫里斯·罗萨比将蒙古之前的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史前时代到581年，被称为“中国在蛮族之中”。第二个时期较短但更为密集，从581年到1279年，被称为“中国在平等之中”。在罗萨比的观点中，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第二个时期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 第一个是唐朝的世界主义，当时唐朝（618-907年）军事强大，战略包容。 例如，历史学家莫里斯·罗萨比将蒙古之前的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史前时代到581年，被称为“蛮夷之中的中国”。第二个时期较短但更为密集，从581年到1279年，被称为“平等之中的中国”。在罗萨比看来，这两个历史时期中的第二个时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第一个是唐朝的世界主义，当时的唐朝（618-907年）军事强大，战略包容。第二个是宋朝的民族中心主义，当时的宋朝（960-1279年）军事弱小，战略排他。 第一个时期从史前时代到581年，被称为“蛮族中的中国”。第二个时期较短但更为密集，从581年到1279年，被称为“平等中的中国”。在Rossabi的观点中，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第二个时期中，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取向。第一种是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义，当时唐朝军事强大，战略包容。第二种是宋朝（960-1279年）的民族中心主义，当时宋朝军事弱小，战略排他。然后，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次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首先是唐朝的世界主义，当时的唐朝（618-907年）军事强大，战略包容。第二是宋朝的民族中心主义，当时的宋朝（960-1279年）军事弱小，战略排他。然后，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次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蒙古帝国的新政治框架有效地取代了宋朝的民族中心主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意识形态。然而，在中国在第二个历史时期看到自己与其他国家平等的时候，一种新的道德哲学——新儒家主义出现了，以表现为中国优越性的民族中心主义形式。 新儒家文人认为自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标杆，并作为道德代理人，执行一项半宗教性的使命，以保护和推广中国古代的价值体系（道）。 新儒家，如历史学家Peter Bol所示，逐渐在中国帝制历史的第二个千年中，在文人的政治和知识生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唐朝的世界性帝国的历史代理主要由在中国或中亚的贵族家庭中接受过古典教育的男性或军事人员组成。 当十世纪唐朝帝国秩序崩溃时，贵族秩序也随之崩溃。 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阶层从地主阶级中崛起，并逐渐增加了他们在宋朝帝国国家中的参与。 士绅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商人、工匠和农民，他们在当地社会中起着精英的作用。 现代学者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些精英。 例如，自内藤湖南（1866-1934）以来，日本历史学家将这个拥有土地、受过经典教育并在政治上活跃的精英群体称为“士绅”，并认为士绅的统治自宋朝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 例如，自内藤虎男（1866-1934）以来，日本历史学家将这个拥有土地，受过经典教育，并在政治上活跃的精英群体称为“士绅”，并认为士绅的统治自宋朝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其他历史学家，如本杰明·艾尔曼，将他们描述为“文人”，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这个群体的经典素养。 现代学者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些精英。例如，自内藤虎男（1866-1934）以来，日本历史学家将这个拥有土地，受过古典教育，并在政治上活跃的精英群体称为“绅士”，并认为绅士的统治已经成为自宋朝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其他历史学家，如本杰明·艾尔曼，将他们描述为“文人”，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这个群体的古典素养。还有其他的中国历史学家强调了这些精英赋予自己的道德使命和义务，称他们为“知识分子”（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 例如，自内藤湖南（1866-1934）以来，日本历史学家们将这个拥有土地、受过古典教育并在政治上活跃的精英群体称为“士绅”，并认为士绅的统治已经成为自宋朝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其他历史学家，如本杰明·艾尔曼，将他们描述为“文人”，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这个群体的古典素养。还有其他的中国历史学家强调了这些精英赋予自己的道德使命和义务，称他们为“知识分子”（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无论我们用什么名字来称呼他们，这个知识和政治精英群体在十世纪末开始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力量。 无论我们以何种名字称呼他们，这个知识和政治精英群体在十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成为重要的历史力量。他们在宋朝期间蓬勃发展，形成了政治积极性，道德责任感，并在帝国国家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政治中心从中原的旧中心开封（960-1127）转移到了两个连续的城市中心——南京（1129-1138）和杭州（1138-1276）——位于下扬子江流域。 无论我们用什么名字来称呼他们，这群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在十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成为重要的历史力量。他们在宋朝期间蓬勃发展，形成了政治积极性，道德责任感，并在帝国国家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政治中心从中原的旧中心开封（960-1127）转移到了两个连续的城市中心——南京（1129-1138）和杭州（1138-1276）——位于下扬子江流域。士绅家族随着宋朝朝廷一起迁移到下扬子江流域，以逃避游牧民族对华北平原的占领。 政治和文化精英向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并永久定居，这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

虽然在整个十三世纪，游牧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击败并取代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游牧势力唯一能够宣称自己与中国朝代地位平等且对立的可行方式，就是声称自己拥有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命"这个概念是在古代周朝中发明的，用来证明取代商朝的合法性，除了日本以外，它在东亚被普遍接受为政治合法性。 尽管在整个十三世纪，游牧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击败并取代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游牧势力唯一可行的方式来宣称他们与中国朝代地位平等且对立，就是要声称他们拥有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命这个概念是在古代周朝中发明的，用来证明取代商朝的合法性，除了日本以外，它被东亚地区普遍接受为政治合法性。东亚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都互相承认天命是政治合法性的普遍形式。 例如，契丹和党项政权声称拥有“天命”，并在北方建立了一个与北宋相抗衡的中国式王朝。 例如，正如莫里斯·罗萨比和他的合作者所主张的，北宋对待契丹和党项政权的态度就像对待平等的对手一样，例如，定期向契丹人支付和平赎金。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朝中国不再是东亚地区的霸主，也不再是费正清所说的中国世界秩序的守护者。 例如，契丹和党项政权声称拥有天命，并在北方建立了一个与北宋相抗衡的中国式王朝。更重要的是，如莫里斯·罗萨比和他的合作者所论述的，北宋对待契丹和党项政权的态度就像对等的，例如，定期向契丹支付和平赎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朝中国不再是东亚地区的霸主，或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世界秩序的守护者。很明显，东亚政治秩序已经成为几个争夺政权的政治力量的战略平衡，包括北方的契丹、党项和女真，以及朝鲜半岛的高丽。 到了十一世纪，契丹人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北半部。 在这个意义上，宋朝不再是东亚地区的霸主，或者是费正清所说的中国世界秩序的守护者。很明显，东亚的政治秩序已经成为包括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在内的北方几个政治力量，以及朝鲜半岛的高丽的战略平衡。到了十一世纪，契丹人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北半部。到了十二世纪，女真人击败了契丹人，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迫使宋朝迁移到了扬子江以南。 南宋国家（1129-1276年）在中国的空间历史上设立了一个重要且独特的先例：长江在政治上划分了中国的次大陆。 游牧民族占领了华北平原，而中国政权统治了扬子江以南的领土。

为了抵抗和对抗扬子江北部游牧势力的军事威胁，南宋的知识精英发展出了更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历史地理观念和民族意识。 这个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阶层将自己视为儒家文明的传播者。 这个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阶层认为自己是儒家文明的传承者，而儒家文明正面临来自南宋周围的蛮族国家的生存威胁。 知识精英们还将《春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这个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阶层将自己视为儒家文明的传播者。他们认为自己正面临来自周围野蛮国家对南宋的生存威胁。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还将《春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左传和妖魔化政治成为南宋学者的智识焦点。 同时，他们还发明了一种跨朝代的家谱，描绘了古老和超越的价值体系如何传承至今。 这个传承过程应该独立于朝代政权的兴衰，而它传递的价值观，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在历史之外的原始状态。 这些古老和超越的价值观的实质被称为道，有时也被称为天理。 这种新的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或者说新儒家，成为了新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核心价值体系。

随着新儒学的兴起，一种新的、更激进的对野蛮的理解也应运而生。 随着新儒家的崛起，一种新的、更激进的对野蛮的理解也应运而生。 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要否认或淡化新儒家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宋朝的新儒家越来越多地与朝代政权共享重大责任，并对蛮族感到焦虑和威胁。 他们发明了一种谱系，描述了道从古代到现在是如何传承下来的。 他们经常激烈地争论道应该高于野蛮，与野蛮分离。 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宋朝的新儒家人越来越多地与朝代政权共享重大责任，并对蛮族感到焦虑和威胁。他们创造了一种谱系，说明道从古代到现在是如何传播的。他们经常激烈地争论道应该优于，且与蛮族分离。新儒家对道的创造和他们对蛮族的妖魔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 这是一个自我（中国，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儒家传统和历史）与他者（野蛮人，游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缺乏传统和历史）之间的两极化过程。 当宋朝中国受到攻击时，新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在新儒家自我和野蛮人他者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

宋代新儒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国”的概念。与早期的汉朝和唐朝不同，他们通过军事力量和机构优于蛮族国家来证明他们的成功，宋代新儒家认为，智力和道德的优越性在于他们所称的道，以及它在中国的独特传播。 历史学家小岛强同意葛兆光的观点，并认为宋代新儒家将文化（儒家隐喻中的礼乐）置于整个儒家传统的中心，并将儒家价值观的传播与政治权力的传播分离。 此外，他们这样做是以野蛮主义为代价的。 他们重新定义了野蛮人，将其与（中国）人民在物质上区别开来，并剥夺了他们对文明和开明社会所必需的道德价值。

新儒家将他们的野蛮主义激进版本改编为他们对左传传统的解释。 例如，北宋的学者孙复（992-1057）曾写过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名为《春秋尊王微言解》，解释了孔子为何选择《春秋》的起止年份。 《春秋》的语言简洁而常常含混不清。 它记录了鲁国在十二位公爵统治期间的最重要政治事件，以及鲁国与周朝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州际关系。 例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孙复（992-1057）曾撰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春秋尊王微言解》，解释了孔子为何选择春秋纪事的起始和结束年份。《春秋》的语言简洁而常常含混不清。它记录了鲁国在十二个公爵统治期间的最重要政治事件，以及鲁国与周朝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孙复认为，孔子之所以选择公元前722年（鲁隐公的第一年）开始《春秋》，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仍尊重周朝的“天子”时，这一年具有文化意义。当每个领主都以适当的敬意称呼天子时，他们就会处于政治等级制度的适当位置。 孔子从未明确提出这一点，但他通过赞美齐和晋（都是文明国家）并责备吴和楚（非文明国家）来微妙地暗示这一点。 孔子在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在位的第十四年）停止记录《春秋》的原因是，那一年鲁哀公在西田猎取了一只独角兽。 孙复在这篇文章中辩称，孔子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的第一年）开始编写《春秋》，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国家仍尊重周的“天子”。当每个领主都以适当的敬意称呼天子时，他们就会处于政治等级制度的适当位置。孔子从未明确提出这一点，但他通过赞美齐和晋（两个文明国家）并责备吴和楚（非文明国家）来暗示这一点。孔子在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在位的第十四年）停止记录《春秋》，因为那一年哀公在西田猎取了一只独角兽。独角兽是一种充满希望和人道的动物，所以这是一个预兆，显示了将中国所有城邦的联合领导权归属于周家的象征性时代的结束。

因此，文明和野蛮的国家变得无法区分，并陷入混乱的权力斗争中。 因此，文明和野蛮的国家变得无法区分，并陷入混乱的权力斗争中。根据孙复的说法，孔子于公元前722年开始编写《春秋》并于公元前481年结束，以确定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天子以应有的尊重保持在顶端，诸侯知道他们在王国中的位置，而野蛮人承认他们应该敬仰天子。 这个时代后来被命名为“春秋时期”，以纪念孔子编辑过的《春秋》。 因此，文明和野蛮的国家变得无法区分，并陷入混乱的权力斗争中。根据孙复的说法，孔子于公元前722年开始编写《春秋》并于公元前481年结束，以确定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天子以应有的尊重居于顶端，诸侯知道他们在王国中的位置，而野蛮人承认他们应该敬仰天子。这个时代后来被命名为“春秋时期”，以纪念孔子编辑过的《春秋》。春秋时期之后，中原陷入混乱。 根据孙复的说法，孔子于公元前722年开始编写《春秋》并于公元前481年结束，以确定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天子以应有的尊重居于顶端，诸侯知道他们在王国中的位置，而野蛮人承认他们应该敬仰天子。这个时代后来被命名为“春秋时期”，以纪念孔子编辑过的《春秋》。春秋时期之后，中原陷入了混乱。孙复认为，尽管强大的野蛮敌人包围着宋朝，但宋朝的皇家国家应该实现孔子在春秋时期的理想等级秩序。 在某种程度上，孙复通过文化上提升“文化中国”的理想，增强了《左传》春秋编年史的传统。

到了南宋时期，新儒家集体发展出了一种理论，即每个个体（男性）都有可能达到圣人的境地。 在世界历史上，新儒家传统中个体完美的可达性与所有三个亚伯拉罕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宋代的道德哲学与对自然研究和宇宙学的新兴兴趣相结合。 例如，新儒家大师朱熹研究过宇宙的形状，并留下了许多他“事物研究”的结果。然而，根据朱熹的说法，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与野蛮人与中国人有不同的身体素质的说法密切相关。 在他的论述中，朱熹对中国人和野蛮人做出了准生物学的区分。 在他与一位追随者的对话中，朱熹试图阐明中国人的身体性质、野蛮人和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区别。 总的来说，新儒家认为，中国人、野蛮人和猕猴应该拥有天赋的相同的人性（性）。 但是，中国人、野蛮人和猕猴的身体特质却是不同的。 朱熹如何确切地理解人体及其生命功能呢？

朱熹和新儒家持有历史学家夏洛特·富思所称的黄帝身体观。 朱熹和新儒家持有历史学家Charlotte Furth所称的黄帝身体观，即身体有线路和管道供液体和气（物质力量或能量）流动和循环。 身体的液体和气可以是清澈的，也可以是各种混浊的色彩。 朱熹和新儒家持有历史学家Charlotte Furth所称的黄帝身体观。身体有线路和管道供液体和气（物质力量或能量）流动和循环。身体的液体和气可以是清澈的，也可以是各种混浊的。根据朱熹，中国人的身体液体和气可以自由流动。 当体液和气的循环受阻或减慢时，身体将会出现混乱。 大猩猩与中国人有着相同的基本性质，但其体液和气的循环方式无法像中国人体那样进行。 对于朱熹来说，这是中国人和猕猴之间的主要区别。 猕猴看起来像人，它的智力比其他动物更高。 然而，猕猴不能像人类那样说话，因为它的体液和气无法在其体内自由流动。 对于朱熹来说，这是中国人和猕猴之间的主要区别。猕猴虽然与人类相似，智力也高于其他动物。然而，猕猴不能像人类一样说话，因为它的体液和气不能在身体内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野蛮人则介于人类和猕猴之间。 在朱熹的分类方案中，野蛮人的身体结构决定性地处于人类以下的地位。 在这种构想中，朱熹超越了《春秋左氏传》的传统，通过理性地证明了中国人和蛮族之间的差异。

这种内在和超越的对知识主体和道德代理的重新定义，成为了朱熹新儒家思想的基石，随后在东亚地区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 这种内在和超越的对知识主体和道德代理的重新定义，成为了朱熹新儒家思想的基石，随后在东亚地区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朱熹在他的《近思录》中加入了最后一章，名为“圣贤通论”。在朱熹的构想中，新儒家的关键含义跃然纸上：知识主体和道德实践者的位置完全无关紧要。 大多数研究中国新儒家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忽视了天理空间坐标的缺失。 知识史学家们广泛地评论和研究了“道的谱系”，这描述了无论在特定的地方，道是如何在历史时间中传播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儒家的想象中，时间的突出和物理空间的消失，这是如何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价值观。 没有任何需要从一个圣人到下一个圣人的物理接触或甚至文化联系。 空间或地理在传承或家谱中已经完全无关紧要。 在新儒家的想象中，时间的突出和物理空间的消失是如何从古代传承价值观的，这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从一个圣人到下一个圣人，没有任何物理接触或甚至文化联系的需要。空间或地理在传播或家谱中已经完全无关紧要。朱熹和他的知识对手刘九渊（1139-92）在如何达到圣人的基本方法上有所分歧，但都默认了“地点或物理位置”对任何知识主体或道德代理人的无关性。 刘的著名座右铭如下：“如果一个智者从世界的一端，东海崛起，他深邃的意识将使他能够理解世界，并推导出一套理解宇宙的抽象原则。 刘的著名座右铭如下：“如果一个智者从东海崛起，在世界的一端，他深邃的意识将使他能够理解世界，并推导出一套理解宇宙的抽象原则。如果另一个智者从西海崛起，他将以同样深邃的意识理解世界，并得出同样的普遍和抽象的原则。”他们都完全否定了物理位置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他们否定了知识和道德主体的背景在他们可能达到道德启蒙和完美的潜力中的相关性。

我们应立即注意到，新儒家并非宋朝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知识主流。 我们应立即注意到，新儒家并非宋朝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知识主流。 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尼德姆对宋代地图学的描述，本质上是对宋代中国科学成就的浪漫化赞美。 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彼得·博尔对宋代地图学的大量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得出结论：

这些地图上测量和记录的距离是基于平面地球的方格网格和古代宇宙学。 这些地图上测量和记录的距离是基于平方网格和古代的平地宇宙观。它并非基于球形地球的先进球面三角学。

宋代的地图制图学对蒙古和元朝的地图影响和影响相当有限。

宋代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跨朝代价值体现在大多数地图上，这些地图展示了中央国家与周边的“野蛮”部落或国家。

一方面，宋代的跨朝代种族中心主义在其制图学中以各种程度持续存在。 一方面，宋朝的跨朝代种族中心主义在其制图学中以各种程度持续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地图中发现宋朝自然哲学和制图技术的精细。

新儒家是宋朝中国的一场社会和文化运动。 但是，它在早期现代中国（1500-1850）的精英社会中无疑具有深远和普遍的影响。 到了十七世纪，新儒家分化为朱熹和王阳明两种对立的文化观念之间的辩论。 它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继续主导着精英和儒家官僚的生活。 我创造了“儒家官僚”这个词，以指代中国次大陆地方精英共享的新儒家思想的广泛范围，并强调他们如何将他们的新儒家思想带入清朝官僚政治派系，与清朝君主制不同。 一旦这些地方精英晋升到儒家官僚体系的不同层级，他们就成为了帝国政治中的省级和国家级的参与者。 因此，参与儒家官僚机构几乎成为地方精英获取政治权力的唯一途径。 而新儒家主义则是他们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取得成功的关键。

## 空间宽大：

蒙古人征服的土地之外，没有已知的世界！

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公元 在成吉思汗（公元1162-1227年）和他的儿子窝阔台的领导下，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大城市和农业区域的征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但是，这种破坏也扫除了交通、通信和思想交流的障碍。 1251–1259)，蒙古帝国在蒙哥汗统治后分裂为四个汗国。 蒙古帝国在蒙哥汗(在位1251-1259年)统治后分裂为四个汗国。 从任何历史尺度来看，这四个汗国都是巨大的。 1260–1294) 然而，直到忽必烈汗（在位1260-1294年）将他在中国北部的新蒙古汗国更名为元朝，并在1271年试图重塑他作为中国皇帝的形象，蒙古人才没有试图像一个定居的、世界性的帝国来管理他们征服的领土。 为了建立一个中国式的王朝并宣称自己拥有天命，忽必烈在上都统治，并在大都（今北京）建立了他的第二座首都来统治中国。 然而，蒙古人在忽必烈汗（在位1260-1294年）将他在中国北部的新蒙古汗国更名为元朝，并在1271年试图改变他作为中国皇帝的形象之前，并没有试图像一个定居的、世界性的帝国来管理他们征服的领土。为了建立一个中国式的王朝并宣称天命的普遍性，忽必烈在上都统治，并在大都（"大都"，今天的北京）建立了他的第二个首都来统治中国。作为天命的竞争者，忽必烈继续对南宋国家进行残酷的战役。 忽必烈的征战在1276年取得了成功，这对于蒙古元朝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大汗开始从草原统治整个中国次大陆。 大汗开始从草原统治整个中国次大陆。 这个行动意味着忽必烈汗选择了儒家模式来描述他的世界帝国。 对于大汗来说，伊斯兰或佛教模式并不吸引他，他选择了儒家模式来描述他的帝国。 对于忽必烈来说，儒家的普世主义是统治中国人口的一个方便且有说服力的选择。

在忽必烈成功征服南宋中国的十年后，即1286年，波斯天文学家和学者官员贾马尔·阿尔·迪恩（活动时间：公元13世纪） 在忽必烈成功征服南宋中国的十年后，即1286年，波斯天文学家和学者官员贾马尔·阿尔·迪恩（活动年代1255-91），这位在十三世纪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精通球面三角学、制图学和数学天文学的人，自1267年以来一直负责监督帝国天文学，他提议编写一部地名词典，以纪念蒙古元朝在1286年的伟大统一和开创。 在贾马勒丁向忽必烈汗提出的建议中，他宣称：“现在我们的地图上已经记录了[已知世界中的]每一块土地和每一个人。” 在忽必烈成功征服南宋中国的十年后，即1286年，波斯天文学家和学者官员贾马尔·阿尔·迪恩（活动年份1255-91），这位在十三世纪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精通球面三角学、制图学和数学天文学的人，自1267年以来一直在监督帝国天文学，他提议编写一部地名词典，以纪念1286年蒙古元帝国的伟大统一和开创。在贾马尔·阿尔·迪恩向忽必烈汗提出的建议中，他宣称：“现在我们的地图上已经记录了每一块土地和每一个人[在已知的世界]。我们应该编写一本书来描绘我们蒙古帝国的伟大统一和开创。”贾马尔·阿尔·迪恩可能分享了我们在拉希德·阿尔·迪恩的《编年史》中看到的地理知识。 在贾马勒丁的提议中，他向忽必烈汗宣称：“现在我们的地图上已经记录了所有已知世界的每一块土地和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制作一本书来描绘我们蒙古帝国的伟大统一和开始。”贾马勒丁可能分享了我们在拉希德丁的《编年史》中看到的地理知识。贾马勒丁还包括了除波斯和阿拉伯来源之外的其他“杂项”地图。 在贾马勒丁向忽必烈汗提出的建议中，他宣称：“现在我们的地图上已经记录了每一块土地和每一个人[在已知的世界]。我们应该制作一本书来描绘我们蒙古帝国的伟大统一和开始。”贾马勒丁可能分享了我们在拉希德丁的《编年史》中看到的地理知识。贾马勒丁还包括了除波斯和阿拉伯来源之外的其他“杂项”地图。据贾马勒丁所知，蒙古人几乎已经征服了全世界。 美洲尚未被发现，大多数木制地球仪都显示了被四个海洋包围的欧亚大陆。 更重要的是，贾马尔·阿尔·迪恩提议编制并创建了第一部全面的普遍帝国地名词典的类型。 根据古代学者和历史学家钱大昕（1728-1804）的说法，元朝时期曾出版了两部《大同志》的手稿版本。 在1291年，《大一统志》共755章，被送到忽必烈汗手中。 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完成后不久就开始了。 学者官员赵辩之向铁穆耳汗（1265-1307）——忽必烈的继任者——请愿编写新版本，这个版本由蒙古学者官员博拉齐（Ch）完成并提交给元朝朝廷。 在1303年4月7日，蒙古学者官员博拉齐（Pulanxi或Bolanxi）和中国学者官员岳玄完成并提交给元朝法庭。 两个版本的手稿都被保存在皇家图书馆中，访问受到限制。

《大同文献》为蒙古元帝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儒家模式。 大同文献为蒙古元帝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儒家模式。对于蒙古人来说，适应儒家模式的各种细节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例如，元朝后来采用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并将新儒家的教义奉为考试课程。 1314年，中国顾问说服蒙古统治者恢复宋朝的科举考试，以招募中国学者。 蒙古元朝在1315年至1368年间举行了十五次京都考试，并只颁发了1136个宫廷学位。 选择范围比早期的宋朝和后来的明朝要小得多。 然而，元朝法庭开创了征服王朝与新儒家之间的新型有限合作关系。 蒙古元朝在1315年至1368年间举行了十五次京都考试，并只颁发了1136个宫廷学位。选拔范围比早期的宋朝和后来的明朝要窄得多。然而，元朝的朝廷开创了征服王朝与新儒家之间新的、有限的合作关系。当然，蒙古人并没有将每一个新儒家的观念纳入他们的考试课程中。 相反，蒙古人粉碎了源自《春秋》的新儒家民族中心主义，并迫使其转入地下。 新儒家的其他组成部分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继续发展，而反对蒙古征服的抵抗运动继续推动宋式的种族中心主义话语。 那些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并为蒙古元朝效力的人，肯定对他们在帮助一个征服王朝精心打造新儒家普世主义的角色有着极高的认识。

徐有仁（1287-1364）是一位儒家学者，他在1315年通过了京都考试，成为了进士。 徐有仁（1287-1364）是一位儒家学者，他在1315年通过了京都考试，成为了进士。他在《大统文献》的印刷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完成四十年后的1346年，大参议员贝尔克·布哈（Ch） 许有仁（1287-1364）是一位儒家学者，他在1315年通过了京都考试，成为了进士。他在《大统文献》的印刷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完成四十年后的1346年，大参赞贝尔克·布哈（Ch Bierque Buhua）向元朝最后一位蒙古皇帝也孙铁木儿（1320-1370）上表，请求印刷并发行《大统文献》的全套。 他在《大同文献》的印刷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他的序言中，徐有仁解释了为什么《大同文献》能够以两种基本方式描绘蒙古元帝国作为一个普遍的帝国。 在他的序言中，徐有仁解释了为什么《大同文献》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描绘蒙古元帝国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首先，徐有仁认为蒙古元帝国在地理范围和政治统一性上超越了以前的统一朝代。 在他的序言中，徐有仁解释了为什么《大同文献》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描绘蒙古元帝国作为一个普遍的帝国。首先，徐认为蒙古元帝国在地理范围和政治统一性上超过了以前的统一王朝。在这里，徐处理了《春秋左氏传》。 在他的序言中，徐有仁解释了为什么《大同文献》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描绘蒙古元帝国为一个普遍的帝国。首先，徐认为蒙古元帝国在地理范围和政治统一性上超过了以前的统一朝代。在这里，徐处理了《春秋》。到了徐的时代，将理想的古代世界定为三代模式——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高古代）已经成为惯例。 据说，徐报道，这个伟大的联盟和开端描述了一个在上、下、东、西、北、南六个方向上文化统一的世界。 九州（文明世界）全都由一位圣王统治。 徐并未明确表示这个古代世界的崇高理想是虚构的。 据许所述，他并未明确指出这个古代世界的崇高理想是虚构的。但他立即补充说，三代模式的历史记录已无法找回和验证，我们只能对汉唐宋三代的事情有所把握。 然后他逐一进行了检查。

根据徐有仁的说法，尽管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02年）的领土扩张得很远，但其策略在正确和错误之间交替。 根据徐有仁的说法，尽管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02年）的领土扩张很远，但其策略在正确和错误之间交替。 更不用说汉朝的大师们对于什么是道的理解存在分歧，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 有一百所学校和许多其他的方法和意图。 我们怎么能称之为“大同和开始”？唐朝（618-907年）的首都长安被叛军占领了几十年。 我们怎么能称之为“大同与开端”？北宋（960-1127）试图与女真人达成协议，但却吃了亏。 最终，宋朝失去了中土。 我们怎么能称之为“大同与开端”？我们的蒙古元朝，相反，已经到达了四个方向的尽头（东，西，北，南），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也不是古代的设想。 我们如何称之为“大同与开端”？北宋（960-1127年）试图与女真人达成协议，但却吃了大亏。宋朝最终失去了中土。相反，我们的蒙古元朝已经到达了四个方向的尽头（东，西，北，南），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也不是古代的设想。我们蒙古人打破了四个方向内的所有群体，并将它们统一为一体。

从当前的角度来看，我将徐有仁的上述观点称为一种价值重估，将空间宽大的美德归功于蒙古元朝——领土的空前扩张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美德。 从当前的角度来看，我将徐有仁的上述观点称为一种价值转化，即赞扬蒙古元朝的空间宽大——前所未有的领土扩张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美德。 徐将读者的注意力从血腥和痛苦转向了蒙古军队的强大和无敌。 他完全以军事实力和领土面积来衡量三个主要的古代帝国——汉、唐和宋。 在这样的比较中，领土扩张成为了衡量军事成功的代理指标。 因此，徐认为所有过去的统一王朝，即汉，唐和宋，都自称为“大同”，但并不配得上这个头衔。 我们的蒙古元朝才真正符合这个头衔的含义。 因此，徐将《春秋》中的理想视为崇高而遥不可及。 因此，徐辩称所有过去的统一王朝，即汉，唐和宋，都称自己为“大同”，但并不配得上这个头衔。我们的蒙古元朝真正符合这个头衔的含义。这样，徐就把《春秋》中的理想视为崇高而遥不可及。 “大同”并不意味着六方（上，下，东，西，南，北）内的所有文化都是一致的，或者九州的所有人都已经联系在一起。 相反，最重要的是这种一致性的前提。 这个前提无非就是蒙古帝国的军事无敌，这在《大同志》中首次描绘的无尽的风景中得到了体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

然而，徐有第二种基本的方式来证明蒙古的世界帝国：徐选择了另一部儒家经典《春秋》。 然而，许有第二种基本的方式来证明蒙古的世界帝国：许选择了另一部儒家经典《春秋》。对于许和许多儒家顾问来说，儒家经典在支持政治合法性方面的灵活可塑性并不新鲜。 然而，徐有第二种基本的方式来证明蒙古的世界帝国：徐选择了另一部儒家经典《春秋》。儒家经典在支持政治合法性方面的灵活可塑性对徐和许多儒家顾问来说并不新鲜。徐回应了一种传统，即儒家顾问从一开始就为蒙古元朝服务，他避开了《春秋》的三种解释实践，选择了灵感来自宇宙学的令人敬畏的《易经》来阐述元朝的军事成功和领土广大。 徐氏认为，《儒家经典》首次提到“统一”并不是在《春秋》，而是在《易经》中。 第一个六卦（乾）由六条直线组成：天，纯阳，以及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开始。 该卦的注释写道：“多么伟大的第一个卦（乾）意味着起源（元）！所有的万物都将由此开始，它将指挥（或统治）天堂。”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蒙古人从《易经》中的这句话中取得了“元”的朝代名称，意为伟大的开始。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蒙古人从《易经》中的这句话中取得了“元”的朝代名称，意为伟大的开始。 因此，第一个六卦是用来指挥和掌控宇宙中的所有条件或状态。 徐继续引用《易经》的注释：“天以勤行为动。” 徐接着引用《易经》的评论：“天以勉行，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乾）是宇宙中最强大的。 因此，第一个六卦是用来指挥和掌控宇宙中的所有条件或状态。续引《易经》的注释：“天以劳力行，君子以不懈自强。”天（乾）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天是万物的起源，帝国是万国的主宰。 徐继续引用《易经》的注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乾）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天是万物的起源，帝国是万国的主宰。因此，万物都可以起源于天。 皇帝应体现出勤奋不懈的精神。 天堂是万物的起源，帝国是万国的主宰。 所谓的“大同与始”，是为了传达如此强大和宏伟的开始，意味着万类可以由皇帝的力量统一和指挥。 这确实是实现六方（上、下、东、西、南、北）文化统一，并将九州所有人民联系起来的触发器。

既然如此，儒家顾问应该在一本宏伟的书中记录蒙古人的大联合和开始。 既然如此，儒家顾问应该在一本宏伟的书中记录蒙古人的大联合和开始。 一方面，它是“方志”的缩写，指的是地方志。 同时，“志”也可以指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中的一种官方体裁。 "文档"（Zhi）这个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方志”的缩写，指的是地方志。同时，“志”也可以指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中的一种官方体裁。古代汉朝的官方历史《汉书》和《后汉书》都包含了几个“志”章节。 “志”章节提供了关于汉朝的行政政策和实践的信息，如数学和谐和日历，礼仪和音乐，法律和惩罚，食品和商品的管理，对天地的祭祀，天文学或天文学，五个阶段的宇宙运作和占卜，地理模式或地理，农业管理，以及艺术和文化。 这些汉朝的行政政策和实践的记录被后来的学者们统称为“治国之道”。 徐继续提出，可以在《周礼》中找到九州的记录，而所谓的“外史”是指九州以外四个方向的记录。

“我们的蒙古元帝国实现了伟大统一的巅峰，并超越了汉唐，”徐声称。 "我们的蒙古元帝国完成了大同盟和开端的顶峰，并超越了汉和唐，"徐声称。 这本书有政治和道德教训。 它展示了蒙古帝国万世的空间宽大。 在蒙古元帝国的大同和开端下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建立这个普遍的帝国有多么困难，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大同。 在序言的结尾，徐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颂词，宣称蒙古元帝国应该延续超过一万代。

《大同联盟文献》唤起了中国政治文化中集体无意识迄今无法满足的渴望。 蒙古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机动性和组织能力才实现了这一古老的中国抱负。 在一本书中，蒙古顾问提出了对广袤土地的领土记录，“没有已知的世界在其之外”，以展示这样的大联合和开始。 由于这个全球性的努力，在十三世纪，"大同和开始文献"极大地扩展了传统的地理知识和中国古代的地名。 遗憾的是，只有极少一部分（整个收藏的1%）的《大同启蒙文献》流传至今。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的满洲清朝，他们从蒙古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并经常引用《大同文献》。 它对满洲清帝国的历史影响将是巨大和决定性的。

更重要的是，蒙古人发明了空间宽大的概念，以赞美他们的领土扩张和超越景观成为帝国美德的意识形态。 天子不再试图展示他的道德完美，因为他的威严可以通过将所有远近的人们纳入一个政治体系，以实际的地理扩张来实现大同和开端。 空间宽大的理念已经明确地成为了帝国的目标和美德。 蒙古元朝开始了《大同文献》的框架，并因此发明了一个新的空间宽大的古典视角，从《春秋》转向。 天子不再试图展示他的道德完美，因为他的威严可以通过将所有远近的人们纳入一个政治体系，以实际的地理扩张来实现大同和开端。空间宽大的理念已经明确地成为了皇家的目标和美德。蒙古元朝开始了《大同文献》的框架，并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宽大的古典视角，转向了《春秋》。包括新儒家的种族中心主义（在《左传》中表达）在内的其他古典思想，将在士绅社会中被禁止和沉寂，等待未来的“中国”激情的火花重新点燃。

此外，蒙古元朝并没有地图上的种族中心主义。 此外，蒙古元朝并没有地图上的种族中心主义。 由许有仁阐述并被许多人理解的空间宽大性，与地图中心主义的观念恰恰相反。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东亚世界地图，由韩国制图师于1402年或更早的时间制作，显示了一个扩大的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以及中国大陆的广阔水道。 这幅名为“Ryukoku Kangnido”的地图，是在京都附近的一座名为西本愿寺的佛教寺庙中偶然发现的，它是15世纪初（大约在1402年）制作的众多世界地图之一。 这幅地图本身引发了许多种解读和推测。

它可能分享了《大同文献》的地理知识，并从蒙古元朝制作的其他世界地图中获取信息。 它可能分享了《大同文献》的地理知识，并从蒙古元朝制作的其他世界地图中获取信息。大多数关于这幅东亚世界地图的证据性研究都将其归功于蒙古元朝的来源。该地图反映了东南亚高原的地理隔离效应以及其他障碍，如戈壁沙漠，西北部的崎岖地形，以及北部的满洲-蒙古草原。 它稍微有些种族中心主义，因为朝鲜半岛的重要性被过分强调了。 但是，当大多数历史学家第一次看到这张地图时，他们都感到震惊。 大多数关于这幅东亚世界地图的证据性研究都将其归功于蒙古元朝的来源。地图反映了东南亚大陆的地理隔离效应以及其他障碍，如戈壁沙漠，西北部的崎岖地形，以及北部的满洲-蒙古草原。这幅地图稍微有些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朝鲜半岛的重要性被过度放大了。但是，当大多数历史学家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时，他们都感到震惊。这幅地图所呈现的广泛的地理知识基础，融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地理，也必然反映在《大同文献》中。

什么是要点？空间宽大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简洁而明确地说，空间宽大使汉族农业文明去中心化，并重新定义了《春秋》中大同的含义。 这个要点是什么？空间宽大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简洁而明确地说，空间宽大使汉族农业文明去中心化，并重新定义了《春秋》中大同的含义。它揭示了宋族的种族中心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地图中心主义。 这是什么要点？空间宽大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简洁而明确地说，空间宽大使汉族农业文明去中心化，并重新定义了《春秋》中大同的含义。它揭示了宋族的种族中心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地图中心主义。这是自汉朝将其封为儒家五经的一部分以来，《春秋》最重要的重构。 这是什么意思？空间宽大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简洁明了地说，空间宽大使汉族农业文明去中心化，并重新定义了《春秋》中大同的含义。它揭示了宋族的种族中心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地图中心主义。这是自汉朝将《春秋》封为儒家五经的一部分以来，最重要的《春秋》重构。为了深入探讨蒙古人的重要性，历史学家蒂莫西·布鲁克最近为理解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理论：中国的帝国国家并非历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一直都是庞大或统一的。 蒙古元朝开启了一个新的“大国”时代。在接下来的七百年里，三个大国——元、明、清——统治了中国大陆。 大国的开始是蒙古人结束了中国大陆南北分裂的五个世纪，并建立了中国大陆和草原的统一国家。 换句话说，蒙古元国结束了“中国平等”（在莫里斯·罗萨比的划分中）的时期。 换句话说，蒙古元朝结束了“中国平等”（按照莫里斯·罗萨比的划分）的时期。所有三个大国家不可避免地都要处理草原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联系。 而草原与中国之间的关键纽带就是北京这个首都。如果说蒂莫西·布鲁克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大国”有一个意识形态模板，那么《大同志》中的空间宏大就是它。

历史学家约翰·达德斯是记录元朝向明朝过渡的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他提出了一个修辞性的问题：蒙古人征服中国是否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后续发展？答案是肯定的“是”。达德斯敏锐地列出了三个关键方面，说明为什么蒙古的征服在明朝皇室在十五世纪重建政治秩序时意义重大：

蒙古人如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领土和历史地理的认识。

与领土扩张有关的中央帝国国家的权力。

儒家知识分子的崛起。

为了我的目的，蒙古元朝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空间。 在中国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蒙古元朝在皇家委托的书籍《大一元始记》中刻画了新的空间意识形态。 它为地理著作和地域管理论文提供了一个管理框架。 这个项目显然是中亚专家和中国儒家学者之间的合作。 在中国帝国历史上首次，蒙古元朝在皇家委托的书籍《大同启事》中刻画了新的空间意识。这为地理著作和领土管理论文提供了一个管理框架。这个项目显然是中亚专家和中国儒家学者的合作。在中亚、佛教和儒家顾问的帮助下，忽必烈开始了这个领土文档项目，并明确表示蒙古元朝是一个儒家的普世帝国。 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朝代。 蒙古人已经融入了儒家传统来宣扬其普遍性。 在中亚、佛教和儒家顾问的帮助下，忽必烈开始了这个领土记录项目，并明确表示蒙古元朝是一个儒家的普世帝国。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朝代。蒙古人已经融入了儒家传统，以宣称其普世性。就像契丹人、女真人和党项人在蒙古元帝国之前声称天命一样，他们明白他们并没有作为一个“中国”的朝代加入。 与之前的游牧民族不同，蒙古元朝接受了普遍的儒家文明，并且行为举止也如此。 蒙古人的遗产在接下来的明朝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超过了新儒家的种族中心主义。

## 中国家园：

天命回归中国人的手中。

那一天是1368年9月10日 元朝皇帝土贡腾穆尔，他曾下令印刷《大同文献》，召集了他的官员们的最后一次会议。 他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即逃离大都，迁移到直北两百英里的草原上的夏都上都。 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和忽必烈汗的中国政权，已经不复存在。 明军很快就会占领首都，并将城市重新命名为“北平”，然后再改为“北京”。 明朝的农业帝国与草原世界之间的新边疆地区很快将呈现出独特的形态。

在许多其他事物中，明朝（1368-1644）从其蒙古前身那里继承了基本的体裁，《大同文献》。 明朝（1368-1644年）从其蒙古前任那里继承了许多其他事物，包括基本的体裁，《大一统文献》。明朝的第一部此类作品是在1370年匆忙编撰的一部集子，名为《大明文献》，主要是为了满足洪武皇帝的虚荣心。 永乐皇帝（在位期间 永乐皇帝（在位1402-1424年），在篡夺侄子皇位之前，他在北京担任军事指挥官超过三十年，他将首都从南京（南方的首都）迁移到北京（北方的首都），并保持了两个首都的制度。 永乐皇帝选择北京作为他的主要首都，拆除了蒙古人在那里建造的一切，并下令建造今天的紫禁城。 这样一个重要的举动展示了永乐皇帝敏锐的地缘政治意识。 因此，他命令他最出色的官员编写《大明一统志》一事并不令人惊讶。 永乐皇帝选择北京作为他的主要首都，拆除了蒙古人在那里建造的一切，并下令建造今天的紫禁城。这样重要的举动展示了永乐皇帝敏锐的地缘政治意识。因此，他命令他最出色的官员编纂《大明一统志》并不令人惊讶。永乐皇帝也比他的父亲洪武皇帝更为精明地赞助文化项目。 永乐皇帝赞助了一个名为“永乐大典”的百科全书项目，这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永乐大典》相比，《大明一统志》显得更加连贯、宽大和务实。 永乐皇帝在世时并未能见证《大明会典》的完成，这部作品在很多年后仍然流传。 永乐的孙子，宣德皇帝（在位期间 1425-35年的宣德皇帝，把这个虚荣的项目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永乐皇帝并没有活得足够长的时间来见证它的完成。大明大统文献在很多年里一直停滞不前。永乐的孙子，宣德皇帝（在位1425-1435年），将这个虚荣的项目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北部边境上正在发生更紧急的事情，宣德皇帝高度关注边境事务。

在1368年至1435年的时期，从洪武皇帝称领天命到宣德皇帝去世，明朝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和绝对的道德中心。 在宣德皇帝去世时，明朝仍然保持着与蒙古元朝相同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是一个普世帝国，有权统治中国农耕世界和草原世界。 洪武在草原世界发动了两次重大战役。 永乐进行了五次深入草原的惊人战役，并在最后一次中去世。 徐光启在1428年，1430年和1434年亲自带领了三次草原之旅。 然而，宣德去世后，普遍帝国的时代逐渐消退。 明朝的皇帝不再像他们三人那样宣称对普世帝国的信仰。 而在宣德之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能够有力地宣称自己有能力在宫墙之外，领导人民和军队。 明朝对草原世界和边境安全问题的处理方式发生了转变。 1453年之后，明朝中国与草原统治者的直接交流越来越少。 它接纳的草原难民越来越少。 它逐渐停止在北京接待大规模的使团。 它向草原上的统治者派遣的使者越来越少 仁慈，同情和公平交易的修辞，以及将世界描述为在天堂代表下的一个大家庭的话语——所有这些都从记录中消失了。 逐渐取代这种世界观的是更接近汉族中国民族主义的东西，这是一种中国要与世界对抗的立场。

堡垒心态在正统皇帝（1435-1449年）的统治期间慢慢形成初步形状，宣德的八岁儿子在1435年继承了皇位。 郑统的强大祖母，由王振领导的一小群太监，以及三位姓杨的大臣共同管理明朝朝廷。 到了1440年代中期，边疆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早期的明朝修辞中充满了友好的词语，将全人类视为一家人，将外国人视为中国的子女。 但是，这种语言正在逐渐消失，使用的频率和自信度都不如过去的几十年。 逐渐地，它被敌意、冷酷的实用政策和复仇心理所取代。 早期的明朝修辞以友好的话语为特色，将全人类视为一个大家庭，将外国人视为中国的孩子。但是这种语言正在逐渐消失，使用的频率和自信度都比过去的几十年要低。渐渐地，它被敌意、冷酷的实用政策和复仇心理所取代。一个更为明显的划分将那些坚持文明价值观的人与那些对道德呼吁充耳不闻、只表现出狼性贪婪的人分开。 在这段时间里，蒙古人中最西边的部落——鄂尔浑部，以及三个乌里昂哈达部落与明朝及其盟友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奥伊拉特和乌榄汗部落之间的关系时而亲密，时而敌对。 但关键的发展是奥伊拉特大导师艾森日益增长的统治地位。

在1449年7月28日，在埃森的领导下，鄂尔浑人确实入侵了。 没有宣战，也没有任何公告来证明这样的行为。 鄂尔多斯人在中国边境的四个不同点进行了协调入侵。 一旦消息传到北京，明朝就开始动员士兵。 他们的武器总数达到了八十万。 明朝宫廷随后宣布计划让正统亲自负责这次远征。 这次远征是在紧急状态下临时安排的。 相比之下，宣德在草原平静时就已经计划了边境之行。 明朝宣布计划让正统亲自负责这次远征。 经验丰富的宣德在他精心准备的巡游中与毫无经验的正统在他混乱的冲入战场中的对比鲜明。 据传言，他并非出于自愿走向聚光灯下，而是在他的终身导师，宫廷太监王振的坚定指导下。 据传言，他并非自愿走上前台，而是在他一生的导师，宫廷太监王振的坚定指导下。郑统的弟弟朱祁钰（即未来的景泰皇帝）的摄政。 在皇帝离开期间，朱祁钰——即未来的景泰皇帝（在位1449-57年）和太监金英在北京接管了政权。 郑统的总部随行人员由十七名高级军事官员和十五名文官组成。 没有太多时间进行热烈欢迎。 8月4日，远征队离开了首都。 他们向北走向宣府和大同，那里是额森领导的袭击地点，也是主要的威胁所在。 这次远征从未到达那里。 郑统的远征队士气低落。 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周密的规划。 郑通的随从不确定他们为什么在那里 这个不幸的出征故事以1449年9月1日在土木堡的大屠杀告终。 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以鄂森俘虏年轻的正统皇帝作为高潮。

1449年的土木之役发生在土木堡（今张家口，与内蒙古接壤）之间，交战双方是鞑靼部落的蒙古人和明朝的北京。 1449年的土木之役发生在土木堡（今张家口，与内蒙古接壤）之间的鞑靼部落和明朝的北京。鞑靼以较小的兵力击败了明朝的50万大军（约为蒙大拿州人口的一半）并俘获了正统皇帝。 1449年的土木之役发生在土木堡（今张家口，与内蒙古接壤）之间的鞑靼部落和明朝首都北京。鞑靼以较小的兵力击败了明朝的50万大军（约相当于蒙大拿州的一半人口）并俘获了正统皇帝。这场灾难演变成了一场宪政危机，因为明朝皇帝成为了北方蛮族的俘虏。 土木之役引发了北京的紧急应对。 高级官员于谦（1398-1457）在明朝朝廷中动员支持，安排景泰皇帝，正统的兄弟上位。 与此同时，也先的军队仍然对北京构成严重威胁。 但景泰皇帝的朝廷能够拒绝额森的赎金要求，并且能够与鄂尔浑人进行有效的谈判。 景泰和能干的于谦介入，挽救了明朝在强大敌人压力下的崩溃。 Esen在草原世界将正统作为人质，与新的景泰皇帝的朝廷打交道，持续了近一年。 Esen将Zhengtong作为人质，在草原世界中扣押了近一年，同时与新的景泰皇帝的朝廷打交道。

最后，郑通于1450年毫无 ceremoniously地返回了朝廷，并与他的家人一起被软禁在家中。 与此同时，Esen于1455年去世。 景泰的统治期间，前皇帝被软禁在家的这种罕见而不幸的情况给他带来了困扰。 然后，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 1457年2月11日，四百名士兵突然在夜间毫无预警地闯入了前皇帝的监狱院落。 他们抓住了惊愕的皇帝，把他放在轿子里，抬到了主要的听众大厅。 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正统皇帝重新掌握了权力，而景泰皇帝因病已久，无法出席朝廷。 在1457年2月11日，四百名士兵在夜晚毫无预警地强行闯入前皇帝的监狱。他们抓住了惊愕的皇帝，把他放在轿子里，抬到了主要的听证厅。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正统皇帝重新掌权，而景泰皇帝已经病了一段时间，无法出席朝廷。他现在被降级为他原来的王子地位。 于谦被处决，那些通过支持景泰皇帝登基，帮助拯救中国的同谋者被撤职。 1457年3月14日，宫廷太监在他的府邸里掐死了景泰皇帝。 但是这场弑君事件对明朝的官僚国家影响不大。 明朝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依然坚韧不拔。 尽管在土木之困和1457年的政变中遭受挫折，正统皇帝重新掌权，并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天顺（r）统治。 （1457-1564年） 随着天顺皇帝开始处理国事，边境的暴力冲突加剧并加速。

在这样的政治和军事气候下，在天顺五年（1461年），《大明总会启事》得以实现。 在这样的政治和军事气候下，天顺五年（1461年），《大明总会启事》取得了成果。 在这样的政治和军事气候下，天顺五年（1461年），《大明盛典》的编纂工作完成。 同样，说天顺皇帝不再有雄心壮志去称霸农业世界和草原世界，这也未免言之过轻。 土木之变成为了政治禁忌，因为当时的皇帝被俘虏，后来重返皇位并下令完成了这个项目。天顺皇帝在草原上作为额森的人质度过了一年，又在软禁中度过了近七年，他对自己的第二次统治会经历怎样的“大团结和开始”非常敏感。同样，天顺皇帝已经没有再去争夺农业世界和草原世界的普世帝国的野心。这还不算是完全的要塞心态，但向这个方向的转变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天顺皇帝对《大明大同文献》会有什么看法呢？

天顺在序言中首先说，洪武皇帝接受了天命，统一了天下，永乐皇帝派遣代表从全国各地收集地方志。 天顺皇帝在序言中首先提到，洪武皇帝接受了天命，统一了天下，永乐皇帝派遣代表从全国各地收集地方志。天顺皇帝铭记祖先的雄心壮志，决心完成他们的遗志。 天顺可能在1457年开始他的第二次统治后不久就下令进行这个项目。 指定的团队在1461年完成了《大明总一统志》，并将其存放在皇家图书馆中。 天顺皇帝在赞美《元朝总合志》的序言中，回应了徐有仁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对明朝创始人的成就的重要教训，后人应当铭记。 从徐有仁到天顺，一个明确的先例已经确立。 “大一统”是建立一个朝代的政治成就。 回应了徐有仁在元大一统文献序言中的观点，天顺赞扬这是对后世的重要教训，以记住明朝创始人的成就。

大明总督府的文件至今保存完好。 大明总督府的文档已经保存到我们的时代，我使用的版本是保存在东京大学亚洲高级研究所（Toyo Bunka kenkyu jo）的版本。 这是明朝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著横切面，展示了明朝防御系统的全貌以及明朝在其历史转折点与邻国的关系，因为它正在从一个世界性的心态转变为一个防御性的心态。 后来，它将成为18世纪《大清一统志》的模板。 《大明一统志》的编辑团队从文本来源和明朝的行政和军事系统中获取了其地理知识。 尽管它还不是基于大地测量的，但《大明一统志》是第一份系统化且保存下来的地缘政治文献记录。 它是明朝政权经历土木之变和1457年政变后的特殊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产物。

韩林编辑团队如何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大明会典》的主编是三位来自天顺皇帝朝廷的韩林学院的杰出学者——李贤（1408-1466年），彭实（1416-1475年）和陆源（1418-1462年）。 汉林编辑团队是如何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的？《大明会典》的主编是三位杰出的学者——李贤（1408-1466年）、彭时（1416-1475年）和陆原（1418-1462年），他们都来自天顺皇帝朝廷的翰林院。另外，还有三位副主编和二十一位翰林编辑加入了工作团队，还有三十多位翰林院的学者在项目中担任文员和抄写员。 汉林编辑团队是如何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的？《大明宪文》的主编是三位杰出的学者——李贤（1408-1466）、彭时（1416-1475）和陆原（1418-1462），他们都来自天顺皇帝朝廷的汉林院。另外，还有三位副主编和二十一位汉林编辑加入了工作团队，还有三十多位来自汉林院的学者在项目中担任文员和抄写员。默认情况下，整个汉林编辑团队都是天顺复辟的支持者，因为这份工作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支持和忠诚的回报。 当这些汉林学者为《大明会典》写序言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避开任何可能暗示土木之役的内容，而这无论好坏，都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因此，在《大明总督大联合文档》的形式和内容上，翰林团队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

与蒙古版本强调空间宽大不同，《大明总一图状》的核心信息是重新界定中国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区别。 蒙古人成为了征服中国的“外族野蛮人”。 如今，明朝早期的世界主义已经完全消失了。

华北平原和首都北京的地貌如此广阔而复杂，只有中国文明才能与之相抗衡。 北方平原和首都北京的地理环境如此广阔而复杂，只有中国文明才能与之抗衡。野蛮人可以占领中国，但永远无法克服并匹敌中国地理环境的优势。 明朝帝国之所以能成功驱逐蛮族，正是因为明朝的开国元勋们能够崛起并掌握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

我将《大明总督文献》所创造的整个政治和象征性结构称为“中国家园”。

第一个编辑原则是从明朝前三位君主的世界主义心态中显著转变过来的。 他们三人（洪武、永乐和宣德）都使用儒家家长式的语言来宣称和证明他们的战役、巡游和对草原世界的使节，并保持着作为中国农业和草原世界的普遍统治者的野心。 重塑中华与蛮夷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回归《春秋》传统，而且实际上提升了明朝中国在前蒙古元朝帝国之上的地位。 汉林学者们扩大了“夷”（野蛮人）的世界范围，从专门指称西北边疆的各种草原居民和游牧群体，扩大到包括郑和在永乐皇帝统治期间（1405年至1433年）的海上远征和探索中记录的所有新王国和政权。 他们展示了明朝皇家如何达到了《春秋》中的期望，成功地平息了东南亚的“岛屿蛮族”，并将其呈现为蒙古人无法比拟的成就。 永乐皇帝在北方的首都“统治万国，安抚四方的蛮族”。郑和探索和记录的南洋，成为四个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北方边境防御系统的成本和规模相比，郑和对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远征成本相对较小。 然而，在《大明总一图志》中，郑和的成就被强调为将岛屿蛮族纳入明朝势力范围的重要且成功的努力。

在《大明大统志》的序言中，翰林学士充分阐述了区分内地中国领域和外部蛮族领域的观念，这是按照《春秋》的记载来规定的。 在《大明并蒂文献》的序言中，翰林学者们充分阐述了区分内地中国领域和外部蛮夷领域的观念，正如《春秋》所规定的那样。他们首先描述了中国过去的空间区域的历史。 在《大明并蒂文献》的序言中，翰林学士们充分阐述了区分内地中国领域和外部蛮族领域的观念，这是按照《春秋》的规定。他们首先描述了中国过去的空间区域的历史。翰林学士们认为，皇帝必须统一天下以善治之。 在《大明宣宗实录》的序言中，翰林学士们充分阐述了区分内地中国领域和外部蛮族领域的观念，这是按照《春秋》的规定。他们首先描述了中国过去的空间区域的历史。翰林学士们认为，皇帝必须统一天下以便善治。天子必须首先统一中国领域，平定蛮族，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对于这些翰林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历史关口，论证明朝是如何实现《春秋》的伟大期望的。 他们赞美了在天命的指引下中国的统一。 这样的统一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就像《春秋》中描述的崇高目标一样，明朝的皇家政权现在已经将中国人和蛮族纳入了其广大的领土之中。 尽管明朝未能征服草原，但明朝已经控制了今天的满洲（称为辽东），并获得了朝鲜的支持，捍卫了戈壁沙漠的内侧，最重要的是，已经到达了中国次大陆的南端。 他们赞美了在“天命”下中国的统一。这样的统一是非凡的，因为就像《春秋》中描述的崇高目标一样，明朝的皇家政权现在已经将中国人和蛮族包括在其广大的领土中。尽管明朝未能征服草原，但明朝已经控制了今天的满洲（称为辽东），并得到了朝鲜的支持，保卫了戈壁沙漠的内侧，最重要的是，已经到达了中国次大陆的南端。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宣称中国人和蛮族在天下共同繁荣的大同和开端。 中国的内部领土和外部的蛮族领地在天下统一。 明朝并未直接统治岛屿上的蛮族，但他们现在已经从明朝那里了解到了中国文明。 明朝将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了偏远的岛屿蛮族，正如《春秋》所规定的那样。 翰林学者们认为，明朝已经平定了大洋洲、东南亚和南亚的政治单位。 郑和的航行为这样的大联盟和开端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 尽管鄂尔浑和乌里扬哈德现在在草原上控制了更多的土地，但大多数东南部的岛屿蛮族已经向大明帝国屈服，而他们在此之前并未向蒙古元朝屈服。

更重要的是，《大明总督府文献》为儒家官僚制度的帝国中国创造了空间和行政模板。 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为中国帝国创造了儒家官僚制度的空间和行政模板。翰林学士描述了明朝中国的领土管理单位，“文明启蒙的领域”。共有十三个省份，每个省份都由州和县组成。 共有149个府，218个州，以及1105个县。 更重要的是，《大明一统志》为儒家官僚制度的帝国中国创造了空间和行政模板。翰林学士描述了明朝中国的领土管理单位，“文明启蒙的领域”。共有十三个省份，每个省份都由府和县组成。共有149个府，218个县，和1105个县。边境沿线还设有许多军事驻地和哨所。 每个省份的部分前面都有插图地图，以指导读者。 每个地区的分部都有详细的自然、人文和文化地理文档。 地方章节、州县小节和插图地图构成了《大明一统志》的主体部分。其最后两章，名为“外夷”，列出了明朝所知的所有邻国。 我们应该注意到，《大明一统志》中并未列出任何“朝贡国”。

鉴于明朝与草原地区之间的敌对对抗，他们之间并没有这样的朝贡关系。 另一方面，郑和的航海之后，东南亚的政治单位才刚刚被认可和分类。 朝鲜人，女真人和琉球（冲绳）都在试图安抚明朝帝国。 在《大明一统志》中并未记录到明显的朝贡关系。其基本框架是遵循《春秋》的观念，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区分中国本土和外部蛮夷。

第二个编辑原则更为微妙且深远。 翰林学者对永乐皇帝在北京建设首都和宫殿群的地缘政治选择做出了区分。 根据《公羊》的传统，位于皇权等级顶端的天子应该居住在一个“庄严壮丽的城市”（京师）。《大明会典》对京城有着独特的描绘。 这座宏伟壮丽的城市位于古有和冀的附近。 [皇帝面向南方，]左侧环绕着海洋，右侧则是太行山环抱，居庸关山就像北方的枕头，黄河和济河就像南方的领口一样流淌。 当忽必烈在1264年至1271年间将他的总部分设在上都和大都，以便从草原统治中国时，这是统治政权首次选择了中国的东北角，这是一个靠近草原的崎岖地形，并且靠近通往中国东北（满洲）的要道。 当忽必烈在1264年至1271年间将他的总部分设在上都和大都以便从草原统治中国时，这是统治政权首次选择了中国东北角，一个毗邻草原的崎岖地带，靠近通往中国东北（满洲）的要道。从中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边缘地带，大部分中国古代历史都在这里展开。 这也是华北平原的东北尖端，以及黄河的河口和洪水平原。 当忽必烈在1264年至1271年间将他的总部分设在上都和大都以便从草原统治中国时，这是统治政权首次选择中国的东北角，这是一个靠近崎岖地形的地方，与草原相邻，靠近通往中国东北（满洲）的要道。从中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边缘地带，大部分中国古代历史都在这里展开。它也是华北平原的东北尖端，黄河的河口和洪水平原。这与长江流域的环境完全不同，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今天被称为文化繁荣的城市杭州。 根据此时为止中国帝国历史上的任何先例，将这个地方作为中国新的、空间扩大的帝国的首都，是一个有些奇怪的选择。 然而，它却成为了草原和中国次大陆在历史上变得密不可分的地方。

古代的地名“幽”和“蓟”指的是古代中原边缘的城邦。 这个描述性的陈述隐含地承认了北京在古代中国的边缘地位。 然而，在蒙古人征服之后，这种历史边缘性并未掩盖北方首都的战略重要性和显著地貌。 换句话说，地缘政治考虑是永乐皇帝在北京建造他的宫殿群的主要原因。 他们认为，野蛮人可能在军事和政治上统治中国，但野蛮人永远无法比得上首都的地理优势。 为什么？有趣的是，这些翰林学者并没有接近新儒家的种族中心主义。 他们并没有争论中国人民优于蛮族。 他们建议，野蛮人可能在军事和政治上统治中国，但是野蛮人永远无法匹配首都的地理优势。为什么呢？有趣的是，这些翰林学者并没有接近新儒家的种族优越主义。他们并没有主张中国人比野蛮人优越。相反，他们声称野蛮人统治了中国，但无法匹配首都的地理优势。 为了解读这个地缘政治论点，我们必须参考背景中的两个隐晦的事件。

根据翰林学者的说法，首都的景观优势胜过天下任何地方，真正是天堂的土地！就像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样，中原王国的野蛮征服者都将他们的首都设在这里。 根据翰林学者的说法，首都的景观优势胜过天下任何地方，真正是天堂的土地！就像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样，中央王国的野蛮征服者都将他们的首都设在这里。但是，野蛮的征服者无法比拟首都景观的优势。 根据翰林学者的说法，首都的景观优势胜过天下任何地方，真正是天堂的土地！就像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样，中央王国的野蛮征服者都将他们的首都设在这里。但是，野蛮的征服者无法比拟首都景观的优势。伟大的永乐皇帝就像隐藏的龙一样沉浸在这里。 根据翰林学者的说法，首都的景观优势胜过天下任何地方，真正是天堂的府邸！就像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样，中原的蛮族征服者都在这里设立了他们的首都。但是，蛮族征服者无法比拟首都景观的优势。伟大的永乐皇帝就像一条隐蔽的龙一样沉没在这里。他的皇 majesty后来继承了惊人的统一和开始[王位的代码]，并在这个位置建立了北方的首都[北京]。 他在这里统治万国，安抚四方的蛮族。 皇上真正能够匹配首都的地理优势，并为万代奠定了卓越的基础。 自古三大家族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繁荣的城市！中国的家园永远不会屈服于蛮族的征服。 即使真的被占领，外族的统治也只会是短暂的，因为作为蛮族，他们永远无法占有中国的优势。

## 结论：

在1461年完成后，《大明总合志》经过了几次小的修订，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 在1461年完成后，大明总合志经过了几次小的修订，直到明朝在1644年崩溃。大清总合志遵循了明朝版本的模板。 似乎满洲清朝在领土记录方面，继承了中国明朝的做法，并保持了显著的连续性。 所有三个大国家——元，明和清——都派遣了他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来进行他们所称的“大同”的意识形态和领土记录，历史学家尤里·派恩斯敏锐地指出了其历史意义。 满洲清军于1644年越过山海关，占领北京后，毫不犹豫地将北京重建为其首都。 然而，满洲清帝国成功地对中国农业和草原世界实现了全面统治。

更重要的是，元明大同文献项目大约需要三到五年才能完成。 更重要的是，元明大同文献项目大约需要三到五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清大同文献项目则需要大约七十年才能取得成果。 并且又花了二十年时间来完成修订版。 为什么完成大清大同文献需要这么长时间？

这一章节表明，大联盟文档体现了大国对其“人口地图”（Bantu）的自我理解。 这一章节表明，大联盟文档体现了大国对其“人口地图”（Bantu）的自我理解。 这一章节表明，大联盟文档体现了大国对其“人口地图”（Bantu）的自我理解。蒙古元朝相信其政治权力已经包含了已知世界中的每一个人。其控制下的人口地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人。 这一章节表明，《大同文献》体现了大国对其“人口地图”（Bantu）的自我理解。蒙古元朝相信其政治权力已经包含了已知世界中的所有人。其控制下的人口地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人。蒙古元朝将其领土的空间宽广作为政治和军事成功的衡量标准，并在《大同文献》中进行了展示。 换句话说，蒙古元重新定义了大同为空间宽大——这是超越其他的最终帝国美德。 历史学家约翰·达德斯将明朝称为“明大国”，因为它是一个强韧的帝国，将从满洲到中亚的整个边境地带军事化，以建立防御系统。 历史学家约翰·达德斯将明朝称为“明朝大国”，因为它是一个有韧性的帝国，将从满洲到中亚的一整片边境地带军事化，以建立防御系统。对于约翰·达德斯来说，明朝能在如此长的距离上维持他们的防御系统，抵御游牧民族的袭击和流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Victor Lieberman来说，明朝的进攻力量明显不足，因为它未能越过并征服草原世界。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Victor Lieberman来说，明朝的进攻能力明显不足，因为它未能越过并征服草原世界。这两位历史学家截然相反的评价，展示了明朝边境现实的两面性。 《大明宏图志》是在土木之变和政变之后立即编写的，它将大一统和开端描述为春秋时期规定的向四个方向传播文明。 然而，主要的平定行动发生在北部边境地区和南海——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岛屿蛮族的领地。 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截然相反的评估，展示了明朝帝国同一边境现实的两面性。大明总会的文献，是在土木之变和政变之后立即编写的，它将大总会和开端描述为春秋时期规定的向四个方向传播文明。然而，主要的平定发生在北部边疆地区和南海——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岛屿蛮族的领地。大总会和开端是为了将较不文明和幸运的人带入中国的启蒙和文化。 然而，主要的平定发生在北部边境地区和南海——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岛屿蛮族的领地。大同和开端是为了将较不文明和幸运的人带入中国的启蒙和文化。这种先进的文明形式只有在中国社会能够匹配并体现中国次大陆的地貌时才显现出来。 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中国的世界秩序吗？正如历史学家万明所展示的，明朝中国与邻国的外交协议的看似连续的外观始终与“朝贡体系”的语言保持一致。然而，明清的外交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和政治是务实和灵活的。 我在万明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空间表征（中国的外交外观）既不单调也不肤浅。 语言和语言政策对于明清两朝的大国来说是密切相关的。 每个国家都根据《春秋》编制了自己的大同文献。 因此，作为大国意识形态的空间表征既反映了大国的自我理解，也反映了它们与邻国的象征性互动。

1700年之前的四種空間表現形式——春秋編年史中的同心圓，新儒家的種族中心主義和對空間維度的忽視，空間寬大作為政治和軍事成功的衡量標準，以及中國本土作為風景意識形態和優越價值的來源——成為了滿清國家的重要遺產。 满族在征服中国农业和草原世界的军事成功，带来了在重新定义其空间表征方面的本质变化 - 作为军事征服的一部分进行的大地测量。 《大清一统志》完全基于大地测量的实证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清朝的大清一统志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 前所未有的测量和绘图为清朝对其在球形地球表面的大小和位置的自我理解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大地测量。

# 第三章：清朝的大地测量

与前一章中讨论的想象的领土相反，清朝在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这是通过采用西欧的制图技术进步，并在1708年至1717年间聘请耶稣会传教士参与大地测量来实现的。 在整个18世纪，这三位清朝统治者不断测量他们新获取土地的纬度和经度点。 与前一章讨论的想象领土相反，清朝在大地测量和制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这是通过采用西欧的制图技术进步，并邀请耶稣会传教士参与1708年至1717年的大地测量调查来实现的。在整个18世纪，这三位清朝统治者——康熙、雍正和乾隆——不断测量他们新获取土地的纬度和经度点。他们每个人都委托制作了地图项目，展示了“托勒密网格和数量扩张”在中国次大陆和中亚的情况。 他们每一个人 - 康熙，雍正和乾隆 - 都委托进行了地图制作项目，展示了中国大陆和中亚的“托勒密网格和数量扩张”。

经纬网点和大地测量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现代欧洲。 中国历史学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为什么中国在十七世纪没有接受西方明显更“先进”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瑟夫·尼德姆，以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受到尊重，他在其开创性的作品《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三卷，1959年）中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和制图学，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尼德姆提出，耶稣会士将“文艺复兴后的制图学”带到了清朝的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帝国的制图技术。 然而，在《地图学史》的第二卷中，Cordell Yee提出了一种修正主义的观点，他认为Needham可能夸大了耶稣会士的影响力。 尽管Yee对Needham的叙述提出了修正性的看法，但这个关于中国历史学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 从我的角度来看，仍然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第一个围绕历史代理问题，特别是解答这个问题：“是谁推动了中国的制图事业？”与普遍的观点相反，推动这一进程的是清朝的皇权，而不是儒家的官僚机构。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早期的现代大地测量学，这是一门致力于准确测量和理解地球的几何属性和在空间中的定位的学科。 尼德姆和余似乎都忽视了大地测量学的关键作用。 这一章深入探讨了这两个问题——审视代理问题并强调了大地测量学的相关性。

表单顶部

表单底部

## 耶稣会地球测量学：

在七岁时即位的康熙皇帝，在他六十年的统治期间成长为一位精明务实的领导者，巩固了广大的中国领土。 他初期的统治年份标志着一场重大的内战，清帝国与吴三桂（1612-78）领导的联盟发生冲突。 在他的统治后期，康熙皇帝在北部的黑龙江附近与罗曼诺夫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对抗，穿越戈壁沙漠到达蒙古的草原，并在1696年至1701年间将他的军事注意力从草原转向了西藏。 这些战役跨越了满族人大部分不熟悉的多样化地形，除了内战，所有的战役都发生在边疆地区。

康熙皇帝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关于他是否真正对科学、数学或者他的 要获得魏源在颂词中描述的圣武皇帝的称号，康熙必须将地缘政治、战略预见和后勤保障放在他的帝国事业的最前沿。 作为一名军事策略家，他面临的挑战是阻止吴三桂试图与蒙古人、俄罗斯人和藏人结成强大的联盟，这威胁到了清朝的领土。 在战胜吴三桂并结束内战后，清帝国迅速制定了策略，以应对吴的盟友，包括俄罗斯人，准噶尔蒙古人和藏人可能带来的威胁。

在鄂博伊摄政期间的康熙早期统治中，杨光先指责耶稣会士可能叛国。 在康熙早期的鄂博伊摄政期间，杨光先指责耶稣会士可能叛国。这导致了耶稣会领袖亚当·沙尔及其追随者被流放。 在他们缺席的时候，杨光先任命了穆斯林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来监督天文历法局。 然而，当康熙在1669年掌权时，他质疑了对耶稣会士的严厉行动，怀疑这些行动是基于对耶稣会士威胁清朝权威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因此，康熙组织了一场天文计算比赛，以评估耶稣会的能力，让费迪南·维比斯特的耶稣会团队与穆斯林天文学家对抗。 这场比赛对康熙至关重要，他看到了利用耶稣会士在天文学、武器和大地测量方面的专业知识进行战争的潜力。 他需要确保耶稣会士的技术实力和他们履行承诺的能力。 比赛于1670年1月举行，紧接在冬至之后，由于日晷影子每天的微小差异，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 这场比赛对康熙来说至关重要，他看到了利用耶稣会在天文学、武器和大地测量方面的专业知识进行战争的潜力。他需要对耶稣会的技术实力和履行承诺的能力有所保证。比赛在1670年1月举行，紧接着是冬至，由于日晷影子每天的微小差异，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在Verbiest的带领下，耶稣会以显著的优势获得了胜利。 到1670年底，他们重新掌握了皇家天文学和占星学的控制权。 这个结果符合康熙的期望和战略计划。

在1670年任命Verbiest为天文历法局局长后，康熙皇帝立即指派他在工部制造火药武器，并制定全球地图。 在17世纪初，满洲八旗军队在面对强大的明朝步兵和巨大的城墙时，严重依赖火炮。 这些火药武器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的情况下，都比投石机表现得更好。 最近发掘出的Adam Schall的《火工切要》（Huogong qieyao），这是一本可能在1643年明朝时期编写的指南，展示了即将到来的清朝火炮的精细设计和潜力。 康熙皇帝研究了对明朝的战斗，认识到这些武器的战略重要性。 继承了沙尔的职务后，费尔比斯在对抗三个保护国的战役中负责炮兵部队。 到1674年，他制作了一幅全面的世界地图《坤輿全圖》，并附有一份详细的指南《坤輿圖說》。

《大地测量和制图学的插图和解释》为后续年份的大地测量提供了详细的计划。 《大地测量和制图学的插图和解释》为后续年份的大地测量提供了详细的计划。 他提出，在耶稣会的著作中，术语“大地”（Dadi），有时缩写为“地”，指的是球形的地球。 与哥白尼学派不同，耶稣会将地球视为宇宙的不动中心，而不是围绕太阳运行的天体。 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天（tian）和地（di）这两个词具有复杂的含义和历史参考。 在翻译成中文时，耶稣会用"天"来表示基督教的上帝，用"地"来表示圆形的地球。 对于儒家学者来说，每个术语都充满了深刻的含义和哲学内涵，这些都植根于中国的古代教导，是新儒家原则的基础。

维尔比斯特遭到了新儒家学者的反对，尤其是年轻有成就的李光地（1642-1718）。 李光地在1670年获得了崇高的进士学位，后于1672年加入了著名的翰林院，他是儒家世界的后起之秀。 当两人在凡尔比斯特被任命为天文历法局局长后相遇时，他们进行了一场尊重却又尖锐的观点交流。 这次交流给李广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他的散文集中记载了这次交流。 对李来说，沃尔比斯特似乎挑战了新儒家的基本信念，即天圆地方。 李认为这是对宇宙的字面解释，他对此表示质疑。 在李的学术成长中，宋代著名学者朱熹（1130-1200年）是新儒家思想的决定性声音。 朱熹明确阐述了一个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对李来说，费尔比斯的批评无异于亵渎神明。

维尔比斯特将天地比作鸡蛋，天是蛋壳，地是蛋黄。 这个比喻与方地说相矛盾。 如果天地是球形的，那么中国（通常被翻译为“中央王国”）将如何适应？这样的宇宙观可能会削弱中国文明的中心地位。 尽管一些耶稣会士认为地球的形状本质上使每个地方都成为中心，但像李这样的新儒家认为这只是诡辩。 维尔比斯特的观点对儒家宇宙地理学的本质构成了威胁。 为了反击这一观点，李倾向于借鉴新儒家的道德哲学。 他辩称，圆和方的概念分别象征着动态和静态。 只因为天不是以圆形运动，并不能否定其动态性质，地不是方形也不能改变其静态本质。 即使中央国家在地理上并非世界的中心，其道德原则也使其与宇宙中心保持一致。 类比来说，李指出，虽然心脏不是身体的物理中心（那是肚脐），但其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 因此，李认为新儒家不应过分关注地球的物理中心。

与李光地传达儒家和官僚反对派的核心观点相反，康熙皇帝则专注于军事目标。 韦尔比斯特必须努力工作，以解决皇帝的担忧并满足他的要求。 与李光地传达儒家和官僚反对的核心不同，康熙皇帝专注于军事目标。费尔比斯特必须努力工作，以解决皇帝的担忧并满足他的要求。在费尔比斯特和李之间的交流发生的同一年（1672年），明朝的老将魏周作（1612-1675年）认识到，康熙皇帝可能会欣赏所有明朝君主享受的同样的宽容——庆祝大清大一统文献的编纂。 魏向皇帝正式致辞：

《省级综合志》（通志）往往需要更多的细节，或者完全缺失，这表明地方当局需要承担起编纂的工作。 《省级综合志》（通志）往往需要更多的细节，或者完全缺失，这表明地方当局需要进行编制。 所有这些数据都应该汇总在一本名为《一统志》的大型文档中，供皇帝审查。

康熙皇帝批准了这个项目，遵循了早期元朝和明朝的既定模式。 康熙皇帝批准了这个项目，遵循了早期元朝和明朝的既定模式。随后，儒家官僚机构开始了这项工作。 然而，吴三桂在南方的意外军事行动导致了大同文献项目被无限期搁置。

在1673年初，吴三桂积累了大量的税收作为战争的战利品，并指挥着一支忠诚的军队，他向年轻的皇帝提出了辞去护国公的职务的请求，这无疑是对皇帝的挑衅。 年轻的皇帝接受了他的辞职，并任命满族官员Samha前往云南，接管吴三桂的军事指挥，并解除他的头衔。 然而，萨姆哈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报告说，吴三桂已经发起了反满清运动，并准备动员他的军队对抗清帝国。 吴三桂如果与其他两位护国公联手，将能对清朝八旗军队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 年轻的皇帝接受了他的辞职，并任命满族官员Samha去云南，接管吴三桂的军事指挥，并解除他的头衔。然而，Samha很快就报告说吴三桂发动了一场反满清运动，并准备动员他的军队对抗清朝。吴三桂可以通过与其他两位护国公联手，形成对清朝旗军的强大反对力量。吴三桂即将发生的叛乱构成了灾难性的风险。 到了1673年底，康熙即将步入二十岁，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下的重大决定。 尽管他无疑从家族长辈和亲戚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建议，但他的内阁却分裂成主战和反战的派别。 在英语学术界，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低估了康熙对吴三桂的战役的危险性。 我赞同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孟森的观点，他将康熙和吴三桂之间的内战的风险与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内战的风险相提并论。

在1674年内战开始时，吴三桂的军队夺取了湖南，湖北，四川和广西省的控制权。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耿精忠、王辅臣和尚之信纷纷与吴三桂的军队结盟，将联盟建设过程扩展到包括藏族、蒙古族和俄罗斯人在内。 清朝王朝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果清朝被击败并被迫撤退到满洲本土，会有什么后果？那些已经侵入满洲的俄罗斯人呢？除了俄罗斯人，还有其他强大的欧洲军队吗？他们离得有多远？他们能否穿越草原到达蒙古草原？如果他们可以通过海路到达中国，为什么他们没有尝试陆路？欧洲人口有多么多样化，是什么让他们与来自中亚、波斯或印度的其他人民区别开来？随着吴三桂在清朝领土周围建立联盟，地缘政治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在1674年，吴三桂在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提议沿着长江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南北两个地区，清朝统治北方，吴三桂统治南方。 然而，康熙皇帝没有对吴三桂的提议考虑第二次，认为这只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幌子。 他认为吴有秘密计划与蒙古人、藏人甚至台湾的郑氏政权建立新的联盟，以对抗清朝。 然而，康熙皇帝毫不犹豫地驳回了吴三桂的提议，认为这只是一个幌子。他认为吴三桂暗地里计划与蒙古人、藏人，甚至台湾的郑氏政权建立新的联盟，以对抗清朝。康熙意识到他必须破坏吴三桂的包围战略！最终，长江下游地区免遭破坏，满族军队取得了胜利。 然而，吴三桂的叛乱的不稳定性却成为了一个地缘政治的警钟。 一幅由可靠的欧洲顾问制作的相对精确比例的世界地图，将帮助康熙形象化地形，识别周边地区的盟友和敌人。

在1674年，维尔比斯特完成了他的世界地图《世界全描》和他的书《地理测量学和制图学的描绘和解释》。 在1674年，弗拉芒传教士费迪南德·维尔比斯特作为清朝天文历法局的局长，完成了他的世界地图《世界全揭图》和他的书《地理测量和制图的插图和解释》。 他的职责包括编辑皇家历书和官方历书，包括星图和日食表，并监督北京皇家天文台的天文仪器的翻新。 在《地理测量与制图的插图和解释》一书中，维尔比斯特提出地理测量学源于经过时间考验的耶稣会传统。 考虑到儒家对传教的长期抵制，维尔比斯特巧妙地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转化为将欧洲世界地图翻译成古典汉语的耶稣会长期实践。 他采用了由马悦然（Matteo Ricci）引入的格式，马悦然是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他在中国式挂卷上描绘了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维尔比斯特的世界地图风格与利玛窦的相呼应，使用挂卷来编制世界地图的图纸，由八卷组成，每卷长171厘米（大约是棒球棒长度的两倍）宽51厘米（大约是棒球棒大小的一半）。 这幅地图富含故事、海洋怪兽、异国情调的细节和古代传说。 它具有鲜明的“中世纪”美学风格。

然而，外表可能会具有误导性。 维尔比斯特的《世界全描》与马特奥·利奇的中世纪世界地图有着显著的不同，它展示了地球球形的两个关键方面 首先，他提出地球的球形表面可以转化为二维地图。 首先，他提出地球的球形表面可以转化为二维地图。其次，他断言地球可以使用“天文定位”来测量。球形性和天文定位需要先进的球面三角学来数学生成地图。 费尔比斯特的《世界全揽》与利玛窦的中世纪世界地图有着显著的不同，它提出了地球球形的两个关键方面。首先，他提出地球的球形表面可以转化为二维地图。其次，他断言地球可以用“天文定位”来测量。球形和天文定位需要先进的球面三角学来数学生成地图。在这个时期，清朝朝廷也在法国历史学家Catherine Jami所称的“皇帝的数学”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这与清朝中国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实施同时发展。

比利时和耶稣会数学家弗朗索瓦·达吉隆（1567-1617），他致力于《光学六书》（Opticorum Libri Sex）的创作。 比利时和耶稣会数学家弗朗索瓦·达吉隆（1567-1617）致力于编写《光学六书》。这本书最初是作为耶稣会机构的光学教科书，后来在西欧被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的杰出贡献所取代。 然而，由于新教改革者和战斗的耶稣会士之间存在显著的分歧，Verbiest选择了d'Aguilon的光学而非Kepler的。 然而，由于新教改革者和战斗的耶稣会士之间的重大分歧，Verbiest选择了d'Aguilon的光学而非Kepler的光学。尽管在西欧的耶稣会和新教科学之间有相当大的相互影响，但在南美或东亚的战斗耶稣会传教士通常会避开这种政治上危险的立场。 然而，投影的数学在清朝中国的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中得以贯彻并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投影的数学在清朝中国的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制图中得以体现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Opticorum Libri Sex》中，投影的科学通过一幅生动的图像得以展示：在图像中，我们看到一位老人以特定的角度握着一个地球仪。 在他后面飞翔的翅膀天使，手持火炬照亮了整个场景。 地球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两个天使正在用圆规测量和计算影子的角度和弧度。

这个直观且富有启发性的插图展示了早期现代欧洲常见的投影数学。 这个直观且富有启发性的插图展示了早期现代欧洲常见的投影数学。 正如历史地图学家约翰·P·斯奈德所展示的，到文艺复兴结束时，早期现代欧洲已经制作了十六种地图投影，以应对在平面上描绘圆形地球的挑战。 因此，费尔比斯特可以为他的世界地图选择一个合适的投影方式。 如历史地图学家约翰·P·斯奈德所示，到文艺复兴时期结束时，早期现代欧洲已经制作了十六种地图投影，以应对在平面上描绘圆形地球的挑战。因此，维尔比斯特可以为他的世界地图选择一个合适的投影。在1670年到1800年之间，出现了更准确、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以满足许多制图需求。 斯奈德已经证明，到文艺复兴时期结束时，早期的现代欧洲已经制作了十六种地图投影法，以应对在平面上描绘圆形地球的挑战。因此，维尔比斯特可以为他的世界地图选择一个合适的投影法。在1670年到1800年之间，出现了更准确和复杂的数学模型，以满足许多制图需求。一些备受推崇和可靠的方法包括等距柱状投影、梯形投影、方位投影、墨卡托投影、正弦投影和博纳投影。 康熙地图集最终采用了正弦投影以满足其对精度的需求。

在这个阶段，维尔比斯特继续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赤道立体投影法来绘制他的世界地图上与赤道平行的经线和水平圈。 在这个阶段，维尔比斯特继续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赤道立体投影法来绘制他的世界地图上与赤道平行的经线和水平圈。 如果有一个历史背景能够赋予“中央王国”这个词以分量，那就是这个——正如一位欧洲传教士所断言的。 维尔比斯特的世界地图将经过北京的第一条子午线标记为零，这是一个宏大开端的象征。 然后，经线向东编号至360，最终回到北京。 它们的数值（0到360）显示在赤道上。 黄道也在地图上找到了它的位置。

两个圆圈分别包围着每个半球：内圈表示纬度，而外圈代表了从赤道到极点的18个区域的最长日照时间。 正如乔丹·布兰奇所说，这种在统一表面上的托勒密网格代表了现代的空间概念。 此模型还包括了确定中国各地经纬度的顺序指令。 这种对地球的几何描绘为康熙皇帝提供了对清朝领土的新颖视角。

维尔比斯特的作品《测地学与制图学的插图和解释》是一部深思熟虑的著作，回答了康熙皇帝在清朝与吴三桂联盟激烈的内战期间的提问。 面对这种剧变的冲突，维尔比斯特将他的大地测量学视为一项持久的努力，并利用四部杰出的耶稣会作品来构建一个耶稣会的大地测量学传统：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朱利奥·阿莱尼1623年的《地理志外记》、阿方索·瓦格诺尼1633年的《空极格志》以及萨巴蒂诺·德·乌尔西斯1612年的《表度说》。 这些耶稣会前辈活动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初期，早于明朝的灭亡和随后的满族入侵中国。

耶稣会关于球形和充满水的地球的概念源于托勒密的地理学。 他们的出版物清楚地展示了关于球形和陆地水体地球的对话的发展，以及耶稣会不懈的努力，试图说服中国学者接受地球的球形理论。 在他的书的序言中，南怀仁回应了儒家学者李光地的质疑，解释说他的参考对象是宇宙和地球的物理形态，而不是儒家的天地 metaphysical 或道德原则。 包括天球及其北极和南极在内的球形和陆地地球的概念，作为大地测量的几何模型。 天球上的一个重要圆和地球表面上的一个圆都有360度。 维尔比斯特用赤道的描绘来描述地球的表面，这是基于耶稣会宇宙学、天文学、宇宙地理学和地理学的既定原则。 北回归线与赤道平行，位于赤道以北23.5度的位置。 在北半球的夏至（每年大约在6月21日），太阳在天球上达到其最大的北纬+23.5度，直接对准北回归线。 维尔比斯特将其称为北道（Beidao）。 相反，在南半球的夏至期间，太阳直接位于摩羯线上方，距离赤道南方23.5度。 相反，在南半球的夏至期间（大约在每年的12月21日），太阳直接位于摩羯线上方，距离赤道南方23.5度。 赤道，北道和南道既存在于天空中，也存在于球形的陆地和海洋中。 魏璧滂详细阐述了从北极到南极的平行线，借鉴了赤道，北方和南方路径的例子。

天文定位和三角测量是确定地球表面相对精确位置的两种主要方法。 在特定位置最直接的测量天文纬度的方法涉及到评估北极星（Polaris）在北半球地平线上的高度，这将给出纬度。 维尔比斯特解释说，向北行进250里（约125公里或77.67英里）将使北极星的高度提高一度。 相反地，向正南方向直行同样的距离会使北极星的高度降低一度。

此外，天文经度是指通过北京（作为本初子午线，位于零度）的子午线与测量位置之间的角度。 确定天文经度非常复杂，Verbiest的技术仍需要澄清。 这种天文定位方法为地球的球形性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证据。 一旦清朝的测量员确定了某个地点的经纬度点（经度和纬度）以及它与首都北京的距离，他们就可以创建一个特定的网格系统。 因此，使用天文历算局已建立的计算表进行计算，以及从网格中进一步推算经纬线点，将变得相对简单。 康熙皇帝坚持遵循维尔比斯特的大地测量学基本原理，并一直向他的儒家顾问，特别是李光地，教授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实践方面。 政治含义无疑是清晰的。

## 康熙征战与考察：

在1674年，威尔比斯特应皇帝的要求，创作了《测地学和制图学的插图和解释》。 尽管面临战争的不可预测挑战，但魏必思能够通过他的工作有效地传达测地原理和测量技术。 康熙皇帝被说服了吗？或者这只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耶稣会传教士编织的又一个宏大的幻象？清朝是否足够信任这些原理和技术的实用性，以在如此广大且不断发展的帝国中承担如此雄心勃勃的项目？

在1672年，康熙皇帝已经明确表示了要对他的领土进行勘察的意图。 在1672年，康熙皇帝已经明确表示要对他的领土进行勘测。他命令他信任的皇家卫队，正式被称为北京内城的“九门提督”，测量紫禁城所有九个入口的经纬度。 在1672年，康熙皇帝已经明确表示要对他的领土进行勘测。他命令他信任的皇家卫队，正式被称为北京内城的“九门提督”，测量紫禁城所有九个入口的经纬度。这些包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和阜成门。 在1674年，康熙皇帝將首任“九門提督”的頭銜授予了費揚古（1645-1701），他是滿洲平原黃旗烏拉那拉氏的一員，與清朝皇室有著密切的聯繫。 他命令他信任的皇家侍卫，正式被称为北京内城的“九门提督”，测量紫禁城所有九个入口的经纬度。这些包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和阜成门。在1674年，康熙皇帝将第一个“九门提督”的头衔授予了费扬古（1645-1701），他是满洲平原黄旗乌拉那拉氏族的一员，与清朝皇室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676年，费扬古可能在维尔比斯特的帮助下，向康熙皇帝报告了测量结果。

皇帝将太和殿（Taihedian）确定为Fiyanggu测量所有九个门的中心点。 这个大殿是标志性的，由于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对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在紫禁城的加冕仪式的华丽描绘，使其在今天广为人知。 皇帝将太和殿（Taihedian）确定为Fiyanggu的所有九个门的测量中心点。这个大厅是标志性的，由于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对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在紫禁城的加冕的华丽描绘，使其在今天广为人知。将太和殿定位在中心是一个战略举动，以确定未来子午线将通过的精确位置，就像维尔比斯特在他的《大地测量和制图的插图和解释》中建议的那样，这将出现在即将到来的清帝国地图中。 因此，皇帝的测量项目始于1672年。

当康熙皇帝在皇家首都附近试验耶稣会的测量方法时，他派遣探险家去研究位于鸭绿江和黑龙江之间的满洲故土。 在1677年4月与吴三桂的内战中，康熙皇帝任命满洲镶黄旗领导人Gioro Umuna去长白山脉调查满洲统治王朝的祖先根源。

乌穆纳于1677年6月13日抵达沈阳，6月22日抵达吉林市（当时的吉林乌拉）——这是离长白山最近的军事驻地。 侦查报告显示，这次旅行将比预期更加危险，这使得乌穆纳向宁古塔的高级将军请求支援，他派遣了额外的部队来陪同乌穆纳的部队。 Umuna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粮食和大米供应三个月，并安排通过水路运输这些供应品。 7月1日，Umuna带着一小群人从吉林市出发，步行前往，他们于7月16日到达长白山脚下。 他们的供应品也在同一时间到达，证明了物流协调得很好。 Umuna在长白山顶进行了祖先的仪式。 没有大地测量或天文工具，Umuna估计了长白山中央峰的高度和天池的宽度，他估计大约为三十英里。 在为康熙皇帝向山顶的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灵献祭后，他们通过松花江水路返回。 他的团队于7月30日到达吉林乌拉，8月10日到达宁古塔，最后于1677年9月21日抵达北京。

乌穆纳进入长白山并非仅仅是对东北地区的探索，而是一次战略和象征性的行动。 最重要的是，这象征着康熙皇帝决心审视这片土地并调查边疆地区。 同时，皇帝正在与吴三桂进行激烈的冲突。 他最终在1681年战胜了他的对手。

次年，即1682年，皇帝决定访问满洲古都沈阳（又名盛京，现今沈阳）。 他计划穿越满族的故乡，这片土地从黑龙江（黑水）延伸到长白山（白山）。 他打算进行一场向满族祖先神灵致敬的仪式。 这次旅行，正式被称为“东巡”(Dongxun)，代表了对满族根源的精神重新连接，并在经过一场艰苦的胜利后，作为对祖先的敬意。 除了具有仪式意义外，康熙皇帝的旅行还结合了狩猎和军事演习。 在这次远征中，南怀仁成功设计并制造了神威火药大炮，并在当年进行了成功的测试。

因此，在1682年，皇帝邀请了维尔比斯特加入皇家随行人员，一同前往满族故乡。 因此，他在此次远征中交给了维尔比斯特一个任务，那就是测量各个地区，很可能是为了在东北各地部署火药武器。 由于维尔比斯特在武器开发和大地测量方面的成功，他赢得了皇帝的赞赏，最终被提升到了尊贵的工部尚书的位置。 康熙皇帝并未将其战胜吴三桂视为结束，而是将其视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清朝疆域的军事行动的前奏。 这些测量任务和为康熙皇帝推进火药武器的工作，是他宏大愿景的初步步骤。

在1682年，即将迈入七十岁的维尔比斯特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在1682年，即將邁入七十歲的韋必思升至一個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層次。作為工部尚書，他站在儒家官僚階層的頂端。 他的崛起并非没有挑战；反对他的并非出自他的耶稣会起源，而更多的是他的地位过于显赫。 然而，他日益衰弱的健康状况让年轻的康熙皇帝感到担忧。 即使在他的晚年，维尔比斯特仍然坚持不懈，从北京到沈阳进行了大地测量，遵循《大地测量和制图的说明和解释》中的方法。 认识到他的价值和需要继任者，皇帝敦促维尔比斯特从欧洲召唤有技术的耶稣会士到清朝。 这标志着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重要转折点。 维尔比斯特迅速行动，向欧洲耶稣会社区发出请求，要求他的水平的传教士。 回应这个呼吁，路易十四的首席国务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1619-1683）派遣了一组国王的数学家到中国，他们于1685年抵达。

在这些法国耶稣会士踏足中国之前，安托万·托马斯于1682年登陆澳门，然后于1685年前往北京。 随着Verbiest年老体弱，他无法再履行职责，于1688年1月去世。 代替他，托马斯的主要职责是接管Verbiest的关键任务。 托马斯首先教康熙皇帝几何和算术，以及如何使用天文仪器。 皇帝希望确保托马斯能够继续在天文历法局和地理测量中继续Verbiest的工作。 通过这次考验后，托马斯承担了确定经过北京的经度的重要任务，因为康熙皇帝急于推进他的帝国的大地测量。 这次在皇帝的指示下，由Verbiest和Thomas进行的东北地区的初步调查并非孤立的事件。 皇帝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意志去“看见”并游历他的帝国。 这些大地测量覆盖了他的东巡、狩猎远征，以及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和1707年对下扬子江流域的六次盛大而昂贵的南巡。 他还确保让宫廷画家创作大量的卷轴画，描绘他的旅行、狩猎和巡游的壮丽景象。 根据历史学家Michael Zhang的说法，康熙皇帝的随行人员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朝廷和清军的指挥中心，类似于今天的空军一号。

当托马斯在1685年接管了维尔比斯特的职责时，康熙皇帝转向了他的官僚机构，并听取了他信任的儒家顾问的建议。 1685年，托马斯接管了维尔比斯特的职责，康熙皇帝转向他的官僚机构，并听取了他信任的儒家顾问的建议。因此，他在1686年建立了大清大同文献研究所。 该机构运行了六十四年，跨越了所有三位清朝高级君主的统治。 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证明的，只有最后三个帝国 - 蒙古元，中国明和满洲清 - 才承担了这样的领土记录任务。 因此，他们在1686年建立了大清大同文献研究所。该研究所运行了六十四年，跨越了所有三位高清君主的统治。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示，只有最后三个帝国 - 蒙古元，中国明和满洲清 - 承担了这样的领土文献任务。蒙古元和中国明都在短期内（五到六年）组建了一个团队来完成这项任务，表明这基本上是一个文学项目。

相比之下，清朝采取了一种基于实际大地测量的不同方法。 相比之下，清朝君主采取了一种基于实际大地测量的不同方法。大清并联文献是一项基于全帝国范围内的经纬点全面调查的工程和军事项目。 这种方法使得《大清并蒂文献》在领土记录方面与其前任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清朝朝廷中，临时和特定任务的机构（官）有时会由内务府管理，以编纂官方文献。 这样的机构被建立，称为开馆（建立机构）。 每个学院的位置主要是根据空间的可用性来选择的。 例如，当一位皇帝去世后，新皇帝通常会为过去的皇帝设立一所实录馆。 这个学院将暂时保存所有与已故皇帝有关的文件。 皇室事务部负责为研究所的人员选择和分配物理空间。 例如，当一位皇帝去世后，新皇帝通常会为前皇帝的在位期间设立一个真实记录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会暂时保存所有与已故皇帝有关的文件。皇室事务部门负责选择并分配物理空间给研究所的人员。一旦工作完成，该部门会收回空间并重新分配用于不同的目的。 工作人员由皇室事务部支付固定的工资，并在他们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提供餐食。 通常，皇室成员，如皇帝的儿子或兄弟，会在皇家的批准下监督这个项目。 任务和其团队，由学者、编纂者、职员和抄写员组成，通常由一位成就斐然、声誉卓著的学者官员担任主编。

这些机构仅迎合清朝皇权的利益，处理的任务包括：

如编制军事记录和档案等文书责任。

编辑职责，如编制天文和占星表以及文献。

学术任务包括对三礼经典的标准化或明史项目。

这些学院出版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的，这是东亚的通用语言，因此他们的员工必须具备文学技能。 然而，这些小型的声望团体不仅仅是精英主义者；他们在朝廷内部发挥了形成派系的关键平台的作用。 因此，向特定研究所任命学者总是涉及到派系忠诚度的微妙平衡。

每个研究所都由一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领导，并由该主题的精英专家组成。 每个研究所都由一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领导，并由该主题的精英专家组成。他们在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中工作，以尽量减少干扰并完成任务，并得到了皇室事务部门的基础设施支持。 下表简要概述了一些选定的研究所，按照他们的成立日期按时间顺序列出。

大清大同文献研究所是清朝朝廷内的一个派系化、专业化和精英化的机构。 然而，它也从额外的技术和战略支持中受益。 到了1680年代，耶稣会传教士在清朝的指使下工作已经显而易见。 康熙皇帝主要是让他们作为旗帜军队的军事和后勤援助，以及他们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家。 耶稣会士们进行的大地测量是康熙皇帝指挥的军事和后勤行动的一部分。 与数学天文学不同，大地测量服务是保密的，并且相对于儒家官僚机构而言，除了大清大同文献研究所的编纂者外，其他人都相对孤立。

在1687年的这个制度背景下，康熙皇帝正在为北方边疆对抗准噶尔蒙古人的重大冲突做准备。 这个准噶尔帝国成立于1634年，立足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对其更大、更持久的邻国构成了挑战——成立于1613年的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以及1636年建立的满洲清帝国。 这三个近代早期的国家在中亚地区互相争夺霸权。 在1634年，由森格领导的蒙古-鄂鲁特部落联盟建立了准噶尔汗国。 苏恩哈尔帝国，成立于1634年，基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对其更大更持久的邻国构成了挑战——成立于1613年的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以及1636年创建的满洲清帝国。这三个早期的现代国家在中亚争夺霸权。苏恩哈尔汗国是1634年成立的蒙古-鄂尔多斯部落联盟，由森格领导。在他的青年时期，森格的兄弟和未来的苏恩哈尔领导人，嘎尔丹被派往拉萨在达赖喇嘛下学习。 在他的兄弟在1670年被谋杀后，噶尔丹从西藏返回，并通过战胜他的对手为森格的死报仇。 一旦他掌握了准噶尔汗国的控制权，噶尔丹开始扩大他的领土，到1681年，准噶尔汗国已经对清朝帝国构成了战略威胁。

在经历了紧张的关系之后，嘎尔丹在1688年入侵哈尔哈领土，导致其统治者和公民寻求清朝的保护。 现在被称为蒙古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哈尔哈蒙古人控制的。 将克尔克蒙古纳入准噶尔汗国的版图，其规模几乎可以与清朝相匹敌，而满族人绝不能忽视蒙古帝国的统一。 此外，加尔丹还与吴三桂密谋包围清朝领土，使局势更加复杂。 因此，康熙皇帝在1690年发动了他对准噶尔的第一次战役，最终在距离北京仅200英里的乌伦布通取得了清朝的胜利。 然而，嘎尔丹的军队设法撤退，保持了他们的军事实力。 康熙皇帝在1690年胜利后的五年里，策划了第二次战役。 与此同时，嘎尔丹不断试图拉拢盟友对抗满族——向不同的蒙古王子、藏族人、维吾尔族人甚至俄罗斯人示好——但他的尝试收效甚微。 他甚至重新向清朝宣誓忠诚以争取时间，但康熙皇帝现在已经决心消灭准噶尔。

康熙皇帝决心在他的第二次战役中部署一支庞大的军队。 不只一支，而是三支清军，共计近75000名士兵，在1696年春季向准噶尔进发。 在康熙的直接指挥和从首都出发下，中央军队是一支强大的近代军队：超过32000名士兵，3000匹马，以及1300辆装满供应品的车。 康熙还指挥着200多门重炮，重达11000磅，以及100门重约1000磅的轻炮。 康熙的六个儿子被任命为指挥官，两位欧洲耶稣会士担任皇帝的技术顾问。 这个场景似乎已经为一场历史性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情报显示，嘎尔丹指挥着大约10000名士兵，还有更多的支持者。 关于有6万俄罗斯军队可能与准噶尔结盟的传言在清朝指挥官中引起了不安，但皇帝仍然坚定不移。

1696年在Jao Modo的对决比最初预想的要轻微。 俄罗斯军队的风声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而Galdan的部队明显减少。 到了6月12日他们与准噶尔人相遇时，经过几个月的恶劣天气行军，清军已经被削弱了。 嘎爾丹的部隊大約有5000人。 康熙皇帝的西军在费扬古将军（曾经监督过首都的九个门）的领导下，选择了战略性地包围敌人，而不是直接与准噶尔人交战。 利用高地，他们发动了一轮猛烈的重炮火力，接着是致命的近距离箭矢攻击。 然而，这次对抗并不意味着准噶尔冲突的高潮。 他们利用高地，发动了一场猛烈的重炮火力攻击，接着是致命的近距离箭矢攻击。然而，这次对抗并不意味着准噶尔冲突的高潮。加尔丹在一小群追随者的陪伴下侥幸逃脱，最后可能是因为疫情或内部纷争而死。 康熙皇帝凯旋回到了首都。 他认识到保护这一遗产的重要性，于是指示他的顾问记录他的军事行动的官方账目，以确保他们在1708年之前对历史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连续的军事行动促使康熙皇帝委托进行全面的地形调查，范围从草原延伸到内部领土。 1708年，首支大地测量队伍出发了。 通常，这样的队伍由战略领导者、后勤人员、技术专家、记录员和助手组成。 历史学家Kicengge深入研究了1709年由战争部发布的满族记录，详细介绍了首次测量团队的组成。 这个团队包括排长Dekjingge和Toofanhaci（被康熙皇帝亲自挑选的满洲旗人），他们的副手Udari、Sereng、Hemuyen，以及前线军官Nastai和Mingcing。 这个团队的技术专家是数学天文学家Cengde，他管理着天文历法局，由三位法国耶稣会士：Xavier-Ehrenbert Fridelli，Jean-Baptiste Régis和Pierre Jartoux陪同，还有四位抄写员和两位制图员。 与负责制造火药武器并领导天文历法局的费尔比斯不同，这些法国耶稣会士在团队中扮演了更为辅助的角色。 此外，该队伍还包括厨师、侍者和搬运工，他们负责处理复杂测量设备和必需品的繁重运输工作。 当需要时，省级和地区领导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当地见解。

由满族领导人领导的调查小组，这个军事单位是在对蒙古人的大规模战役之后诞生的。 没有出现的是中国工作人员，这解释了满族语言在皇家记录中的主导地位。 康熙皇帝在这项调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监督了这项调查计划。 这个复杂的制图过程是通过一条包括皇家卫兵和地方州长在内的指挥链精心策划的。 这项任务的负责人也是皇帝最尊敬的大臣之一。 然而，随着皇帝的测量野心从满洲领土扩展到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区，仅依赖他忠诚的旗帜领导者变得无法维持。 这就需要将测绘责任委托给地方和省级的州长。 因此，清朝发现有必要将大地测量发展成覆盖整个中国大陆的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在北部边疆进行的调查只是开始，康熙皇帝决定对整个中国大陆进行调查。 康熙皇帝在1711年6月19日指示他的顾问们，包括李光地，这样一项巨大的工作只能基于大地测量的原则来完成：

在天文学术语中，度量衡对应于地球的广度和辽阔。 在天文学术语中，度的测量对应于地球的广度和辽阔。 在球形地球上，200里的弧度对应天空中等于一度的弧度。 然而，自古以来，制图师一直在努力将天体的度数转化为地球上的距离，这导致了许多不准确之处。 因此，我已经指派精通数学和制图的人员去调查东北的山脉和水道。 他们已经成功地通过将天体的角度与地面的距离相对应，为我制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详细地图供我审查。

引述的宣言来自于《真实记录》是直接摘录自维尔比斯特的《测地学和制图学的描绘和解释》。 更为重要的是，皇帝认同地球是由陆地和水构成的球体。 他的指示不应被视为一次性的事件，或者与清朝不懈努力推广对地球球形的新宇宙地理理解不一致。

此外，康熙的行动直接反对儒家对古代的崇敬。 此外，康熙的行动直接反对儒家对高古的崇敬。尽管这些方法与儒家官僚的文化价值观相对，但务实的康熙选择引导官僚机构朝着符合他的目的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个过程并非总是顺利的，接下来的两位君主也遇到了类似的挑战。

《实录》中的引述与康熙皇帝关于清朝中国和朝鲜边界的相邻指令有着内在的联系。 清朝的学者和现代历史学家经常忽视这段引语的第二部分。 这种剥离康熙皇帝指令语境的做法，导致了对他意图的根本误解。 根据康熙的说法，大地测量与他极其重视的边疆问题密不可分。 他清楚地知道俄罗斯人和韩国人对满洲家园的威胁。 他的主要目标是尽其所能了解地形，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并保持朝鲜的顺从。

在这段引述的第二部分，康熙皇帝描述了环绕整个满洲家园的三条边界河流：

松花江或浑通江源自长白山北部，向东北转向，经过吉林（川厂）和大王乌拉，然后与黑龙江或黑龙江汇合，最后流入海洋。 松花江或浑通江源自长白山北部，向东北转弯，经过吉林（川场）和大王乌拉，然后与黑龙江或黑龙江汇合，最后流入海洋。这个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鸭绿江从长白山向东南流淌，然后在凤凰城或凤凰城和Ŭiju县之间向西南移动，最终到达海洋。 松花江或浑通江源自长白山北部，向东北偏转，经过吉林（川场）和大王乌拉，与黑龙江或阿穆尔河汇合，最后注入海中。这个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鸭绿江从长白山向东南流淌，然后在凤凰城或凤凰城和Ŭiju县之间向西南移动，最终到达海洋。鸭绿江西北部地区属于中国，而东南部地区则是朝鲜领土的一部分。 从长白山的边缘，图们江向东流，然后向南，最终到达海洋。 图们江的西南部分属于韩国；东北部分是中国的土地。 虽然这些边界河流周围的区域已经确定，但鸭绿江和图们江之间的区域仍未确定。 我已经派遣了一个团队前往与朝鲜义州县接壤的争议领土凤凰城。 除了进行联合调查外，我已经指示该团队彻底探索我们领土的最远端，确定并澄清模糊的边界，然后向我汇报。

康熙皇帝划定了三条标志着与西伯利亚和朝鲜半岛边界的关键河流：松花江-黑龙江，鸭绿江和图们江。 向北，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作为清朝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第一个官方协议，树立了历史先例。 此条约使俄罗斯将黑龙江以北至斯塔诺沃伊山脉的领土割让给清朝，同时保持其在贝加尔湖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领地。 这项协议不仅使中国产品全球化，而且还赋予俄罗斯参与中国商品的特权，尤其是备受追捧的皮草。

从皇帝的指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清朝和朝鲜边界存在紧张关系，由于人参采集者和猎人越界，多次发生了暴力冲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城市凤凰城，康熙制定了一种涉及清朝和朝鲜两国行政机构的双边审判制度。 在派遣他的代表参加这些联合听证会的同时，皇帝也秘密地派遣了大地测量员到边疆。 对于康熙来说，内蒙古已经被平定，通过尼布楚条约解决了清俄边界问题，他的下一个议程是通过精密的大地测量评估来巩固清朝和朝鲜的边界。 这项1711年的皇帝指令紧随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他在1687年至1696年对嘎尔丹的军事行动之后。

在1711年，康熙皇帝派遣他的代表团和大地测量队伍到凤凰城的同一年，他启动了对整个中国本土的全面大地测量研究。 历史学家李小聪根据四种不同的来源，确定了中国境内由战争部门组织的十三次此类测量和制图工作。 他们依次发生在1710年至1716年之间，这个时间跨度从康熙皇帝在1696年对嘎尔丹的第二次胜利战役，到1717年完成的"皇家领土全景"（也称为康熙地图册）。 以下按时间顺序列出了它们：

该调查始于北京，向南发展，沿西南方向环绕海岸线，最终在扬子江中部盆地，特别是湖广地区结束。 每个省份都由一张地图代表，除了下扬子江流域，它在两张地图上详细描述。 一旦省份地图完成，各省长立即委派一位值得信赖的使者亲手将其交给康熙皇帝在指挥中心。 每个途经的地方司法机构都被分配了提供马匹和食物的任务，以便于这个高优先级的派遣，这使其与普通的官僚文件传输有所区别。 在审查完地图后，康熙皇帝将其交给了皇室内务部的皇家工坊。 它被复制、精炼、合并、验证，然后通过木版或铜版印刷进行复制。 这些印刷品的多个版本被制作出来，其中许多至今仍然存在。

每一张十三个区域地图都装饰着经纬网。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皮埃尔·雅图在皇家工作室负责监督这些地区地图的统一，以形成一个全面的帝国地图集（被称为康熙地图集）。 皇家工坊制作了几个版本的康熙地图集。 在档案编号中找到的一本值得注意的版本是《大清天下内外全图》。 1号档案中发现的一本值得注意的版本，名为《大清天下全图》，揭示了地图集的组装、使用和欣赏。 在右下角的一个未知学者官员的揭示性题词读到：

每个朝代都制作过地图，然而许多人需要更精确的纬度（被称为北极的高度）和经度（被描述为东西轴线的宽度）坐标。 每个朝代都制作了地图，然而许多人需要更精确的纬度（被称为北极的高度）和经度（被描述为东西轴线的宽度）坐标。只有维尔比斯特制作了内外领域的地图，清晰地标出了天下每百里的网格线。 这种表示方式远胜于其前任。 我们的领土广袤，不易徒步穿越。 我们的王朝已经统一了内外领土，体现了一种变革的道。 在1716年，皇帝的指示下，供应商被派往每个省份。 他们使用天文工具测量了北极星的高度，并将这些读数绘制在网格地图上，每个方格测量一百里。 [我没有包括作者解释大地测量法的方法论的一小部分。]这张地图使用户可以测量天文纬度，辨别天地的对齐，估计地点之间的旅行时间，确定领土边界，了解山脉的形成，并追踪水路。 虽然可以查看单独的省份地图，但它们的独特颜色编码可以提供清晰度。 所有这些地图都可以和谐地组合成我们广大领域的单一表示。 每个纬度和经度的读数都无懈可击地对齐。 结果是一件精确和优雅的杰作，其价值无法估量，堪比黄金和宝石。

这位儒家学者官员的题词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这幅地图。 这暗示了清朝皇室和儒家学者在对清朝领土的认知上存在微妙的差异。 从这位学者的角度来看，康熙地图集是一种新奇之物，由于地理测量的原因，其精确度超越了以前的作品。 这位儒家学者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这幅地图。这暗示了清朝皇室和儒家学者在对清朝领土的认知上存在微妙的差异。从这位学者的角度来看，康熙地图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其精确度超过了以前的作品，这要归功于大地测量。这个赞扬也表明，尽管儒家官僚的上层承认并赞扬了这次测量的有效性，但他们的观点仍然与清朝皇室有所不同。 虽然清朝统治者在1716年积极推动制图工作，严重依赖军事行动和皇家工坊的熟练工匠，但儒家官员更多的是旁观者和赞赏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开始接受耶稣会的大地测量和宇宙学原理，尽管这种接受需要时间，并在几十年间逐渐发展。

## 声称科学专业知识：

在1722年，雍正皇帝接管了权力，清帝国与耶稣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与康熙皇帝对耶稣会士及其传教活动的支持立场相反，雍正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打压。 然而，即使在改变了对耶稣会士的政策后，皇帝并未停止他们在制图事务上的合作。 历史学家冯宝林指出，在雍正皇帝的统治期间，有四幅重要的皇家地图是在耶稣会专家的协助下制作的。 与康熙皇帝对耶稣会士及其传教活动的支持立场相反，雍正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打压。然而，即使在改变了对耶稣会士的政策后，皇帝并未停止他们在地图制作方面的合作。历史学家冯宝林指出，在雍正皇帝的统治期间，有四幅重要的皇家地图是由耶稣会士的专业知识制作的。仿照他的前任的做法，雍正皇帝派出测量队伍扩大清朝领土的皇家测量，特别是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期间或之后。 他也同样与战争部和省级州长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像以前一样，这些皇家地图的主要语言仍然是满语。

这些大地测量的基石在于天体和地球领域之间的和谐。 这些大地测量的基石在于天体和地球领域之间的和谐。因此，天文测量的精细直接影响了绘制地球的精确性。 在这种精细追求的顶峰是通过计算两个不同点之间的距离，以数学方式表示天体或地球球体的能力。 宫廷数学家们运用球面三角学，从已知的测量数据中推导出未知的天体和地球坐标。 结果是实证观察和复杂数学计算之间的精细调整的协同作用。 在雍正皇帝的统治期间，天文手册得到了实质性的修订，这对大地测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730年，备受尊敬的蒙古数学天文学家明哈图接管了天文历法局，并向雍正皇帝报告了预测日食准确性的减弱。 在1730年，备受尊敬的蒙古数学天文学家明哈图接管了天文历法局，并向雍正皇帝报告了预测日食准确性的减弱。明哈图提出了对测量方法和计算技术的全面改革以解决这个问题。 皇帝意识到精确性的重要性，于是给予了批准。 在1730年，备受尊崇的蒙古数学天文学家明格图接管了天文历法局，并向雍正皇帝报告了预测日食准确性的减弱。明格图提出了对测量方法和计算技术进行全面改革以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意识到了精确性的重要性，于是给予了批准。然后，明格图与德国耶稣会士伊格纳兹·科格勒和葡萄牙传教士安德烈·佩雷拉合作，以提高预测日食和月食的精确性。

清朝对卓越天文精度的追求经常促使耶稣会士借鉴欧洲的尖端进步。 然而，这并没有转化为全面采用欧洲的科学哲学；他们反而选择了从开普勒动力学和牛顿基础等领域中谨慎地引入。 在这个艰巨的旅程中，耶稣会巧妙地整合了开普勒的椭圆概念和受到牛顿影响的计算方法。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精确到极致，即使这需要偏离他们的宗教信仰。 他们回避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蓝图，标志着一种激进的选择过程。 他们选择性地融合了欧洲正在兴起的科学革命中的特定方法，与清朝对精确性的高度重视保持同步。 这次全面的改革导致了天文表的编纂和行政实践的改进，为后来的皇家历法计算奠定了基础。 随后的大地测量也从这个关键的天文学演变中受益。

乾隆皇帝在1735年即位后，天文改革和大地测量的步伐持续不断。 然而，这个时期标志着重大的政治转变。 乾隆皇帝采取了不直接干预的方式，使自己与儒家官僚事务保持距离。 这种转变导致了清朝皇室与儒家官僚之间的复杂关系，自1672年以来，清朝皇室一直支持耶稣会科学，而儒家官僚却对耶稣会科学持怀疑态度。 因此，儒家官僚机构似乎处于下风，经常试图淡化、诋毁或挑战耶稣会的贡献。 尽管耶稣会在火药武器、提高天文精度、大地测量专业知识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地图的概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切并未改变他们的处境。

在乾隆皇帝的朝廷中，被称为“科学派”的学者们似乎不愿与耶稣会士合作。 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梅觉澄在回到朝廷后，提议将《数理精蕴》的名称更改为《象数原原》。 这是为了避开可能的命名禁忌，并增强该作品的传播。 这部开创性的作品整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部分内容，以及平面和球面三角学。 数学家-天文学家梅觉澄在返回朝廷后，提议将《数理精蕴》的名称更改为《象数源源》。这是为了避免可能的命名禁忌，并增强该作品的传播。这部开创性的作品整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部分内容，以及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梅觉澄手持数学论文，他的目标是获得皇帝的祝福，以便为皇家学者复制更多的副本。 直到那一年，只有礼部拥有该书的独家印刷权。 这种限制性的访问意味着，如果没有清朝法院批准的重印版，数学天文学基本上无法在更广泛的儒家机构中使用。

美梅怀有更宏大的抱负 他建议礼部出版数百份，确保其能够传达到省级办公室和基础儒家教育机构。 他认为通过重新命名这个文本，它将会吸引到更广泛的读者。 此外，他主张在儒家官僚机构中引入数学天文学的专门考试。 这不仅有助于为天文历法局选择合适的候选人，而且还可以减少清朝对耶稣会士及其科学专业知识的依赖。

然而，这本关于数学天文学的书的传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然而，这本关于数学天文学的书的传播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障碍。以前被归功于康熙皇帝并且仅限于皇室的《数理精蕴》在儒家官僚机构中的更广泛传播面临着重大挑战，因为在中国帝制时代有着长期的禁名制度。 然而，这本关于数学天文学的书的传播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障碍。这本被认为是康熙皇帝所著的《数理精义》一直被皇室独占，由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名讳制度，这本书在儒家官僚体系中的广泛传播面临着重大挑战。按照惯例，一旦皇帝去世，他的名字就被禁止说出或写出。 这种禁忌在中国的宗族习俗中也很普遍，一位家长死后，他的名字就会变得禁止提及。 "数理精义"这本书，曾被认为是康熙皇帝的作品，并且只在皇宫内部流传，由于中国古代的禁忌，这本书在儒家官僚机构中的广泛传播面临着重大挑战。根据习俗，一旦皇帝去世，他的名字就被禁止说出或写出。这种禁忌也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宗族习俗中，当家族的族长去世后，他的名字就会变得禁忌。梅完全了解这个传统，他建议将"数理精义"的标题改为"天文现象和数学的起源"。 这表明这本书并非由前任皇帝所写，从而消除了可能违反禁忌的风险。 然而，乾隆皇帝看穿了这一点，并在批准梅氏提案的其他方面时，否决了更改标题的请求。 他同意以原标题印刷这本书，但要求在口头上称之为《数书原源》以表示对康熙皇帝的尊重。 尽管遭遇了这个小挫折，但科学派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训诫，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目标。 然而，乾隆皇帝看穿了这一点，否认了标题的更改，同时批准了梅的其他建议。他同意以原标题印刷该书，但要求口头上称之为《数书原源》以表示对康熙皇帝的尊重。尽管遭遇了这个小挫折，科学派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训诫，意识到他们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目标。这推动他们招募和培养天文历法局的下一代数学天文学家，逐渐削弱了耶稣会的影响力。

在1736年，科学派加大了他们的努力。 在1736年，科学派加大了他们的努力。顾宗（1685-1755年），人事部部长，也是科学派的一位知名成员，向乾隆皇帝呈上了一份奏折，质疑耶稣会科学的真实性。 他辩称，耶稣会对数学天文学的翻译，起源于明朝的最后几年，经历了大量的修改和调整。 他以《新法历书》（1645年）这本早期的耶稣会出版物为例。 顾宗（1685-1755年），人事部部长，科学派的知名成员，向乾隆皇帝上疏，质疑耶稣会科学的真实性。他认为，耶稣会对数学天文学的翻译，根植于明朝的最后几年，经历了大量的修改和调整。举例来说，顾宗指出了早期的耶稣会出版物《新法历书》（1645年）中的问题。他指出，这部作品的图表和图解中充满了不一致之处，而且常常伴随着混乱和模糊的阐述。

然而，顾强调了康熙皇帝的不同做法。 然而，顾先生强调了康熙皇帝的不同做法。皇帝并没有完全依赖耶稣会的教导，而是探索了“古法”——这是对儒家优质技术的赞许——以丰富耶稣会的内容。 然而，顾先生强调了康熙皇帝的不同方法。他并非仅依赖耶稣会的教导，而是探索了“古法”——这是对儒家优质技术的赞许，以丰富耶稣会的内容。这项尝试导致了1722年的《历象考成》。 然而，顾先生强调了康熙皇帝的不同方法。他并非仅依赖耶稣会的教导，皇帝探索了“古老的方法”——这是对儒家优质技术的赞扬——以丰富耶稣会的内容。这个尝试在1722年导致了《历象考成》的出版。顾先生称赞这是康熙皇帝整合耶稣会科学的杰作。 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进一步倡导这种融合，站在他父亲奠定的基础上。

顾的批评对耶稣会很明确：如果他们的工作没有得到全面的信息补充，那将导致天文历法局的效率低下，甚至最终瓦解。 顾和梅的主要目标是瓦解耶稣会对数学天文学的控制，并以清晰的古典汉语形式使其对儒家官僚机构开放。 他们的目标是削弱耶稣会在天文历法局的主导地位，并用更有资格、技术更强的学者来取代他们。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因为他们实现了预期的结果。

然而，顾先生淡化了明格哈图、伊格纳兹·科格勒和安德烈·佩雷拉等数学天文学家主导的1730年天文改革的重要性。 然而，顾先生淡化了像明哈图，伊格纳兹·科格勒和安德烈·佩雷拉这样的数学天文学家引导的1730年天文改革的重要性。顾先生一直在贬低耶稣会士的贡献。 然而，顾先生淡化了像明哈图、伊格纳兹·科格勒和安德烈·佩雷拉这样的数学天文学家主导的1730年天文改革的重要性。顾先生一直在贬低耶稣会士的贡献。他指出，在雍正在位期间，他们的主要成果是《观象算法补编》（以下简称《补编》）。 然而，顾先生淡化了像明哈图、伊格纳兹·科格勒和安德烈·佩雷拉这样的数学天文学家主导的1730年天文改革的重要性。顾先生坚决贬低了耶稣会士的贡献。他指出，他们在雍正在位期间的主要成果是《观象算法补遗》（以下简称《补遗》）。从顾和梅的角度来看，《补遗》只包含了39页的表格，旨在改进日食和月食的预测，显然需要更详细的技术评论或基础计算方法。 他将他们的努力贬低为仅仅39页的附录，主要包含预测太阳和月亮事件的表格。 他批评这项工作需要更清晰的方法，使得除了作者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 根据顾和梅的观点，这份补充资料只包含了39页的表格，旨在精确预测日食和月食，但显然需要更详细的技术评论或基础计算方法。他们将其努力视为仅仅是39页的附录，主要包含预测太阳和月亮事件的表格。顾批评这项工作需要更清晰的方法，使得除了作者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主要的作者——天文历法局的Ignaz Kögler和礼部尚书，以及他的合作者André Pereira和Mingghatu——似乎是唯一能够解释和修改这些表格的三人组。 他质疑他们的动机。 顾先生质疑他们的动机。他们为什么没有阐明他们工作的基本机制？他们是在隐藏什么，还是自私地寻求对数学天文学的垄断？这种不透明的做法似乎值得怀疑，甚至近乎疏忽。

在顾宗的纪念仪式之后，乾隆皇帝在天文历法局设立了一个学院。 乾隆皇帝命令Kögler，Pereira和Mingghatu阐明他们的表格背后的奥秘。 这种策略似乎植根于儒家官僚制度所假定的文化优越性。 尽管欧洲传教士和蒙古旗帜手可能在数学天文学上很熟练，但他们缺乏用复杂的古代汉语阐述他们发现的技巧。 历史上，耶稣会传教士常依赖当地学者，通常是天主教皈依者，来帮助他们将信息和论文翻译成古代汉语。 但是，这些翻译往往达不到公务员考试和古典识字标准设定的高文学标准。 顾和梅知道科格勒、佩雷拉和明哈图在古典识字方面的局限性。

顾在短时间内再次向皇帝献上了一份奏折，他认为制作这样的表格需要清晰的解释和插图，这需要一位独特的学者，他既要有文学艺术才能，又要有数学天文学的专业知识。 顾在短时间内向皇帝呈上了另一份奏折，他认为制作这样的表格需要清晰的解释和插图，这需要一位独特的文艺和数学天文学专家。谁能胜任这个角色呢？那就是著名的技术学者梅觉成，他是康熙皇帝时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家梅文鼎的孙子。 顾立刻向皇帝再次上表，认为制作这样的表格需要清晰的解释和插图，这需要一位独特的文艺和数学天文学专家。谁是理想的人选？那就是著名的技术学者梅觉成，他是康熙皇帝时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家梅文鼎的孙子。梅觉成在科学派中是一位重要人物。 顾立刻向皇帝再次上表，认为制作这样的表格需要清晰的解释和插图，这需要一位独特的文艺修养和数学天文学专业知识的学者。谁是理想的人选？那就是杰出的技术学者梅觉成，他是康熙皇帝时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家梅文鼎的孙子。梅觉成是科学派的中坚力量。另一个合适的选择是何国宗，他在雍正时代就与科学派结盟，对改革中使用的数学天文学非常熟悉。 顾建议梅觉成领导学院对《补编》进行改革，何国宗作为他的得力助手。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用梅觉成和何国宗来取代科格勒、佩雷拉和明噶图。

在1737年，乾隆皇帝批准了顾的提议。 在1737年，乾隆皇帝批准了顾的提议。按照学院的典型运营标准，皇帝组建了一个由精英满族王子和顶级顾问组成的团队，来领导《数学原理要义》和《观象算法补遗》的改革。 这个杰出的团队由乾隆的叔叔和满族皇室成员，云禄（1695-1767）和云礼（1697-1738），以及尊贵的大学士鄂尔泰（1680-1745），张廷玉（1672 -1755）和徐本（？-1747）组成。 他们与科学派的关联是众所周知且有影响力的。 然而，梅觉成（1680-1763）和何国宗（？-1767）才是推动这个项目的真正领导者。 他们接替了耶稣会士的角色，引领数学天文学走向了新的方向。

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派开始撰写他们对历史的版本，详细描述了耶稣会科学是如何融入中国文化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派开始编写他们对历史的版本，详细描述了耶稣会科学如何被融入中国文化。这个叙述试图重塑耶稣会对数学天文学的贡献，将其融入中国帝国历史的更广阔的画卷中。 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部分被忽视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派开始编写他们对历史的版本，详细描述了耶稣会科学如何被融入到中国文化中。这个叙述试图重塑耶稣会对数学天文学的贡献的故事，将其融入到中国帝国历史的更广阔的画卷中。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在20世纪的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忽视了。当代历史学家往往过分依赖耶稣会的记录，对中国帝国时期丰富的数学天文学历史持怀疑态度，甚至将其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这种适应政治的微妙之处经常被忽视，有时甚至将复杂性简化为“中国”和“西方”天文学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

从耶稣会主导的科学事业向清朝科学派的崛起过渡，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变。 在康熙皇帝的统治下，特别是在佛碧斯的影响下，耶稣会引入并倡导了“新方法”，使数学天文学成为清帝国科学追求的前沿。 然而，在乾隆皇帝的统治期间，特别是在1735年至1737年之间，正在崭露头角的儒家学者们宣扬了"中法"。 他们的目标是以有利于清朝君主和其行政机构的方式加强皇家数学天文学。 在康熙皇帝的统治下，特别是在佛烈便的影响下，耶稣会士引入并倡导了“新方法”，将数学天文学推向了清朝科学追求的前沿。然而，在乾隆皇帝的任期内，特别是在1735年至1737年之间，正在崭露头角的儒家学者们宣扬了“中法”。他们的目标是以有利于清朝君主和其行政机构的方式加强皇家数学天文学。这个时代见证了清朝朝廷中的科学派在数学天文学和大地测量领域牢固地确立了其权威，这在清朝历史上尚属首次。

## 乾隆考察与勘测：

这幅1743年的《大清总督文献》中的划界图代表了清朝君主对全面领土的宏大愿景。 因此，儒家官僚的高级阶层被赋予了进一步阐述和实施这种领土意识形态的任务。这是第一次明确划分中国中心地带（内地）和草原、中亚以及青藏高原的广大领土（外地）。 每个地区都实行独特的行政体制。 这种空间理解在1743年发布的《大清并蒂图》中正式阐述。 因此，儒家官僚的高级阶层被赋予了进一步阐述和实施这种领土意识形态的任务。这是第一次，中国的中心地带（内部领域）和草原、中亚以及西藏高原的广大领土（外部领域）之间有了明确的划分。每个地区都在一个独特的行政系统下进行管理。这种空间理解在1743年发布的《大清会典》中正式提出。根据这个领土指南，清帝国的领土被分为内部和外部领域。 内部领域包括了十八个省份，总共1600个地级市和县，被称为统部（Tongbu）。 相比之下，外部领域包括了五十七个边疆地区和附庸国，被称为边部（Fanbu）。 在外部领域之外，还存在着30个附庸国，这些国家会定期向北京进贡。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中亚的持续内乱给了清帝国另一个军事干预的机会。 尽管经历了康熙皇帝发起的两次重大战役，准噶尔汗国仍然坚持下来，并成为了三十个朝贡国之一。 然而，在1745年Galdan Tsering去世后，Zunghar Khanate陷入了内乱。 然而，在1745年Galdan Tsering去世后，准噶尔汗国陷入了内乱。乾隆皇帝利用这次内乱，根据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大理寺制定的策略，于1755年发动了入侵。 尽管经历了康熙皇帝发起的两次重大战役，准噶尔汗国仍然坚持下来，并成为三十个朝贡国之一。然而，在1745年嘎尔丹·策林去世后，准噶尔汗国陷入了内乱。在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大理会议已经制定了一项策略，乾隆皇帝利用这次内乱，于1755年发动了入侵。结果是俘获了一位准噶尔领导人，并随后将准噶尔汗国分为四个独立的鄂尔多斯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汗。 然而，在1756年的一次事件中，这些可汗之一的阿穆尔萨纳反叛清朝，希望将整个联盟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

阿穆尔萨纳的反叛遭到了乾隆皇帝无情的反击。 他无情地指挥他的军队消灭蒙古族的准噶尔人，命令他们不要放过任何男性，包括投降的男孩。 此外，清军还策划通过阻断对准噶尔人的基本食物供应来造成饥荒。 报告显示，虽然某些指挥官对执行这种在常规战争中不常见的极端措施犹豫不决，但在准噶尔边缘的俄罗斯目击者记录了整个定居点——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消灭的情况。 那些设法逃脱这场屠杀的人面临着被奴役，失去他们的部落身份。 此外，清军策划通过阻断对准噶尔人的基本食物供应来造成饥荒。报告表明，虽然某些指挥官对实施这种在常规战争中不常见的极端措施犹豫不决，但在准噶尔边缘的俄罗斯目击者记录了整个定居点——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消灭。那些设法逃脱这场大屠杀的人面临着被奴役，失去他们的部落身份。后果是一片因冲突、饥荒和疾病的毁灭性三重打击而变得荒芜的土地。 历史学家魏源指出，40%的人死于天花，30%的人面临残酷的处决，10%的人发现自己被征服或奴役，剩下的10%在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寻求庇护，最终与当地人口融为一体。 清除准噶尔人并非仅由中国人和满族人完成；土耳其穆斯林社区，特别是维吾尔人——他们之前曾遭受准噶尔人的入侵和统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除准噶尔人并非仅由中国人和满族人完成；土耳其穆斯林社区，特别是维吾尔人——他们以前曾遭受准噶尔人的入侵和统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灭亡准噶尔为与维吾尔人结盟铺平了道路，维吾尔人是一个曾经在准噶尔统治下的突厥穆斯林人口。 清朝指挥官以战略举措，营救了两位被准噶尔人囚禁在监狱中的突厥族克惠亚兄弟。 这些科贾人主要来自印度的尼扎里伊斯玛仪派，清朝为了换取他们的效忠而将他们释放。 在维吾尔人的帮助下，清朝成功地镇压了准噶尔的抵抗。 然而，事情发生了转折，维吾尔人很快就背叛了他们的清朝盟友。 作为回应，清朝军队迅速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超越了帕米尔山脉，进入了突厥人的中亚地区。 这种力量的展示迫使科干和塔什干的统治者向清朝的霸权屈服。 在这场更大的政治游戏中，两位霍加兄弟被捕，被处决，他们的遗体被献给了皇帝。 因此，到1759年，阿尔提沙尔的突厥穆斯林被纳入了清帝国。 因此，到1759年，阿尔泰沙尔的突厥穆斯林被纳入了清帝国。

在乾隆皇帝的领导下，这个地区由军事州长监督，确保它与中国的主要行政框架保持分离。 驻扎的部队由蒙古卫拉特人、满洲旗人、中国穆斯林和汉族人组成。 清朝的主要关注点是确保粮食、银子和棉布的和平贸易，而不是试图改变突厥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统治导致汉族中国人逐渐涌入中亚。 然而，对于中亚穆斯林来说，1759年清朝征服后的政治格局与他们在准噶尔统治下的生活环境相差无几。 社会经济动态基本上没有变化；这只是该地区军事占领领导层的转变。

在清朝的中亚征服期间，分别在1756年、1759年和1772年进行了三次调查。 乾隆皇帝的测绘方法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方法相似。 乾隆皇帝对测量的方法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相似。他认识到康熙地图集的重要性，以及他的父亲雍正的贡献，乾隆皇帝的目标是通过将中亚纳入大地测量，来扩展他们的制图里程碑。 这项全面的调查跨越了三位清朝统治者，捕捉到了清朝内外领土的广度，为《大同文献》奠定了基础。 乾隆皇帝在1743年首次发布了《大清一统志》的初版，主要用于展示，展示了不断发展的领土意识。 然而，这个初版并未包含中亚地图，这促使了后续的出版物和《大清一统志》的修订版的出版。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三次调查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对清朝帝国的重要性。

在1756年，最初的勘测队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亚的天山山脉和伊犁地区。 从康熙地图集和雍正皇帝统治期间进行的调查中获取灵感，这次探索既是军事行动，也是制图工作。 由天文历法局局长何国宗领导，此次探险队包括数学天文学家明嘎图，葡萄牙耶稣会数学家费利克斯·达·罗查和何塞·德·埃斯皮尼亚，两位名为苏布迪和吉兰巴·丹德尔的藏族喇嘛，以及一位名字仍未知的旗军财务官员。 1756年3月21日，他们从北京出发，目的地是边境小镇巴尔喀什湖。 在这里，曾参与过对准噶尔人的军事行动的满洲皇家卫兵努桑和哈辛加在等待测量小组。 需要强调的是，控制权已经转移到了科学派，尤其是在何国宗和明哈图的领导下。 耶稣会现在被降低到一个边缘角色，提供技术支持。 虽然测量团队仍然是一个军事和后勤的工作，但清帝国已经减少了对耶稣会科学知识的依赖。

调查团队最初在巴里坤湖集结，这个地方位于辽阔的戈壁沙漠和巍峨的青藏高原之间。 调查团队最初在巴里坤集结，这个地方位于辽阔的戈壁沙漠和巍峨的青藏高原之间。位于哈密以西，毗邻碧绿的巴里坤湖，位于一条狭长通道的终点，可以俯瞰历史悠久的西安市和嘉峪关。 遗留的古老海岸线环绕着巴里坤湖，表明中国西部曾经经历过更湿润的气候。 目前，这片景色已经变得干燥而荒芜。 该地区平均每年降雨量为210毫米（约8英寸），而蒸发量为2250毫米（约89英寸）。 湖泊主要由径流供水，蒸发后保留富含矿物质的高盐水。 经过三个月的旅程，探险队于1756年6月22日到达巴里坤。

1756年，测量小组的到来被阿木尔萨纳的叛乱这一不安的背景所打断。 1756年，测量小组的到来被阿木尔萨纳的叛乱所打乱。清军在天山山脉北部的精河，由焦辉将军率领，对抗阿木尔萨纳的部队，等待乾隆皇帝的指示。 在这期间，刘同勋，他已经赢得了清朝皇室可靠的问题解决者的声誉，并且最近被提升为军机大臣，犯下了一个关键的判断错误。 他建议清军从巴尔喀什湖撤退，却不知道乾隆皇帝坚决要消灭准噶尔蒙古人的决心。 对刘的建议不满，皇帝召回他回到北京。

刘从伊犁出发，于1756年6月30日抵达巴里坤湖，仅在测量团队到达后的几天。 他的逗留时间很短，因为他在第二天就动身前往北京。 刘与测量团队的同时出现并非巧合。 他在皇家领土西部地区的插图和文档的制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762年发布） 他后来与纪昀合作，于1782年制作了《黄河源流略志》。 这两部全面的作品，我将在下一章中深入探讨，极大地受益于中亚调查团队收集的数据点，并由刘先生主导。

1756年7月2日，测量小组在巴尔科尔分成两组，各自走不同的路线。 在1756年7月2日，测量小组在巴尔喀什湖分成两组，各自走不同的路线。第一组由皇家卫队努桑带领，他们沿着天山山脉的北侧走的是北线路。 这个小组，由明哈图、苏布迪和费利克斯·达·罗查组成，于1756年8月28日在精河与贾欧辉指挥官会面。 与此同时，由皇家卫队哈辛加领导，何国宗和何塞·德·埃斯皮尼亚等人组成的第二组，沿着天山南路前进。 这两个团队都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调查，于1756年11月12日在巴尔鲁克重新集结。

1756年11月23日，皇家卫兵Nusan和Hacingga手持重要的调查数据和地图，通过军事通道开始了他们前往北京的旅程。 然而，天文历法局的局长何国宗选择了更为从容的步调。 他在苏州省会（现称为酒泉）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在1757年3月1日抵达北京。 然而，天文历法局的局长何国宗选择了更为悠闲的步调。他在到达北京之前，先在省会城市苏州（现称为酒泉）停留。这次远征的制图工作强调了清军在这些努力中的主导作用，乾隆皇帝作为总司令，监督整个行动。

在1759年，乾隆皇帝的叔叔兼大臣富恒领导下，组建了第二个测量小组。 由于他的皇室血统和军事背景，清朝的重要人物富恒将这个任务放在了优先位置。 该团队的任务是绘制塔里木盆地以南地区的地图。 这次探险的关键成员包括蓝羽皇家卫士德布，二等皇家卫士乌林泰，以及技术专家明哈图，费利克斯·达·罗查和何塞·德·埃斯皮尼亚。

他们于1759年6月4日从北京出发，7月24日到达苏州，8月18日抵达哈密。 他们的旅程是为了追踪由Jaohui和他的副手Gūwalgiya Hala Fude领导的清军所走过的路线。 到这个时候，Jaohui已经平息了Amursana的叛乱，并在维吾尔人的帮助下，有效地消灭了准噶尔蒙古人。 这对军队搜集了当地的地理情报，评估了军事用途的地形，并根据他们的第一手观察制作了一套地图。

皇帝指示测绘团队沿着这些军队路线行进，并通过精确标注关键地点的纬度和经度坐标来增强军事地图。 完成他们的任务后，该团队于1760年4月11日回到苏州。 到1760年6月，Deboo和Mingghatu带着关键的数据和地图返回到北京。

为了巩固清朝对中亚的控制，焦辉任命了一位军事总督来监督该地区，并建立了一系列的驻军和流放犯人的殖民地。 为了巩固清朝对中亚的控制，焦辉任命了一位军事总督来监督该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的驻军和流放犯人的殖民地。 为了巩固清朝对中亚的控制，焦辉任命了一位军事长官来监督该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的驻军和刑事殖民地。这片广大的中亚领土，现在已经牢牢地在清朝的统治之下，由一个军事结构进行管理。在这个结构的最高层是伊犁总督，其下是一套广泛的驻军和定居点系统。

首任伊犁指挥官是明水，他是反对阿穆尔萨纳运动的主要人物。 他在1762年至1767年期间担任此职务。 他的继任者阿贵，也是阿木尔萨纳战役的另一位关键参与者，他在1767年短暂担任伊犁指挥官，然后在帝国内部晋升到更高的职位。 首任伊犁指挥官是明水，他是反对阿木尔萨纳运动的主要人物。他在1762年至1767年期间担任此职务。他的继任者阿贵，也是阿木尔萨纳运动的关键参与者，他在1767年短暂担任伊犁指挥官，然后在帝国内部晋升到更高的职位。阿贵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官僚团体的核心支持者，该团体支持实证学派运动，与省长阮元并肩。 这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进一步讨论。

前战争部长Iletu在1768年接替Agūi的任期，担任伊利指挥官的角色。 他一直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785年去世。 前战争部长Iletu在1768年接替Agūi的任期，担任伊犁指挥官。他一直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785年去世。在Iletu担任伊犁指挥官的任期内，1771年，托尔古特蒙古人从里海北部的伏尔加河地区迁移到中亚，以逃避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的兵役。 前战争部长伊勒图在阿贵任期结束后，于1768年接任伊犁指挥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785年去世。在伊勒图作为伊犁指挥官的任期内，1771年，托尔古特蒙古人从里海北部的伏尔加河地区迁移到中亚，以逃避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的兵役。清帝国看到了机会，欢迎他们，并在天山山脉北部的游牧地区提供了定居点。 与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的侵略策略相比，清朝对托尔古特人的接纳被视为解决准噶尔战役的积极结果。 这提供了一个对准噶尔冲突的反叙事，并展示了清朝与他们的俄罗斯对手相比的仁慈。

托尔古特人从伏尔加河东岸迁移到伊犁的过程充满了危险。 在Ubashi Khan的领导下，一个由超过30,000个帐篷（大约150,000到170,000个人）组成的大型车队在1771年1月7日开始了这次艰巨的大迁徙。 到乌巴什与伊勒图就他们即将到来的事情进行沟通时，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大约15000顶帐篷，或者大约70000个人。 这次艰难的旅程至少造成了10万人的死亡。 历史学家彼得·珀杜指出，这次重大迁徙的完整记载仍在等待其编年史作者。 Torghuts蒙古人，是1628年从中亚迁移到俄罗斯的Zunghar蒙古人的后裔，他们在1771年在清朝的保护伞下返回。 他们的归来被视为乾隆皇帝仁慈统治的象征。 1771年，清朝说服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托尔古特蒙古人在额济纳河定居并采用农业。 像许多在清朝统治下的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蒙古族群一样，他们采用了农业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混合方式来维持生计。

根据从北京到伊犁的满文翻译指示，乾隆皇帝深度参与了托尔古特人的重新安置，并在1771年亲自在颐和园接待了乌巴什汗。 随后，在1772年，皇帝委派了第三个调查团队前往中亚，对居住在托尔古特的整个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测绘。 他非常关心他们的福祉，社区的满意度，以及他们的治理结构，由贵族监督较小的旗帜。 然而，清朝政府对于托尔古特人新家园周围的地形只有模糊的了解。 随后，在1772年，皇帝委托第三个调查团队前往中亚，对居住在托尔古特的整个地区进行详细的地图绘制。他对他们的福祉、社区的满意度以及由贵族监督的小旗帜的治理结构非常感兴趣。然而，清朝政府对托尔古特新家围绕的地形只有模糊的了解。这次调查考察的部分目标就是弥补这个地理知识的空白。

第三次大地测量调查已经派出。 这个测量小组的关键成员包括钱清门皇家卫兵博宁（后来两次担任伊犁指挥官）、新任命的天文历法局局长费利克斯·达·罗查、皇家卫兵德布（第二次测量的老兵）和先锋阿木巴图。 这个团队最初在科布多会面，然后被分成两组。 博宁在阿木巴图的陪同下向北行进，经过多尔伯特、塔努乌兰海、塔尔巴哈泰和伊犁等地，主要关注托尔古特人的居住地附近。 这个调查团队的关键成员包括钱清门皇家卫士博宁（后来两次担任伊犁指挥官）、新任天文历法局局长费利克斯·达·罗查、皇家卫士德布（第二次调查的老兵）和先锋阿木巴图。最初在科布多会面后，团队被分为两部分。博宁和阿木巴图一起向北行，经过多尔伯特、塔努乌兰海、塔尔巴哈泰和伊犁等地，主要关注托尔古特人的居住地附近。与此同时，德布和费利克斯·达·罗查走南线，他们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托尔古特人的定居点周围。 最后，两队于1772年9月22日在塔城的塔尔巴哈台会合。 博宁和阿姆巴图一起向北冒险，途径多尔伯特、塔努乌兰哈伊、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等地，主要关注托尔古特人的居住地附近。与此同时，德布和费利克斯·达·罗查走的是南线，他们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托尔古特人的定居点周围。最终，两队在1772年9月22日的塔尔巴哈台，塔城汇合。从那里开始，他们一起努力，直到到达伊犁。 他们的努力共同覆盖了西蒙古的托尔古特族牧场和俄罗斯中亚部分地区。

1756年，1759年和1772年的三次大地测量探索各具独特特征。 1756年，1759年和1772年的三次大地测量探索各具特色。首先，乾隆皇帝及其顾问团高度重视这些调查，他们指派了熟练的军事领导人来监督这些调查，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 1756年，1759年和1772年的三次大地测量探索各具特色。首先，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高度重视这些调查，他们指派了熟练的军事领导人来监督这些调查，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清朝及其军队是这些探索背后的主要推动者，使它们与他们在中亚的军事和后勤目标保持一致。 这些调查并非仅仅出于好奇而产生的学术追求。 这些调查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而产生的学术追求，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受到时间压力的影响。 从巴里坤的首次探险历时134天。 随后的任务从哈密开始并结束，持续了220天，而最后一次任务持续了刚刚超过100天。 这些探险的资金、目标、支持和受众与通过北京测量子午线的法国团队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最显著的区别是清朝对中亚勘测的紧迫性。

第二个显著的特点，自然地源于第一个，是在《皇朝疆域西域图说》中公布的纬度和经度数据中，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测量得出的。 第二个显著的特点，自然地源于第一个，是在《皇朝西域图说》中公布的纬度和经度数据中，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测量得出的。在哈密以西的107个坐标中，只有30个被确定为测量点。 这107个坐标中的大约36个，占总数的33.64%，是通过使用球面三角法从实际测量点推导出来的。 因此，这两次调查为53个点提供了真实的测量数据，占记录的107个点的49.53%。 这意味着官方报告的数据中仅有大约一半是基于实际测量的。 虽然众所周知，军事和行政机构经常夸大其结果，但另一半并非仅仅是猜测。 因此，这两项调查为53个点提供了真实的测量数据，占记录点107个的49.53%。尽管我们知道军事和行政机构经常夸大他们的结果，但另一半并非仅仅是猜测。这些数据是通过使用球面三角学，考虑到地球的曲率来推算的。 无论是真实的测量结果还是计算出的结果，都符合当时由Verbiest引入并详细介绍的大地测量标准。

总的来说，三次大地测量覆盖的广阔区域确实值得关注。 早先介绍的胡焕庸人口线，划分出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 然而，这些不同的地区在规模上大致相当，都是清朝领土扩张的成果。 这意味着现代中国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朝对中亚征服的遗产。 这次扩张将清帝国重塑成了一个包含农业和干旱地区的二元领域。 东部地区人口密集，降雨充沛，而西部地区则包括干旱的草原、沙漠和高地，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和城镇点缀其间。 康熙皇帝将他的测量工作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部，而乾隆皇帝则将目标放在西部。 清朝中国的版图广阔，总面积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四百万平方英里。 东部省份和满洲占据了其中的一半，而蒙古，中亚和西藏高原占据了另一半。 康熙皇帝将他的测量工作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部，而乾隆皇帝则将目标放在了西部。清朝的版图广阔，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四百万平方英里。东部省份和满洲占据了其中的一半，而蒙古，中亚和西藏高原则占据了另一半。尽管乾隆皇帝并未对西藏高原进行测量，但在中亚的干旱地带和广袤的蒙古草原进行测量已经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 结论：

本章揭示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方面：他们是清朝皇权和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约瑟夫·内顿和科德尔·叶这样的学者对于早期现代中国对耶稣会士制图学的角色和接受程度持有不同的观点。 这可能需要我们重新评估耶稣会的地理测量和制图贡献，作为清朝和其军队的组成部分。 这将有助于调和这些知识上的差异，揭示一个共同过程的重要方面。 因此，尽管耶稣会士面临儒家学者的批评和敌意，他们仍然设法在清朝皇权保护的军事领域内维持其运作。 在之前的作品中，我曾主张，耶稣会士对于提高天文事件，主要是日食和月食预测的精确度，变得不可或缺。 本章进一步扩展了这个观点，断言耶稣会深深地融入了清政府的军事系统，使他们对儒家官僚机构而言无法触及。

然而，耶稣会所得到的保护代价高昂。 然而，耶稣会所得到的保护代价高昂。清朝皇室将他们纳入了八旗制度的军队等级中，并强加给他们在巨大压力下提供准确结果的义务。 没有科学社区或独立探索的空间。 然而，耶稣会所得到的保护代价高昂。清朝皇室将他们纳入了八旗制度的军队等级中，并强加给他们在巨大压力下提供准确结果的义务。他们没有科学社区或独立探索的空间。重点是军事纪律和天文观测和大地测量的高精度。

耶稣会在清帝国的军事领域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孤立运作的。 例如，大清总督文件是儒家官僚中的学者和官员广泛认可的汇编。 例如，大清会典是儒家官僚中的学者和官员广泛认可的汇编。一些历史学家，如程志（Kicengge），将其与制图学联系起来，但据我所知，他们尚未将其与大地测量联系起来。 此外，皇家工坊制作的省级和帝国地图在儒家官僚机构以下的省级行政长官中得到了传播。 例如，大清会通志是儒家官僚中的学者和官员广泛认可的汇编。一些历史学家，如程志（Kicengge），将其与制图学联系起来，但据我所知，他们尚未将其与大地测量联系起来。此外，皇家作坊制作的省级和帝国地图在省级以下的儒家官僚中传播。直到1929年，历史学家们才在沈阳故宫的原址上发现了康熙地图册（铜版印刷）。 因此，在整个清朝时期，儒家官僚大多对康熙地图册及雍正和乾隆时期制作的扩展地图一无所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官僚的上层阶级、省级行政长官或伊犁指挥官（军事长官）对这种地缘政治信息毫无所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官僚体系的高层、省长或伊犁指挥官（军事长官）对这种地缘政治信息毫无所知。他们确实知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官僚体系的高层、省长或伊犁指挥官（军事长官）对这种地缘政治信息毫无所知。他们确实知道这些信息。但是，他们是如何试图在儒家官僚体系中分发这种地缘政治信息的，完全意识到并预料到这样的举措可能会遭到知识和文化的抵制？

# 第四章：探索黄河源头

在1800年的中国，大约有3亿农民，其中有300万不同阶层的地方精英（占1%）分布在这个拥有跨区域市场的大型农业社会的各个层次。 在儒家学者中，很少有人进入官僚机构，甚至更少的人能够接触到政府最高层的皇家政治或敏感问题。 除了参与研究所的人员外，有多少人可以接触到大清的《大同文献》？对于儒家官僚机构的顶层人士，他们如何看待清朝的地缘政治？有多少位处于儒家官僚机构顶层的学者官员能够接触到清朝经纬图的机密地缘政治信息？清朝的君主能否独占地缘政治信息？那些确实关心地缘政治问题的学者和儒家官僚机构又如何呢？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视野时，请不要误解，我们是在谈论一种知识分子和精英的立场。 清朝的君主和儒家官僚机构并不总是彼此看齐。 很少有儒家学者进入官僚机构，甚至更少的人能够参与到帝国政治或政府最高层的敏感问题中。除了参与研究所的人，还有多少人可以访问大清大联盟文档？对于儒家官僚机构的顶级人物，他们如何看待清朝的地缘政治？有多少位处于儒家官僚机构顶层的学者官员可以访问清朝经纬图的机密地缘政治信息？清朝的君主能独占地缘政治信息吗？那些确实关心学者和儒家官僚机构的地缘政治问题又如何？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视野时，请不要误解，我们是在谈论一种知识分子和精英的立场。清朝的君主和儒家官僚机构并不总是能够彼此看对眼。在这一章和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依次介绍两种类型的学者官员：纪云圈和阮元圈。 除了参与研究所的人员外，还有多少人可以接触到大清大同文献？对于儒家官僚体系的顶层人士，他们如何看待清朝的地缘政治？有多少位处于儒家官僚体系顶层的学者官员能够接触到清朝经纬图的机密地缘政治信息？清朝的君主能否独占地缘政治信息？那些确实关心地缘政治问题的学者和儒家官僚又如何呢？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视野时，请不要误解，我们是在谈论一种知识分子和精英的立场。清朝的君主和儒家官僚并不总是能够彼此看对眼。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依次介绍两种类型的学者官员：纪昀圈和阮元圈。这些学者官员掌握了清帝国的地缘政治信息，并用儒家的语言进行了普及。

对于纪运圈来说，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问题是探索黄河的源头。 清朝的君主和政府将黄河水利视为他们的最高优先事项。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具标志性的河流的源头一直被地理学家和制图师们争论不休，神秘莫测，对其确切位置没有明确的共识。 古代的中国地图制作者仍在确定其准确位置，但他们将其命名为昆仑，这是一个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山脉。 它位于靠近青藏高原，并且紧邻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使其变得难以接近，但仍然在神秘的遥远之地中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有必要追踪黄河的源头，除了管理河流之外，还有什么目标？

神秘、未知、令人敬畏——黄河源头位于青藏高原，给人的感觉与今天参观美国西部大峡谷的人们所感受到的惊奇相似。 这里是众多冰川和其他自然特征的家园，它们起着“水塔”的作用。这个地区被称为“第三极”，因为它拥有极地以外最大的淡水储备。 这些储备有助于维持整个地区的河流流动，包括黄河、长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恒河和印度河，它们都源于青藏高原。 在早期现代时代之前，由于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青藏高原很少受到各国的关注。 据我所知，青藏高原作为地缘政治区域对清朝的重要性尚未有任何历史学家进行研究。 从1350年到19世纪，西藏由藏传佛教的神权政治统治，其封建制度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 在十八世纪，佛教神权政治成为清帝国的合作伙伴。 在同一时期，欧洲国家将西藏浪漫化，作为他们东方主义的一部分。

黄河源头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文人社会和儒家官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乾隆皇帝的监督下，中亚的机密和战略地理测量是清朝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一个分支。 测地测量是康熙地图的延伸，并作为清朝专有的机密且不断发展的地缘政治数据宝库。 因此，黄河源头成为了清朝皇权和纪昀圈子——儒家官僚体系的顶层——的共同问题。

源头在历史文献中被提及位于昆仑山脉，但其确切位置从未被确定。 在十八世纪，有两次探险活动被派往该地区以确定黄河的源头。 在1708年，康熙皇帝派遣了一支测量队前往青藏高原寻找河流的源头。 第二次探险发生在1782年，清朝征服中亚之后。 本章将展示清朝如何在1708年和1782年的两次探险之间，开始将青藏高原视为关键的地缘政治区域。 我们将跟随乾隆皇帝的亲信纪昀（1724-1805），他以领导编辑委员会监督皇家图书馆，即“四库全书”的工作而闻名。 与此同时，他还主持了记录黄河源头历史和探索的工作组。 在消灭准噶尔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纪昀和他的同事们在地测勘查和制图的基础上，于1782年发布了《黄河源头简明记录》。

## 野蛮的地理解体：

纪昀于1724年出生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官宦世家。 同年，戴震（1724-1777）出生在下扬子江谷的徽州一个低级商人家庭中。 像戴震这样出身卑微的地方学者，不会像纪昀那样屈服于皇权政治。 两人的生活后来会交叉。 戴震，一位地方精英，他的职业轨迹与在首都附近的一个富裕官僚家庭长大的纪昀有所不同。 纪云的父亲纪荣述（1685-1764）通过了省级考试，并在儒家官僚机构（刑部和户部）的高层任职。 这种参与意味着纪荣树必须熟悉皇家政治才能提升他的职业生涯。 这种参与意味着纪容恕必须熟悉皇家政治才能提升他的职业生涯。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对他聪明的儿子的高期望是完全合理的。 纪昀回忆说他跟随父亲来到首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出生地。 纪昀从这样一个富裕且人脉广泛的家庭中崭露头角，成为了乾隆皇帝手下最知名的朝臣之一。

在纪昀达到成年之前，两次地震事件塑造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未来。 在吉云成年之前，两次地震事件塑造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未来。首先是针对准噶尔蒙古人的军事行动的准备。 在他成年之前，两次地震般的事件塑造了纪昀的政治和军事未来。第一个是针对准噶尔蒙古人的军事行动的准备。第二个是在1730年，纪昀仅六岁时，出版了一本令人震惊的书，名为《大义觉迷录》（以下简称《觉迷录》）。 在吉云成年之前，两次地震般的事件塑造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未来。第一个是针对准噶尔蒙古人的军事行动的准备。第二个是在1730年，吉云仅六岁时，出版了一本令人瞠目结舌的书，名为《大义觉迷录》（以下简称《觉迷录》）。在雍正皇帝意外去世后的1735年，这本书被禁止。 在其相对较短的生命周期（五年）中，这本书中的地理论点在关心领土扩张和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规范区别的人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件事是在纪昀仅六岁的1730年，出版了一本令人瞠目结舌的书，名为《大义觉迷录》（以下简称《觉迷录》）。这本书在雍正皇帝意外去世后的1735年被禁止。在其相对短暂的生命周期（五年）中，这本书中的地理论述在关心领土扩张和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经典区别的人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本书的知识和政治后果必定给纪家上了重要的一课。简而言之，《觉迷录》是纪昀在18世纪中国的知识和政治传奇的适当开端。

从混乱中觉醒，这种混乱源于离奇的政治迫害，始于对反满清阴谋的调查。 从混乱中觉醒是由奇异的政治迫害引起的，这一切都始于对反满清阴谋的调查。雍正皇帝动员了他的官僚和军事机器来追踪罪犯。 皇帝追捕罪犯的行动最终将他引向了当地学者曾静，他在1728年因叛国罪被捕。 在1729年的夏天，雍正皇帝开始审问曾静。 到1730年，审讯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材料用于印刷。 该出版物，《解惑录》，是从1728年到1729年对曾静审讯的结果汇编而成的文本集。

《觉迷论》概括了雍正皇帝对近一个世纪反满洲论调的反驳。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这份文件非常坦率和直接。 在满洲帝国和反满洲抵抗之间，双方都明确地使用文明的理想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论点，而不是隐藏在古典的暗示或语言之后。 简单来说，雍正并不精通儒家语言。 在《醒迷录》中，雍正皇帝表达了空间宽大以传达他的统治合法性，这是蒙古版本的新表达。 在《醒世恒言》的第一部分，雍正选择了在曾静迫害期间的主要诏书。 在《觉迷录》的第二部分，皇帝允许曾静的声音浮出水面，雍正逐点有力地驳斥了曾静的论点。 在第三部分中，审讯官——刑部尚书和满族贵族杭一鲁——继续审问曾静。 在《觉迷诀》的第四部分中，皇帝将已故的学者陆留良（1629-83）认定为曾静阴谋的幕后主使。 然后，皇帝猛烈攻击陆留良的遗产，并惩罚他的后代。

皇帝选择饶恕曾静的生命，因为他被视为陆留良的天真支持者。 吕认为满族君主无权统治中国。 他认为，由于蒙古征服者的野蛮性质，他们未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统治中国。 吕还将野蛮人描述为像老虎、豹子、豺狼和狼一样的兽性，他们永远无法融入中国文明，只能进行战斗、驱逐，并保持在游牧地区。 以这种方式，陆回归了宋朝的种族中心主义，并运用儒家的政治语言将反满言论转化为原始的种族主义论点。 到最后，满洲君主制和反满洲抵抗在儒家理想上产生了分歧。 皇帝试图通过削弱和转变儒家的野蛮主义语言来针对陆的反满立场。

消除野蛮行为意味着对儒家话语的部分拆解。 从混乱中觉醒成为雍正皇帝从上到下训诫儒家官僚的公开示范 信息再明确不过：不要侮辱满族人，称他们为野蛮人。 不要在政治、古典文学或暗示中使用可能表明满族人是野蛮人的参考。 在清朝巩固其新近获得的领土期间，这项禁令的范围受到了严格和特定的限制。 除了反对满洲人的观点外，如果儒家学者不反对满洲人的合法性，那么清朝的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度相当灵活。 满族人还强制所有中国男子剃去额头的头发，留长辫子。 这个举动显而易见：如果除了剃头的僧侣之外的任何男人公开违反发型着装规定，他将被处决。 满洲统治者的权威不容质疑，但其他政治问题可以通过协商来讨论和解决。 到了1730年，雍正皇帝意识到，仅仅流血并不能消除反满抵抗。 他知道，尤其是儒家经典中的华丽辞藻，对满族的反对言论可能会颠覆满族的统治。

与其使用蛮力和暴力镇压，雍正皇帝选择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方法来反驳反满洲的论点。 而不是使用蛮力和暴力镇压，雍正皇帝选择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方法来反驳反满洲的论点。在《觉悟迷惑》一书的开头，雍正皇帝讨论了儒家话语中最突出的问题：文明的中国人和不守规矩的野蛮人之间的区别。 反派角色，陆留良（1629-83年），是对照人物。 雍正皇帝在追捕大反派陆留良时，瞄准的是高级儒家官僚，而不是天真的追随者曾静。 在《觉迷论》的其余部分中，对于雍正皇帝在充满争议和秘密的权力斗争中被选为合法领导人的虚假信息和流言的持续传播进行了反驳。 尽管在较小的社区、农村地区以及知识分子社会中的反清派中一直存在着持久的谣言，但《解惑录》试图澄清事实。 总的来说，皇帝试图利用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来阻止谣言在地方精英和儒家官僚中的传播。

皇帝的意识形态说服力有多有效？请考虑以下五点，关于《解惑篇》在1730年至1735年间如何影响政治和官僚制度。 皇帝的意识形态说服力有多有效？考虑一下这五点，关于《觉悟》如何影响1730年至1735年间的政治和官僚制度。首先是文学审查。 皇帝的意识形态说服力有多有效？考虑一下这五点，关于《破迷录》如何影响1730年至1735年间的政治和官僚制度。首先是文学审查。就像西班牙，葡萄牙和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在1100年至1800年间在欧洲和美洲根除和惩罚异端邪说一样，清朝的文学审查比它应有的范围更广。 审查者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抓住异端者，而不太关心可能受到影响的无辜个体。 在整个18世纪，无论是在《疑园》之前还是之后，清朝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对文人社会进行了这些文人大清查。 就像西班牙，葡萄牙和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在1100年到1800年期间在欧洲和美洲根除和惩罚异端邪说一样，清朝的文人裁判所投下的罗网比应有的还要广。裁判官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抓住异端者，而对可能受到影响的无辜个体并不太关心。在整个18世纪，无论是在《醒迷录》之前还是之后，所有三位清朝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对文人社会发动了这些文人裁判。当学者们越过了界限，清朝的君主毫不留情。 整个亲属关系或任何与此事有关的人都可能丧生。 清朝设定了严格的限制，以威慑那些可能粗心大意或无知的人。 因此，没有任何学者或官员会轻视这件事。 他们都明白，如果越界，他们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满族的统治合法性。

然而，雍正皇帝在1728年至1729年对反满洲阴谋的迫害并不完全是一场文学审查。 然而，雍正皇帝在1728年至1729年对反满派阴谋的迫害，并非完全是文人的审查。曾静的书引发了迫害，但陆留良在此之前早已去世。 因此，皇帝攻击的是一种知识遗产，而不是惩罚正在进行的反满抵抗。 然而，雍正皇帝在1728年至1729年对反满洲阴谋的迫害并不完全是文学审查。曾静的书引发了迫害，但陆留良在很久之前就去世了。因此，皇帝攻击的是一种知识遗产，而不是惩罚正在进行的反满抵抗。与文学审查不同，《醒世恒言》的后果和影响公之于众。 皇帝与一位微不足道的学者（曾静）争论最高的文明理想，把赌注提高到了荒谬的程度。 与文人的审查相反， 《解惑录》展示了皇帝决心消除任何可能对清朝合法性的挑战。 因此，将《觉迷录》置于清代文人狱的背景和历史中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是清朝如何对儒家话语施加政治指导方针。 《觉悟录》在其短暂的存在期间，在塑造儒家传统中对皇权政治的可接受批评的界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君主需要独立改变儒家话语的权力。 明朝的统治者有时会对他们的儒家顾问进行残酷的恐吓。 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统治者选择将他们吸纳到文化项目和儒家官僚机构中。 正如许多知识史学家所指出的，十七世纪中叶出现了儒家话语的新趋势。 其参与者并不总是清朝君主的支持者。 例如，陆留良就属于这个哲学运动的一员，他关注的是实学，即实际、务实和具体的事务，而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 正如许多知识史学者所指出的，儒家话语的新趋势在十七世纪中叶出现。参与者并不总是清朝皇权的支持者。例如，陆留良就属于这个注重实际、务实和具体事务（实学）的哲学运动，而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像陆留良这样的学者通常将自己视为儒家实学家，他们将自己的思想源流追溯到新儒家大师，如朱熹和程颐，而不是归因于明朝学者王阳明的超越个人的道德主义，这被清朝皇权视为空洞和无实质的。 像陆留良这样的儒家实学家，他们拒绝满族的合法性，属于少数派。 根据大多数儒家实学派的观点，清朝是宽大仁慈的，这符合孔子和古代圣王的教诲。 到了十七世纪末，那些赞扬朱熹因其尊重实用、务实和具体事务的人与那些追随王阳明超验道德主义的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变得根深蒂固，明显且有分歧。 儒家务实主义者，他们在清朝官僚机构中占据多数，将自己视为朱熹的追随者，并反对王阳明的道德主义观念。 与此同时，清朝君主在以新儒家正统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制度中鼓励那些儒家实用主义者。

朱熹和王阳明在新儒学中的分歧超越了简单的观念差异。 朱熹和王阳明在新儒家中的分歧超越了简单的观念差异，它标志着官方思维方式、学术网络和儒家行政管理的重大转变。 因此，雍正皇帝对陆留良的攻击揭示了儒家实用主义者的根本弱点——他们对野蛮人的构想的危险性。 清朝君主谴责了十六世纪盛行的个人主义，认为它是自私和腐蚀性的力量，并将其归咎于明朝的崩溃。 清朝君主划定了一条界限：明朝的崩溃是由于官僚派系之间激烈且自私的派系斗争，这些斗争为了各自的派系利益，削弱了明朝统治者的合法性。 雍正皇帝宣布，我们在清朝统治下绝不应重蹈覆辙。 清朝君主认为，政治派系的形成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这个论点不仅仅是政治修辞，也转移了人们对野蛮行为的讨论。 对于像纪容舒这样的清朝官员来说，坚持这一党派路线，不追求“地方和派系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有关，是学者和官员如何开始接受、思考，并有时设想在清朝统治下他们当地社会的新秩序。 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有关，是学者和官员如何开始接受、思考，有时甚至设想在清朝统治下他们的地方社会中的新秩序。 作为清朝国家建设的延伸，加强地方精英是确保他们对清朝帝国支持的主要策略。 这个过程在康熙皇帝与南方边境军阀之间的内战中是必要的。 随后，减少他们的土地税成为维持清朝君主地方支持的主要政策。 清朝君主容忍了地方精英的多样性，并鼓励他们主导地方社会。 因此，地方秩序的竞争性愿景以及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中地方组织几乎自治的治理成为了18世纪清朝社会的特征。 当地精英的丰富多彩的声音证明了地方社区中士绅统治的多样化。 鉴于地方精英的多样性，雍正皇帝宣称，在康熙皇帝的帝国建设和维护稳定超过六十年后，清帝国的稳定和扩张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 学者和官员如何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政治现实？他们如何能够继续潜在但持久的反满洲理论？雍正皇帝试图遏制反满洲抵抗的同时，也扩大了皇权对地方社会士绅统治的影响力。 这将是不明智的，不把皇帝的警告直接指向像黄宗羲的“封建论”和顾炎武的“君贤论”这样的著作，他们关于土地改革的讨论直接反映了地主和士绅阶级对皇权扩张的抵抗。

第四个是帝国正统与地方精英优先事项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基于新儒家思想。 第四个是帝国正统与地方精英优先事项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基于新儒家思想。 然而，在清朝征服并控制了中国之后，反满清阴谋在地方精英中间变得更加突出。 许多人以散播谣言和参与宫廷阴谋而闻名，他们常常以白话文学的传统推测皇帝的权力。 然而，儒家官僚的高级官员对皇权的看法和评估，与地方精英有着明显的不同，更具实际性。

与此同时，官僚机构中地位最高的儒学学者开始更多地与清朝的务实主义和世界主义合作。 尽管他们都声称遵循朱熹的新儒家思想，但在清朝帝国的各个地方，这种哲学的批评者已经悄然出现。 尽管他们都声称遵循朱熹的新儒家学说，但在清朝帝国的各个地方，这一哲学的批评者已经悄然出现。儒家官僚机构顶层的实用主义者正在塑造新儒家学说的新版本，并设想出一种世界主义的世界观，而地方精英们则在构建更为稳固的地方秩序治理方式。 在清朝帝国中，儒家实用主义者在领导职位上和地方精英之间出现了分裂。 当我们评估《疏影集》对儒家官僚政治现实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全国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分离。

第五个推论是第四个推论的逻辑延伸。 清朝君主试图区分国家精英的价值观，他们关注清朝帝国的政治合法性或领土扩张和军事成功，与涉及地主主义、村庄秩序或社区伦理的地方精英的价值观。 纪昀的家庭属于国家精英，共享帝国意识形态。 国家精英通常对地方精英的关注漠不关心。 在早期现代中国，存在着一个等级结构，包括清朝君主、儒家官僚和地方精英。 在每个层次上，都存在着复杂的价值体系。 受过经典教育的儒家官僚，包括省级和国家精英，形成并培育了儒家中国的国家统一。

在1730年出版后，《醒迷录》的影响在清朝的全国精英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涵盖了上述所有五个方面。 在皇家学校阅读《觉悟之困》并非小事或仅仅是形式上的事情。 每一位国家、省级和地方精英都必须去理解其政治含义，并理解雍正皇帝的观点。 让我们关注雍正皇帝对于国家精英的主要问题：清朝领土上的野蛮行为的消除。 雍正皇帝直接的地理推理，拒绝了他的儒家官僚最珍视的野蛮观念。 儒家和原始种族主义的观念认为，野蛮人是天生的兽性和根本的外来种族，这种观念在儒家官僚机构的较低层面上存在并被压制。 纪昀的家人理解消除野蛮行为的政治含义。 对他们来说，拒绝清朝领土上的野蛮行为远远超过了学术辩论。 它影响了儒家官僚制度的基本前提。

谁是野蛮人？雍正皇帝的辩论回归到了轴心时期建立的古代文明理想。 从十一世纪宋朝的文化民族主义，到十三世纪蒙古的空间宽容性表现，再到十五和十六世纪明朝对中国家园的重建，清朝君主继承并协商了过去的地缘政治论据的层次。 当雍正皇帝准备军事行动入侵中亚的准噶尔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他可能非常热衷于参与过去的地缘政治愿景。 雍正皇帝在他广受赞誉的父亲（康熙）经过六十年的帝国建设后接管了清朝皇权。 雍正皇帝继承了他父亲的政治活动主义，并主要关注国内、官僚和实用问题，除了最终的文明理想和野蛮人的困境。 雍正皇帝选择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并在面对儒家语言中的野蛮问题时，接受了大胆的挑战。 他的目标是通过用这本名为《从混乱中觉醒》的书来灌输他的官僚机构，挑战野蛮人的基本假设，这是一本强调偏离满洲合法性官方说法风险的关键宣传作品。 在雍正皇帝统治之前和之后，没有君主试图做他所做的事。 雍正皇帝选择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并在面对儒家语言中的野蛮问题时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他通过用这本《从混乱中觉醒》的书来灌输他的官僚机构，以挑战野蛮的基本假设，这是一部强调偏离满洲合法性官方说法风险的关键宣传作品。在雍正皇帝统治之前和之后，没有一个君主试图做他所做的事。简单来说，他的解释可以总结如下：

自古以来，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够在天下称王，是因为他们在四海之内（四个方向）养育和保护他们的子民。 这一直是儒家话语中“天子”（皇帝）角色的关键前提，雍正皇帝也赞同这一点。 自古以来，圣王之所以能够在天下统治，是因为他们在四海之内滋养和保护他们的子民。这一直是儒家话语中“天子”（皇帝）角色的关键前提，雍正皇帝也赞同这一观点。过去，圣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天命，并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 根据传说，民众的支持与天命息息相关。 我们应该注意到，天命正是蒙古元朝和中国明朝共享的政治合法性。 雍正皇帝宣称，皇帝们通过统一天下所有人，获得了天命。 只有正义的人才能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无疑是成千上万的儒家官僚心中合法统治者的代名词。 自古以来，普遍的原则就是把天下人民像家人一样团结起来，把天下万物视为一体。 古代儒家普世主义的道德色彩对雍正皇帝仍然具有相关性。 皇帝应以宽大的心态包容天下所有人，而不是被那些根据地方和省份身份和偏好自我划分的人的狭隘、自私或肤浅的观点所贬低。 此时，雍正皇帝已经深入研究了天地人合一的新儒家口号。

然后是雍正皇帝论点中最重要的转折。 然后是雍正皇帝论述中最重要的转折。 然后是雍正皇帝论述中最重要的转折。他反驳道：皇帝仅凭出生地就被赋予天命的理由是什么？满族人因为出生地的不同而与汉族人区别开来。皇帝或皇室成员应因出生地而被取消资格吗？皇帝的问题当然是反问的。 儒家经典反复宣称，只有那些符合天命的统治者才能繁荣，违背天命的人将会灭亡。 有德的统治者将与天（和宇宙）和谐相处。 因此，统治者的出生地完全无关紧要。 例如，来自草原世界的骑马征服者忽必烈汗，来自南方的卑微农民朱元璋，以及来自中国大陆东北角的满族皇帝，都应该说明这一点。 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天命，并统治了中国。 再次强调，他们的出生地完全无关紧要。 例如，包括忽必烈汗（来自草原世界的骑马征服者），朱元璋（来自南方的卑微农民出身），以及现在来自中国亚大陆东北角的满族皇帝，都应该说明这一点。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天命，并统治了中国。再次，他们的出生地完全无关紧要。在这个跨越农业和游牧地区的大帝国中，统治者的出生地不应该也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跨越鸿沟的普遍统治！

在这里，雍正皇帝重新定义了空间宽大原则作为能统治农业和游牧世界的皇帝的主要美德。 在这里，雍正皇帝重新定义了空间宽大的原则，作为皇帝的主要美德，他可以统治农业和游牧世界。天道或任何超越的标准不再是主要的。 这不再是个人的道德实践或符合儒家理想社会的公共标准的道德行为的修养。 这不再是诚、静、尊、礼等新儒家的黄金标准。 宏大的心态和空间扩展包含了最大数量的人和土地。 这种空间宽大的美德代表了一个普遍帝国的公平和开放，而不是省级和地方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帝国成功地统一了农业和游牧地区。 这是一个广大而全面的帝国，能够成功地弥合这种分歧。 雍正皇帝对蒙古元朝空间要求的扩大，在儒家官僚机构和话语中引起了震动。

然后满族问题——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出现在《觉悟》中。 然后，满洲问题——房间里的大象——出现在《觉悟》中。雍正皇帝表示，我们的国家从东方土地（代指满洲）崛起，并通过实施仁慈的政策，接受了天命来统治中国。 没有政治行为者应该根据人民的起源区分中国人和野蛮人。 此外，所有的政治参与者，无论国内外，都已经承认并服从清朝的统治。 皇帝阐明，事实上的政治现实是草原、农业世界和海外人民，包括韩国、琉球、越南和日本等普遍接受清朝的统治。 即使是来自大西洋的访客（欧洲人）也向清朝的普遍统治屈服。 此外，所有的政治参与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都已经承认并服从了清朝的统治。皇帝明确了事实上的政治现实，那就是清朝统治的普遍接受，主要是由草原，农业世界，以及海外的人们，包括韩国，琉球，越南，和日本。甚至大西洋的访客（欧洲人）也服从于清朝的普世统治。清朝得到了大同和开端（儒家语言中的政治合法性的代名词），没有其他人做到了。 皇帝阐明了事实上的政治现实，即草原、农业世界和海外人民，包括韩国、琉球、越南和日本，普遍接受清朝的统治。甚至大西洋的访客（欧洲人）也屈服于清朝的普遍统治。清朝得到了大同和开端（儒家语言中的政治合法性代名词）的祝福，没有其他人做到这一点。所有迹象都表明，清朝的统治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赞扬。 因此，陆留良和他的追随者是妄想的局外人。 因此，陆留良和他的追随者是妄想的局外人。他们是反体制的破坏者，错误地抹黑了清朝的政治成功。

雍正皇帝重新定义了对野蛮的指控，认为这是对其起源的误解。 雍正皇帝重新定义了对野蛮的指控，认为这是对其起源的误解。他们（陆丽良及其追随者）怎么能因为我们（满族人）来自东方土地而轻易地对我们不屑一顾？对于满族人来说，东方土地就像中国家庭的祖籍。 这只是一个地点！然而，一些[中国人口]过去常常嘲笑和诽谤我们是野蛮人。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清朝来自满洲，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祖籍之地。 他们（陆留良及其追随者）怎么能因为我们（满族人）来自东方土地就轻易地将我们排斥在外呢？对于满族人来说，东方土地就像中国家庭的祖籍（籍贯）一样。这只是一个地点！然而，一些中国人却常常嘲笑和诽谤我们是野蛮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清朝来自满洲，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有祖籍一样。更重要的是，随着帝国领土的扩张，祖籍的位置相对于文明中心已经发生了变化。 例如，古代传说中的帝王舜起源于文明中心的东部，被视为“东方的野蛮人”。周朝的文王（公元前1050-221年）起源于文明中心的西部，曾经被认为是“西方的野蛮人”。这些古代圣王的祖籍位置并没有减损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美德和智慧。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清朝来自满洲，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祖籍一样。更重要的是，随着帝国领土的扩大，祖籍的位置相对于文明中心的位置也在变化。例如，古代传说中的帝王舜起源于文明中心的东部，曾被视为“东方的野蛮人”。周朝的文王（公元前1050-221年）起源于文明中心的西部，曾被视为“西方的野蛮人”。这些古代圣王的祖籍位置并没有减损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美德和智慧。皇帝辩称，如果古代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那么自古以来，随着文明世界的扩大，中心一直在不断移动。 清朝君主，起源于中国东北的黑水（黑龙江）和白山（长白山）之间的东方土地，遵循了这种演变模式，成为了跨朝代文明扩张的一部分。 因此，指责满族人是野蛮人，无视了自古以来的帝国扩张，对满族的起源有误解，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看法也过于狭隘。

然而，皇帝问道，为什么人们还要根据彼此的出生地和祖籍互相争吵和嘲笑呢？这种争吵是小心眼、心胸狭窄、粗俗的人所为。 然而，皇帝问道，为什么人们仍然会因为彼此的出生地和祖籍而争吵和嘲笑对方呢？这种争吵是小心眼、心胸狭窄、粗俗的人所为，不适合君子、官员、大臣或君主。 然而，皇帝问道，为什么人们还在争吵，根据他们的出生地和祖籍互相嘲笑？这种争吵属于心胸狭窄、心地刻薄、粗俗的人。这不适合绅士、官员、大臣或君主。雍正皇帝试图辩称，文明理想正在不断发展。 然而，皇帝问道，为什么人们仍然会因为出生地和祖籍而相互争吵和嘲笑？这种争吵是小心眼、心胸狭窄、粗俗的人的行为。这并不适合君子、官员、大臣或君主。雍正皇帝试图争辩说，文明理想正在不断演变。然而，通过文本和非文本研究，中国古代的重新概念化很快就会认真进行。 《解惑论》在1730年后的古典研究中有影响吗？当然，它有。 但它的作用并不像审查制度那样。 它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成为对所有经典文本解释性阐述的警示提醒。 "混沌醒觉"在1730年后对古典研究有任何影响吗？当然，它有。但它并不像审查制度那样起作用。它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对所有经典文本的解释性阐述都起到了警示作用。它无疑影响了纪昀的家庭。 纪昀后来担任了古典学术的冠军和赞助人，以及皇家图书馆注释目录的编辑。 雍正皇帝将南宋的皇权指为在中国文明与野蛮之间划下这条无法无天的界线的始作俑者。 当时，中国大陆沿着长江被划分为北方（辽朝的契丹人）和南方（南宋的中国人）；在雍正皇帝看来，两者都同样贫弱和愚蠢。 北方人称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称北方人为“辫子头”，以此表达他们的蔑视。 雍正皇帝指出，南宋皇权是在中华文明与野蛮之间划出这条无法无天的界线的首要罪魁祸首。 在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沿着长江被划分为北方（辽朝的契丹人）和南方（南宋的汉人）；在雍正皇帝看来，两者都同样贫弱和愚蠢。北方人称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称北方人为“辫子头”，以此表达他们的蔑视。皇帝宣称那是一个丑陋和分裂的时代。雍正皇帝将满洲清帝国描述为一个历史时刻，当时中国人和蛮族在天下之下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在一起。 那些妄想症患者怎么能在和平的时候故意划分内外，制造不必要的分裂呢？只有一小部分傲慢、不理智、愤怒的异端者会在如此美好的时刻违背天理。 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无视他们国家的家长和君主。 多么可怕！

在明朝末期，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明朝皇室的衰落和衰败。 在明朝末期，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明朝皇室的衰落和衰败。皇帝表示，根据政权周期性的转变，是大清崛起的时候了。 皇帝为新兴的朝代背诵了一系列的儒家陈词滥调。 然而，他对于德行（政治合法性）与君主血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天地有爱民之心，无私地关心人民。 如果贤明的统治者来自中国，那么大同的开始将在中国内部和附近。 如果义人统治者来自中国之外，远离中国，那么大同的开始将在中国之外，远离中国。 大同启示被视为政治合法性和空间壮丽的象征，同时也是天命的体现。

然而，继任的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6年）却对西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继任的乾隆皇帝（在位1735-96年）回忆起他父亲的《大义觉迷录》，并在即位后立即悄悄禁止了它的流通。 然而，继任的乾隆皇帝（在位1735-96年）回忆起他父亲的《大义觉迷录》，并在即位后立即悄悄禁止了它的流通。乾隆皇帝还下令逮捕曾静和他的导师张熙，并将他们处决。 然而，继任的乾隆皇帝（在位1735-96年）回忆起他父亲的《大义觉迷录》，并在他即位后立即悄悄禁止了它的流通。乾隆皇帝还下令逮捕曾静和他的导师张熙，并将他们处决。乾隆皇帝宣称，处决他们的官方理由是他们让他的父亲感到尴尬。 乾隆皇帝似乎遵循雍正皇帝的孝道逻辑：雍正惩罚卢留良是因为卢诽谤他的父亲（康熙），而饶恕曾静是因为曾静只是因无知而冒犯了他。 乾隆皇帝下令逮捕曾静和他的导师张熙，并将他们处决。 乾隆皇帝宣布他们被处决的官方理由是他们羞辱了他的父亲。 乾隆皇帝似乎遵循了雍正皇帝的孝道逻辑：雍正皇帝因卢琉亮诽谤他的父亲（康熙）而惩罚他，而饶恕了曾静，因为曾静只是因无知而冒犯了他。乾隆皇帝处决了曾静和张静，因为他们诽谤了他的父亲（雍正）。乾隆皇帝的动机肯定不止于此。雍正皇帝对康熙的辩护和他对皇位的继承，间接地引来了所有关于康熙皇帝和雍正对兄弟的残酷的指控和谣言。 对于乾隆皇帝来说，《醒世恒言》公开了皇室的太多丑闻。 这令他感到尴尬，所以他禁止了这本书。 乾隆皇帝接下来的四十年都致力于修正康熙至雍正的继承危机及其后果的历史。 对于乾隆皇帝来说，《醒世恒言》过多地揭露了皇室的丑闻，这让他感到尴尬，因此他禁止了这本书。然后，乾隆皇帝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致力于修正从康熙到雍正的继承危机及其后果的历史。从康熙到雍正的继承斗争使雍正皇帝的十五年统治黯然失色。 因为所有与他的父亲争夺皇位的叔叔们都还在忍受着他们的惩罚或监禁，所以这一直困扰着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也重新审视了他在继承权斗争中饶恕一些叔叔（雍正的兄弟）的决定。

《觉悟之后》的政治审查旨在清理继承危机的历史记录。 《觉悟的政治审查》旨在清理继承危机的历史记录。 《觉悟的困惑》的政治审查旨在清理继承危机的历史记录。 类似于乔治·R·马丁的热门奇幻小说和HBO电视剧《龙族之家》，继承危机只有在满足两个条件时才会变得危险：（1）有两个或更多的继承人有同等的机会登上王位，（2）这些继承人必须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聚集支持，形成他们的派系。 《龙之家》是一部关于坦格利安家族在维斯特洛斯争夺权力的热门小说。 奇幻小说围绕着继承危机及其后果展开，就像康熙到雍正的过渡一样。 在马丁的热门奇幻小说和HBO电视剧《龙族之家》中，继承危机只有在满足两个条件时才会变得危险：（1）有两个或更多的继承人有同等的机会登上王位，（2）这些继承人必须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聚集支持，形成他们的派系。 皇室应该激发尊严，尊重和恐惧。 这不是用来闲聊或嘲笑的话题。 从乾隆皇帝的角度来看，他的父亲已经越过了界限。 但他不能公开责怪他的父亲，所以他发明了孝道的文化逻辑来为他的审查制度辩护。 尽管出现了这种政治逆转，但随着乾隆皇帝准备按照他父亲的精心计划和准备在中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历史地理变得更加紧迫。 就乾隆皇帝而言，他的父亲已经越过了界限。但他不能公开责备他的父亲，所以他发明了孝道的文化逻辑来为他的审查行为辩护。尽管有这种政治逆转，但随着乾隆皇帝准备在中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历史地理变得更加紧迫，他执行了他父亲的精心计划和准备。乾隆皇帝同意他父亲的地理论点，并以许多方式对其进行了阐述。 但是，乾隆皇帝不同于他的父亲，他把证明空间宽大的棘手任务交给了他的儒家顾问，他们能更好地说服他们的同事和下属。 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乾隆皇帝将帝国建设置于文化政治之前。 然而，与他的父亲不同，乾隆皇帝决定将清朝君主与儒家官僚的最高阶层重新对齐，并经常像他的祖父康熙皇帝那样赞助大型文化活动。 他的支持最终鼓励了儒家官僚机构接受清朝的地缘政治愿景。

## 在扩张领土中绘制水道：

在1734年，雍正皇帝下令进行一次特殊的殿试，并强迫省级长官推荐最优秀的人才作为省级考试毕业生的同等候选人。 1678年的特殊殿试是一次罕见且充满政治色彩的事件，这是唯一的先例。 雍正皇帝的这项声明也被视为一种激励，以赢得儒家官僚的支持。 有传言称，大多数儒家官僚中的省级精英都害怕这位凶猛的皇帝，并对雍正皇帝的邀请表示怀疑。 因此，很少有省级官员积极推荐学者参加。 为了避免尴尬，特殊的宫廷考试被推迟到了次年，也就是1735年，雍正皇帝突然去世。 谣言是，儒家官僚体系中的大多数省级精英都害怕这位凶猛的皇帝，并对雍正皇帝的邀请表示怀疑。因此，很少有省级长官积极推荐学者参加。为了避免羞辱，特别的殿试被推迟到了次年，也就是1735年，雍正皇帝突然去世。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发生在纪昀十一岁时，对他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殊的宫廷考试是公务员考试制度中的一项独特事件，它在常规选拔儒家官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格考试，定期在地方政府的县城举行，长期以来一直是精英文化的一部分，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在省会城市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和文化活动。 除了标准的政府公务员考试，殿试对于大多数知名的希望者来说，是一个罕见的机会，可以摆脱他们的地方和区域网络，加入到通往国家精英的快速通道。 雍正皇帝的目标是在《醒世恒言》等严厉措施发布后，利用这个事件激励儒家官僚的顶层。 出乎意料的是，雍正皇帝在1735年去世，他的儿子乾隆继承了清帝国。 然后，戏剧性的逆转上演了，大多数省级长官积极推荐他们最聪明的人和亲信参加特殊的宫廷考试，希望年轻的皇帝会选择并且重用这些帝国的新人才。 雍正皇帝的目标是利用这个事件来激励儒家官僚体系的最高层，在《醒世恒言》等严厉措施的出版后。然而，雍正皇帝在1735年意外去世，他的儿子乾隆继承了清帝国。然后，戏剧性的逆转上演，大多数省级州长积极推荐他们最聪明的人和亲信参加特殊的宫廷考试，希望年轻的皇帝会选择并严重依赖这些新的帝国人才。乾隆即位后不久，1736年举行了被称为“博学洪词”（boxue hongci）的特殊宫廷考试。 大多数省长预期新的年轻皇帝将引领更为灵活和宽松的文化政策。

未来将不再有特殊的宫廷考试，1736年的特殊考试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未来将不再举行特殊的殿试，1736年的特殊考试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清朝在北京举行了近三百年的两次特殊的殿试。 第一次是在1678年，清朝和吴三桂内战刚结束后立即举行的。 “天机玉衡赋”，这是一项赞美古代政权及其天文仪器的写作任务，是这次特殊殿试的考题。 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清朝在北京只举办了两次特殊的殿试。第一次是在1678年，清朝和吴三桂内战结束后立即举行的。这次特殊的殿试的写作任务是“炫机玉衡赋”，要求赞美古代政权及其天文仪器。全国推荐了143名考生，最终有50人被录取。 其中包括20名一等生和30名二等生，占了考试人数的三分之一。 大部分的获胜者加入了明史研究所，以编写前明朝的官方历史。 58年后，如上所述，乾隆皇帝在位初期举行了第二次特殊殿试。 1736年，省长提名了他们的特定配额。 两百七十六人中的十五人被选中并呈现给年轻的乾隆皇帝。 前十五名的优秀考生被选为第一和第二等级。 第一名有五位获胜者，第二名包括十位杰出的学者 这次的十五位获胜者并没有像《明史》那样的现成项目。 相反，他们全部进入了翰林院。 尽管儒家学者经常赞美和尊崇特殊的殿试，但清朝君主却认为这是公务员考试制度有效运作的一个小偏差。 因此，清朝历史上只进行了两次特殊的宫廷考试。 由于在清朝历史中的罕见，大部分参加特殊殿试的人在全国范围内都被当作名人对待。 尽管儒家学者经常赞美和尊崇特殊的宫廷考试，但清朝的君主却认为它们是公务员考试系统有效运作的一个小小的偏离。因此，在清朝的历史上，它们只进行了两次。由于在清朝历史上的罕见，大多数参加特殊宫廷考试的人都被当作全国舞台上的名人对待。这两次考试经常被儒家学者们怀念为乾隆皇帝统治期间的“美好旧时光”。

此外，宫廷考试必须被视为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 此外，宫廷考试必须被视为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 在特殊的殿试中，那些没有与强大派系有关联的新选出的翰林院士成为了年轻的乾隆的潜在宠儿。 皇帝经常赞扬这些人，以平衡这些派系的影响。 特殊宫廷考试的第一和第二等级中的几个多彩人物，生动地展示了文化名人及其作为一个新群体的实用主义对早期乾隆皇帝的朝廷意味着什么。 在特殊的宫廷考试中，新选出的不隶属于强大派系的翰林院士成为了年轻的乾隆的潜在宠儿。皇帝经常赞扬这些人，以平衡这些派系的影响力。特殊宫廷考试的第一和第二等级中的几个多彩人物生动地展示了文化名人及其作为一个新群体的实用主义对早期乾隆皇帝的朝廷意味着什么。韩士俊（1696-1773）被选为第一榜的五人之一，而齐兆南（1703-1768）被选为第二榜的十人之一。 这两百七十六位候选人中最年轻的是袁枚（1716-1797），他并未被选为翰林院。 讽刺的是，袁枚成为了比韩世俊、齐昭南或任何一位由特殊宫廷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更广为人知的知识名人。 但是，当时的袁枚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失望，这个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 袁媚当时二十岁，而季媚只有十二岁。 乾隆皇帝的朝廷基调是清朝君主与儒家官僚之间的和解。 但是，当时年轻的袁枚对结果感到非常失望，这个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们选择了实学（通常被解释为实质性的学习），以回归康熙皇帝对文化和实用技能的重视，以建设帝国。 在“实学”的更大趋势下，齐及其同事们利用清朝大地测量的数据发展了历史地理学。

齐兆南无疑是乾隆皇帝朝廷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思想家。 齐兆楠无疑是乾隆皇帝朝廷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的智识贡献帮助塑造了清朝对地缘政治和水道的理解，并赢得了韩世俊和袁枚的赞誉，他们认为齐兆楠对帝国建设和服务乾隆皇帝至关重要。 然而，齐兆南却是个古怪而书呆子般的人。 齐兆南无疑是乾隆皇帝朝廷期间最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的智识贡献帮助塑造了清朝对地缘政治和水道的理解，并赢得了韩世俊和袁枚的赞誉，被誉为帝国建设和服务乾隆皇帝的重要人物。然而，齐兆南却是个古怪的书呆子。齐有着出色的记忆力，他能毫不费力地记住各种来源的大量随机历史信息。 我们称之为照相记忆，尽管这个术语直到19世纪末摄影变得流行时才开始使用。 齐兆南的照相记忆和出色的散文是他在特殊宫廷考试中排名第二的原因。 在研究历史地理学时，他不断参考许多未知的书面资料。 例如，当乾隆皇帝收到在满洲的宁古塔军事站发现的一面古铜镜时。 齐使用历史参考资料来解释这面镜子的重要性，这让皇帝印象深刻，并赞扬齐的知识和记忆技巧。 此外，这种独特的技能组合非常适合于研究历史地理。

不久在1736年的特殊宫廷考试中被选中后，乾隆皇帝就把齐兆南安置在了清朝的大同文献研究所。 从1737年到1749年，齐昭南充分利用了对清朝地理测量的独家和特权访问。 据我所知，齐是唯一一位明确声称在研究所工作并且可以第一手无拘无束地接触到康熙地图册和雍正对康熙地图册的补充的儒家学者和官员。 大约在同一时间，法国耶稣会士米歇尔·贝诺伊斯特（1715-74）正在皇家工坊制作省级测地图，将它们与康熙地图集结合，制作出一幅巨大的投影地图，并为乾隆皇帝提出了一个关于地球的新叙述。 在这个特权角色中，齐能够接触到大地测量调查的复杂技术方面，而大多数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则被限制在编辑和编译等任务上。 研究所的大多数学者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地理学家。 他们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关注地理学。 例如，那些在研究所监督齐的人正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那种官僚。 王俊（1694-1751）和杨淳（1676-1753）是研究所的高级学者，他们经常要求齐处理历史地理和大地测量的问题。 尽管王和杨缺乏技术专长，他们只能背诵历史文本中的信息，以便听起来像是了解一些技术问题。 这使他们能够在儒家官僚机构甚至专门研究所中担任高级职务。 这些儒家学者经常将《大同文献》视为一个文学项目。 他们可以为各种目的编写一部关于国家治理、行政管理和人文地理的文学作品。

然而，地图的维度，位置的准确性（城市，城镇和军事殖民地），以及地形特征的比例（河流，山脉和沙漠）都需要相对较高的准确性。 然而，地图的维度，位置的准确性（城市，城镇和军事殖民地），以及地形特征的比例（河流，山脉和沙漠）都需要相对较高的准确性。这就是齐昭南声称从康熙地图中学到的。 根据王和杨的说法，齐昭南可以接触到乾隆皇帝宫廷的“内室机密资料”，并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资料。 这是齐昭南声称他能够获取大地测量调查的机密信息的间接证据。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王和杨也能接触到这些机密材料，但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 相比之下，齐能够理解康熙地图集的技术细节和重要性。 他赞扬了这个大规模的工程，并将之描述为壮丽，因为康熙皇帝在进行清朝的大地测量时展现出了雄心壮志。

从1737年到1749年，齐被任命到朝廷中的几个知识要求高的机构，包括编纂《三礼》、一本名为《明鉴纲目》的全面历史书籍，以及清朝的制度和法规的汇编，皇室的日常记录，以及在五音宫——所有书籍、法规和皇家命令的皇家印刷厂的编纂工作。 在这些职务轮换之后，齐被任命为乾隆皇帝的年轻继承人的导师，并被提升到他职业生涯中的最高级别——礼部尚书。

尽管齐在乾隆皇帝的朝廷中担任着至关重要且独特的职位，但不幸的是，他的职业生涯却被提前终止了。 齐于1737年以杰出的才华在清帝国大同文献研究所开始了他的官方职业生涯。 他在1749年从马上摔下来，头部受伤，不幸导致齐从乾隆皇帝的朝廷退休。 这场事故始于1749年春天，齐在紫禁城外的皇家花园参加一场朝廷仪式。 在他回去的路上，进入故宫的一个门时，他的马受到惊吓，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他在1749年从马上摔下来，头部受伤，不幸导致齐从乾隆皇帝的朝廷退休。 他的保护者和仆人把他急忙送到了医生那里。 这位医生是一位拥有魔法能力的蒙古治疗师。 他剖开一头活牛的肚子，取出所有内脏，然后把齐放进牛的肚子里，让他吸收牛的自然能量和力量。 这种方法被认为可以使他的骨骼和血管恢复正常排列。 当他听说齐的伤势时，乾隆皇帝正在牡丹附近的木兰狩猎场。 他剖开一头活牛的胃，取出所有内脏，然后将齐放入牛内，以吸收牛的自然能量和力量。他们相信这种方法可以使他的骨骼和血管恢复正常排列。当乾隆皇帝在牡丹附近的木兰猎场听说齐受伤时，他派他的儿子（齐的学生）去看望他，并给他三瓶最好的外伤药。 然后，皇帝用从木兰猎场带来的十五捆干鹿肉安慰齐。 接下来的事情是可以预料的：六个月后，在1749年的冬天，齐请求退休并返回他的家乡，位于扬子江下游的天台，以照顾他的母亲。 他的请求被批准了，但皇帝要求他在法庭上待到次年春天才能返回长江下游的天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意外，也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剧场，以从乾隆皇帝的朝廷退休。 无论齐的理由是什么，很明显，齐正在经历政治斗争，并在处理清朝朝廷的政治事务中感到迷茫。

虽然像齐这样古怪的书呆子在高级朝廷政治中感到格格不入，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策划了那场使他离开乾隆皇帝朝廷的事故。 尽管像齐这样的古怪书呆子在高级朝廷政治中感到格格不入，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策划了那场使他离开乾隆皇帝朝廷的事故。然而，他利用这个机会，从高级政治中退出，作为一名学者和下层扬子江谷的士绅，他花了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创作他的漫画杰作。 尽管像齐这样的古怪书呆子在高级朝廷政治中感到格格不入，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策划了那场使他离开乾隆皇帝朝廷的事故。然而，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高级政治，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作为一名学者和下扬子江谷的士绅，创作了他的漫画杰作。在他回家的头十年里，他于1761年完成了《水道体纲》（1776年出版），这是对中国水道的实用分析的插图。 尽管像齐这样的古怪书呆子在高级朝廷政治中感到格格不入，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策划了那场使他离开乾隆皇帝朝廷的事故。然而，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高级政治，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作为一名学者和下扬子江谷的士绅，创作了他的漫画杰作。在他回家的头十年里，他于1761年完成了《水道提纲》（1776年出版），这是对中国水道的实用分析的插图。齐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使用后来得到了《皇家图书馆注释目录》对《水道提纲》的证实。 无疑，齐遵循了清朝君主制定的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 在他的前十年家庭生活中，他在1761年完成了《水道提纲》（1776年出版），这是对中国水道实用分析的插图。齐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使用后来得到了皇家图书馆《水道提纲》的注释目录（tiyao）的证实。毫无疑问，齐遵循了清朝君主制定的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对于齐来说，棘手的事情是让他的儒家官僚同事相信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可以实用并融入儒家体系。

与此同时，纪昀在1754年通过了殿试并获得了进士学位。 与此同时，纪昀在1754年通过了殿试并获得了进士学位。而齐在1750年至1761年期间对高层政治感到幻灭，留在了扬子江下游的家中，致力于绘制日益扩大的清帝国的水道地图。纪昀和他的同僚成为了下一批能够接触到大地测量的国家精英。 与此同时，纪昀在1754年通过了殿试并获得了进士学位。然而齐在1750年至1761年期间对高层政治感到幻灭，留在了扬子江下游的家中，致力于对扩张中的清帝国的水道进行测绘。纪昀和他的同伴成为了下一批能够接触到大地测量的国家精英。他们对帝国水道的测绘有着与齐不同的看法。 与此同时，纪昀于1754年通过了殿试并获得了进士学位。齐昭南对高级政治感到幻灭，从1750年到1761年，他在扬子江下游的家中，致力于绘制日益扩大的清帝国的水道地图。纪昀和他的同辈成为了下一批能够接触到大地测量的国家精英。他们对帝国水道地图的理解与齐昭南有所不同。比较这两代连续的儒家学者——齐昭南和纪昀——对清朝大地测量的地缘政治视角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齐在1750年至1761年间对高层政治感到幻灭，留在下扬子江谷，在家中研究清朝不断扩张的水道图，但纪云和他的同僚成为了下一批能够接触到大地测量的国家精英。他们对齐对帝国水道图的理解有所不同。比较这两代连续的儒家学者——齐兆南和纪云——的地缘政治视角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能接触到清朝的大地测量。让我从齐的角度开始。 一方面，齐昭南在清帝国扩张领土中对水道的绘制，以及纪昀以古代经典之名对水道的儒家绘制之间的时间平行性至关重要。 一方面，齐昭南在清朝领土扩张中对水道的绘制，以及纪昀以古代经典之名对水道的儒家绘制在时间上的并行性至关重要。齐的绘制展示了清朝新的领土宽大。 两个地缘政治的映射版本几乎同时创建，但目的略有不同。 下一代的学者和领土管理者选择了纪昀的版本，因为它更贴近他们的价值观。

让我们来看看齐的中国水道地缘政治地图 让我们来看看齐的中国水道地缘政治地图。在《水道网络要点》的序言中，齐首先描绘了地球（大地）为陆地和水域相间的球体。 我们来看看齐的地缘政治对中国水道的绘制。在《水道网络要点》的序言中，齐首先描绘了地球（大地）是陆地和水域的球体。山脉可以被看作是骨骼，水道就像人体中的血管。 第二章解释了“天文定位”是如何通过展示球形地球与天球的对应关系来工作的，齐先生完全赞同天文定位。 简单来说，齐通过使用儒家语言，能够验证大地测量学。 简单来说，齐通过引用古代中国的“九州”并承认《尚书》中的“禹贡”章节是中国水系最知名的描绘，表达了他对儒家经典的认可。 通过引用儒家经典，齐提高了他作为主流儒家学者的信誉，使自己与耶稣会士、佛教徒、道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作家区别开来，同时运用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 然而，齐并不满足于遵循传统方法，而是选择批评他之前的人的作品。 然而，齐并不满足于遵循传统方法，而选择批评那些在他之前的人的作品。根据儒家的惯例，批评古代圣王和高古哲人的著作或教诲是不常见的。 通过参考儒家经典，齐提高了他作为主流儒家学者的可信度，使自己与耶稣会士、佛教徒、道教徒和伊斯兰教作家区别开来，同时运用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然而，齐并不满足于遵循传统方法，而是选择批评他之前的人的作品。根据儒家的惯例，批评古代圣王和高古哲学家的著作或教导是不常见的。另一方面，批评帝国时代（公元前202年至1911年）的学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并未像古代圣王和哲学家那样受到尊重。 然而，齐昭南并不满足于遵循传统方法，而是选择批评他之前的人的作品，强调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根据儒家的惯例，批评古代圣王和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或教诲是不常见的。另一方面，批评公元202年至1911年帝国时代的学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并未像古代圣王和哲学家那样受到尊重。齐昭南回顾了过去的地理作品，并强调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李道元的《水经注》是关于中国水道信息最可靠的来源，因为对古代《水经》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因此，李道元的《水经注》成为了研究水道的新标准，取代了传统的《水经》。

根据齐的说法，对《水经注》的研究过于偏重于中国的西北部分，完全忽视了东南部分。 根据齐的说法，对《水经注》的评论过于狭隘地关注了中国的西北部分，完全忽视了东南部分。 根据齐昭南的说法，他根据1760年代刚刚完成的新领土扩张，将清朝的领土划分为“西北”和“东南”两部分，这是清朝刚刚接管中亚的关键时期。 根据齐昭南的说法，他在《水经注》中的关注重点过于偏向中国的西北部分，完全忽视了东南部分。 因此，需要对大地测量数据进行新的、彻底的评估，以评估清朝的水道。

李对“中国”的定义仅限于北魏时期（386-535年）的华北平原，这意味着他只能提供该地区的水道信息。 齐认为李并未对华北平原以外的水道有直接的了解，而是依赖于其他文本，这导致了错误的重复。 相比之下，齐可以获取整个中国大陆的大地测量数据。 他想要记录并评估满洲和广东的水道，以反映清帝国最近的扩张。 齐相信李对华北平原以外的水道没有第一手的了解，而是依赖其他文本，这导致了错误的重复。相比之下，齐可以获取整个中国大陆的大地测量数据。他想要记录和评估满洲和广东的水道，以反映清朝最近的扩张。齐的水道分析从北到南的范围，类似于胡焕庸线（一个现代科学观点）所划分的中国人口密集区和稀疏区，正如在引言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 从西端到东海岸的范围反映了乾隆皇帝征服中亚后最新和最新的领土。 他毫不掩饰地，尖锐地批评了李道阳在清朝领土扩张的顶峰时期的历史局限性。 这与雍正皇帝关于中国文明的领土扩张和流动性的理论相呼应（这与清朝最新的领土扩大保持同步）。 这并不夸大其词地说，齐的对中国水道的务实分析捕捉到了雍正皇帝在《醒迷谈》中对蛮族地缘政治解散的精神。 齐的作品也赞美了乾隆对中亚的征服。

要完全理解齐的《水道网络要素》，关键在于回顾齐如何利用水道网络揭示清朝的领土性。 要完全理解齐的《水道网络要点》，关键是要回顾齐如何利用水道网络揭示清朝的领土性。 此外，历史地理在朝代官方历史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汉书·地理志》一节所示。 负责治理的国家官员应该了解如何管理水道，利用它们进行贸易，并作为防御边界。 用来理解清朝扩张的历史例子有其局限性，因为他们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是空前的，比现代中国共和国的领土面积更广。 清朝的领土比包括汉朝和唐朝在内的任何以前的政权都要大。

齐为清朝领土的辽阔空间奠定了重新构想的基础，他明确地将其领土规模与前朝进行比较，并详细描述了帝国内的水道和边界河流。 例如，黑龙江将清朝中国与罗曼诺夫俄罗斯分隔开来，而鸭绿江和图们江则在清朝中国和朝鲜之间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例如，黑龙江将清朝中国与罗曼诺夫俄罗斯分隔开来，而鸭绿江和图们江则在清朝中国和朝鲜之间起到了同样的作用。齐强调历史地理的实用性，但也希望驱散儒家学者普遍持有的一些误解。 地理著作历史上包含了关于景观的神话，这可能包括关于精神和恶魔的故事，以及对山脉和河流的超现实描绘。 相信这些神话的学者往往会夸大所描述地区的面积，并强调景观的自然美和美学。 齐强调历史地理的实用性，但也想驱散儒家学者普遍持有的一些神话。 他做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去神秘化过程，试图清除所有对中国风景的神奇描述。 齐在1761年对他所知道的清朝所有河流进行了具体、准确和实用的记录。

齐对清朝中国所有河流的记录是揭示其领土范围和覆盖面的关键努力。 中国大陆的所有主要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动的 在《水路要览》中，齐首先描述了（1）东海岸线。 在《水道网的基本网络》中，齐首先描述了（1）东海岸线。然后，他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对胡焕庸线东侧的所有河流进行了分类：（2）沈阳地区的河流，（3）北京地区的河流，（4）从北京到下扬子江谷的大运河和山东省的河流，（5）黄河及其源头，（6）所有流入黄河的重要河流，（7）淮河，所有流入淮河的重要河流和南运河，（8）长江，第一部分，（9）长江，第二部分，（10）长江，第三部分，（11）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一部分，（12）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二部分，（13）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三部分，（14）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四部分，（15）长江流域的运河和太湖，（16）浙江省的浙江，（17）福建省的闽江，（18）广东省的粤江，第一部分，（19）粤江，第二部分，（20）粤江，第三部分，（21）云南省的河流（藏南高原，或称佐米亚），（22）藏族河流（佐米亚），（23）戈壁沙漠以北的河流，（24）戈壁沙漠以北的黑龙江，（25）所有流入黑龙江的重要河流，（26）黑龙江以南和朝鲜半岛的河流，（27）蒙古长城以北的河流，（28）西域（中亚）的河流。 如果你熟悉中国的地理，你会对齐在中国近代早期编制的地域列表印象深刻。 在《水道网的基本网络》中，齐首先描述了（1）东海岸线。然后，他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对胡焕庸线东侧的所有河流进行了分类：（2）沈阳地区的河流，（3）北京地区的河流，（4）从北京到下扬子江谷的大运河和山东省的河流，（5）黄河及其源头，（6）所有流入黄河的重要河流，（7）淮河，所有流入淮河的重要河流和南运河，（8）长江，第一部分，（9）长江，第二部分，（10）长江，第三部分，（11）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一部分，（12）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二部分，（13）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三部分，（14）所有流入长江的重要河流，第四部分，（15）长江谷地的运河和太湖，（16）浙江省的浙江，（17）福建省的闽江，（18）广东省的粤江，第一部分，（19）粤江，第二部分，（20）粤江，第三部分，（21）云南省的河流（藏南高原，或称佐米亚），（22）藏族河流（佐米亚），（23）戈壁沙漠北部的河流，（24）戈壁沙漠北部的黑龙江，（25）所有流入黑龙江的重要河流，（26）黑龙江南部和朝鲜半岛的河流，（27）蒙古长城北部的河流，（28）西域（西域，中亚）的河流。如果你熟悉中国的地理，你会对齐在中国近代早期编制的领土列表印象深刻。尽管他没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边疆知识”，但他对清朝领土的完整性仍有深刻的理解。 这是指对特定区域或领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无论是物理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是象征性的。

大约在1770年，清朝水道的绘制加强了清朝对其领土的皇权主张。 大约在1770年，清朝对水道的绘制进一步加强了清朝对其领土的主权要求。 在绘制Pax Manchurica地图时，齐传达了几个关键信息。 根据齐的说法，帕米尔山脉以西的所有河流都流入西洋，而印度次大陆的河流则流入南洋，西伯利亚的河流流入北洋（他对北冰洋的称呼）。 这有助于通过确定其河流的方向，将清朝帝国定位在欧亚大陆上。 鉴于齐有机会接触到康熙地图集，他很可能也能阅读费尔南多·维尔比斯特的《世界图解》并理解地球球形和大地测量的基本概念。 根据齐的说法，帕米尔山脉以西的所有河流都流入了西洋，而印度次大陆的河流则流入了南洋，西伯利亚的河流则流入了北洋（他对北冰洋的称呼）。这有助于通过确定其河流的方向来确定清朝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位置。鉴于齐可以接触到康熙地图集，他很可能也能阅读费迪南·维尔比斯特的《世界插图和解释》，并理解地球是球形的基本概念和大地测量。此外，通过理解地球上有五大洲，齐必须已经意识到清朝帝国是全球许多广泛的政治制度之一。 与蒙古元朝因其“空间宽大”而傲慢自大地宣称其帝国在道德上优于所有其他帝国不同，齐现在可以用更多的理由和知识为清朝做出类似的声明。 据齐称，清朝通过测量其经度和纬度，创建了包括海洋和大陆在内的整个清帝国的地图。 齐认为他可以自信地写关于清帝国的文章，因为一切都有实证证据作为支持。 与蒙古元朝傲慢且夸大地宣称他们的帝国因其“空间宽大”而在道德上优于所有其他帝国不同，齐现在可以为清帝国提出更有理由和知识的类似主张。根据齐的说法，清朝通过测量其经纬度，创建了包括海洋和大陆在内的整个清朝帝国的地图。齐认为他可以自信地写关于清朝帝国的文章，因为一切都有实证证据作为支持。根据齐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权都声称已经实现了政治合法性并创建了统一的帝国，但没有一个像大清帝国那样成功。

在《水路的基本网络》中，历史并未成为重要的关注焦点。 在《水路网络的基本要素》中，历史并不是重要的关注点。 这本书的目标是强调清朝帝国的广大疆域。 在《水路网络的基本要素》一书中，历史并不是重点关注的内容。这本书的目标是强调清朝帝国的广大。齐的目标是证明清朝的领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汉朝和唐朝的政治权力。 然而，这个展示并没有表明历史轨迹，包围中国的河流，或者他们的时间期。 清朝帝国在陆地上向三个方向扩展：北，西和南。 为了防止俄罗斯人入侵，北方设立了军事站，并对中朝边境的人参采集者的活动进行了规定。 在西部，维吾尔人被平定，准噶尔蒙古人被消灭，而土尔扈特蒙古人则在清朝在中亚的边境沿线定居。 清朝在陆地上向三个方向扩展：北，西和南。为了防止俄罗斯人入侵，北方设立了军事站，并对中朝边境的人参采集者的活动进行了规定。在西方，维吾尔人被平定，准噶尔蒙古人被消灭，土尔扈特蒙古人被安置在清朝在中亚的边境上。在中国西南部的金川进行了战争，台湾被纳入清朝的行政区。 乾隆皇帝指定广州为南方与欧洲商人交流的主要贸易港口。 这些行政和领土措施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清朝承认蒙古人在中亚和东欧拥有广大的帝国，但与蒙古人不同的是，清朝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和军事殖民地来统治他们征服的土地。 清朝在中原地区实行中央集权的儒家官僚制度进行统治。 清朝也允许外域的政治精英用他们的风俗、宗教和制度来管理他们的地区。 清朝承认蒙古人在中亚和东欧拥有广大的帝国，但与蒙古人不同，清朝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和军事殖民地来统治他们征服的土地。清朝在内地（中国次大陆）实行中央集权的儒家官僚制度进行统治。清朝也允许外地的政治精英以他们的风俗、宗教和制度来管理他们的地区。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分析了清朝在他们的外地的管理技术，这可能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概念的早期例子。 这种方法的创新特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齐以清晰准确的方式把握了清朝内外领域的重要性。

将内外领域整合以夺取清朝领土在中国历史上是新的，这是《大清联合开创文献》的基本组织原则。 齐的书与清帝国的地缘政治愿景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 这里有一个故事证明了这种联系：每当乾隆皇帝巡游到扬子江下游地区时，齐先生会和其他退休官员一起陪同他，向皇帝的住所表示敬意。 齐是一位忠诚的儒家官员，他认为清朝君主制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的最高表现。 他对承认和尊重乾隆皇帝的普遍统治和政治合法性表现出了真诚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齐先生得出这个结论是通过对清朝领土的深思熟虑，而不是对皇帝的盲目忠诚。 他对清朝帝国水道的全面分析使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因为大量的文档和大地测量提供了关于清朝领域范围的新的、精确的数据。 在清朝统治之前，没有任何政权能够提供如此精确的测量。 齐对他们的这种能力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不久在齐完成了1761年的《水道要网络》之后，齐的一位具有破坏性的家族成员齐周华，在他的家乡天台浮出水面。 齐在1761年完成《水道要览》后不久，齐氏家族中的捣乱分子齐周华在他的家乡天台浮出水面。他年轻时曾研究反满洲儒学学者陆留良的教义，并逃离家乡三十年。 齐家的大部分成员都认为他是齐家的叛徒。 齐周华在自我放逐三十年后最终回到家乡，并出售了他的财产份额以筹集资金出版他的书。 在这本书中，齐周华引用了许多陆留良的观点。 齐周华在1762年熊学鹏省长访问泰州城墙建设工地时，将他的书提交给了熊学鹏。齐周华与《雍正皇帝的从迷悟真》中的对话者曾静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这次提交导致了他的逮捕，他的家被没收，随后被以叛国罪起诉。 齐周华被判处死刑，处以肢解。 他的家人被免除罪责并被释放。 这本不幸的书包含了齐氏的世系名单，包括齐昭南。 由于与齐周华有关联，齐昭南已被刑部逮捕并且所有财产被没收。 乾隆皇帝赦免了齐昭南，并归还了他近40%的财产。 这位老先生感到悲伤和沮丧。 他在1768年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 他在1768年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

## 调用儒家时间观进行绘图：

因此，文学审查玷污了齐的遗产和毕生的工作，《水道要网》。 因此，文学审查玷污了齐的遗产和毕生的作品《水道要网》。自1768年以来，许多后世的儒家学者避开了齐的杰作，因为它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同年，纪昀因犯罪而蒙受耻辱。 同年，纪昀因犯罪而受辱。纪昀警告他的姐夫陆建增（1690-1768）关于他的贪污指控，结果纪昀被流放到中亚作为惩罚。 1771年，服刑一年后，他被赦免并允许回到朝廷。 尽管他之前的行为，乾隆皇帝仍然高度尊重他，并要求他为土尔扈特蒙古人返回沈阳写诗，认为他是帝国中最优秀的文人。 纪昀警告他的姐夫，陆建增（1690-1768），关于对他的贪污指控，结果导致纪昀被流放到中亚作为惩罚。1771年，服刑一年后，他被赦免并被允许回到朝廷。尽管他之前的行为，乾隆皇帝仍然高度重视他，并要求他为土尔扈特蒙古人返回盛京写诗，认为他是帝国最优秀的文人。在庆祝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归来后，纪昀在准噶尔战役结束时分享了他对中亚的第一手经验和观察。 尽管纪昀不是技术官僚，但他对中亚有着学者般的观察。 尽管他被流放到这个地区，但这对他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在中亚度过的时间证明是无价的，使他成为监督《黄河源流简明记录》项目的最佳人选。 尽管纪昀不是技术官僚，但他对中亚有着学者般的观察。被流放到该地区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他在中亚度过的时间证明是无价的，使他成为监督《黄河源流略》项目的最佳人选。齐兆南对清帝国地缘政治愿景的诠释与纪昀的《黄河源流略》之间的相似性和平行性令人瞩目且富有启示性。 齐遭遇了悲惨的失败和谴责，而纪则崛起，建立了纪云的圈子，位于儒家官僚机构的最高层。 纪昀的政治智慧和韧性是他上升的宝贵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齐兆南和纪昀在政治信仰、个性和职业轨迹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性的观点上却是一致的。

在乾隆皇帝统治初期，皇帝改变了他的作风，这表明清朝君主对儒家官僚体制的强制干预已经结束。 在考试制度中，选择考试参与者的人成为他们的导师，所有被选中的人都成为了考官的学生。 在儒家官僚体系中，成为考官有形成派系的特权。 在1754年，秦会田（1702-1764），一位在雍正皇帝统治下曾遭受迫害但在乾隆皇帝初期迅速升至高位的官员，主持了一次关键的京城宫廷考试（胡，106-09）。 在这次考试中，纪昀通过北京的殿试获得了进士学位的最高荣誉。 在这次考试中，纪昀通过在北京的殿试获得了进士的最高荣誉。钱大昕和一群杰出的学者，包括朱筠（1729-1781）、王名盛（1722-1797）、王昶（1725-1806）也是如此。 在1754年，秦会田（1702-1764），一个曾在雍正皇帝统治下受到迫害的官员，但在乾隆皇帝即位初期迅速升至高级职位，主持了一次重要的京都宫廷考试（胡，106-09）。在这次考试中，纪昀通过北京的宫廷考试获得了进士学位的最高荣誉。钱大昕和一群杰出的学者，包括朱筠（1729-1781），王鸣盛（1722-1797），王昌（1725-1806）也是如此。他们在同一年被选为一批人，成为了终生的密友和知识伙伴。 他们视彼此为平等，并在官僚机构中成为终身盟友。 钱大昕和一群杰出的学者，包括朱筠（1729-1781）、王名盛（1722-1797）、王昌（1725-1806）等人也是如此。他们在同一年被选入一个小组，并成为了终生的朋友和知识伙伴。他们视彼此为平等，并在官僚机构中成为了终生的盟友。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都将在清朝的政治和知识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在同一年（1754年），北京礼节社会中奇特而傲慢的局外人戴震闯入了钱大昕的住所，并在刚刚通过考试制度的最高难关并成为同行和亲密盟友的1754年学者官员群体中声名大噪。 在同一年（1754年），北京礼节社会中奇特而傲慢的局外人戴震闯入了钱大昕的住所，并在刚刚通过考试系统最高难关的1754年学者官员群体中声名大噪，成为了他们的同行和亲密盟友。 然而，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他仍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提拔。 在同一年（1754年），北京礼节社会中奇特而傲慢的局外人戴震闯入了钱大昕的住所，并在刚刚通过考试系统最高难关的1754年学者官员群体中声名大噪，成为他们的同行和亲密盟友。然而，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他仍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提拔。1754年学者官员群体的导师秦会田迅速为戴震提供了一份工作，并将他的作品收录在《五礼全考》中。 钱大昕称戴震为“奇才罕见”，主要是因为戴震将数学天文学和历史地理学应用于经典诠释。 纪昀对钱大昕的评价感到非常高兴，并将戴震加入了他的团队。 纪昀还出版了戴震的《考工记图》。 戴震的认可标志着知识方向的改变，与前一代的务实学习有所不同。 他的工作反映了1754年这一批人的智识倾向。 此外，他后来与纪昀的圈子的关联突显了他们共享的知识倾向。

纪昀承认戴震在数学天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精通。 作为回报，戴在他赞助的出版物《古代技术记录插图》中提供了关于古代日晷和其他文物的详细描述。 他以第谷的宇宙地理学为基础进行描述，并为其提供了支持的论据。 戴震还有另一套手稿，名为《水地记》，展示了他对当代历史地理问题的敏锐意识，他使用了第谷星表来进行阐述。 然后，戴用他的余生来修订他关于数学天文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作品。 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说他不会透露结论，直到研究证明对主题有100%的理解和确定。 他的古典研究、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和解析音韵学的手稿都保存了下来。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展示他思想的演变。 戴的《水道山脉记》展示了他的研究与齐昭南的《水道要览》有着根本的不同，并预示了纪昀的《黄河源流略》。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的研究与齐昭南的研究大约在1740年的同一时间进行。 然而，齐兆南可以接触到翰林院和全国地理测量，而戴震作为徽州商人的儿子，只能接触到在长江下游的儒家学院中有限的商业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的研究与齐昭南在1740年左右的研究同时进行。然而，齐昭南可以接触到翰林院和全国地理测量，而戴震，一位徽州商人的儿子，只能接触到在下扬子江谷地的儒家学院中有限的商业作品。戴震使用的主要来源是胡渭写的《禹贡锥指》。 需要注意的是，戴震的研究与齐昭南的研究大约在1740年的同一时间进行。然而，齐昭南可以接触到翰林院和全国地理测量，而戴震，一位徽州商人的儿子，只能接触到在下扬子江谷地的儒家学院中有限的商业作品。戴震主要使用的资料是胡渭写的《禹贡锥指》。在这个背景下，胡渭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高级官员徐乾学（1631-1694）在康熙皇帝对蒙古领导人噶尔丹进行战役之前，大约在1690年，全国地理测量还处于初期阶段时，编写了《大清会通启事》。 然而，齐可以接触到翰林院和全国地理测量，而戴，一位徽州商人的儿子，只能接触到在下扬子江谷地的儒家学院中有限的商业作品。戴主要使用的资料是胡渭写的《禹贡锥指》。在这个背景下，必须注意胡渭的职业生涯：高级官员徐谦学（1631-1694）在康熙统治期间编写了《大清大同启事》，当时全国地理测量还处于1690年左右的初级阶段，康熙皇帝在对抗蒙古领导人噶尔丹之前。胡渭在1690年是一位已经在历史地理上工作了大部分生活的老绅士。 当徐千学将整个编纂办公室从清朝宫廷搬到他在扬子江下游的住所时，他终于有机会加入徐千学的团队。 在这个背景下，必须注意到胡渭的职业生涯：高级官员徐乾学（1631-1694）在康熙年间编写了《大清盛典启蒙文献》，当时全国的大地测量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大约在1690年，康熙皇帝在对抗蒙古领导人噶尔丹的战役之前。胡渭是一位在1690年的老绅士，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历史地理工作。当徐乾学将整个编纂办公室从清朝宫廷搬到他在扬子江下游的住所时，他终于有机会加入徐乾学。在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期间，胡渭有幸被接见。 胡渭是1690年的一位老绅士，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历史地理。当徐乾学将整个编纂办公室从清朝宫廷搬到他在扬子江下游的住所时，他终于有机会加入徐乾学。1703年，在康熙皇帝南巡期间，胡渭有幸觐见皇帝。他向皇帝提交了他的作品《禹贡狭观》，并因此在晚年得到了对他对历史地理的奉献的认可。 康熙皇帝写下了四个字——"蓍年篤學"（高龄仍专心致志于学问），并将其作为对这位老先生的赞誉。 在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期间，胡渭有幸觐见皇帝。他向皇帝提交了他的作品《禹贡疏略》，并因此在高龄时期对历史地理的奉献得到了认可。康熙皇帝写下了四个字——"蓍年篤學"（高龄仍然专心学习），并将其作为对这位老先生的赞誉。就像他之前的梅文鼎一样，胡渭超越了他的时代，因为他采用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基本原则。 他们的实用学习因为他们对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领域的坚定奉献而获得了皇家荣誉：梅文鼎在数学天文学上，胡渭在历史地理学上。 这两个领域都被认为是实用且对清朝帝国有价值的。

戴震在胡渭的地理数据基础上进行了建设，并将其作为科学依据来解释历史书籍和儒家经典中的地理信息和参考资料。 戴震在胡渭的地理数据基础上进行了建设，并将其作为科学依据来解释历史书籍和儒家经典中的地理信息和参考。因此，胡渭对清朝的地图制作对于理解戴震的历史地理学至关重要。 戴震基于胡渭的地理数据，并将其作为科学依据来解释历叐书籍和儒家经典中的地理信息和参考资料。因此，胡渭对清朝地图的绘制对于理解戴震的历史地理学至关重要。胡渭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采用比齐兆南更为含蓄。 然而，他们都认同第谷的宇宙地理学和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 戴震的历史地理学与第谷的宇宙地理学相符，这是1754年那一代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支持的。 然而，尽管戴震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感兴趣，但他无法获得清朝的大地测量数据。 然而，尽管他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感兴趣，但戴震无法获得清朝的大地测量数据。相反，他依赖胡渭提供的信息进行研究。 尽管他们没有获得清朝的大地测量数据，他们的成就是什么？齐昭南的地图绘制更为准确，但结果是由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的。

因此，儒家官僚体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从清朝君主那里采用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 因此，儒家官僚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从清朝君主那里采用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首先，齐兆南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清帝国的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 因此，儒家官僚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从清朝君主那里采用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首先，齐兆南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清朝的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其次，戴震根据他们复兴儒家经典的方式，通过经典诠释改编和修改了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 因此，儒家官僚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从清朝君主那里采用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首先，齐兆南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清帝国的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其次，戴震通过经典诠释，根据他们复兴儒家经典，改编和修改了早期现代地球测量学。纪昀的圈子最终采用了戴的方法，而齐的工作被遗忘了。 两种类型的学者之间的区别并不绝对，他们的立场应被视为一系列可能性。 一些学者在这两种理想类型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 例如，蒋永更倾向于齐氏的方法，而凌廷堪则更倾向于戴氏的方法。 例如，蒋永更倾向于齐氏的方法，而凌廷堪则更倾向于戴氏的方法。 这涉及到按照经典诠释修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并回归到儒家经典的历史时间性。 毫不奇怪，第二种形式与清朝的联系较少，但并不打算质疑清帝国的合法性。 它转向了一个相对更为自治的儒家管理，就像明朝那样，而不是对清朝皇权表现出顺从的态度。 乾隆皇帝在同一时期赋予儒家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 毫不奇怪，第二种形式与清朝的联系较少，但并不打算质疑清朝的合法性。它转向了一个相对更加自治的儒家政权，就像明朝那样，而不是对清朝表现出恭顺的态度。乾隆皇帝在同一时期给予了儒家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清朝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因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 戴震巧妙地在这些政治边界内创造了新的历史地理。

戴的地图与齐的地图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清朝领土扩张的地图上增加了一个基于儒家历史观念的时间维度。 戴和纪云的“圈”创造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基本版本，用于古典诠释。 首先，胡和戴开发了一张地图，展示了他们当前的城镇、城市、山脉和河流。 随后，他们利用经纬度划分的网格线在地图上标识历史地点。 接下来，他们追踪了同名城镇的位置如何相对于其现代对应物发展变化。 最后，他们根据城镇当前的位置，编制了一个记录，记录了城镇名称的任何变化以及其在网格线上的位置变化。 一个表格可以澄清2000年前发生的一场传奇战斗。 通过参考河流、城镇和城市的当前位置，可以确定战斗是如何进行的，并通过地理参考纠正历史记录。 胡和戴的主要目标是准确识别历史事件的细节，并防止对历史地理发生的事情产生任何混淆。 他们更关心历史的准确性和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 他们与齐昭南的制图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更符合现代地理学家的理念，注重地理制图的准确性。

相比之下，胡和戴更关心如何准确地通过地理参考来对历史事件进行定位。 相比之下，胡和戴更关心准确地用地理参考来确定历史事件的日期。戴震比胡卫更专注于儒家的时间性，他的主要成就是将文本记录和地图上的位置联系起来。 但他并不仅仅是凭经验连接这些点。 但他并非仅仅凭经验连接这些点。戴震使用了第谷的宇宙模型和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作为宇宙学基础来填补数据点。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这些系统性和宇宙学的前提。 大多数知识史学家都将这个群体视为实证学者或语言学家。 根据这种观点，这些学者依赖文本和历史记录来进行他们的研究。 但是，事实上，他们也使用了非文本的方法。 在戴震的案例中，他利用早期现代数学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日期标记。 但实际上，他还利用了早期现代数学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日期排序。 戴震所完成的并不是一项小成就或仅仅是一项证据分析。 在戴震的案例中，他利用早期现代数学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日期定位。 这使他能够发现以前未知的证据和模式。 尽管现代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已经驳斥了一些戴震的发现，但他的成就在于他能够将儒家时间性的新维度融入清代的领土绘图中。

纪云对技术领域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努力支持他们。 纪昀对技术领域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努力支持他们。 他也精通皇室政治，并了解到许多官员，包括齐的迫害，都是由于文学审查而导致的倒台。 在纪昀的学者和朋友圈中，许多人也对这些技术领域有深厚的了解。 尽管戴震没有任 戴震期望在保持儒家体系的真实性、可信度和完整性的同时，将数学天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无缝地融入古代世界的宇宙、语言和制度中。 戴震是18世纪中国的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中国知识现代性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震于1777年去世，但纪云圈继续遵循戴震的高标准，激励许多学者追求。 这样的追求之一就是探索黄河的源头。

## 纪云圈的《源头》创作：

自从从中亚回来后，纪昀开始着手编纂《四库全书》。这是一部庞大的图书收藏，他们尽可能地找到了许多书籍来建立一个皇家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设在七个亭子里。 历史学家们研究了纪昀在建立皇家图书馆方面的领导作用以及他对清朝皇权的服务。 关于清朝皇权与儒家官僚制度之间关系的两个重要论点至关重要。 首先，重建了中国所有过去的知识、信息和遗产的皇家图书馆，巩固了清朝皇权与儒家官僚之间的关系。 首先，皇家图书馆，重建了中国所有的过去的知识，信息和遗产，巩固了清朝皇权和儒家官僚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收集皇家图书馆的过程中，清朝皇权清除了任何反满洲的语言，段落或书籍。 关于清朝皇权与儒家官僚制度之间关系的两个重要论点至关重要。首先，皇家图书馆，重建了中国所有的过去知识、信息和遗产，巩固了清朝皇权与儒家官僚制度之间的关系。其次，清朝皇权在收集皇家图书馆的过程中，清除了任何反满洲的语言、段落或书籍。文学审查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度进行，微妙地深入研究来自全中国的大量文本。 在这种背景下，纪昀圈开始撰写《黄河源流略》。

《黄河源流简志》是一部非凡的著作。 但令我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历史学家关注过它，更不用说分析它了。 这份文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是在清朝扩张的顶峰时期产生的。 《黄河源流简志》是一部非凡的文本，但令我惊讶的是，尚未有历史学家关注过它，更不用说分析它了。这份文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是在清朝扩张的高峰期产生的。我们将看到，《黄河源流简志》不仅提供了清朝对内外领土联系的地缘政治视角，还揭示了纪昀及其同事如何与乾隆皇帝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然而，尽管纪昀在清朝的高级文化和政治中是一个多彩而传奇的人物，但他在记录黄河源头的历史地理方面的领导作用几乎没有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关注。 乾隆皇帝赞同并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

纪云圈，是在纪云的指导和赞助下的一群受人尊敬的学者，他们共同创作了《黄河源头简明记录》。 这本书不仅记录了该地区的历史地理，还解决了关于水道制图的有争议的辩论。 此书不仅记录了该地区的历史地理，还解决了关于水道制图的有争议的辩论。此外，它在学者中激发了对中亚地理的新兴兴趣。 这本书是一部力作，总结了乾隆皇帝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新近获得的清帝国的外部和游牧领域（番部）与内部和农业领域（统部）连接起来。 清帝国有一个巧妙的策略，即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大陆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如青藏高原，天山山脉的南北地区，以及南部的塔林盆地）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 这有助于维护领土的连贯性，并导致了新疆，也被称为“新疆”的创建。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新的探索时代，通过沿着中国著名的黄河进一步上游进行调查。 这本书是一部力作，总结了乾隆皇帝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将新近收入版图的清帝国的外部游牧领地（繁部）与内部农业领地（统部）相连。清帝国有一个巧妙的策略，即在中国人口密集的大陆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如青藏高原，天山山脉的北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南部的塔林盆地）之间建立强大的联系。这有助于维持领土的连贯性，并导致了新疆的创建，也被称为“新领土”。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新的探索时代，通过进一步沿着中国著名的黄河上游进行调查。本章重点介绍了现代中国共和国认为至关重要的源头的早期探索，并探讨了其政治文化。

在1782年，乾隆皇帝开始寻找黄河的源头。 在1782年，乾隆皇帝开始寻找黄河的源头。整个行动是由于无法将陕西省青龙港的两条黄河流合并而启动的。 在陕西省对上游的管理不善可能会对黄河的下游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能导致其危险地转移，对华北平原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在工程项目进行管理上游的同时，乾隆皇帝发起了一项文化倡议，并指示阿米塔，满洲大参议阿贵的儿子和忠诚的皇家卫士，带领一支队伍前往青海（科科诺尔）寻找黄河的源头。 许多人相信，向源头进行仪式会平息并安抚黄河的精神。

在1730年，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1730年，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有长达三十六天的时间，黄河的水变得清澈，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黄河通常会带有黄色的泥土，使其呈现浑浊的外观。 在1730年，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长达三十六天，黄河的水变得清澈，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黄河通常会带有黄色的泥土，使其看起来浑浊。清朝将此视为吉兆，雍正皇帝选择在西宁建造一座庙宇，以纪念河神。 最初，雍正皇帝计划在黄河源头附近建造这座寺庙，但他意识到追溯到昆仑山的河流是具有挑战性的。 因此，他选择在位于青海（科科诺尔）湖东部的西宁建造这座寺庙。 阿米塔在西宁为河神进行了一次仪式。 然而，乾隆皇帝对于向河神进行仪式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所以事情还没有结束。 皇帝的目标是超越他祖父发现黄河源头的壮举。 1708年，康熙皇帝派遣由皇家卫队拉西领导的后勤团队去调查黄河的源头。 根据拉西的报告，黄河的源头位于海拔超过4000米的兴苏海盆地。 这比被认为是中国五大名山中最重要的泰山还要高。 "星宿海"的名字意为“星座海”。星宿海是一个狭长而细长的盆地。 从空中俯瞰盆地的景色令人惊叹。 在明亮的阳光下，一群小湖泊闪闪发光。 皇家卫兵拉西可以从附近山顶上看到这个壮观的景象。 他认为这个特殊的地方非常适合作为黄河源头的位置，并向康熙皇帝进行了汇报。

另一方面，阿米塔的团队被赋予了一个军事后勤任务，执行一项仪式，找到黄河的源头，进行大地测量，并创建一个详细的区域地图。 另一方面，阿米塔的团队被赋予了一个军事后勤任务，执行一项仪式，找到黄河的源头，进行大地测量，并创建一个详细的区域地图。 另一方面，阿米塔的团队被赋予了一个军事后勤任务，执行一项仪式，找到黄河的源头，进行大地测量，并创建一个详细的区域地图。 阿米塔指出了兴苏海盆地西南方的一条河流，蒙古人称之为“金河”。 这条河流长300里，汇入黄河的兴苏海盆地上游。 Amita还提到了金河以西的一块巨大的岩石，蒙古人称之为北极星岩，它高耸入云。 在岩石的顶部有一个天池。 池塘上方流出的金色水流入了金河。 根据阿米塔的说法，天池是黄河的真正源头。

阿米塔的报告成功找到并赞美了黄河的源头，这让乾隆皇帝印象深刻，甚至为此写了一首诗以表彰这一成就。 然而，如果皇帝没有要求纪云圈为他们的探险创作历史记载，这可能只是清朝朝廷的一次表面现象。 这份记录记录了过去的成功和错误，最终导致皇帝在最后庆祝成功。 这份记载是《黄河源头简明记录》，于1782年出版。 这本书以官方语言写成，包含了从大地测量和使用经纬度网格线进行河流跟踪收集的信息。 这本书以官方语言撰写，包含了从大地测量和使用经纬度网格线进行的河流跟踪中收集的信息。 这本书还解释了为什么清朝领土的“外域”，也就是源头所在地，在成为清朝领土之前已经被探索了几个世纪。 这个象征的重要性无法被过分强调。 这本书《黄河源流简志》从技术角度阐述了探索黄河源头如何帮助巩固清朝领土的内外疆域。

《黄河源流简志》（以下简称《黄河源流》）有几位来自纪昀圈子的作者，可能是在纪昀的指导和乾隆皇帝的指示下完成的。 《黄河源流简志》（以下简称《黄河源流》）有几位来自纪昀圈子的作者，可能是在纪昀的指导和乾隆皇帝的指示下完成的。 因此，他们的描述基于谣言和猜测，包含了许多错误。 因此，纪昀阐述了写这本书的理由，并概述了编写它的以下基本原则。 纪昀表示，许多讨论源头的作家实际上从未访问过它所在的地方。因此，他们的描述基于谣言和猜测，包含了许多错误。这就是为什么纪昀阐述了写这本书的理由，并概述了编写它的以下基本原则。据纪昀说，水道很复杂，必须用地图来说明。 旧地图上充满了错误和不准确之处。 黄河源头的大地测量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这些调查被记录在一本名为《西域图志》的书中，由刘同逊编写，以纪念准噶尔战役，并基于中亚的大地测量。 这些调查的权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完成黄河源头的测量标志着清朝领土扩张的顶峰和全面的大地测量。 目标是消除帝国内外领土之间的任何区别。 “大一统”的含义在清朝完成上述行动，维护内外疆域领土完整性后变得有意义。

黄河源头的位置是基于已经开发和详细记录在《西域文献与插图》中的地图。 黄河源头的测量是基于已经开发和详细记录在《西域文献与插图》中的地图。所有的测量，包括那些在《西域文献与插图》中带有纬度和经度数值结果的章节，都是基于大地测量的实证数据。 然后，黄河错综复杂的水道被绘制在地图上。 当前的地名用红墨标记，而较旧的地名则用黑墨标记。 在黄河源头提到的任何历史名称都被圈出，以显示以前的错误是如何犯下的。 此外，纪昀将黄河的每一条支流进行了统计，包括不同的支流如何汇合、分离、地下流淌和重新出现。 数据按行排列，首行列出了河流及其运动，其后的行显示了新的河流加入它们。

就源头的历史记载而言，吉云圈引入了三个有趣的类别，分别称为“质实”（Zhishi）、“证古”（Zhenggu）和“辨伪”（Bianwei），这些都可能没有儒家含义。 在源头的历史记载中，纪昀圈子引入了三个有趣的类别，分别是“质实”（Zhishi）、“证古”（Zhenggu）和“辨伪”（Bianwei），这些都可能没有儒家含义。对于质实，纪昀旨在消除儒家读者之间的任何不确定性。 在源头的历史记载方面，纪昀圈引入了三个有趣的类别，分别是“质实”（Zhishi）、“证古”（Zhenggu）和“辨伪”（Bianwei），这些都可能没有儒家的含义。对于质实，纪昀的目标是消除儒家读者之间的任何不确定性。他通过采用《水经》和李道元注释的传统惯例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涉及识别河流沿线的地名并叙述它们之间的路径。 在对源头历史记载的描述中，纪昀圈引入了三个有趣的类别，分别是“质实”（Zhishi）、“证古”（Zhenggu）和“辨伪”（Bianwei），这些都可能没有儒家的含义。对于质实，纪昀的目标是消除儒家读者之间的任何不确定性。他通过采用《水经》和李道元注释的传统惯例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涉及到识别河流沿线的地名并叙述它们之间的路径。纪昀利用古人的传统和受人尊敬的格式来说服他的儒家听众，河流路线和地名是通过实证证据验证的。 所有的河流路线都被准确地识别出来，并与古代经典的格式相一致。 纪昀使用“现实”一词，是指对河流路径的实际观察和对儒家经典的验证。 换句话说，要被认为是真实的，它必须具有其存在的空间和时间证据。

纪昀引入了第二个类别，“过去的验证”。他声称关于黄河源头的描述和讨论中只有20%是正确的，其余80%是不准确的。 尽管过去的描述主要是不正确的，但纪昀并不想完全忽视它们。 纪昀引入了第二个类别，“过去的验证”。他声称关于黄河源头的描述和讨论中只有20%是正确的，其余80%是不准确的。尽管过去的描述主要是不正确的，纪昀并不想完全忽视它们。一个类别被创建出来，用于筛选数据并确保历史记录中关于黄河源头信息的准确性。 纪昀引入了第二个类别，“过去的验证”。他声称关于黄河源头的描述和讨论中只有20%是正确的，其余80%是不准确的。尽管过去的描述主要是不正确的，纪昀并不想完全忽视它们。他创建了一个类别来筛选数据，确保历史记录中关于黄河源头的信息的准确性。纪昀从各种可靠的来源收集信息，包括《史记》、《汉书》以及18世纪作家如胡渭和严若聚的最近的记载。 纪昀仔细核实了任何值得信赖的信息，并仿照张明峰在《桂胜》和《桂古》中精炼的地理著作的例子。 这涉及列出原始文本并验证文本记录和实证测量的准确性，以确定当前位置。 这就像戴震之前所完成的那样，从过去进行验证。 纪昀仔细核实任何可信的信息，并遵循张明峰在《桂胜奇观》和《桂古地理》中精炼的地理著作的例子。这涉及列出原始文本并验证文本记录和实证测量的准确性，以确定当前位置。这种从过去的验证就像戴震之前所完成的一样。戴震的遗产在黄河源头继续存在。 第三类，“辨识虚假”，与之前的“从过去验证”有所不同。在之前的类别中，纪昀只关注正确的陈述，但在当前的这一类别中，纪昀关注的是关于源头的错误陈述。 在过去，据纪云所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使学者们感到困惑。 一些学者顽固地坚持过时的教条，不愿改变，导致了谎言的滋生。 纪云列出了原文，并解释了为什么某些陈述是不真实的。 这是为了帮助儒家读者理解为什么有许多错误的解释。

上述三个分析类别经常被误导性地标记为“证据分析”。这种误称忽视了戴震和纪昀在处理地理问题时，预设地球是真实且球形的，而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帮助他们在地球上绘制河流。 上述三个分析类别经常被误导性地标记为“证据分析”。这种误称忽视了戴震和纪昀在处理地理问题时，预设地球是真实且球形的，而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帮助他们绘制了地球上的河流。此外，黄河源头的建设取决于清朝领土扩张的两个特定条件。 以上三个分析类别经常被误导性地标记为“证据分析”。这种误称忽视了戴震和纪昀在处理地理问题时，都是基于地球是真实且球形的假设，而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帮助他们绘制了地球上的河流。此外，黄河源头的建设依赖于清朝领土扩张的两个特定条件。因此，纪昀的圆圈相应地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 首先，纪昀圈强调了理解蒙古名字和中亚文化的重要性，以避免中国学者过去所犯的错误。 这种世界主义的态度与明朝的态度有所不同。 因此，纪云圈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首先，纪云圈强调了理解蒙古名字和中亚文化的重要性，以避免中国学者过去的错误。这种世界主义的态度与明朝的态度有所不同。其次，纪云圈强调了对中亚的古代术语的发明和创造，这在古代历史文献中被称为“西域”。 首先，纪云圈强调了理解蒙古名字和中亚文化的重要性，以避免中国学者过去犯的错误。这种世界主义的态度与明朝的态度不同。其次，纪云的圈子强调了对中亚的古代术语的发明和创造，这在古代历史文献中被称为“西域”。将中亚归类为“西域”很重要，因为它避免了与野蛮人的任何负面关联，不像吐蕃这个词。 此外，它传达了一种历史感和崇敬感。

残酷的战斗，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高昂的开支，这些都是清朝疆域扩张的特点。 "西部地区"包括了几乎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大片土地 它包含许多地理特征，包括可能指的是在汉代官方历史中提到的神秘山脉的昆仑。 在西部地区，有许多种语言。 其中，蒙古语是主导语言。 翻译手册是使用标准等效词汇编写的。 在句子的底部注释了翻译过的名字，并注意到古代书籍中音译词的大量出现。 纪昀利用了1763年编写的《西域通文志》这本标准翻译手册。 这有助于避免在中亚使用历史上不一致且令人困惑的地名。 除了清朝对蒙古语和地名，穆斯林和维吾尔习俗，以及中亚地理的尊重和宽容，纪昀的《纪氏演义》遵循历史惯例来应对异国的“西域”。你可能会发现《七十一》如何接受和描绘蒙古传统的方式很有趣。 清朝官员不再将西部地区视为未开化的地方。

## 结论：

要理解黄河在中国的重要性，人们可以观察黄河钢琴协奏曲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出色表演，例如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 要理解黄河在中国的重要性，人们可以观察到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如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时，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出色表演。这展示了黄河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重要性。 要理解黄河在中国的重要性，可以观察到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如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时，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出色表演。这展示了黄河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重要性。黄河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强大象征。 要理解黄河在中国的重要性，人们可以观察到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如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时，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出色表演。这展示了黄河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重要性。黄河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强大象征。它代表了在日本侵略下的苦难和羞辱，以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韧性和重生。 这条河让中国人民想起了他们的起源和他们所克服的一切，但它也指向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黄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崛起的形象：一个坚韧、决心和意志的象征。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科学院派遣了一个地质队伍去探索并确定黄河源头的位置。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科学院派出了一个地质队，一劳永逸地探索并确定了黄河的源头。他们在清朝前辈的工作基础上，以惊人的精确度和细节进一步确定了源头。 如今，你可以参观位于青藏高原的源头地标。 你也可以参观长江源头的类似的显著地标。 它已经成为了民族性和中国超验价值的象征。 在中国采纳民族概念之前，就有文献记录了黄河源头的重要性。 这发生在清帝国领土扩张的最后阶段，确保了清朝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追溯黄河，自中国文明开始以来就为人所知，其源头在青藏高原，这是一个极其引人入胜的故事。

# 第五章：巩固内外境界

这本名为《地球图说》的书为地方学者提供了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简化理解，为儒家官僚体系内外的人们重新评估“天下”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本书是为了让儒家学者更容易理解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真诚努力。 前一章探讨了清朝帝国在试图主导地缘政治知识时遇到的挑战，以及纪昀的“圆”如何与清朝君主共同发展出共享的地缘政治视野。 本章深入探讨了阮元的圈子如何倡导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使其原理更易于本地学者理解。 《地球图说》展示了根植于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最易理解的全球观。 承认地球为球形意味着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或中华思想将不可避免地消退。 然而，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种新发现的地球观念如何在政治上理解？清朝的内外疆域之间是否可以有明确的区别？

## 米歇尔·贝诺伊斯特的工作：

在1745年，法国耶稣会士米歇尔·贝诺伊斯特（1715-1774）抵达北京，自我介绍为一位精通数学的人。 在1745年，法国耶稣会士米歇尔·贝诺伊斯特（1715-1774）抵达北京，自我介绍为一位精通数学的人。他很快就被征召参加了第一次金川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在环境上具有挑战性，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边疆金川地区，以两条河流穿越的高耸山脉为特征。 当地的土著人民，说着与藏语不同的嘉绒语，已经反抗清朝。 作为回应，大学士阿桂领导了这场战役，并招募了两位耶稣会士，米歇尔·贝诺伊斯特和费利克斯·达罗查，利用他们的技术专长。 这次行动在环境上具有挑战性，位于上游长江（四川）盆地的边疆，即金川地区，以两条河流交错的高耸山脉为特征。当地的土著人民，他们说的是与藏语不同的嘉绒语，他们已经反抗清朝。作为回应，大学士阿桂领导了这次行动，并招募了两位耶稣会士，米歇尔·贝诺伊斯特和费利克斯·达罗查，利用他们的技术专长。他们的任务是测量穆拉穆拉山，并在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确定对抗反叛力量的火炮部署的最佳位置。 因此，在1747年，贝诺伊斯特开始在清军中服役，担任一个谦逊的角色——供应商。

就像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乾隆皇帝也从欧洲招募了熟练的耶稣会士来使世界地图现代化，坚持利玛窦的基本范式，将清帝国置于全球背景之中。 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乾隆皇帝也从欧洲聘请了熟练的耶稣会士来使世界地图现代化，坚持利玛窦的基本范式，将清帝国置于全球背景之中。同时，清朝君主在重新定义和重塑世界地图以描绘他们的领土扩张方面保持坚定。 而不是将更新世界地图的重要任务交给儒家官僚，清朝君主一直依赖耶稣会传教士来完成这样的角色。 费尔比斯特通过向康熙皇帝介绍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提升了他的世界地图在耶稣会传统中超过利玛窦的重要性。 此举为清朝使用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创建世界地图和进行大地测量设立了重要的先例。 在这项工作中，米歇尔·贝诺伊斯特进入了皇帝的视野。 受到耶稣会传教士展示的凡尔赛喷泉图像的启发，乾隆皇帝在1747年第一次金川战役结束后，委托他为圆明园设计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水喷泉，喷泉上装饰有中国生肖雕塑。 在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并向皇帝阐明水力学原理后，贝诺瓦赢得了皇帝的青睐和信任。 在1767年的一封信中，贝诺瓦解释说皇帝已经委托他在皇家园林中建造一个“欧洲宫殿”（也被称为西洋楼）。 这座独特的建筑结合了巴洛克、文艺复兴、法国和洛可可风格的元素，由耶稣会士设计，由皇家熟练的劳工和工匠建造。 贝诺瓦在1767年接替朱塞佩·卡斯蒂廖内（1688-1766）担任欧洲宫殿的主要建筑师。 这座完成的建筑成为花园内的一处显著特色。 在完成这项成就后，贝诺瓦开始承担创建皇家地图的重要任务。

乾隆皇帝早在1767年就任命贝诺瓦为制造司（造办处）内制图团队的负责人，特别是在皇室内部备受尊重的养心殿。 乾隆皇帝在1767年就任命Benoist为制造司（造办处）内制图团队的领导，特别是在备受尊重的养心殿（皇室内务部）中。Benoist的职责是监督康熙地图集的扩展，重点是绘制包括中亚在内的经纬度网格地图。 在这个制图过程中，他勤奋地整合了地理调查的最新发现，包括新发现的国家，同时删除了与实际情况不再一致的过时内容。 此外，Benoist撰写了一份内容丰富的手稿，涵盖了地球、彗星以及最新发现的各个方面。 此外，贝诺瓦从维尔比斯特的早期作品中汲取灵感，制作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 这幅地图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贝诺瓦在1771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岁生日而送的礼物。 乾隆皇帝对这一盛大的礼物和珍贵的礼品表示满意，对这幅壮丽的世界地图表示深深的满意。 在收到贝诺瓦的世界地图作为庆祝礼物后，乾隆皇帝立即下令在宫殿内保存多份副本。 此外，他确保新发现的地图内容被纳入到皇家全球地图中。 此外，他确保新发现的地图内容被纳入皇家全球地图中。

贝诺伊斯特的世界地图取得了成功，皇帝要求更新有关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具体情况。 遵循皇帝的指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何国宗和翰林院编修钱大昕与贝诺瓦合作，根据他的杰出世界地图创作了一部精致而文学性的作品。 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就是名为《地球图解》的手稿。 尽管这本书非常重要，但它在清朝朝廷内保持了二十年。 根据皇帝的指示，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何国宗和翰林院编修钱大昕与贝诺瓦合作，根据他的卓越世界地图创作了一部精致而文学性的作品。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就是名为《地球的插图和解释》的手稿。尽管这本书的意义重大，但它在清朝宫廷内保持了二十年。希望找到适当的机会和背景最终发布，这在1799年实现了。

## 阮元的轨迹：

阮元，1764年2月21日出生于扬州，来自一个在学术和军事上都有杰出背景的家庭。 他的祖父阮玉堂在1715年通过了武举考试，并有着杰出的军事生涯。 与此同时，他的父亲阮成新接受了古典教育，他的母亲来自富裕的林家，擅长诗词和书法。 阮元，1764年2月21日出生于扬州，来自一个在学术和军事上都有杰出背景的家庭。他的祖父阮玉堂在1715年通过了武举考试，享有杰出的军事生涯。与此同时，他的父亲阮成信接受了古典教育，他的母亲来自富裕的林家，擅长诗词和书法。阮家世代富裕，政治影响力大，他们的网络中心位于扬子江下游的扬州都市区，与纪昀的家庭不同，后者的根源在北京。

在1775年，和珅（1750-1799年）从皇家卫队迅速晋升为大学士，这让清朝的官僚们既敬畏又嫉妒他的成就。 在1775年，和珅（1750-1799年）从皇家卫队迅速晋升为大学士，使清朝的官僚们对他的成就既感到敬畏又嫉妒。他的崛起源于各种因素，如他在结盟和处理对手方面的熟练。 仅仅26岁，他已经精通清朝的四种语言——满语，蒙古语，藏语和汉语。 此外，和珅还担任乾隆皇帝的财务经理，并在权力内圈中担任了极其重要的信任职位。 此外，乾隆皇帝还委托他负责重大文化项目，包括《大清会典》。 他的管理技能为清朝的边疆扩张筹集了资金，并为他的家庭积累了大量财富。 他精通四种中亚语言，且拥有敏锐的财务头脑，使他成为清朝内部极为成功的金融家。 清朝的朝廷，由纪昀和和珅的影响力网络主导，这就是阮元进入的制度背景。

对他即将走的路毫无所知的阮正在准备留下自己的印记。 他并不知道他的旅程很快就会与和珅的主导政治影响力交织在一起，这使他后来的抱负变得模糊。 阮的教育之旅在他四岁时就开始了，那时他的母亲教他读写。 他在四岁时就开始接受教育，他的母亲教他读书写字。在1769年，他五岁时，他进入了一所私立宗族学校，在那里他与扬州的著名学者交流和学习。 1779年，他第一次在县级考试中失败，这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事件反而使他与像凌廷堪（1757-1809）和焦循（1763-1820）这样的知识分子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在1781年，阮在他的母亲去世后面临了一段哀悼期。 然而，在1784年，他通过了县级考试，被允许进入仪征县学校。 然而，在1784年，他在县考中成功，这使他进入了仪征县学校。两年后，即1786年，阮元在省考中表现出色，促使他踏上了前往北京参加京考的旅程。 尽管他的第一次尝试并未成功，但阮的父亲建议他留在首都，为即将到来的京都考试做准备。 在此期间，阮与许多知名学者进行了广泛的通信，并有机会亲自与他们见面。 他与戴震的崇拜者和纪昀圈子的三个人建立了友谊：邵晋涵（1794-1796）、王念孙（1744-1832）和任大椿（1738-1789）。

在北京面临最初的挑战后，阮在二十五岁时的第二次尝试中取得了成功。 在北京面临最初的挑战后，阮在二十五岁时的第二次尝试中取得了成功。 他在通过殿试后，于1789年在备受尊重的翰林院获得了一份有前途的年轻学者的职位。 这项成就绝非易事，考虑到通过省级考试的几率不到1%，而在京城考试中表现出色的几率更是罕见，不到0.01%。 阮的成功源于他的声望积累、天赋、努力工作和幸运环境的完美结合。 这个显著的成就将标志着他生活的转折点，使他与乾隆皇帝朝廷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和珅建立联系。 在1789年，和珅和彭元瑞（1731-1803年），人事部部长，被任命为翰林院内的初级学者的领导。 在他们在学院的时间里，和珅成为了阮元的导师，巩固了他们的职业关系。

在和珅四十岁的生日庆典上，翰林学者们对他的看法不一，有些人反对他并在松云寺组织了一次聚会。 阮发现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情绪中，最初参加了反对和珅的聚会，但最终被诱惑离开，前往和珅的府邸。 在那里，他向和珅介绍了自己，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和珅礼貌地欢迎他，并对他成为当天的第一位客人表示感谢。 在这段时间里，阮公公开与和珅结为朋友，与这位有影响力的大参议员建立了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阮公开地与和珅建立了联系，与这位有影响力的大参赞形成了联系。

在1796年，乾隆皇帝选择退位，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这使得和珅在这次权力交接中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 尽管知道乾隆即将去世，和珅仍然忠诚于年迈的皇帝。 然而，新的统治者嘉庆对和珅强烈反对。 在1796年，乾隆皇帝选择退位，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这使得和珅在这次权力交接中处于危险的位置。尽管知道乾隆即将去世，和珅仍然忠诚于年迈的皇帝。然而，新的统治者嘉庆强烈反对和珅。一旦乾隆去世，嘉庆迅速剥夺了和珅的权力，并强迫他用一条白色丝带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一事件标志着和珅派在朝廷的崩溃，也是阮的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与他过去在朝廷错综复杂的政治中与和珅的关联直接相关。

从1796年到1805年，清朝在湖北西部、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内陆）等地区面临着由白莲教千年主义组织的农民起义。 由于这场叛乱的爆发，乾隆皇帝刚刚将皇位让给年轻的嘉庆皇帝，他缺乏真正的力量来领导对白莲教的战役。 相反，乾隆皇帝依赖和珅来监督军事行动。 最初，和珅认为这次叛乱的地理范围和强度不足以威胁清朝的基础，他认为白莲教的教义对清朝的合法性并无威胁。 然而，他在战争的财务方面处理不当，导致军费的大量浪费和欺诈。 然而，他在战争的财务方面处理不当，导致军费浪费和欺诈严重。因此，白莲教战争对清朝帝国来说变成了一场灾难，不仅因为它带来的财务负担，还因为它暴露了清朝绿营军队的根本弱点，以及在农民战争中将平民作为战斗人员的做法。 白莲教起义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内陆已经经济停滞，不像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那样繁荣。

与和珅的倒台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大清盛世通鉴》的出版。 康熙皇帝早在1672年就发起了这项人文地理计划，即《大清大同文献》。 该项目耗时较长，因为它严重依赖于皇家大地测量。 作为对皇家领土的详尽地理记录，这部编纂集成了从蒙古元朝和中国明朝继承下来的各种模板。 1740年12月，第一版完成的《大清一统志》首次呈现给乾隆皇帝。 它在1751年在五音宫进行了限量印刷。 在出版后不久，清朝在中亚对准噶尔蒙古人发动了一场战役，导致领土大幅扩张。 因此，《大清一统志》在1762年进行了修订，以纳入中亚的大地测量，并容纳《皇朝西域图志》的内容。

大联盟文档包括各种类别的模板，如行政、景观、风俗、城市、皇家学校、户籍、税收、官员、山脉、古迹、水道、桥梁、堤坝、关键通道、要塞、官方墓地、寺庙、著名学者、贞洁女性、重要的道教和佛教僧侣，以及土特产。 大联盟文档包括各种类别的模板，如行政、景观、风俗、城市、皇家学校、户籍、税收、官员、山脉、古迹、水道、桥梁、堤坝、关键通道、要塞、官方墓地、寺庙、著名学者、贞洁女性、重要的道教和佛教僧侣，以及本土产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地理。 这种人文地理学似乎是建立在过去的模板上的，但它从大地测量中获得了新的可扩展性。 该文档还根据已经军事保障并纳入的地区建立了领土单位，被称为“统部”，与已经军事巩固但仍在等待纳入行政系统的地区形成对比，这些地区被称为“藩部”。 这两个区域依赖于大地测量的准确性来进行领土规模的划分，并以同样宏伟的地图呈现出来。 1785年，负责人文地理项目的大学士和珅向乾隆皇帝呈交了第二版，包括新疆（新征服的中亚地区），此后被称为和珅版。 五音宫出版了这个版本三次，它也被复制并分发到了皇家图书馆的七个馆，被称为四宝全集。 因此，它已经广泛地为学者和官员所接触。

乾隆皇帝在1799年去世后，反对和珅的派系主张修订《大同文献》。 乾隆皇帝在1799年去世后，反对和珅的派系主张修订《大同文书》。 乾隆皇帝在1799年去世后，反对和珅的派系主张修订《大同文书》。嘉庆皇帝（在位1796-1820年），作为和珅的检举人，支持了这个想法。 到1839年，第三版和最后一版正在准备中，但是第一次中英战争（也被称为鸦片战争）打断了这个过程。 满族大臣穆章嘎（1782-1856年）于1842年11月将这第三版呈现给道光皇帝，此后被称为穆章嘎版。 然而，这个版本从未进入印刷。 在十九世纪初，道光萧条导致了经济挑战和社会动荡，给清朝带来了财政短缺。 满族大参议穆江嘎（1782-1856）于1842年11月将这第三版呈献给道光皇帝，此后被称为穆江嘎版。然而，这个版本从未进入印刷。在十九世纪初，道光萧条导致了经济挑战和社会动荡，给清朝带来了财政短缺。地方和地方精英普遍娱乐性地使用鸦片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社会经济动荡。 然而，这个版本从未进入出版社。 在十九世纪初，道光萧条导致了经济挑战和社会动荡，给清朝带来了财政短缺。地方和地区精英普遍娱乐性地使用鸦片，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社会经济动荡。因此，木讲歌版本的发布被暂停。和珅和木讲歌的《大清一统志》版本都是与帝国范围内的大地测量有关的广泛且严谨的过程的产物。

和珅版本在十九世纪广泛流传于精英阶层和儒家行政阶层。 和珅版本在十九世纪广泛流传于精英阶层和儒家行政阶层。 这种知识好奇心的激增在历史学家中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尽管这个运动在十八世纪的历史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鲜为人知。 这种对知识的强烈好奇心在历史学家中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尽管这个运动在十八世纪的历史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鲜为人知。以前被搁置的牡丹江版本现在可以用于历史研究。 随着和申版的广泛传播和牡腌嘎版的发展，中亚的地缘政治问题在首都的学者和官员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这种知识好奇心的激增在历史学家中有很好的记录，尽管这个运动在18世纪的历史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鲜为人知。以前被搁置的牡腌嘎版现在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最近，经过适当的标点和校对的现代版牡腌嘎版已经完整地出版，共30卷，于2022年12月出版。 现代历史学家继续将其誉为传统历史地理学最全面、最可靠的来源。

此外，皇家工坊制作的省级和帝国地图需要在省级行政长官以下的儒家官僚机构中传播。 康熙地图册（铜版印刷）直到1929年才在其原始地点，即沈阳故宫中被发现。 因此，在整个清帝国的历史中，儒家官僚需要更多地了解康熙地图册以及雍正和乾隆统治期间产生的后续扩展。 因此，这些地图专门为军事和后勤用途创建，并相对保密，阻止了任何直接源于这些大地测量和地图的知识和文化讨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官僚的上层阶级，包括省长或伊犁指挥官（军事长官），对这些地缘政治信息一无所知。 他们，的确，对此有所了解。 这些地图是专门为军事和后勤用途创建的，并相对保密，不让文官知道，从而阻止了任何直接源于这些大地测量和地图的知识和文化讨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官僚机构的高层，包括省长或伊犁指挥官（军事长官），对这些地缘政治信息一无所知。他们确实对此有所了解。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试图在儒家官僚机构内部传播这些地缘政治信息，完全意识到他们可能会遇到的知识和文化抵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官僚体系的高层，包括省长或伊犁指挥官（军事长官），对这种地缘政治信息一无所知。他们实际上对此非常清楚。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在儒家官僚体系中传播这种地缘政治信息，充分意识到他们可能遇到的知识和文化抵抗。这个主题正是阮的《地理图解》所讨论的。

1799年对阮元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从清朝朝廷转向省级治理。 1799年对阮元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从清朝朝廷转向省级治理。在清朝朝廷参加了已故乾隆皇帝的皇家葬礼后，他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新职务。 1799年对阮元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从清朝朝廷转向省级治理。他在清朝朝廷参加了已故乾隆皇帝的皇家葬礼，然后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新职务。这一年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不仅对他个人，也对他重塑中国帝国的知识和政治历史。 他非常尊敬乾隆皇帝，认为他是儒家学问和文化在其赞助下前所未有地繁荣的典范儒家君主。 此外，他的统治还催生了新的学术领域和研究领域，将古典解释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深度。 然而，如阮所述，乾隆时代的结束至少暗示着这个辉煌时代的暂时停滞，他为这个充满文化活力和学术进步的非凡时期的即将结束而感到悲痛。 对于阮来说，乾隆皇帝的去世结束了一个对中国知识和文化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辉煌篇章。

阮元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这个信息，以免冒犯在位的嘉庆皇帝。 被古典知识的热情驱使，阮元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 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纪念和概括中国古代不懈追求和发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过去的千年里被异端、误解、伪造、不真诚和出于恶劣政治或自私动机的故意挪用所掩盖。 阮元在他的追求中，引入了一种新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来阐述关键的历史模型和例子，为理解古典知识的传播和保存设定了新的标准和方向。 由对古典知识的热情驱使，阮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纪念和总结中国古代不懈追求和发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过去的千年里被异端、误解、伪造、不真诚和故意为了邪恶的政治或自私动机而被淡化。在他的追求中，他引入了一个新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来阐述关键的历史模型和例子，为理解古典知识的传播和保存设定了新的标准和方向。由这种深深的责任感驱使，阮对古典学术和方法的奉献和赞助后来会显现出来。 然而，此刻，他在清朝朝廷中的职位，作为户部侍郎和皇家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所长，使他能够在即将离任之前启动两项紧迫的任务。 首先，他编写了一部全面的数学天文学家（周人）的历史。 同时，他在1799年赞助出版了《地理图说》。

## 地球的插图和解释：

在《地理图说》一书中异常漫长的序言中，阮氏首先提出，来自西洋（欧洲人的代名词）的人们在理解天地原理方面具有非凡的专业知识。 在《地理图说》这本书中异常长的序言中，阮先生首先提出，来自西洋（欧洲人的代名词）的人们在理解天地原理方面具有非凡的专业知识。然而，他们的知识已经被暗示在中国的古代。 在《地理图说》一书中异常漫长的序言中，阮氏首先提出，西洋人（欧洲人的代名词）在理解天地原理方面具有非凡的专业知识。然而，他们的知识已经被暗示在中国的古代。学者们既不应盲目接受它，因为它是新的，也不应仅仅因为它看起来很神奇就抛弃它。 在《地理图说》一书中异常漫长的序言中，阮氏首先提出，西洋人（欧洲人的代称）在理解天地原理方面具有非凡的专业知识。然而，他们的知识已经被暗示在中国的古代。学者们既不应盲目接受它，因为它是新的，也不应仅仅因为它看起来很神奇就抛弃它。两种极端立场都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这个论点主要针对的是儒家官僚和学者，因为清朝君主已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耶稣会的科学。 然而，深深植根于传统知识和观念中的儒家学者，需要帮助才能接受耶稣会数学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的基本原理。

历史学家很快注意到阮的卓越地位的出现。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种话语立场轻蔑地称为“起源神话”或“傲慢的种族中心主义”，但这种描述基本上是错误的。 阮的论点并不围绕起源或种族中心主义展开。 相反，它与伏尔泰的“宽容”概念相吻合，对来自不同或外国文化的有价值的想法或做法表示宽容。 从本质上讲，我们应该对来自可能看起来较为低等的文化的有价值的观念或做法持开放态度，甚至接纳它们。 阮的论点并不围绕起源或种族中心主义。相反，它与伏尔泰的“宽容”概念相吻合，对来自不同或外来文化的有价值的观念或做法表示宽容。本质上，我们应该愿意接受它们，即使它们来自可能看起来较为劣等的文化。阮采用了一种启发式设备，借鉴了对儒家经典的评论传统，以发现或探测不同的潜在历史模式。 这种启发式设备是学者们通过评论的媒介融入新的解释或创新理论的一种普遍趋势。 不幸的是，这种在18世纪的趋势导致一些历史学家误解中国的知识传统为基本保守或仅仅是对文本权威的盲目坚持。 戴震等人是一位开创性的思想家，他在摆脱注释传统的束缚方面面临挑战。 在阮元的圈子里，许多人都钦佩戴震，并积极寻求创新的方法来重振中国的古代文化。 他们利用评论格式来促进他们的再创新和开创性的想法。 遗憾的是，一些历史学家未能认识到这种创新形式，导致他们毫无根据地声称18世纪的中国缺乏“哲学”。

《地球插图与解释》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地球的插图和解释》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阅读后，阮对此印象深刻，认为它比早期的作品《标度说》（由意大利耶稣会士萨巴蒂诺·德·乌尔西斯（1575-1620）所著）的解释和插图要优越。 阅读之后，阮印象深刻，认为这比意大利耶稣会士萨巴蒂诺·德·乌尔西斯（1575-1620）早期的作品《标度说》的解释和插图要优秀。 这使他能够对贝诺瓦的新书提供一个见解深入的意见。 在他的评论中，阮元将贝诺瓦书中的“地球”一词和十三世纪波斯天文学家贾马尔·阿尔·迪恩创造的“地源”一词联系起来。 在1271年的蒙古元朝时期，忽必烈汗设立了一个伊斯兰天文历法局和一个天文观测站，与传统的中国天文历法局并行运作。 在这段时间里，贾马尔·阿尔·迪恩在编写一部波斯语的天文手册（带有表格的天文手册）中发挥了作用，该手册纳入了新观察到的行星参数，并在明朝初期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回回历法》。 在他的评论中，阮元将贝诺瓦书中指代地球的“地球”一词，与十三世纪波斯天文学家贾马尔·阿尔·迪恩创造的“地源”一词联系起来。在元朝时期的1271年，忽必烈汗设立了一个伊斯兰天文历法局和一个天文观测台，与传统的中国天文历法局并行运作。在此期间，贾马尔·阿尔·迪恩在编写一本波斯语的zīj（一本带有表格的天文手册）中发挥了作用，该手册融入了新观察到的行星参数，后来在明朝初期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回回历法》。此外，贾马尔·阿尔·迪恩还与《大元大会文》有关，该文于1291年完成。 在这段文字中，中文词语“地元”被记录为用中文音译的“库来伊亚尔子”，代表波斯语中的木制地球仪。

历史学家蒂莫西·布鲁克在《伟大的国家》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木制地球仪的重要性，现在这个地球仪已经成为伊朗的国家骄傲。 然而，布鲁克并不知道，阮早在1799年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全球联系。 对地球仪的早期表现引起了阮的兴趣，使他相信这可能是耶稣会对球形地球概念的早期前驱。 事实证明，阮的直觉离真相并不遥远。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阮开始了一场辩论。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阮先生首先发表了一篇论战性的文章。他辩称，海洋和陆地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水陆球体，这是一个位于宇宙中心的球形物体。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阮先生首先发表了一篇辩论文章。他辩称，海洋和陆地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水陆球体，这是一个位于宇宙中心的球形物体。他推理说，如果地球不位于宇宙的中心，那么我们能观察到的天体球体就无法以不同的速度围绕地球旋转。 通过春分将太阳运动的天线划分为两半，每半12小时，上半部分在地平线以上，下半部分在地平线以下，这为支持地球是圆的观点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他继续解释，阮的目标是为本地学者提供直观的插图。 例如，他观察到早期的中国计时和天文学采用了一天中的十二个两小时时段，对应于六十进制的周期。 例如，他观察到早期的中国计时和天文学使用了一天中的十二个两小时时段，对应于六十干支循环。因此，这些两小时时段的命名精确地遵循了《易经》中规定的六十干支循环的原则，这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本地学者来说是熟悉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阮提供了相关的例子。 例如，他观察到早期的中国计时和天文学采用了一天中的十二个两小时时段，对应于六十干支循环。因此，这些两小时时段的命名精确地遵循了《易经》中规定的六十干支循环原则，这对当地学者在日常生活中是熟悉的。为了进一步阐明，阮提供了相关的例子。当地球上的人直接面向太阳时，就标志着“午”两小时时段。 在午夜时分，就是“子”时。 向"子"点东移三十度将表示"未"的两小时时段，向"子"点西移三十度将表示"巳"的两小时时段。 阮观察到，当测量差距为一度时，两地之间的距离等于250里。 因此，对于一个两小时的时间段，覆盖三十度，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会是7500里。

如果地球是方形的，那么上述大地测量学的原理将无效。 如果地球是方形的，那么上述大地测量学的原理将无效。 阮提出了一个重大转折，他建议大地测量学的原理最初来自西部地区（中亚），并在蒙古元帝国时期由贾马勒丁带到中国。 然而，这个观点也在古代哲学和经典描述中得到了暗示。 然而，这个观点在古代哲学和经典描述中也有所暗示。因此，贾马尔·阿尔·迪恩并没有提出新的解释。 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建议大地测量学的原理最初来自西部地区（中亚），并由贾马尔·阿尔·迪恩在蒙古元帝国时期带到中国。然而，这个观点也在古代哲学和古典描述中得到了暗示。因此，贾马尔·阿尔·迪恩并没有提出新的解释。如果贾马尔·阿尔·迪恩的创新部分地暗示了中国的古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耶稣会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借用呢？我们能够整合贾马尔·阿尔·迪恩的数学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融合Sabatino de Ursis，Ferdinand Verbiest或Michel Benoist的作品呢？

阮通过引用著名数学天文学家梅文鼎解释的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原理，为辩论做出了贡献。 尽管许多学者和官员通常提到康熙皇帝的原则，但阮强调了梅文鼎著作的重要性，因为他广泛研究并融入了耶稣会科学。 梅文鼎的原理指出，两地之间向北或向南移动一度等于250里。 这个原理是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基础，维尔比斯特利用它说服康熙皇帝进行全国范围的大地测量，并创建了康熙地图册。 除了引用梅文鼎，阮也提供了他的观察。 他指出，江南省的纬度是32度，而浙江省的纬度是30度，导致了2度的差异。 根据他的解释，如果江南的人看到浙江的人，那个人应该显得有些倾斜。 同样，北京的纬度是40度，而在海南岛，它是20度。 他指出，江南的纬度是32度，而浙江省的纬度是30度，导致了2度的差异。同样，北京的纬度是40度，而在海南岛，它是20度。如果一个北京的人看海南岛的人，那个人看起来好像会从地面上掉下来。 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在没有深入理解重力的情况下，阮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呼吁。 如果一个来自北京的人看到一个在海南岛的人，那个人应该看起来好像他们可能会从地面上掉下来。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在没有深入理解重力的情况下，阮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呼吁。他强调，每个人都稳稳地站在地面上，头顶上是天空，没有关于从地面上掉下来的担忧。 这个简单而有力的观察挑战了现有的信仰，并为阮的大地测量学和球形地球概念的独特观点做出了贡献。

阮继续坚称，由于宇宙的永恒不间断的运动和运作，地球可以保持在宇宙的中心，正如《易经》中的一句著名引言所提到的。 阮继续坚称，由于宇宙的永恒不间断的运动和运作，地球可以保持在宇宙的中心，正如《易经》中的一句著名引言所述。他用生动的类比来阐述他的观点。 阮继续坚称，由于宇宙的永恒不间断的运动和运作，地球可以保持在宇宙的中心，正如《易经》中的一句著名引言所述。他用生动的类比来阐述他的观点。他使用的一个类比是将宇宙比作充满大量空气的猪膀胱，地球就像膀胱中的豌豆一样位于中心。 阮继续坚称，由于宇宙的永恒不间断的运动和运作，地球可以保持在宇宙的中心，正如《易经》中的一句著名引言所述。他用生动的比喻来阐述他的观点。他采用的一个比喻是将宇宙比作充满大量空气的猪膀胱，地球就像膀胱中的豌豆一样位于中心。他还将其比作一个装满水并用绳子系住的碗，当快速旋转时，水不会溅出来。 他还用了另一个比喻，把一个木球放在一个大水盆中间，然后猛烈搅动水，使得球保持在中心位置。 阮进一步引用了攀登泰山的经历，那里寒风刺骨，人的耳朵会疼痛。 他让读者想象一下，一个比泰山高一千倍的地方，那里的空气移动得比在山顶上体验到的更快、更有力。 根据阮的说法，宇宙中的空气快速且不断地旋转，从而稳定地将地球保持在中心位置。 通过这些类比，阮强调，站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感觉自己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对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毫无疑问。 他的解释旨在消除怀疑，强化他对地球在宇宙中稳定且居中位置的信念。

阮在序言中的类比，吸引了扬子江下游普通学者的个人和相关的经验。 他的目标是消除他们的生活经验与球形地球概念之间的任何潜在矛盾，以缓解任何相关的恐惧。 他的序言充当了《地球的插图和解释》主文的预防性介绍。 作为扬子江下游的知名舆论领袖和省长，阮的话语具有相当大的分量，远超过来自北京的无名耶稣会传教士（Benoist）。 他的目标是支持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和宇宙地理学，重点关注以球形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地理结构，包括所有七大行星的轨道的天体球体，以及形成外层的恒星球体。 这些宇宙学方面遵循了“古老的方法”，符合儒家经典的基本前提，即所有好的想法都源于古代。 阮对这种宇宙学和宇宙地理学的强调展示了他对古代持久原则的奉献，即使他拒绝了在利玛窦和南怀仁的世界地图中发现的来自外国的异国细节和习俗。 他相信，理想的古代礼仪和音乐（代表高级文明）的崩溃，导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家向四个方向的各个边缘地区分散。 阮氏强调这种宇宙观和宇宙地理学，展示了他对古代原则的坚守，即使他拒绝接受利玛窦和南怀仁的世界地图中所包含的来自外国的异国细节和风俗。他认为，理想的古代礼仪和音乐（代表高级文明）的崩溃，导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家向四个方向的各个边缘地区分散。在支持以这些古代原则为重点的近代大地测量学和宇宙地理学的同时，阮氏试图通过重构中国知识传统的内容和背景，来强化他的观点的重要性。 具体来说，真正的文明可以扩展到遥远的边缘地区，最终回归到文明的核心。 关键因素是能够识别这个失落的宝藏。

总的来说，阮再次重申了他的开场陈述，强调宇宙学和宇宙地理学，包括球形地球的概念，都源于中国古代的“古老方法”。 总的来说，阮重申了他的开场陈述，强调宇宙学和宇宙地理学，包括球形地球的概念，都源于中国古代的“古法”。他敦促学者们既不要因为它是一个新颖的想法就盲目接受，也不要因为它太过神奇就轻易否定。 总的来说，阮先生重申了他的开场陈述，强调宇宙学和宇宙地理学，包括球形地球的概念，都源于中国古代的“古法”。他敦促学者们不要因为这是一个新颖的想法就盲目接受，也不要因为它太过神奇就轻易否定。相反，阮先生倡导对这个观点的宽容和接受，就像在《地球的插图和解释》这本书中所呈现的那样，同时也弘扬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重要性。 总结来说，阮先生重申了他的开场陈述，强调宇宙学和宇宙地理学，包括球形地球的概念，都源于中国古代的“古法”。他敦促学者们不要因为这是一个新颖的想法就盲目接受，也不要因为它太过神奇就轻易否定。相反，阮先生倡导对这个想法的宽容和接受，就像在《地球的插图和解释》这本书中所呈现的那样，同时也弘扬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重要性。通过鼓励开放的思维方式，阮先生希望在更广泛的知识领域内培养对这些概念的更深入理解和欣赏。

《地球的插图和解释》提供了全面的描述，包括纬度、经度等元素，以及地球作为椭球体的新概念。 《地球的插图和解释》提供了全面的描绘，包括纬度、经度以及地球作为椭球的新概念。该书详细介绍了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 此书详细介绍了四大洲 - 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它还阐述了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天球，它们的尺寸，以及季节的变化。 《地球的插图和解释》提供了全面的描述，包括纬度、经度以及地球作为椭球的新概念。该书详细介绍了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它还阐明了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天球，它们的尺寸，以及季节的变化。两个部分讨论了由于观察者相对于地球中心的位置（直径）和大气折射可能导致的天文测量中的潜在错误，这可能导致各种不准确。 另一部分探讨了地球的形状，日食和月食，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和彗星。 此外，它还包括一个专门用于使用浑天仪作为天文理解模型的部分。 这本书的结构混乱，表明它并非作为当代天文学知识的系统指南，因为已经有官方的文本为与清朝法院有关的专业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提供服务。

令人惊讶的是，《地球的插图和解释》除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原理外，没有数学或天文学的内容。 令人惊讶的是，《地球的插图和解释》除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原理外，没有数学或天文学的内容。然而，它确实提供了地球直径的测量，以及对像日食、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以及季节转换等现象的直观、定性的理解。 令人惊讶的是，《地球的插图和解释》除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原理外，没有任何数学或天文学的内容。它确实提供了地球直径的测量，以及对像日食、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以及季节转换等现象的直观、定性的理解。然而，这本书并未包含任何数学计算。 令人惊讶的是，《地球的插图和解释》除了早期现代大地测量的原理外，没有任何数学或天文学的内容。它确实提供了地球直径的测量和对像日食、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以及季节转换等现象的直观、定性的理解。然而，这本书并未包含任何数学计算。没有算术，没有应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没有提取平方根的方法，没有平面或球面三角学，没有代数，也没有几何学。 这些都是皇家数学和天文学文本中的标准特征。 阮，他在皇家学院担任数学主任的头衔，并赞助了像李锐（1769-1817）这样的杰出数学家，他编写了《数学天文学家的历史》并对他时代的中国代数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在书中加入更多的数学内容。 然而，省略数学概念是有意为之，因为目标是为了简化内容以适应普通读者，而不是反映阮的数学能力。

这是一个例子：《地球的插图和解释》提供了清晰简洁的地球正面（欧亚、非洲和大洋洲）和背面（北美和南美）的图片，包括经线和纬度线。 历史学家们经常忽视这些插图，因为他们怀疑这些来源的可信度，或者发现它们难以与现有的历史学说相符。 子午线主要基于赤道，将其切割为160度。 每个度数都形成一个单独的椭圆弧，上面在北极相交，下面在南极相交，代表地球的360度经度。 这些线就是每个地方的经线。 纬度线主要基于子午线，将其二等分为160度。 每个度数都形成一个单独的圆，赤道形成最大的圆。 这些圆的大小离赤道越远越小，最终在北极和南极汇聚为一点。 这代表了从地球赤道到每个极点的90度距离。 经线和纬线都被划分为360度。 Benoist的地图与Verbiest的地图有显著的不同。 Benoist在地图中加入了法国对子午线的测量，揭示了地球是椭圆形的。 地球的形状类似于扁圆球体 这意味着它大部分是球形的，但在两极略微扁平，而在赤道处则凸出。 地球沿赤道的直径大于从南极到北极的直径。

在地球表面，"大同"的概念对清帝国意味着什么？地球现在包含了已知世界的全部。 在地球表面，“大同”这个概念对于清帝国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地球包含了已知的整个世界。清朝的势力只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一部分。 在地球表面，“大同”这个概念对于清朝帝国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地球包含了已知的整个世界。清朝的势力只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在蒙古元朝时期，“大同”指的是空间的宽广，而在中国明朝时期，它指的是中国的家园。 考虑到整个地球已经成为已知的世界，清朝如何重新思考或重新定义其政治领土？清朝采用或接受了什么解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清朝的关键创新——《大清大同志》。 这份关键的领土文件的和珅版本于1751年发布，穆让阿版本于1842年发布，它们共享了一个关键的创新，将清帝国分为两个领域。 在蒙古元朝时期，“大同”指的是空间的宽大，而在中国明朝时期，它指的是中国的家园。考虑到整个地球已经成为已知的世界，清朝是如何重新思考或重新定义其政治领土的呢？清帝国采用或接受了什么解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清大同文献的关键创新。和珅版本的这份重要的领土文献于1751年发布，穆江嘎版本于1842年发布，它们共享了一个关键的创新，将清帝国分为两个领域。这种划分几乎完全符合胡焕庸人口线，将清帝国划分为农业和游牧领域，或者说是内部和外部领域。 通常来说，对于帝国国家来说，在广阔的领土上扩张和居住在各种生态环境中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地理和地理障碍，例如戈壁沙漠、满洲-蒙古草原（或草原）和青藏高原，这些历史上阻止了中国国家对中亚和南亚的入侵或占领。 这些地理障碍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人类的流动性设定了看似不可能的限制。 这些地理障碍在限制人类活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设定了不可能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地理障碍甚至在今天仍然对中国的发展构成重要的制约。 历史学家彼得·珀杜将其称为大清的扩张，尽管地理和生态的挑战，但还是通过军事占领征服了中亚。

清朝帝国的扩张远非简单或必然的。 清朝帝国的扩张远非简单或必然的事情。其遗产使中华民国不得不应对地理和人口上的不平衡领土。 早在1923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98）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胡焕庸是他的同时代人中急于绘制中国不均匀人口分布的人之一。 他的主要关注点围绕着将人们从人口密集的地区迁移到人口稀疏的地区的现代主义观念。 然而，在他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之前，胡焕庸被迫描绘出他所看到的人口分布极度不均的严酷现实。 他的发现非常直接，揭示了两个人口中国的划分。 胡画了一条垂直线，现在被称为环永线。 它将中国划分为两个独特的地理和人口领域（参见第一章的胡焕庸线图）。

为了克服胡焕庸线所指示的地理和结构障碍，清朝设计了一种创新的地理认识论，将中国本土、中亚和西藏高原融合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实体。 为了克服胡焕庸线所指示的地理和结构障碍，清朝设计了一种创新的地理认识论，将中国本土、中亚和西藏高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实体。通过重新解读和重新配置“大同”文明原则，象征着农业和干旱地区或内部和外部领域的融合。 为了克服胡焕庸线所指示的地理和结构障碍，清朝设计了一种创新的地理认知论，将中国本土、中亚和西藏高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实体。通过重新解读和重新配置“大同”的文明原则，象征着农业和干旱地区或内部和外部领域的融合。农业和内部地区可以类比为明朝时期的中国腹地。 为了克服胡焕庸线所指示的地理和结构障碍，清朝设计了一种创新的地理认知，将中国本土、中亚和西藏高原融合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实体。这是通过重新解释和重新配置“大同”的文明原则来实现的，象征着农业和干旱地区或内部和外部领域的融合。农业和内部地区可以类比为明朝时期的中国腹地。相比之下，干旱和外部地区则展示了清朝的空间宽大，比历史上的汉朝和唐朝的领土还要大。 这种立场并非仅仅是傲慢或夸大其词的表现。 事实上，清朝在中亚取得了显著的军事胜利，并通过全面的大地测量仔细记录了这些成功。

领土文献和人文地理学，《大清总督文献》通过创造新的类别，即统一区划（中国本土）和边境区划（蒙古，中亚和西藏）来强调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这些类别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大多数学者和官员通常使用“内外领域”的概念，其中长城的主要阻塞点作为内部和外部领域之间的划分。 在明朝统治的300多年里，中国本土在内部领域的防御要点内居住的人们中培养出了强烈的中国家园意识。 从历史和制度上看，中国的行政治理已经通过省级政府组织成为领土单位。 因此，外域或“塞外”被视为异国，那里的生活条件恶劣，适合游牧民族生活，有许多陌生且奇特的人，地形崎岖，气候极端，生活方式令人不适。 清朝帝国起源于满洲，与蒙古人结盟，并征服了中亚。 从官方角度来看，他们不能延续中国人对内外领域的刻板印象和区别。 因此，《大清一统志》必须宣布一种强调领土统一的官方地理认识论。 统一和边界划分的分类在展示清朝领土完整性方面具有关键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区别。

在完成他的作品《地球的插图和解释》时，贝诺伊特强调了黄河源头的深远重要性。 在详细描述了欧亚、欧洲、非洲和美洲之后，贝诺伊斯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亲眼目睹或游历天下所有的国家。 许多学者踏上了遥远的旅程，记录独特的文化，传播儒家原则，发现非凡而迷人的传统，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检查边界和地理特征，并遇见杰出的思想家和人物。 旅行的挑战总是鼓励这些追求。 例如，汉朝的张骞（？-公元前114年）冒险进入西域，蒙古人则冒险到了昆仑的黄河源头。 我们杰出的康熙和乾隆皇帝派遣探险队仔细研究黄河的源头，他们的发现比以前的任何报告都更为细致和准确。 我们尊敬的乾隆皇帝将他的美德和军事才能传播到了遥远的西方，导致许多国家屈服于他的统治并融入我们的领土边界。 作为来自西洋的外人，Benoist谦虚地表示，他很荣幸并尊重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为清朝效力。 他的任务是描绘和阐明西部地区作为清帝国一部分的特征和景观，并解释清帝国的扩张如何能够为这个壮观的宇宙做出贡献，其中地球位于中心，被天体、五大行星和星座环绕。

Benoist继续赞美乾隆皇帝的辉煌和神圣。 贝诺瓦继续赞美乾隆皇帝的辉煌和神圣，他的文化成就和军事实力超越了所有的前朝。 他征服了万里西域 危险的，遥远的，凶猛的，固执的土地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领土。 那些说着无知的话语，穿着奇怪衣服的人都跪下并把额头贴在地上，显示他们对陛下权威的臣服。 这个描述确实符合马克斯·韦伯对政治领土的定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同盟成为了清帝国的最终合理化，声称对内外领土的权威。 更尖锐地说，合并内外领域并未形成中央王国。 相反，包含内外领土的清帝国只是地球的一部分。 这种理解显著改变了清朝的帝国世界观。

在接下来的两部分中，我将描述满族学者启时一在其备受赞誉的中亚研究中对“边界划分或外部领域”的一个共时性例子。 然后，对于“统一划分或内部领域”的一个实例，我将重新审视阮元对下扬子江平原的分析，展示他的区域和领土观点中的全球背景。 在欧美帝国主义的崛起之际，清朝帝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其地理认识论。

## Qishiyi的中亚：

关于Qishiyi我们所知甚少。 他属于尼玛察哈拉满族世系，他在1754年通过了京都考试，这一年也是纪昀和钱大昕的同年。 1771年，他被任命为河南省的县长，1773年，他被调任到中亚的乌鲁木齐。 关于齐士奕的信息非常少。他属于尼玛察哈拉满族，于1754年通过了京都考试，与纪昀和钱大昕同年。1771年，他被任命为河南省的县长，1773年，他被调任到中亚的乌鲁木齐。齐士奕在乌鲁木齐的军事政府任职了十多年后返回北京，他可能在1785年左右去世。 他的名字，Qishiyi，翻译成“七十一”。尽管他出身于满族贵族，但他的家庭并不富裕。 尽管他通过了京都考试，但他从未设法提升儒家官僚体系的地位，保持了相对低调的政治存在。 然而，他的作品《西域闻见录》堪称杰作，后来成为任何关于中亚的文献的必备参考。

我在西部地区听到和目睹的记录以及地球的插图和解释，这两部作品都是在同一时代创作的，它们共享一个基础前提，即根植于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 我在西部地区听到和目睹的记录，以及地球的插图和解释，这两部作品都是在同一时代创作的，它们共享一个基础前提，那就是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根基。这个观点被概括在《我在西部地区听到和目睹的记录》的开篇语中。 尽管地球处于天体球体的中心，但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就像弹珠一样渺小。 中原——这是对古代中国文明地理中心的暗示——只是地球球面上的一小片碎片。 这种由齐士奕表达的情感，是对清朝帝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以及地球在宇宙大计划中的相对渺小的深思熟虑。 它运用了修辞效果来吸引读者，并代表了他对他所处时代的宇宙观的理解。 尽管他的官僚地位不高，但他仍被认为是清朝最顶尖的知识精英之一。 然而，他对地缘政治信息的获取并不受限，他在乌鲁木齐的专业知识使他成为中亚地区的宝贵观察者。 重要的是，值得注意的是，他选择以这种修辞手法开始描绘被称为西部地区的领土——他的书的重点——通过清朝的领土扩张来保护。

我在西部地区所听闻和目睹的记录分为五个主要部分。 我在西部地区听到和目睹的记录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深入探讨了“新疆”（新疆）的地理方面——这是齐士义和他的同代官员用来指代新并入的中亚领土的术语。 第二部分概述了中亚新疆周边的国家，显然带有战略重点。 我在西部地区听到和目睹的记录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深入探讨了“新疆”（新疆）的地理方面——这是齐士奕和他的同时代官员用来指代新并入的中亚领土的术语。第二部分概述了中亚新疆周围的国家，显然有战略重点。第三部分包括五次军事进攻的历史记载，这些进攻巩固了齐士奕在1777年——他完成他的书的那一年，根据序言——所知的新疆的建立。 第四部分深入了解居住在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的文化习俗和传统。 最后一部分列出了所有军事哨所（军台）的相对位置和距离，这些哨所是为了传递军事信息而设立的。 清朝帝国接替了前明朝的制度，在中国本土维持了1785个这样的军事站点（驿站），并将这些精心规划的军事哨所扩展到了新疆。

齐士义对新疆地理的描绘与何国宗和明嘎图领导的大地测量完美吻合。 这些调查广泛覆盖了天山山脉的北部和南部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由北部的天山山脉，南部的昆仑山脉，以及东部的阿尔金山脉环绕。 以贯穿其大部分地域的塔里木河命名，塔里木盆地以其极其恶劣的沙漠环境而著名，其中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 昆仑山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毗邻青藏高原。 这就是黄河源头所在的大致位置。 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都是人类居住的恶劣环境。 因此，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看，清朝更加关注天山山脉北部和南部的细长狭窄地区，这些地区对于领土控制的前景更为可行。 整个第一部分读起来就像是军事行动的历史地理。

在第二部分中，齐士义详细列出了在十八世纪与新疆接壤的各种不同政权。 在第二部分中，齐士一详细列出了在十八世纪与新疆接壤的各种政权。这些包括像哈萨克斯坦、布鲁特、安集延（现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城市）、博洛尔、科干汗国、莫卧儿帝国、克什米尔、巴达赫尚、帖木儿沙阿、罗曼诺夫俄国和布哈拉（现乌兹别克斯坦的另一个城市）等重要实体。 在第二部分中，齐士一详细列出了在十八世纪与新疆接壤的各种政权。这些包括像哈萨克斯坦，布鲁特，安集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城市），波罗尔，科干汗国，莫卧儿帝国，克什米尔，巴达赫尚，帖木儿沙阿，罗曼诺夫俄国，和布哈拉（另一个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等等。这些政权不仅在当时的重要历史作品中被提及。 它们也被归类为“外藩”或“朝贡国”在大清的大同文献中。

在十八世纪，居住在天山山脉南北地区的人们与中亚邻国的文化和习俗联系更为紧密，而不是与中国本土。 在十八世纪，居住在天山山脉南北地区的人们与中亚邻国的文化和习俗联系更为紧密，而不是与中国本土。清朝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的战役后，实现了对这些地区的军事统治，导致无数生命的丧失。 这场艰苦的胜利和对新疆地区准噶尔蒙古人的镇压，展示了清朝对确保和维持军事控制的坚定承诺，为中亚的穆斯林人口创造了殖民条件。 在十八世纪，居住在天山山脉北部和南部地区的人们与中亚邻国的文化和习俗联系更为紧密，而不是与中国本土。清朝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的战役后，实现了对这些地区的军事统治，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这场艰苦的胜利和对新疆地区准噶尔蒙古人的镇压，展示了清朝坚定不移地维护军事控制，为中亚的穆斯林人口创造了殖民条件。保护领土完整和安全对清朝至关重要，这从这些努力中可以看出。 在齐士义的历史叙述中，清军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准噶尔蒙古人，之后维吾尔穆斯林迅速占领了这片土地，取代了被摧毁的准噶尔蒙古人。 这场艰苦的胜利以及在新疆对准噶尔蒙古人的镇压，展示了清朝坚定不移地保护和维持军事控制的决心，为中亚的穆斯林人口创造了殖民条件。保护领土完整和安全对清朝至关重要，这些努力就是明证。在齐士义的历史叙述中，清军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准噶尔蒙古人，之后维吾尔穆斯林迅速占领了这片土地，取代了被摧毁的准噶尔蒙古人。因此，天山山脉的北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维吾尔穆斯林居住。 因此，在18世纪后半叶，由于清朝的统治，穆斯林人口生活在类似殖民地的存在中。 在齐石一的历史叙述中，清军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准噶尔蒙古人，之后维吾尔穆斯林迅速占领了这片土地，取代了被摧毁的准噶尔蒙古人。因此，天山山脉北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维吾尔穆斯林居住。因此，在18世纪后半叶，由于清帝国的统治，穆斯林人民生活在类似殖民地的存在中。齐石一明确地阐述了清军的行动，包括消灭准噶尔蒙古人，平息1756年阿穆尔萨纳的反叛，平定由维吾尔兄弟布尔汗·阿尔丁和霍加·贾汉领导的穆斯林起义，镇压1765年乌什的穆斯林起义，以及促成1772年托尔古特蒙古人的回归。 随着每次行动的结束，这都带来了对该地区更严格的控制和加强的军事监视。

在1777年，只有三种类型的人居住在嘉峪关之外，这个关口是长城的瓶颈，分隔了清朝的内外领地。 在1777年，只有三种人群居住在嘉峪关以外的地方，这个关口是长城的瓶颈，分隔了清朝的内外领土。这三个群体是蒙古人，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族人。 在这三个群体中，维吾尔穆斯林显著地与中国人口不同，不像蒙古人和藏族人。 维吾尔族穆斯林，他们看起来更像高加索人而不是东亚人，与中国大陆的居民相比，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从历史上看，这些社区经常被指定为“野蛮”的外部领域，但这种暗示在齐士义的记载和《大清并蒂文献》中都没有。 在他的作品的第四部分中，Qishiyi全面阐述了穆斯林社区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 他从讨论斋月开始，描述了他们的婚礼、饮食、饮料、葬礼和商业活动。 他进一步描绘了他们的问候礼仪，节日庆祝，日历事件，房屋建筑风格，以及禁止离婚的规定。 在他的作品的第四部分，齐石一全面阐述了穆斯林社区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他从讨论斋月开始，描述了他们的婚礼仪式、饮食、饮料、葬礼和商业活动。他进一步描绘了他们的问候礼仪、节日庆祝活动、日历事件、房屋建筑风格以及禁止离婚的规定。他详细介绍了他们种植的作物，该地区存在的昆虫和动物类型，以及各种景色，如新旭海，那里有数千个冰川湖在阳光下闪 shimmer。 他详细描述了他们种植的作物，该地区存在的各种昆虫和动物，以及各种可供选择的风景，例如新旭海，那里有数千个冰川湖在阳光下闪 shimmer。以前人们认为新旭海是黄河的源头。 在乾隆皇帝的团队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他们发现实际位置在它的旁边。

在详细描述了他在穆斯林地区的旅程后，齐士义反思道：在准噶尔蒙古人的统治下，维吾尔穆斯林的土地被重税，对狩猎和农业产量施加了重压。 在细致描述了他在穆斯林地区的旅程后，齐士义反思道：在准噶尔蒙古人的统治下，维吾尔穆斯林的土地被重税压迫，对狩猎和农业产量施加了负担。维吾尔人为税收收集者提供了肉、酒和女人，而这些收税人，由于他们的贪婪，无情地掠夺了维吾尔人。 在详细描述了他在穆斯林地区的旅程后，齐士义反思道：在准噶尔蒙古人的统治下，维吾尔穆斯林的土地被重税，狩猎和农业产量都被加重负担。维吾尔人为税收人员提供肉、酒和女人，而这些人驱使着他们的贪婪，无情地掠夺维吾尔人。齐士义指出，直到今天，维吾尔人仍然将他们的粮食和钱财藏在地下，他认为这种行为既可笑又可怜。 在详细描述了他在穆斯林地区的旅程后，齐士义反思道：在准噶尔蒙古人的统治下，维吾尔穆斯林的土地被重税，狩猎和农业产量都被加重负担。维吾尔人为税收人员提供肉、酒和女人，而这些人驱使着他们的贪婪，无情地掠夺维吾尔人。齐士义指出，直到今天，维吾尔人仍然在地下藏粮和钱，他认为这种行为既可笑又可怜。然后，齐士义断言，乾隆皇帝已经平息并消灭了准噶尔的“野蛮人”，从而解放了维吾尔穆斯林，使他们过上了和平繁荣的生活。 所有的穆斯林现在都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们自然生命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齐士义将清军的入侵视为维吾尔穆斯林的解放，并赞扬清帝国对新疆的占领是合法的。 齐石翼随后断言，乾隆皇帝已经平定并消灭了准噶尔“野蛮人”，从而解放了生活在困苦中的维吾尔穆斯林，使他们过上了和平繁荣的生活。所有的穆斯林现在都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们自然生命的结束。值得注意的是，齐石翼将清军的入侵视为维吾尔穆斯林的解放，并赞扬清帝国对新疆的占领是合法的。他认为清朝的领土扩张是最终的和绝对的。 周边的国家主要是中亚穆斯林，但现在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已经属于清朝。 值得注意的是，Qishiyi将清军的入侵视为维吾尔穆斯林的解放，并赞扬清帝国对新疆的占领是合法的。他认为清朝的领土扩张是最终和绝对的。邻国主要是中亚穆斯林，但现在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属于清帝国。无情的准噶尔蒙古人被击败，维吾尔穆斯林成为清帝国的臣民。 尽管他们保持着独特且异域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不再被视为“野蛮人”。

尽管新领地的资源稀缺，生活条件恶劣，但齐士义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尽管新疆的资源稀缺，生活条件恶劣，但齐士义仍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尽管这片土地并不以其文化活力而闻名，人口稀少，但记录清朝征服、财政管理、军事政府以及移居到那里并成为清朝臣民的维吾尔穆斯林的风俗和文化仍然至关重要。 因此，齐士义认为，我们可以理解新疆在清朝统治下的逐步演变，甚至是它的转变。 尽管新疆的资源稀缺，生活条件恶劣，但齐士奕强调了其重要性。尽管这片土地并不以其文化活力而闻名，人口稀少，但记录清朝征服、财政管理、军事政府以及移居到那里并成为清朝臣民的维吾尔穆斯林的风俗和文化仍然至关重要。因此，齐士奕认为，可以理解新疆在清朝统治下的逐步演变甚至转变。此外，齐士奕还记录了新疆所有军事驻地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 例如，嘉峪关和哈密两个关键军事哨所之间的距离为1470里。 在这两个主要驻地之间，存在23个较小的驻地，根据地形和交通需求，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在30到90里之间。 新疆地区有数百个这样的军事驻地，构成了清朝军事政府的骨干。 考虑到齐士奕在他非凡的书中对宇宙的介绍，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通过从大地测量调查中推断出这些数据的，也许还得到了军事运输记录的证实，因为他在军事政府任职了四年。

骐驶驿精心记录了新疆地区，使其在清朝帝国中得到了确认。 齐石矣精心记录了新疆地区，使其在清朝帝国中得到了确认。 在这个领土上，蒙古人、藏人、满族人、汉族人或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更广泛的中国人口都被视为清朝的臣民。 在清朝的边界内，没有人被视为野蛮人。 在这个领土上，蒙古人、藏族人、满族人、中国人或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更广泛的中国人口都被视为清朝的臣民。在清朝的边界内，没有人被视为野蛮人。虽然有一些外部团体，比如19世纪的英国人，可能以被视为野蛮的方式行事，因此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像蒙古人、藏族人和穆斯林这样的团体不再被这样分类。 在这个领土上，蒙古人、藏族人、满族人、汉族人或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更广泛的中国人口都被视为清朝的臣民。在清朝的边界内，没有人被视为野蛮人。虽然有一些外部群体，比如19世纪的英国人，可能以被视为野蛮的方式行事，因此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像蒙古人、藏族人和穆斯林这样的群体不再被这样分类。换句话说，“野蛮人”这个词似乎主要用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被视为敌对的人，而不是用于清朝领土内的未开化群体。

## 阮元的三江：

在1787年，朱珪（1731-1807年）被任命为未来嘉庆皇帝的导师，并在清朝朝廷中被认为是和珅的政治对手，他接任礼部尚书并前往下扬子江谷的杭州。 在他的访问期间，他与著名学者王忠（1745-1794）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探讨了下扬子江流域的地缘政治意义。 王冲在他的文章“广陵对”中生动地记录了这次对话，强调了对下扬子江流域地区的独特意识。

王开始阐述了长江下游流域的宇宙意义，他在中国的十二个地区和十二个天体星座之间找到了相关性。 在这个框架中，广陵被用来表示长江下游流域，尽管后来，广陵也特指扬州的城区。 在整个中国领土上，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以北，而长江的源头在南方。 穿越中国，长江向东流淌，直到通过下扬子江口流入海洋。 修建大运河，连接了长江和黄河，进一步提升了下扬子江流域的地位，使其在清朝中国成为商业和地缘政治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忠生动地展示了黄河和长江源头的宇宙观点，以及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中国的领土轮廓。

王回顾了以长江下游流域的英雄人物为特色的政治和军事事件。 王采用了一种非传统且富有创新性的历史编纂方法，将下扬子江流域作为他历史叙述的核心，与正史的叙述方式有所不同。 这种偏离传统的做法如此明显，以至于朱桂觉得有必要打断他寻求澄清。 王先生在他的故事中，毫不停歇地继续讲述，最后得出以下几点：在和平时期，长江下游流域和扬州都市区成为了盐贸易的商业中心，使无数农民受益，并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从而减轻了农业部门的税收负担。 在他的重新叙述中，王采用了一种非传统且富有创新性的历史编纂方法，将下扬子江流域置于他的历史叙述的核心，偏离了正史（Zhengshi）的朝代标准历史。这种偏离传统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朱桂觉得有必要打断他进行澄清。然而，王却毫不停歇地继续他的故事，最后得出以下几点：在和平时期，下扬子江流域和扬州都市区成为了盐贸易的商业中心，使无数农民受益，并向中央国家缴纳税款，从而减轻了农业部门的税收负担。该地区广泛的水道便利了货物的运输，使四海之内的所有人都得到了丰富。 一旦爆发战争，下扬子江谷的军队随时准备出征支持中央政权，或者坚守阵地，期待未来的恢复。 然而，王先生毫不停歇地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总结了以下几点：在和平时期，长江下游流域和扬州都市区繁荣发展成为盐业贸易的商业中心，使无数农民受益，并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从而减轻了农业部门的税收负担。该地区广泛的水路便利了货物运输，使四海之内的所有人都得到了丰富。如果爆发战争，长江下游流域的军队随时准备支援中央政府，或者坚守阵地，期待未来的恢复。即使混乱持续，该地区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也会毫发无损，这一品质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没有任何可耻的投降行为就是证明。 王以赞扬长江下游流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地区，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人作为结束。

对下扬子江流域，特别是扬州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重新评估，可以归因于扬州、苏州和杭州在清朝帝国中崛起为商业大都市。 这种对下扬子江流域，特别是扬州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重新评估，可以归因于扬州、苏州和杭州在清朝帝国中作为商业大都市的崛起。扬州在满族征服下扬子江流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也是一个原因。 这种对下扬子江流域，特别是扬州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重新评估，可以归因于扬州、苏州和杭州在清帝国中崛起为商业大都市。扬州在满族征服下扬子江流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也是原因之一。这种新的观点也受到人口向中国南方转移和大规模向东南亚迁移的影响。 对下扬子江流域，特别是扬州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重新评估，可以归因于扬州、苏州和杭州在清朝帝国中崛起为商业大都市。这也可以归因于扬州在满洲征服下扬子江流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种新的观点也受到了人口向中国南方的转移和大规模移民到东南亚的影响。同时，清朝帝国还面临着由天主教菲律宾、越南内战及其影响、欧洲贸易商和殖民者通过马六甲战略要冲，以及广大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带来的挑战。 这些复杂的区域动态促使人们在清朝时期重新强调了下扬子江流域在东亚和东南亚更广泛背景下的重要性。 王忠的论文敏锐地识别出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并深入探讨了它在中国近代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大约在1800年，长江下游流域和中国沿海地区开始与中国内陆地区产生分歧，这种分歧在白莲教战争的动荡中得到了加剧。 在1799年，嘉庆皇帝为了重申他的权威，以及对白莲教起义的无效抵抗作出反应，对和珅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导致和珅被处决。 随后，皇帝派遣阮元到下扬子江流域，任命他为浙江省的省长。 这个决定受到了对阮元与和珅关系的怀疑的影响。 然而，阮元并未被任命去镇压白莲教运动。 相反，他被授权去对抗越南支持的海盗在西南沿海的威胁。 在和珅倒台后，阮元积极寻求与朱桂和朱赟（1729-1781）两兄弟结盟，他们在嘉庆皇帝的朝廷中颇有影响力。 阮正在平衡他的职业抱负，同时疏远过去的关系。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官方记录和他的年表传记并未强调他与和珅的关系。

从阮的角度来看，最近的发展标志着一个篇章的结束，并将他从清朝宫廷引领到省长的位置。 除了接近皇帝和政治影响力，地方官员的财务收益和未公开的收入使得担任省长比在清朝朝廷工作更具吸引力。 他在各个职位上服务，先是在杭州（浙江省），然后搬到昆明（云南省），最后定居在广州（广东和广西省）。 在那里，他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访客、商人和侵略者汇聚到中国的海岸。 在那里，他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访客、商人和侵略者汇聚到中国的海岸。渴望传达这些见解，阮的治理方式因职位而异。 在杭州，他区分了当地的袭击者和他们的越南对手。 在昆明，作为云贵总督，他巧妙地管理了与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广州监管广东和广西时，他在处理欧洲贸易动态和日益严重的鸦片贸易挑战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面对英国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激增，阮的政策经验变得无与伦比。 历史学家阮 历史学家Kent Guy指出，在他在这些地区的任期中，阮氏应对边疆省份独特挑战，其中军事治理至关重要。

阮正在监督的不仅仅是任何典型的边境省份。 他热衷于支持《地球的插图和解释》的出版，他的奉献精神在序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阮对儒家普世主义的坚定信仰即使面对外来哲学也始终不渝。 他认为这些外来观念是对儒家教义的补充和肯定，就像大海接纳众多河流的水一样。 他无法想象欧洲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影响未来的一代人，使他们背离儒家的原则。 面对来自东南亚的海盗袭击，他如何在坚定的儒家普世主义信念、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和科学的熟悉，以及在多个边疆省份的行政角色中应对呢？

黎朝，统治现今北越南的朝代，从1428年至1789年，在17世纪期间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冲突中。 这场冲突持续到了18世纪，北方的陈氏领主与南方的阮氏领主相互对抗。 最终，西山朝代介入，结束了陈氏和阮氏领主之间长期的争斗，并标志着1789年黎朝的覆灭。 在此举动中，他们在两个世纪的分裂后统一了越南。 他们还与清帝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获得了乾隆皇帝对越南合法统治者的认可。 在杰出的太阳领导人阮光平的领导下，他后来成为光中皇帝，越南享受了相对的和平与繁荣。 然而，他的继任者的无能统治为被驱逐的阮朝领主阮映铺平了夺回南越的道路，并最终在1802年用阮朝取代了西山朝。

在鄭和阮氏诸侯之间的长期斗争中，双方经常从中国的袭击者那里购买粮食，这些袭击者在广东省东部分为两个主要群体：丰尾和水澳。 在1794年，太陽政權為這些劫掠者提供了戰艦，使他們能夠攻擊福建省東南海岸。 在太陽的支持下，這次海上進攻向北推進，造成了浙江省的動盪。 他们在1798年袭击了浦镀，1799年袭击了温州。 到1800年，阮元在杭州担任浙江省省长时，他仔细评估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 他注意到了Tay Son政权与中国海盗的合作。 他注意到了太阳政权与中国海盗的合作。与在中国中部肆虐的白莲教起义不同，阮元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同的情况。 他正在处理一个外国势力，这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朝贡国，而不是清帝国的明确内敌。

然而，阮元对海盗的打击并不成功，而是与越南海军和中国海盗联盟的长期斗争。 然而，阮元对海盗的打击并不成功，而是与越南海军和中国海盗的联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清朝海军不时驱逐海盗，但无法追击他们进入南方。 袭击者总是能重新集结，补给他们的船只并再次发动攻击。 阮元对海盗的打击行动并不成功，而是与越南海军和中国海盗的联盟进行了漫长的斗争。清朝海军时不时地驱逐海盗，但不能追击他们到南方。海盗总是能重新集结，补给他们的船只并再次发动攻击。清朝海军无法有效地击败骚扰的海盗的原因是越南在战舰和武器技术上的优势，阮元也承认了这一点。

始於1802年的阮朝，與朝鮮和德川時代的日本作為獨特的鄰國，有著相似之處。 清朝帝国承认他们是儒家文明的一部分，古代汉语在他们的精英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德川时代的日本不同，朝鲜和阮朝的越南保持了科举考试制度，并将儒家经典和四书融入了他们的学术课程中。 在儒家分类中，朝鲜和阮朝越南在文明等级中被高度尊重。 然而，官方记录偶尔会将越南战船描述为野蛮。 根据阮的说法，任何支持海盗袭击中国海岸线的国家都被视为敌人，无论其文明等级如何。 阮将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问题置于传统的文明等级之上，显示出了实用的立场。 这种对领土现实主义的强调与《大清一统志》的总体叙述相吻合，该书讨论了像菲律宾、越南、韩国甚至英国这样的朝贡或邻近国家。

鉴于阮的地位作为边疆省份的州长，他务实的地缘政治观点，以及他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依赖，他如何看待王忠雄辩地阐述的下扬子江流域作为清朝中国的关键部分？这种观点在历史记载中常常被忽视，但在他与陈耀天（1725-1814）关于“三江”争论的学术对话中浮现出来。 鉴于阮的地位作为边疆省份的州长，他务实的地缘政治观点，以及他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依赖，他如何看待下扬子江流域地区作为清朝中国的关键部分，如王忠所雄辩地阐述的那样？这种观点在历史记载中常常被忽视，但在他与陈耀天（1725-1814）关于“三江”争论的学术对话中浮现出来。《尚书》赞扬传说中的大禹皇帝在古代中国巧妙地创造了三条有效引水入太湖的渠道。 鉴于阮的地位作为边疆省份的州长，他务实的地缘政治观点，以及他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依赖，他如何看待下扬子江流域作为清朝中国的关键部分，如王忠所雄辩地阐述的那样？这种观点在历史记载中常常被忽视，但在他与陈耀田（1725-1814）关于“三江”争论的学术对话中浮现出来。《尚书》将传说中的大禹赞誉为巧妙地在古代中国时期创造了三条有效地将水引入太湖的渠道。这一叙述得到了学者和官员的广泛接受，因为在中国帝国历史的前一千年，下扬子江盆地面临的水利挑战最小。 《尚书》中《禹贡》篇的权威段落写道：“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这段文字从十七世纪开始成为争论的焦点，凸显了下扬子江流域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在帝制中国，参与经典辩论通常是一种微妙的讨论政治的方式，而“三江”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不仅仅是实证研究；政治、水利和环境现实的利害关系非常大。

然而，太湖地区（扬子江下游流域的一个子区域）的水力困难只在十八世纪初开始显现。 然而，太湖地区（下扬子江流域的一个子区域）的水力困难只在18世纪初开始显现。现在公认的是，这些挑战是由于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大规模森林砍伐所导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物的积累增加，最终导致太湖的进出水流发生了严重阻塞。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埃尔文在嘉兴的故事中所展示的，水控结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而且演变过程也很漫长。 像嘉兴或太湖这样的区域系统，不可避免地与像整个长江或下游长江河口这样的大型水利系统相连，并与之共同演变。

太湖作为一个重要的水库，为长江下游流域的多条水道接收和排放水分。 水流输送沉积物的能力与水流速度的四次方有关。 因此，即使是微小的速度变化也会显著影响沉积物的运输能力，而速度反过来又受到河道深度的影响。 除了沉积物的携带能力，问题不仅仅是在下扬子江谷地进行疏浚和沉积。 水运输沉积物的能力与水流速度的四次方有关。因此，即使是微小的速度变化也会显著影响沉积物的运载能力，而速度又受到河道深度的影响。除了沉积物的运载能力，问题还在于长江下游流域的疏浚和沉积。例如，太湖的水位高于农田，而农田的水位又高于长江和海平面。 太湖、农田、长江和海平面之间的高度差直接影响了灌溉技术。 农田的灌溉是双向的。 例如，太湖的水位比农田高，农田的水位又比长江和海平面高。太湖、农田、长江和海平面之间的高度差异直接影响了灌溉技术。农田的灌溉可以双向进行。当太湖的水位高时，农民可以让水流入稻田。 当太湖水位低时，农民可以将稻田中的水漏回湖中。 因此，灌溉取决于太湖水位的时间和测量。 因此，灌溉取决于太湖水位的时间和测量。这就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说的“水利”。 他们的意思是如何通过管理特定区域的灌溉和防洪来最大化土地的经济产出和农业生产力。 因此，作为省长，阮需要对压制特定地方抵抗的利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权衡不同的地方利益，以提高太湖地区的整体生产力。

在这个区域框架内，我将深入探讨关于“三江”的知识性讨论，这是对下扬子江流域地区的传统称呼。 在这个区域框架内，我将深入探讨关于“三江”的知识性讨论，这是对下扬子江流域地区的传统称谓。主要参考来自胡渭所著的《禹贡锥指》。 到1690年，胡渭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他的大部分生活都致力于研究历史地理。 在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时，胡渭获得了特别接见的机会。 他向皇帝呈上了他的作品《禹贡锥指》，并因其毕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即使在晚年也得到了赞扬。 就像他之前的梅文鼎一样，胡渭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秉持着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核心原则。 在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时，胡渭获得了特别接见。他向皇帝呈上了他的作品《禹贡狭义》，并因其毕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即使在晚年也得到了赞扬。就像他之前的梅文鼎一样，胡渭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秉持着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核心原则。康熙皇帝的认可基本上给了这部作品一个认可的印章，使其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参考和引用来源。 像数学天文学家梅文鼎和历史地理学家胡渭这样的杰出人物，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受到赞扬，因为他们的领域被认为对清帝国既实用又无价。

在《禹贡狭义》一章中，胡渭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三川”话题进行了探讨。胡渭还提高了“三川”在《书经》中的重要性。 在《禹贡狭义》一章中，胡伟处理了历史上有争议的“三江”主题。胡也提高了“三江”在《书籍文件》中的重要性。这些河流象征着汉江（北部）、长江（中部）和赣江（南部）的汇聚。 在《禹贡狭义》一章中，胡渭着手处理历史上有争议的“三江”主题。胡渭还提高了《书籍文件》中“三江”的重要性。这些河流象征着汉江（北部）、长江（中部）和赣江（南部）的汇合。包括胡渭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试图确定流入太湖的三条河流，他们认为这三条河流的汇合在稳定湖泊方面起到了作用。 在《禹贡狭义》一章中，胡渭深入探讨了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三江”话题。胡渭还提高了《书经》中“三江”的重要性。这些江河象征着汉江（北方）、长江（中部）和赣江（南方）的汇合。包括胡渭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试图确定流入太湖的三条河流，他们认为这三条河流的汇合在稳定太湖水位方面起到了作用。陈耀田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撰写了《禹贡三江考证》。 在这部作品中，他激烈地争辩说“三条河流”指的是一条水道。 这种解释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和考据学者权祖望的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辩论。 陈耀田仔细分析了《书籍文件》的相关部分，并与其他历史来源和儒家经典进行了交叉参考，运用各种语言学技术来支持他的立场。 在他的深入研究中，他推断只有一条水道流入太湖。 根据陈的说法，“书籍文件”中提到的“三条河流”暗指长江、汉江和豫章的水道汇合。 陈推测，这些河流的汇合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洪水。 因此，他推测，传说中的大禹皇帝可能在长江中游的鄱阳湖地区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流域，以减轻这些河流汇入鄱阳湖的影响。 根据陈的说法，“书籍文件”中提到的“三条河流”暗指长江、汉江和豫章的水道交汇处。陈推测这些河流的汇合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洪水。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即传说中的大禹皇帝可能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流域，以减轻这些河流汇入长江中游的鄱阳湖的影响。陈有效地阐明了鄱阳湖和太湖地区的相互联系。 他强调，太湖地区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水文系统。

在1797年，阮元成为浙江省的教育专员。 他咨询了陈耀田，其学术研究为水利工程提供了关键的见解，特别是关于鄱阳湖和太湖地区之间的关系。 1799年，阮元被任命为浙江省的省长。 在1797年，阮元成为浙江省的教育专员。他咨询了陈耀田，其学术研究为水利工程提供了关键的见解，特别是关于鄱阳湖和太湖地区之间的关系。两年后，1799年，阮元被任命为浙江省的省长。他继续他早期的工作，撰写了《浙江图考》，重点是确定“三江”在哪里，其中包括长江下游盆地的大部分地区。 阮的出版物旨在引导针对下扬子江地区日益严重的淤积、洪水和灌溉问题的政策讨论。 两年后，即1799年，阮被任命为浙江省的省长。他继续他早期的工作，撰写了《浙江图考》，重点研究“三江”在哪里，其中包括长江下游盆地的大部分地区。阮的出版物旨在指导政策讨论，以应对长江下游地区日益严重的淤积、洪水和灌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阮提出了一种对“三江”的解释，这与陈的观点和几乎所有以前的解释都有所不同。

阮对经典短语“三江流入”的解释，将三江的终点从传统上认为的太湖改为了海洋。 因此，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三条河流入海，从而稳定了太湖。”阮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条河流，它们横跨整个下扬子江流域并在河口汇合，都被充分疏浚并顺畅流动，太湖将保持平衡，不会溢出，从而避免可能的问题。 阮对古典短语“三江并流”的解读，将三江的终点从传统上认为的太湖改为了大海。因此，这个短语应该理解为“三江流入大海，从而稳定了太湖”。阮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三江——北江、中江和南江——贯穿整个下扬子江流域并在河口汇合，都能被充分疏浚并流动畅通，太湖就会保持平衡，不会溢出，从而避免可能的问题。这种对古典文本的重新阅读不仅仅是学术分析。 阮对古典短语“三江汇流”的解读，将三江的终点从传统上认为的太湖改为了海洋。因此，这个短语应该理解为“三江汇入海洋，从而稳定太湖。”阮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三江——北江、中江和南江——贯穿整个下扬子江流域并在河口汇合，都能被充分疏浚并流动畅通，太湖就会保持平衡，不会溢出，从而避免可能的问题。这种对古典文本的重新阅读不仅仅是学术分析。在这里，太湖的水利问题被纳入了清朝更广泛的水利管理策略中。 焦点从湖泊本身转移到了河口和相邻的海岸线，强调了它们的长期生态和环境意义。 太湖不再仅被视为储水库，而是被视为调节三条河流流入海洋的系统。 这种对下扬子江流域与海洋联系的更广泛的看法，显然具有地缘政治影响，从将粮食从下扬子江流域运往首都北京，到考虑东南亚的移民和冲突，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战略马六甲海峡等地区。

阮指出，他的家乡扬州位于三条河流中最北边的一条河流附近。 在1796年至1802年之间，他在北京和下扬子江流域之间进行了大量的旅行。 在这些旅行中，他参考了古代著作，对海岸线和河流路径进行了调查，并将文本来源与实证测量进行了交叉参考，从而得出了上述结论。 长江源自上游的长江谷地，蜿蜒穿越中国，最后到达太湖，然后流入海洋。 在他随后的插图中，阮详细描述了下扬子江谷在长时间内演变和扩展成为一个活跃的河口的过程。 他指出，北部的河流最初在海宁汇入海洋，那里有一座建于近两千年前的古老的河海庙，可以追溯到汉朝。 在阮的时代，海岸线比古代要远得多，这意味着太湖曾经离海洋更近。 因此，汉朝时期的生态和地理景观与阮的时代相比，会有显著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南部的河流源自太湖，流经杭州，最后在余姚流入海洋。 值得注意的是，南部的河流源自太湖，流经杭州，最后在余姚流入海洋。这条河被称为浙江，也是该省得名的来源。 到了阮的时代，南方的河流已经消失，沉积物的积累使得沿海地区变成了广阔的湿地。 根据阮的经历，他在浙江省长任期内，每月都会检查海堤的结构完整性，以确保其能抵挡住海浪的冲击。 这个堤坝是沿着海岸的不规则山丘建造的。 从堤防向内陆几英里的地方，是一片平坦的湿地。 这可能是南方河流的古老河床吗？

阮提出，通过追踪这条古老河流的路径，并将其与历史资料和古典文本进行交叉参考，所有的谜团都能得到解答，消除了关于南方河流位置的任何争议或不确定性。 阮提出，通过追踪这条古老河流的路径，并将其与历史资料和古典文本进行交叉参考，所有的拼图都会落到位，消除了关于南方河流位置的任何争议或不确定性。他主张，优先考虑当代目击者的描述是解决这场持久争论的关键。 然后，这些描述可以与历史和古代文本进行交叉参考，以确认南方河流曾经存在于杭州附近，尽管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通过这种方法，阮展示了古典和历史研究如何显著提高我们对下扬子江流域水道生态变化的现代理解。 因此，古典讨论得以解决，服务于知识、生态和政治目标。

阮敏敏地将扬子江下游谷地转变为与海洋世界接壤的生态区，开辟了通往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航线。 当他担任广州市长时，他认识到广州体系，被英国人称为旧中国贸易，使广州成为欧美商人的南部海洋前沿和贸易中心。 然而，阮对这些沿海贸易中心和昆明等地之间的区别有着敏锐的认识，在昆明，与少数民族的互动更为普遍。 1802年，阮公发布了他的《浙江省插图调查》的那一年，他正处于省长任期的初期，而白莲教战争即将结束。 当他在广州接任省长职务时，他认识到，广州体系，被英国人称为旧中国贸易，已经使广州成为欧洲和美国商人的南方海洋前沿和贸易中心。然而，阮对这些沿海贸易中心和昆明等地，与少数民族交往更多的地方之间的区别有着敏锐的认识。1802年，阮发表了他的《浙江省插图考察》的那一年，他正处于担任省长的初期阶段，白莲教战争即将结束。这个时期对阮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认识：从传统的内陆边疆省份，如陕西和云南，转变为像浙江和广东这样的沿海贸易中心，这些地方更多地暴露在不断变化的海洋动态中。 阮体现了清朝在从以欧亚为中心的早期现代世界转向由工业化西方主导的贸易路线网络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熟练和务实的领导。

这可能不仅仅关于“工业化的西方”，而是关于清朝如何在他们现在面临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进行战略定位。 与罗曼诺夫俄罗斯的广阔边界相比，尽管重要，但似乎并不那么紧迫或关键，相比之下，沿海的复杂贸易动态和防御策略更为重要。 这个范围从广州的贸易中心到北方向北京的海上粮食运输。 这种从中亚向沿海地区的重要转变，齐士奕将其视为清帝国最近被征服的地区，而阮元则将其概念化为与更广泛的海洋世界互动的新生态区，显而易见。 与罗曼诺夫俄国的广泛边界相比，尽管重要，但相较于沿海地区错综复杂的贸易动态和防御策略，它显得不那么紧迫或关键。这从广州的贸易中心到北方向北京的海上粮食运输都有所体现。这种从乾隆皇帝视为清朝帝国最近被征服的区域的中亚，到被阮元概念化为与更广大的海洋世界互动的新生态区的沿海地区的关键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清朝帝国的领土完整性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展示了其统一性和划定的边界，所有这些都在清朝君主的保护伞下，如清朝大同文献所强调的那样。 如果没有《地球图说》提供的全球视角，这种领土完整性的概念将是不完整的。

## 结论：

常有人说，历史不应被视为一条直线式的进程，有着预定的终点。 常言道，历史不应被视为一条直线、有预定终点的进程。有什么比研究早期现代中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更能体现这一点呢？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主导叙事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直接且进步的道路，目标是解放人民，摆脱外国和国内的压迫，以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国家。 有趣的是，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寻求挑战全球超级大国（美国）。 常言道，历史不应被视为一条直线、有预定终点的进程。没有什么比研究早期现代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更能证明这一点。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主导叙事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直接且进步的道路，旨在解放其人民免受外国和国内的压迫，以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国家。有趣的是，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寻求挑战全球超级大国（美国）。这种对全球突出地位的雄心仍然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有什么比研究早期现代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更能体现这一点的呢？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主导叙事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直接且进步的道路，旨在解放其人民免受外国和国内的压迫，以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国家。有趣的是，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寻求挑战全球超级大国（美国）。这种对全球突出地位的雄心仍然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载中，它被描绘为引领中国人民走出阴影的指导力量，就像一次出埃及记，与西方帝国主义、内部封建主义和社会停滞作斗争。 这个过程使中国人民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尊严并挺直了腰板。 在1950年，这种新生的自豪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引领国家走向经济增长和工业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载中，它被描绘为引领中国人民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引导力量，就像一次出埃及记，与西方帝国主义、内部封建主义和社会停滞进行斗争。这个旅程让中国人民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尊严并挺直腰板。有了这种新发现的自豪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引导国家走向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虽然道路充满了挑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谨慎地导航其航线，摸索着前进。 到2008年，中国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精致，并开始与领先的科技国家竞争尖端技术。 中国的崛起对全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这种显著的转变归功于其指导。

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植根于丰富的背景故事中，这些故事强调了从明朝到清朝的晚期帝国的持久遗产。 这个晚期的帝国时代，虽然被认为相对静态，但其特点是封建地主主义，农民的负担，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有限认识。 在这本书中，我与许多历史学家一起挑战了将“旧政权”描绘为静态的、压迫性的、无知的君主制的观点。 相反，我将18世纪的清朝君主描绘为一个充满活力、有策略、务实且开明的政治实体，他们扩大并治理着不断增长的领土。 我同意许多学者的观点，反对将儒家官僚机构描绘为一个不变的、保守的、严格等级制度的机构。 在这本书中，我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挑战了将“旧制度”描绘为静态、压迫和无知的君主制的观点。相反，我将18世纪的清朝君主制描绘为一个充满活力、战略性、实用性和世界观的政治实体，它扩大并治理着不断增长的领土。我赞同许多学者反对将儒家官僚机构描绘为一个不变的、保守的、严格等级制度的机构。我将其描绘为帝国、省级和地方议程和忠诚的复杂互动，丰富了多元化的观点和信仰，能够适应独特的挑战，即使并不总是成功，其目标在智识上也是多样的。 因此，清朝君主领导了清朝的国家框架，儒家官僚机构和清军协同执行其指令。

历史学家经常深入研究传统和记忆的领域，这些方面是任何历史实体可能固有地接受、挑战或忽视的。 在这本书中，我研究了清朝帝国可能融合的四个想象领土。 我强调清朝君主善于融合早期现代地理测量学，这是由耶稣会士引入的，并通过其军事机制进行广泛的调查。 尽管这次大地测量是革命性的，但其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儒家官僚体制的知识和文化占有所掩盖。 然而，在这个框架内，这次测量并未完全被遮蔽。 我进一步研究了纪昀的“纪氏圈”和阮元的“阮氏圈”，以理解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如何经历文化适应或改革，以与中国古代遗产产生共鸣，最初在《黄河源略》中，随后在《地理图说》中。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官僚的很大一部分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并不熟悉。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811年出版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 这幅地图的创作者仍然未知，但人们认为它是黄千仁（1694-1771）的原作的手绘复制品，黄千仁是黄百家（1643-1709）的儿子，黄宗羲（1610-1695）的孙子。 黄家的传承始于黄宗羲，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明朝在1644年灭亡后，他反抗清朝的统治。 黄氏家族的传承始于黄宗羲，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明朝于1644年灭亡后抵制清朝的统治。黄氏的专长包括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国家治理、语音学和礼仪研究。 黄氏家族的传承始于黄宗羲，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明朝于1644年灭亡后抵制清朝的统治。黄氏的专长包括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国家治理、语音学和礼仪研究。当然，像黄氏这样的学者精通儒家经典、四书和历史文本，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 黄氏家族的影响力在18世纪显著，他们在微妙的政治格局中充当了思想领导者。 到黄千人绘制他的地图时，包含了儒家文明的全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代表了最优秀的儒家学者们反对清朝统治，并深深投入于理解他们世界的实证细节的地理洞察。 这幅地图的尊重和分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在1811年就已经存在，后来被Arthur Williams Hummel（1884-1975）收购，并赠送给国会图书馆。

这张地图作为一件杰出的文化遗产而引人注目。 这张地图因为缺少了两个典型的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关键元素，对我来说其重要性更为凸显。 首先，它缺少来自大地测量的经纬网，使得比例尺对现代观众来说看起来不准确。 其次，它并未精确地描绘清朝的邻国。 对于现代人来说，它忽视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包括南亚，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 并且，它需要更好地描绘东北亚和东南亚。 黄家对清朝君主的抵抗似乎使他们与君主可获得的大量信息隔绝开来。 只有与清朝合作，对外国知识更加接受的人，如纪昀的圈子或阮元的圈子，才能在1762年出版《皇朝西域图说》，在1782年出版《黄河源流略记》，在1799年出版《地球图说》等全面的作品。 即使与清朝政权保持距离，黄千仁似乎仍坚持儒家的王朝治理原则，并在1800年左右向清朝投降。 所有的复制品都带有标题，引用了大清帝国下整个领域的插图。 然而，他们对这个领域的描绘有些偏颇。 清朝的地缘政治信息只与其行政高层分享，而不是广泛地与儒家学者分享。 因此，在地方志的层面上，对大地测量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

随着清帝国在1850年左右开始衰落，清朝君主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专有控制以及他们与纪昀之流和阮元之流的历史地理项目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清一统志》仍广为流传，但其详细的人文地理并未显示出受到近代大地测量学的影响。 它作为地理权威的广泛引用和认可可能源于其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明显依赖性不足。 随着清朝在1850年左右开始动摇，清朝君主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独占以及他们与纪昀圈和阮元圈的合作历史地理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清一统志》仍广泛流传，但其详细的人文地理并未显示出受到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影响。其作为地理权威的广泛引用和认可可能源于其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明显依赖性不足。随着清朝君主在1860年代濒临崩溃，以及儒家学者和农民对基督教的愈发反感，陷入困境的清朝君主发现有必要与新兴的省级精英合作以升级他们的军事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清一统志》仍广泛流传，但其详细的人文地理并未受到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影响。其作为地理权威的广泛引用和认可可能源于其对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明显依赖性不足。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王朝摇摇欲坠，儒家学者和农民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日益高涨，陷入困境的清朝王朝发现有必要与新兴的省级精英合作，以提升他们的军事技术。这种现代化，加上改革派和革命者的崛起，引领了新的政治挑战时代的来临。 同时，工业化的西方引入了一种更先进的、专为军事使用的大地测量学。 在十九世纪末，早期现代大地测量学，就像清朝王朝本身一样，似乎已经过时了。 这本书详细描述的地缘政治的整个发展过程，在1900年左右被遗忘和抛弃。

# 参考文献：

阿吉隆，弗朗索瓦·德，彼得·保罗·鲁本斯，西奥多·加勒，扬·莫雷图斯，以及印刷商普兰蒂因斯切印刷厂 阿吉隆，弗朗索瓦·德，彼得·保罗·鲁本斯，西奥多·加勒，扬·莫雷图斯和印刷商普兰蒂因斯切印刷厂的《六卷光学书：对哲学家和数学家有用》 安特卫普：普兰丁出版社，由寡妇和儿子J出版 Moreti，1613年 http://archive.org/details/opticorumlibrise00agui.

阿克切廷，艾丽芙 "Akcetin, Elif的《边疆的腐败：甘肃欺诈丑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边疆的腐败：甘肃欺诈丑闻。” 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访问于2022年5月8日。 http://www.proquest.com/dissertations/docview/304809853/abstract/5697A361152241C3PQ/1.

阿克曼，詹姆斯R.，编 《帝国地图：制图术与帝国的掌控》 肯尼斯·内本扎尔二世关于制图史的讲座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

阿科卡，杰基，伊莎贝尔·科明-瓦蒂奥，和斯特凡·拉马塞 "Akoka，Jacky，Isabelle Comyn-Wattiau和Stéphane Lamassé，《整合质量维度的人名数据库的概念建模》，无日期，14页。"

亚历克斯，贝阿特丽斯，卢卡斯·恩格尔曼，艾欧娜·沃克，克莱尔·格罗弗，理查德·托宾，迈克·贝内特和阿琳·凯西。 “Plague Dot Text：对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94-1952）爆发报告的文本挖掘和注释。” 数据挖掘与数字人文学报 HistoInformatics（2021年1月20日） https://doi.org/10.46298/jdmdh.6071.

Allsen，Thomas T.和David Morgan Allsen, Thomas T.和David Morgan的《蒙古欧亚的文化与征服》 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202355.

阿米泰，鲁本，和米哈尔·比兰 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人：欧亚游牧民族与定居世界 布里尔的内亚洲图书馆 ; v 11 莱顿; Brill, 2005.

安德拉德，托尼奥 火药时代：中国，军事创新与西方在世界历史中的崛起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089513.

安东努奇，达沃尔 “在皇帝的服务中：费利克斯·达·罗查 S.J "在皇帝的服务中：费利克斯·达·罗查 S.J（1731-1781）和乾隆的'十大战役' |," 东方光芒：澳门宗教研究视角，编号 "在皇帝的服务中：费利克斯·达·罗查 S.J（1731-1781）和乾隆的'十大战役' |," 《东方光芒：澳门宗教研究视角》，第3期（2018）：61-79。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新版/附加序言 收获书籍；HB244 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73年。

阿里吉，乔瓦尼，濱下武志，和马克·塞尔登 阿里吉，乔瓦尼，濱下武志和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500年，150年和50年的视角》 伦敦，英国：泰勒和弗朗西斯集团，2003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82606.

阿什比，爱德华 “对抗中国：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在《对抗中国》中。 "对抗中国：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在《对抗中国》中。Lynne Rienner出版社，2023年。 Ashbee, Edward。“对抗中国：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在《对抗中国》中。 Lynne Rienner出版社，2023年。https://doi.org/10.1515/9781685859442.

邦，彼得·F.和达柳斯·科洛狄杰克 普遍帝国：欧亚历史中帝国文化和代表性的比较研究 英格兰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

鲍永玲 "‘世界’概念在近代东亚语境里的断变." 史林, no. "‘世界’概念在近代东亚语境里的断变." 史林, 第02期 (2012): 96–102.

巴特莱特，贝阿特丽斯·S 君主与大臣：1723-1820年间清朝中期的大理会议 君主与大臣：中清时期的大理寺，1723-1820年 [重印版]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

巴辛，马克和马克·巴辛 巴辛，马克和马克·巴辛，《帝国视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民族主义想象与地理扩张，1840-1865》 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42372.

贝洛，大卫·安东尼 穿越森林，草原和山脉：清朝中国边疆的环境，身份和帝国 环境与历史研究 纽约，NY：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

贝格尔，帕特里夏 《虚空的帝国：清朝中国的佛教艺术与政治权威》 荣宅：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413385.

博彼得K Bol, Peter K. "探索地图中的命题：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 宋元学报 46 (2016): 209-24.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历史中的新儒家 哈佛东亚专题研究307 莱顿；波士顿：BRILL，2008年。

博莱茨，玛丽亚 野蛮主义及其不满 美国红木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3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077413.

博莱茨，玛丽亚和克里斯蒂安·莫泽 重新审视野蛮主义：对旧概念的新视角 博莱齐，玛丽亚，和克里斯蒂安·莫泽。 "重新审视野蛮主义：对旧概念的新视角"。荷兰莱顿：BRILL，2015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397620.

男孩，约翰·D “轴心时代与二十世纪的问题：杜波依斯，贾斯珀斯和普遍历史。”美国社会学家46，无 "轴心时代与二十世纪的问题：杜波依斯，贾斯珀斯和普遍历史。"美国社会学家46，第2期（2015年6月1日）：234-47。 "轴心时代与二十世纪的问题：杜波依斯，贾斯珀斯和普遍历史。"美国社会学家46，第2期（2015年6月1日）：234-47。https://doi.org/10.1007/s12108-015-9254-0.

分支，乔丹 制图国家：地图，领土与主权的起源 纽约，NY：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

布鲁克，蒂莫西 伟大的国家：中国与世界 哈珀柯林斯，2020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解码消失的制图师的秘密 多伦多：Anansi出版社，2013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困扰的帝国：元朝和明朝的中国 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年。

伯班克，简，和弗雷德里克·库珀 伯班克，简，和弗雷德里克·库珀的《世界历史中的帝国：权力与差异政治》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巴特菲尔德，亚瑟·德克斯特 关于通过弧度测量确定地球形状的历史 戴维斯出版社，1906年。

卡拉汉，威廉A 卡拉汉，威廉A。“中国2035：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全球事务（英国牛津郡阿宾顿）2，无 “中国2035：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全球事务》（英国牛津郡阿宾顿）2，第3期（2016）：247-58。 https://doi.org/10.1080/23340460.2016.1210240.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中国2035：从中国梦到世界梦。" 全球事务，第2期，无 "中国2035：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全球事务》第2卷，第3期（2016年5月26日）：247-58。 "2035年的中国：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全球事务》第2卷，第3期（2016年5月26日）：247-58。https://doi.org/10.1080/23340460.2016.1210240.

卡姆斯，马里奥 "重新想象清朝空间：雍正的欧亚地图集（1727-1729）"。晚清中国42，无 “重新想象清朝空间：雍正的欧亚地图集（1727-1729）。”晚清中国42，第1期（2021）：93-129。

卡尼萨雷斯-埃斯瓜拉，豪尔赫 "伊比利亚殖民科学"。Isis 96，没有 “伊比利亚殖民科学。” Isis 96，第1期（2005）：64-70。 https://doi.org/10.1086/430679.

卡瓦菲，康斯坦丁 完整诗集 纽约：阿尔弗雷德A 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2012年。

陈德雄，Leo 关于狐狸和鬼魂的话语：纪昀和十八世纪的文人故事讲述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年。

张, 迈克尔 G 骑马巡游的法庭：清朝统治的建设，1680-1785年 哈佛东亚研究专题287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7年。

追逐，肯尼斯·沃伦 火器：直到1700年的全球历史 剑桥，英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

陈明星，龚英华，李洋，陆大道，张华 陈明星，龚英华，李洋，陆达道，张华。“沪杭永线两侧人口分布与城市化：回答总理的问题。”地理科学杂志，第26卷，无 陈明星，龚英华，李洋，陆达道，张华。“沪淮垣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和城市化：回答总理的问题。”地理科学杂志，第26卷，第11期（2016年11月）：1593-1610。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6-1346-4.

程耀田 禹贡三江考 续修四库全书55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蒋妮可TC 乾隆皇帝的隐藏珍宝：重新考虑清朝皇室的收藏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9年。

冲，J 崇，J “流行叙事与中国历史：理解崛起中的中国的启示。”《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第20期，无 “流行叙事与中国历史：对理解新兴中国的启示。”《欧洲国际关系杂志》20，第4期（未注明日期）：939。

科茨西，J 科茨西，J 等待野蛮人 修订版 版本 纽约，N.Y.：企鹅图书，1982年。

科克，克里斯托弗 文明国家的崛起 纽瓦克，英国：Polity出版社，2019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5725374.

尼科拉·迪·科斯莫 “内亚的清朝殖民地管理。” 国际历史评论 20，没有 “内亚的清朝殖民地管理。”国际历史评论20，第2期（1998）：287-309。 “内亚的清朝殖民地管理。”国际历史评论20，编号2（1998）：287-309。https://doi.org/10.1080/07075332.1998.9640824.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内亚历史上的战争（500-1800年） BRILL，2018年。

克罗斯利，帕梅拉·凯尔 克罗斯利，帕梅拉·凯尔，《摇摆的枢轴，自1800年以来的中国：一部解释性历史》 奇切斯特，西苏塞克斯，英国；马尔登，马萨诸塞州：Wiley-Blackwell，2010年。

克罗斯利，帕梅拉·凯尔，海伦·F 克罗斯利，帕梅拉·凯尔，海伦·萧，和唐纳德·S ，编者 帝国边缘：早期现代中国的文化，族群和边疆 中国研究28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大明一统志（大明的大统一文档） 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統志） 东京：东京大学亚洲高级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1461年。

戴英聪 “伪装的失败：清朝的缅甸战役。”现代亚洲研究38，无 “伪装的失败：清朝的缅甸战役。”现代亚洲研究38，第1期（2004）：145-189。 “伪装的失败：清朝的缅甸战役。”现代亚洲研究38，编号1（2004）：145–89。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04001040。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四川边疆与西藏：清朝初期的皇家战略 中国计划书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9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白莲花战争：晚期帝制中国的反抗与镇压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

戴震，震 戴震全书 由杨应芹和诸伟奇编辑 由杨应芹和诸伟奇编辑 安徽古籍丛书 第二辑 河北省：黄山书社，2010年。

达德斯，约翰W Dardess, John W. "蒙古人有多重要？：从北宋到明朝初期的中国领土，权力和知识分子。" 在《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111-134页。 Dardess, John W. "蒙古人有多重要？：从北宋到明朝初期，中国的领土，权力和知识分子。" 在《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111-134页。剑桥（马萨诸塞州）；伦敦：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明朝中国，1368-1644：一个韧性帝国的简明历史 罗曼和小菲尔德，2012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不仅仅是长城：北方边疆与明朝国家安全，1368-1644年 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2019年。

德尔加多，詹姆斯P 忽必烈汗的失落舰队：寻找传奇舰队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迪·科斯莫，尼科拉 古代中国及其敌人：东亚历史上游牧势力的崛起 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迪科斯莫，尼科拉，唐·J Di Cosmo, Nicola, Don J Wyatt和Nicola Di Cosmo 在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界，种族界限和人文地理 伦敦，英国：泰勒和弗朗西斯集团，2003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242023.

杰瑞德·M·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纽约;伦敦: W 纽约;伦敦:W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杜穆扎，塞德里克，斯特凡·拉马塞，伊莎贝尔·科明-瓦蒂奥，和杰基·阿科卡。 "将质量维度整合到人名数据库的概念建模"。《数据挖掘与数字人文学杂志》关于数据科学与数字人文学@ EGC 2018的特刊（2021年5月7日） Du Mouza，Cédric，Stéphane LamassÉ，Isabelle Comyn-Wattiau和Jacky Akoka。“整合质量维度的人物数据库概念建模。”数据挖掘与数字人文学杂志特刊：2018年EGC上的数据科学与数字人文学（2021年5月7日）https://doi.org/10.46298/jdmdh.5078.

杜阿拉，普拉森吉特 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未来 亚洲联系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

邓内尔，露丝W 新清帝国史：在清城德建立内亚帝国的过程 第一版 鄧儒林，《新清帝国史：清成德的内亚帝国的形成》，第一版，劳特里奇，2004年。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630938.

杜兰特，斯蒂芬·W，李惠仪，和大卫·沙伯格 杜兰特，斯蒂芬W.，李惠仪，和David Schaberg。《左传》：对《春秋》的评论。中国思想经典。 杜兰特，斯蒂芬W.，李惠仪，和大卫·沙伯格。《左传=春秋》：对《春秋》的评论。中国思想经典。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艾布瑞，帕特里夏·巴克利和安妮·沃尔索尔 Ebrey，Patricia Buckley和Anne Walthall，《东亚古代史：文化、社会与政治史，第一卷：至1800年》 森加学习，2013年。

艾克，朱尔 艾克，尤尔。“满洲地图制作：清朝皇家地图项目中满文和满语使用的发展。”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 51-52，无 “满洲地图制作：满洲文字和语言在清朝皇家地图项目中的应用发展。” 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 51-52，第1号（2020年1月26日）：137-68。 “在满洲的制图：满洲文和语言在清朝皇家制图项目中的使用发展。” 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 51-52，第1号（2020年1月26日）：137-68。https://doi.org/10.1163/26669323-05105201009。

埃里克森，克里斯托弗 “早期明朝的皇家野心：蒙古元朝在空间表现和历史判断中的遗产。” 《中国历史研究前沿》第12期，无 “明朝早期的皇家野心：元朝蒙古人在空间表现和历史判断中的遗产。” 《中国历史研究前沿》12卷，2017年第3期：465-484页。 “明朝早期的皇权野心：元朝蒙古人在空间表现和历史判断中的遗产。” 《中国历史研究前沿》第12卷，第3期（2017）：465-84。https://doi.org/10.3868/s020-006-017-0020-8。

艾森斯塔特，沙穆埃尔·N “轴心时代：超越性视野的出现和神职人员的崛起。”欧洲社会学杂志/欧洲社会学档案/欧洲社会学档案馆23，无 “轴心时代：超越性视野的出现和神职人员的崛起。”欧洲社会学杂志/欧洲社会学档案/欧洲社会学档案馆23，第2期（1982）：294-314。

艾森斯塔特，舒穆埃尔·N 帝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版 新布朗斯维克，新泽西州：罗德里奇，1993年。

艾略特，约翰H “复合 “复合君主制的欧洲。” 过去与现在，第137期（1992）：48-71。

艾略特，马克C 乾隆皇帝：天之子，世之人 世界传记系列图书馆 纽约：朗文，2009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塔塔尔的极限：帝国和国家地理中的满洲。” 亚洲研究杂志 59，无 "塔塔尔的极限：帝国和国家地理中的满洲。" 《亚洲研究杂志》59卷，第3期（2000年8月）：603-46页。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满洲道路：晚期帝制中国的八旗与族群身份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艾尔曼，本杰明 “明清边防，中国地图学的内向转变，以及18世纪清朝在中亚的扩张。” 在《中国国家在边界》，29-56页。 “明清边防，中国制图学的内向转变，以及18世纪清朝在中亚的扩张。”收录于《中国国家与边界》，第29-56页。温哥华：UBC出版社，2007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古典识字对早期近代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意外后果。” 在《重新思考东亚语言，方言和识字，1000-1919》，115:198-219。 “古典识字对早期近代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意外后果。”在《重新思考东亚语言，方言和识字，1000-1919》，115:198-219。荷兰：BRILL，2014。

艾尔曼，本杰明·A 《中国晚清帝国文化中的科举考试历史》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中国晚期帝制时代的科举文化史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与精英治理 剑桥，马萨诸塞州；伦敦，英格兰：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古典主义，政治与亲属关系：晚期帝制中国的常州新文儒学派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明清时期的地理研究"。 Monumenta Serica，C，35，号 "明清时期的地理研究"。《Monumenta Serica》，C，35，第1号（1981）：1-18。 "明清时期的地理研究"。《Monumenta Serica》，C，35，第1号（1981）：1-18。https://doi.org/10.1080/02549948.1981.11731148.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晚期帝制中国的耶稣会科学与自然研究，1600-1800。”《早期现代历史》杂志第6期，无 “耶稣会科学与自然研究在晚期帝制中国，1600-1800。”《早期现代历史》杂志第6卷，第3期（2002年8月）：209 “晚期帝制中国的耶稣会科学与自然研究，1600-1800。”《早期现代历史》杂志，第6卷，第3期（2002年8月）：209。https://doi.org/10.1163/157006502320910522。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1550-1900年的中国科学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

埃尔弗斯科格，约翰 我们伟大的清朝：晚清时期的蒙古人，佛教和国家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年。

艾舍里克，约瑟夫·W “关于中国革命前土地分配的注释。”现代中国7，无 艾舍里克，约瑟夫W。“关于中国革命前土地分配的注记。”现代中国7，第4期（1981年10月1日）：387-411。 Esherick, Joseph W. "关于中国革命前土地分配的注释。" 现代中国 7, no. 4 (1981年10月1日): 387-411. https://doi.org/10.1177/009770048100700401.

埃文斯，P 埃文斯，P “长路归家：约翰·费尔班克与1941-72年美国对华政策。”国际期刊37，无 “长路归家：约翰·费尔班克与1941-72年美国对华政策。”国际期刊，第37卷，第4期（1982）：584-605。 “长路归家：约翰·费尔班克与1941-72年美国对华政策。”国际期刊，第37卷，第4期（1982）：584-605。https://doi.org/10.2307/40202091。

艾塞特，杰雷米 “绘制虚空：通过风景画和透视法在新儒家朝鲜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中对制图的工具化（15-16世纪）。”《国际韩国历史杂志》26，无 “绘制虚空：通过风景画和透视法在新儒家朝鲜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中对制图的工具化（15-16世纪）。”《国际韩国历史杂志》26卷，第1期（2021）：177-218。 https://doi.org/10.22372/ijkh.2021.26.1.177.

费正清，J G., 费正清，和S ., 费正清，J. 和 S. Y. 公平银行，J. 和 S. 邓 “关于清朝的朝贡体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6卷，无 "关于清朝的朝贡体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6卷，第2期（1941年）：135-246页。 “论清朝的朝贡体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6卷，第2期（1941）：135-246。https://doi.org/10.2307/2718006.

费正清，约翰·金 在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1842-1854年条约港口的开放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年。

费正清，陈大端，主编 费正清，陈大端，主编，《中国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 哈佛东亚系列32 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

费正清，约翰·金·费尔班克和默尔·戈德曼 《中国：新历史，第二版扩展版》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法韦罗，玛丽 部落：蒙古人如何改变世界 剑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21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6525537.

费扬古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费扬古 奏，《遵旨测量城门具奏》康熙15年01月24日，故宫156789 号，件 1 ，国立故宫博物院 ⋈ 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未定日期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费扬古 奏，《遵旨测量城门具奏》康熙15年01月24日，故宫156789 号，件 1 ，国立故宫博物院 ⋈ 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未知日期.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042528=Xbb=5Q#07l.

冯宝琳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察." 故宫博物院院刊, 无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5年第01期: 23-31+35页.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皇舆全图》的乾隆年印本及其装帧." 故宫博物院院刊, 无 "《皇舆全图》的乾隆年印本及其装帧." 故宫博物院院刊, no. 02 (1990): 93–96.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记述几种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舆十排全图》." 故宫博物院院刊, 编号 "记几种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舆十排全图》." 故宫博物院院刊, 第04期 (1986): 73–78页.

风作哲 和珅评传 (赫舍里评传)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福柯，米歇尔 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心理学出版社，2002年。

弗兰克，安德烈·贡德 重新定向：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 伯克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799259.

弗兰克，V 弗兰克，V “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领土条款。”太平洋历史评论16，无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领土条款。”太平洋历史评论16，第3期（1947）：265-70。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领土条款。”太平洋历史评论16，第3期（1947）：265-70。https://doi.org/10.2307/3635997.

弗劳恩，扬-博杰 “关于‘中国威胁’的叙述：从二十一世纪初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美国-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根源分析。”《国际中国文化传播》第8期，无 “关于‘中国威胁’的叙述：从二十一世纪初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美国-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根源分析。”《国际中国文化传播》第8卷，第3期（2021）：363-89。 “关于‘中国威胁’的叙述：从21世纪初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美西对中国认知的话语根源分析。”《国际中国文化传播》8卷，第3期（2021）：363-89。https://doi.org/10.1007/s40636-021-00229-x。

法国，霍华德·W 《天下为公：过去如何塑造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第一版 纽约：阿尔弗雷德A 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2017年。

福克斯，沃尔特 康熙時期的耶穌會地圖集：其形成歷史以及滿洲、蒙古、東突厥斯坦和西藏地圖的名稱索引，並以原始大小重現耶穌會地圖 Monumenta serica专著系列4 北京：辅仁大学，1943年。

船越昭生，昭生 来到锁国日本的“康熙图”的地理学史研究 初版 叢書歷史學研究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年。

弗思，夏洛特 茂盛的阴性：中国医学史上的性别（960-1665）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甘懷真 编辑 甘懷真編輯 东亚文明研究丛书62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

高向东，王新贤，朱北前 “基于胡焕庸线研究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化。”《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杂志》第1期，无。 “基于胡焕庸线研究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化。”《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杂志》1，第1期（2017年12月）：2。 https://doi.org/10.1186/s41257-017-0004-9.

葛兆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史》 Brill的中国人文图书馆，第6卷，第12章 莱顿; 波士顿: Brill, 2014.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我在"中国"居住：为我们的时代重构中国的历史话语 荷兰莱顿：BRILL，2017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中国是什么？：领土，民族，文化和历史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18年。

葛兆光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关于“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 电子资源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7.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 出版 台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11.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乱臣、英雄还是叛贼？——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 中国文化研究, no. "乱臣、英雄抑或叛贼？——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 中国文化研究, no. 01 (2012): 22–31.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 "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2012): 1–11.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对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中国典籍与文化, no. "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中国典籍与文化, 第1期 (2012): 8-22页.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3241.2012.01.002.

吉利斯皮，查尔斯C 吉利斯皮，查尔斯C。“视角。”美国科学家45，编号 吉利斯皮，查尔斯C。“观点。”美国科学家45，第2期（1957）：169-76。

金茨堡，卡罗 《夜战：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巫术与农业崇拜》 纽约：企鹅图书，1985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木制的眼睛 由马丁·莱尔和凯特·索珀于2001年翻译。

冯·格拉恩，理查德 “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经济历史杂志》第56卷，无 “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经济历史杂志》56卷，第2期（1996）：429-54。 “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经济历史杂志》56卷，第2期（1996）：429-54。https://doi.org/10.1017/S0022050700016508。

戈尔弗斯，诺埃尔 “安托万·托马斯，SJ，和他的《数学概要》：一本耶稣会数学教科书在中国传教的传记。” 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没有 “安托万·托马斯，SJ，和他的《数学概要》：一本耶稣会数学教科书在中国传教的传记。” 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2017年，第45期：119页。

戈尔弗斯，诺埃尔 “安托万·托马斯，SJ，和他的《数学概要》：一本耶稣会数学教科书在中国传教的传记。” 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无 “安托万·托马斯，SJ，和他的《数学概要》：一本耶稣会数学教科书在中国传教的传记。” 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2017年，第45期：119-83页。

格林伯格，艾米·S 《昭昭天命与美国领土扩张：带有文件的简史》 第二版 贝德福德历史与文化系列 波士顿：贝德福/圣 波士顿：贝德福德/圣马丁出版社，2018年。

格鲁恩，埃里希S 重新思考古代的他者 马丁古典讲座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盖伊，R 肯特 清朝省长及其省份：1644-1796年中国领土行政管理的演变 中国项目书籍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皇帝的四庫：晚乾隆時期的學者與國家 哈佛東亞研究專著129 劍橋，麻薩諸塞州：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1987年。

海恩斯，R 海恩斯，R “军事革命’抵达中亚草原：准噶尔的独特案例（1676 - 1745）。”《蒙古学：蒙古研究的国际期刊》，2017年1月1日 “军事革命”抵达中亚草原：准噶尔的独特案例（1676 - 1745）。”蒙古学：蒙古研究的国际期刊，2017年1月1日

韩琦 通天之学: 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其含义）。《清史研究》，无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 清史研究，2016年第04期：53-60页。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 no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0，第06期 (2015): 123-142+192.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 06 (2009): 76-82.

韩昭庆，和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61, no. 04 (2019): 1-12.

杭世骏 道古堂集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哈雷，J 哈雷，J. B. 和保罗·拉克斯顿 《新地图的本质：制图史论文集》 哈雷，J.B.和保罗·拉克斯顿，《地图的新本质：制图史论文集》。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

哈雷，J 哈雷，J.B.和大卫·伍德沃德，编者。 哈雷，J.B.和大卫·伍德沃德，编。《制图学史》。 3卷 B.等人编，《地图制作史》，共3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 https://press.uchicago.edu/books/HOC/index.html.

哈特，罗杰 想象的文明：中国，西方及其首次相遇 巴尔的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3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318706.

何良焘 明清之际西法军事技术文献选辑 第一版。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4輯 长沙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亨德森，约翰B 构建正统与异端：新儒家，伊斯兰，犹太和早期基督教模式 奥尔巴尼，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

赫尔曼，约翰E 赫尔曼，约翰E。“西南帝国：清朝早期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亚洲研究杂志》第56卷，无 赫尔曼，约翰E。“西南帝国：清朝早期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亚洲研究杂志》56卷，1997年第1期：47-74页。 赫尔曼，约翰E。“西南帝国：清朝早期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亚洲研究杂志》56卷，1997年，第1期：47-74页。https://doi.org/10.2307/2646343。

Hinsch，Bret “神话与早期及中世纪中国对外族群身份的构建。”亚洲族群研究，第5期，无 Hinsch，Bret。“神话与早期和中世纪中国外族身份的构建。”《亚洲族群》5，2004年第1期：81-103页。

平野聰 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沌：现代东亚如何处理内亚帝国的遗产 初版 世界历史的兴衰; 兴衰的世界历史, 18 = 18 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8年。

平野聰 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乱 东京：光文社，2007年。

霍林格，大卫A "Hollinger，David A. 的《海外新教徒：传教士如何试图改变世界，但改变了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7年。

霍斯特特勒，劳拉 Hostetler，Laura。 "争夺地图主权？：满洲，中国和欧洲地图中的清帝国。" 在《帝国地图：地图学与帝国的掌控》中。 Hostetler，Laura。“争夺地图主权？：满洲，中国和欧洲地图中的清帝国。”收录于《帝国地图：地图制图术与帝国的掌控》中。Kenneth Nebenzahl，Jr.，地图史讲座。 Hostetler, Laura. "争论的地图主张？：满洲，中国和欧洲地图中的清帝国。" 在《帝国地图：地图制图与帝国的掌控》中。Kenneth Nebenzahl，Jr.，关于地图制图历史的讲座。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

侯德仁 "《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的纂修及其学术价值." 中国地方志, 无 “《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的纂修及其学术价值.” 中国地方志, 2006年第12期: 43–46页.

夏佛伦斯C 在陌生的土地上：耶稣会士及其在晚清中国的科学使命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 https://doi.org/10.7208/9780226355610.

夏伯嘉 利玛窦和天主教对中国的传教，1583-1610：一部带有文件的简短历史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克特出版公司，2016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426655.

胡焕庸 "中国人口分布——附带统计表和密度图." 地理学报 2，没有 “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 地理学报 2, no. 2 (1935年4月15日): 33–74 https://doi.org/10.11821/xb193502002.

胡明辉 中国向现代化的过渡：戴震的新古典视角 胡明辉，《中国向现代性的过渡：戴震的新古典视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使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第8期，无 "使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中国文学与文化》第8卷，第2期（2021年11月1日）：429-34。 "使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中国文学与文化》第8卷，第2期（2021年11月1日）：429-34。https://doi.org/10.1215/23290048-9299869。

胡明辉，约翰·埃尔弗斯科格，编者 胡明辉，约翰·埃尔弗斯科格，编. 中国的世界主义，1600-1950年 Cambria汉语世界系列 纽约州阿默斯特：Cambria出版社，2016年。

胡渭 《禹贡锥指》（对《禹贡》篇章的狭隘观点） 康熙版本，1703年。

胡志超，王阳林，刘燕穗，龙华楼，彭健 胡志超，王阳林，刘燕穗，龙华楼，彭健。“‘胡焕庸线’东部的城乡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模式。” ISPRS国际地理信息学报5，无 胡志超，王阳林，刘燕穗，龙华楼，彭健。“‘胡焕庸线’以东的城乡发展和转型的时空模式。”ISPRS国际地理信息学报5，编号3（2016年2月27日）：24。 胡志超，王阳林，刘燕随，龙华楼，彭健。“‘胡焕庸线’东部的城乡发展和转型的时空模式。”ISPRS国际地理信息学报5，编号3（2016年2月27日）：24。https://doi.org/10.3390/ijgi5030024.

黄一平 黄益平，“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动机、框架和评估。”《中国经济评论》40期（2016年9月1日）：314-321页。 黄一平，“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动机、框架和评估。”《中国经济评论》40期（2016年9月1日）：314-321页。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6.07.007.

哈夫，托比·E 早期现代科学的崛起：伊斯兰，中国和西方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

艾德玛，威尔特·L 关于《狐狸和鬼魂话语》的评论的评论 由陈德鸿撰写的《纪昀和十八世纪文人讲故事》的评论 通报86，无 《狐狸鬼话》的评论回顾，由陈德鸿撰写，关于纪昀和18世纪的文人故事讲述。载于《通报》第86卷，第4/5期（2000年）：400-405页。

Innes, James B.和Yongqiang Zong Innes，James B.和Yongqiang Zong。“中国东部长江沿海低地中晚全新世古洪水的历史：非花粉孢粉证据的评估，回顾和综合。”第四纪，第4卷，无 Innes，James B.和Yongqiang Zong。“中国东部长江沿海低地中晚全新世古洪水的历史：非花粉孢粉证据的评估，回顾和综合。”第四纪，第4卷，第3期（2021年9月）：21。 Innes, James B., 和 Yongqiang Zong. “中国东部长江沿海低地中晚全新世古洪水的历史：非花粉孢粉证据的评估，回顾和综合。” 第四纪 4, no. 3 (2021年9月): 21. https://doi.org/10.3390/quat4030021.

石井剛 戴震与中国近代哲学：从汉学到哲学 东京：智泉书馆，2014年。

伊藤贵之 作为思想的中国近世 初版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伊藤贵之，渡边义浩和林文孝。 治乱的历史：华夷、正统、势（历史中的秩序与混乱：华夷之争、正统与历史趋势） 系列关键词阅读中国古典 4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7年。

雅各布，基督教 《君主地图：历史上的制图理论方法》 雅各布，克里斯蒂安，《君主地图：历史上的制图理论方法》,由爱德华H编辑。 雅各布，克里斯蒂安，《君主地图：历史上的制图理论方法》,由爱德华·H·达尔编辑。 翻译：汤姆·康利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

雅各布，玛格丽特C.，和拉里·斯图尔特 雅各布，玛格丽特C.和拉里·斯图尔特，《实用物质：牛顿的科学在工业和帝国服务中，1687-1851》 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300314.

雅克·马丁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 伦敦：艾伦·莱恩，2009年。

詹米，凯瑟琳 皇帝的新数学：康熙统治时期（1662-1722）的西方学习和皇权 皇帝的新数学：康熙统治时期（1662-1722）的西方学习和皇权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22日访问 http://oxford.universitypressscholarship.com/view/10.1093/acprof:oso/9780199601400.001.0001/acprof-9780199601400.

卡尔·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和目标 新哈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年。

纪昀 在中国风景中的影子：儒家学者的笔记 亚洲文化新研究 阿蒙克，纽约：M.E. 阿蒙克，纽约：M.E.夏普，1999年。

纪昀 河源纪略（黄河源头的简明记录）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雅天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阅微草堂笔记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金宇 "《乾隆年间三次西域测绘再分析》，西域研究，编号 "乾隆年间三次西域测绘再分析"，《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27-34页。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清乾隆年间西域测绘再考察》"，《历史地理》，30（无日期）：250-66。

约翰逊，伊恩 “观点 | 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 “观点|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却浪费了。” 纽约时报，2020年3月13日，版块 “观点|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却浪费了。” 纽约时报，2020年3月13日，观点版块。 “观点|中国为西方赢得了时间，西方却浪费了。”《纽约时报》，2020年3月13日，版面观点。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3/opinion/china-response-china.html.

约翰逊，肯德尔A 新中央王国：中国与美国早期的自由贸易浪漫史 插图版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7年。

卡莫拉，斯特凡 制作蒙古历史：拉希德·阿尔·迪恩和《贾米阿勒塔瓦里赫》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9年 https://www.jstor.org/stable/10.3366/j.ctvrs91bj.

康大卫C 西方来临前的东亚：五个世纪的贸易和朝贡 当代亚洲在世界中的地位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

卡佩勒，安德烈亚斯 俄罗斯帝国：多民族历史 伦敦，英国：泰勒和弗朗西斯集团，2001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775293.

凯特利，大卫N.，和诺埃尔·巴纳德 凯特利，大卫N.，和诺埃尔·巴纳德，《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研究1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彼得·克内兹 南俄内战，1918年：志愿军的第一年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

肯尼迪，保罗M 《大国的兴衰：从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哈佛商学院的权力与道德收藏 纽约，NY：兰登书屋，1987年。

肯尼迪，斯科特 超越中央王国：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比较视角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

柯宁，约翰内斯 Keuning, Johannes. "1600年以前地理地图投影的历史." Imago Mundi 12 (1955): 1–24.

卡纳，帕拉格 《未来是亚洲的：21世纪的商业，冲突和文化》 首版Simon&Schuster精装版 纽约：Simon & Schuster，2019年。

基岑格 达清古伦及其时代：帝国的形成和八旗社会 初版 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黄舆全览图东北大地测绘考”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期刊，无 10 (2018): 479–517.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阿睦尔撒纳叛乱始末考（Amurasana的叛乱从开始到结束）》。大手门学院大学国际自由艺术学院评论，2015年第8期：41-73页。

金贤珍 在古希腊和中国的种族与外国人 伦敦：Duckworth，2009年。

金光旻 边疆资本主义：突厥斯坦的产品，清朝的银子，以及东方市场的诞生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Kitson，彼得J.和罗伯特·马克利 撰写中国：关于阿默斯特使团（1816年）和中英文化关系的论文 Melton，英国：Boydell＆Brewer有限公司，2016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529813.

Kivelson，Valerie A.和Ronald Grigor Suny 俄罗斯的帝国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

克鲁格曼，保罗·R 地理与贸易 平装书 编著，1993年 加斯顿·艾斯肯斯讲座系列 比利时鲁汶：鲁汶大学出版社，1993年。

库恩，菲利普·A 在他人中的中国人：现代的移民 兰翰，马里兰州，美国：罗曼与利特菲尔德出版社，2008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021916.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夺魂者：1768年的中国巫术恐慌 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300414.

鄺，陸士 况，陆克S "名字的含义：重新考虑'中國'（或'中央王國'）"。历史学报第58期，无 "名称的含义：重新考虑'中國'（或'中央王国'）"。历史学报58，第3期（2015）：781-804。

来，惠敏 乾隆皇帝的荷包 出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8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拉里，黛安娜 中国国家在边境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https://muse.jhu.edu/book/41763.

编辑，勒德洪 勒德洪编著的《平定三逆方略》(规划和策略在平息三次叛乱) 电子资源 电子资源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1792年。

李智英 李智英，《中国霸权：东亚四百年的统治》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6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709036.

李淳圭 "明朝中国（1368-1644年）的地图制图边界构建"。ProQuest论文出版，2021年。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593559671?pq-origsite=primo."

莱文森，约瑟夫·里士满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

李畅然 戴震的《原善》中表现微妙之处 Beijing :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16.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泰山学院学报，无 "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泰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49-53页。

李富孙 鹤征后录（特别考试记录，续集） 中國基本古籍庫V8.0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李光地 李光地的榕村文集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雅天下电子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李淮音 制造现代中国国家 1600-1950 阿宾登，奥克森；罗德里奇，2019年。

李金飞 "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30, no. "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30, no. 2 (2020): 75-86+214-215.

李玲玲和李零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第一版。 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李鹏翔 "《遐域琐谈》为《西域闻见录》最初版本新证." 《西域研究》, 无 "《遐域琐谈》为《西域闻见录》最初版本新证." 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140-144页。

李孝聪 “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故宫学术季刊 (国家宫殿博物馆研究季刊) 30，无 “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 30, no. 1 (1990): 55–86.

美国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美国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图像 访问于2023年9月3日 https://www.loc.gov/resource/g7820.ct002256/.

利伯曼，维克托 “清朝及其邻国：世界历史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历史32，编号 利伯曼，维克多。“清朝及其邻国：早期现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社会科学历史 32，第2期（2008）：281-304。

凌廷堪 校礼堂诗集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刘超建，和王恩春 "乾嘉时期新疆舆地学著述研究初探"（刘超建，王恩春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号未知。 02 (2012): 57–61.

刘成禹 世載堂雜憶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刘凤云 清代三藩研究 艾尔曼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刘，赫莉迪亚 帝国的冲突：现代世界构建中的中国发明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

刘明月，冯小龙，王三贵，邱环光 刘明月，冯小龙，王三贵，邱焕光。“中国过去40年的扶贫成就与挑战。”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杂志，第64期，无 刘明月，冯小龙，王三贵，邱焕光。“中国过去40年的扶贫工作：成功与挑战。”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杂志，第64卷，第1期（2020）：209-28。 刘明月，冯小龙，王三贵，邱环光。“中国过去40年的扶贫工作：成功与挑战。”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杂志，第64卷，第1期（2020）：209-28。https://doi.org/10.1111/1467-8489.12353。

刘统勋 皇輿西域圖志（皇輿西域图志）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1782年。

刘颖，格雷戈里·布鲁，陈中平 刘颖，Gregory Blue，陈中平，《郑和的海上航行（1405-1433）与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多语种参考书目》 荷兰莱顿：BRILL，2014年 刘颖，Gregory Blue，陈中平，《郑和的海上航行（1405-1433）与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多语种参考书目》。荷兰莱顿：BRILL，2014年。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786642.

刘颖，陈中平，格雷戈里·布鲁 郑和的海上航行（1405-1433）与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多语种参考书目 荷兰莱顿：BRILL，2014年 刘颖，陈中平，Gregory Blue著，《郑和的海上航行（1405-1433）与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多语种参考书目》。荷兰莱顿：BRILL，2014年。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786642.

劳埃德，杰弗里，和内森·希文 道与言：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 新哈芬：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

洛伟，迈克尔 汉朝管理的问题：祖先的仪式，度量衡，以及抗议的手段 波士顿，美国：BRILL，2016年。

杰克·伦敦 强者的力量 Leslie-Judge，1914年。

马大正 “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 新疆社会科学（新疆社会科学院）, 期号 “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 新疆社会科学 (新疆社会科学院), 1985年第1期: 89-91页.

迈尔，查尔斯·S 《边界之内：自1500年以来的权力、财富和归属领土》 剑桥，马萨诸塞州；伦敦，英格兰：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R级别的少校 少校，R 中国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包括康熙皇帝随行的费迪南德·维尔比斯特神父的两次进入鞑靼的旅程：来自耶稣会的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神父的法文 附加了佩雷拉神父同样在这位皇帝的随从中进入鞑靼的旅程，从尼科拉斯·维森的荷兰语翻译过来。 泰勒和弗朗西斯，2017年。

曼考尔，马克 中国在中心：300年的外交政策 现代中国转型系列 纽约：伦敦：自由出版社；科利尔麦克米伦，1984年。

曼考尔，马克 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直到1728年 哈佛东亚系列61 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

曼恩，迈克尔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崛起，1760-1914 第二版 卷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崛起，1760-1914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381314.

毛海剑 清帝国与鸦片战争：天朝的崩溃 剑桥中国图书馆 剑桥, 英国: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6.

马克斯，罗伯特·B 中国：环境史 罗曼&小菲尔德，2017年。

麦考斯兰，肖恩 蒙古世纪：元朝中国的视觉文化，1271-1368年 伦敦，英国：Reaktion Books出版社，2014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2120736.

麦克尼尔，J 麦克尼尔，J “导言：人类世与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研究》第49期，无 “导言：人类世与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研究》49卷，第2期（2016）：117-128页。 “导言：人类世与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研究》49卷，第2期（2016）：117-128页。https://doi.org/10.1353/ecs.2016.0005.

麦克尼科拉斯，马克P 麦克尼科拉斯，马克P，《清朝的伪造与冒充：民间欺诈与高清国家》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649017.

门德尔松，丹尼尔·亚当 等待野蛮人：从经典到流行文化的散文 《纽约评论集》 纽约：评论书籍，2012年。

孟森 清代历史 台北：正中书局，1960年。

梅耶-方，托比 《遗留物：面对19世纪中国的内战》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3年。

米勒，H 公羊传春秋全译 纽约，美国：美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5年。

米尔沃德，詹姆斯A 穿越关口：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族群和帝国（1759-1864） 美国红木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欧亚十字路口：新疆的历史 修订和更新版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2年。

宫崎, 一定 宫崎市定 岩波新书29 东京：岩波书店，25。

宫崎市定和孙晓颖 宫崎市定和孙晓颖 第1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莫兰，卡罗尔，凯瑟琳 R Cooper，Angélica López，和Barbara Goza "发展有效的P-20合作伙伴关系，以造福Chicano / Latino学生和家庭。”《西班牙裔高等教育杂志》第8期，无 “发展有效的P-20合作伙伴关系，以造福Chicano / Latino学生和家庭。”《西班牙裔高等教育杂志》第8卷，第4期（2009年10月1日）：340-56。 库珀，安吉利卡·洛佩兹，和芭芭拉·戈扎。“发展有效的P-20伙伴关系，以造福奇卡诺/拉丁裔学生和家庭。”《西班牙裔高等教育杂志》8卷，第4期（2009年10月1日）：340-56。https://doi.org/10.1177/1538192709347845。

莫拉尔，弗洛林-斯特凡 “将清朝置于全球科学史中：李应时和利玛窦于1603年翻译的世界地图。” Isis 109，编号 “将清朝置于全球科学史中：李应时和利玛窦1603年世界地图的满文翻译。”《伊西斯》109卷，第4期（2018）：673-94。

克劳迪娅·德·莫西尔-弗里茨 “最近发现的世界地图（坤輿圖）：一项语言学调查。” 亚洲研究，2021年。 https://doi.org/10.1515/asia-2019-0061.

莫斯卡，马修W 莫斯卡，马修W。“帝国与边疆情报的流通：清朝对奥斯曼的认知。”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0，无 莫斯卡，马修W。“帝国与边疆情报的流通：清朝对奥斯曼的认识。”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0，第1期（2010）：147-207。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朝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3年。

莫斯特恩，露丝 黄河：自然与非自然的历史 耶鲁农业研究系列 新哈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21年。

穆吉，托马斯 “穆吉，托马斯。《十字路口的李约瑟：战时中国的历史，政治与国际科学（1942-1946）》。《英国科学史杂志》第50期，无。 穆吉，托马斯。“在十字路口的李约瑟：战时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国际科学（1942-1946）。”《英国科学史杂志》50卷，1号（2017年3月）：83-109页。 Mougey，Thomas。“交叉路口的李约瑟：战时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国际科学（1942-1946）”。《英国科学史杂志》50卷，2017年3月，第1期：83-109页。https://doi.org/10.1017/S0007087417000036。

穆尔汉，克劳斯 使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19年。

牧场歌 牧场歌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1842年。

蒙克-额尔登，兰苏伦 “前现代欧亚的政治秩序：帝国的合并与世袭分治制度。”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6卷，无 “前现代欧亚的政治秩序：帝国的合并和世袭分治制度。”皇家亚洲学会期刊26，04（未注明日期）：1-23。

纳金，苏珊 北京：1400-1900年的寺庙和城市生活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国家情报委员会 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全球趋势2025：一个改变的世界 华盛顿特区，2008年。

纳萨格多尔吉，宗戈尔·B “《尼布楚條約背後：一個蒙古貴族家庭的早已注定的命運》。”《薩克薩哈：滿洲研究雜誌》第15期（2018年）。 http://dx.doi.org/10.3998/saksaha.13401746.0015.002.

尼德姆，约瑟夫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三卷，数学与天文地理科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

李约瑟，王玲 李约瑟，王玲，《中国科学技术史》 剑桥[英格兰]: s.n., 1961.

新比，L 新比，L “中国：满洲和平。”《十八世纪研究杂志》第34期，无 “中国：满洲和平。”《十八世纪研究杂志》34卷，第4期（2011）：557-63。 "中国：满洲和平"。《18世纪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2011）：557-63。https://doi.org/10.1111/j.1754-0208.2011.00454.x。

新比，L 新手，L “中国文学对新疆的征服。”现代中国25，无 “中国文学对新疆的征服。”现代中国25，不4（1999）：451-74。 “中国文学对新疆的征服。”现代中国25，第4期（1999）：451-74。https://doi.org/10.1177/009770049902500403.

劳拉·纽比 帝国与汗国：清朝与科甘德关系的政治历史（大约1760-1860年） Brill，2005年 https://brill.com/view/title/11876.

新居洋子 耶稣会士与普遍帝国：在华传教士对文明的翻译 初版 名古屋市：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

野田, 仁 诺达，金。《哈萨克汗国在俄罗斯和清帝国之间：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中亚国际关系》 荷兰莱顿：BRILL，2016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514082.

诺埃尔，戈勒斯 “再次审视18世纪葡萄牙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三位人物：安德烈·佩雷拉，多明戈斯·皮尼罗和费利克斯·达罗查 |”，《东方光环：宗教研究的澳门视角》，无 “重访18世纪葡萄牙的三位耶稣会士：安德烈·佩雷拉，多明戈斯·皮涅罗和费利克斯·达罗查|”，《东方光环：宗教研究的澳门视角》，第3期（2018）：33-59。

努涅斯，安妮-玛丽和玛丽塞拉·奥利瓦 "Núñez，Anne-Marie和Maricela Oliva。“促进大学入学的组织合作：P-20框架。”西班牙裔高等教育杂志，第8卷，无 "Núñez，Anne-Marie和Maricela Oliva。“组织合作以促进大学入学：P-20框架。”《西班牙裔高等教育杂志》8卷，第4期（2009年10月1日）：322-39。 "Núñez，Anne-Marie和Maricela Oliva。“组织合作以促进大学入学：P-20框架。”西班牙裔高等教育杂志，第8卷，第4期（2009年10月1日）：322-39。https://doi.org/10.1177/1538192709347844。

尼兰，迈克尔 五部“儒家”经典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

奥特曼，马克斯 “重叠的帝国：十九世纪青海的宗教，政治和族群。”晚清中国37，无 “重叠的帝国：十九世纪青海的宗教，政治和族群。”晚清中国37，第2期（2016）：41-91。

大沼贵弘 "清朝与其中亚邻国"。《萨克萨哈：满洲研究杂志》第12期，无。 "Onuma, Takahiro的《清朝与其中亚邻国》。《满洲研究杂志》第12期，编号20220303（2014年）。 https://www.academia.edu/9843893/The\_Qing\_Dynasty\_and\_Its\_Central\_Asian\_Neighbors.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清朝与哈萨克关系的转变：1770年代的清朝西部领土。”东洋文库研究部的回忆录，2019年1月1日 "清朝与哈萨克关系的转变：1770年代的清朝西部领土"，《东洋文库研究部的回忆录》，2019年1月1日

罗伯特·B·奥克斯纳姆 骑马统治：鄂博伊摄政时期的满族政治，1661-1669年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

博爾濟吉代 同文之盛：西域同文志整理与研究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彼得·珀杜 "珀杜，彼得。“早期现代世界的边界与贸易-涅尔琴斯克和北京的谈判。”十八世纪研究，中国与全球现代性的形成，43，无 Perdue, Peter。“早期现代世界的边界与贸易-涅尔钦斯克和北京的谈判。”《十八世纪研究》，中国与全球现代性的形成，43，第3期（2010年春季）：341-56。

彼得·C·珀杜 中国西进：清朝征服中亚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05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顽强的朝贡体系"，《当代中国杂志》第24期，无 "顽强的朝贡体系"，《当代中国》杂志，第24卷，第96期（2015年）：1002-14。 "顽强的朝贡体系"，《当代中国》杂志，第24卷，第96期（2015年）：1002-14。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5.1030949.

菲利普斯，安德鲁 “文明使命与早期现代亚洲国际等级制度的崛起。”《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42卷，无 “文明使命与早期现代亚洲国际等级制度的崛起。”《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42卷，第3期（未注明日期）：697页。

松树，尤里 "兽或人：中华-蛮族二分法的先帝制起源。" 在《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人：欧亚游牧民族与定居世界》，59-102页。 "野兽或人类：中华-蛮族二分法的先帝制起源。" 在《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人：欧亚游牧民族与定居世界》，59-102页。勒顿和波士顿：Brill，2005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永恒的帝国：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帝国遗产 普林斯顿[N.J.]：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

普拉特，斯蒂芬·R 帝国暮光：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第一版 . Knopf, 2018. 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2018年。

波科克，J 波科克，J Pocock，J 《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传统》 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传统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无日期。

Pollard，David E.和David E. ，David E.和David E. 帝国鼎盛时期的中国真实生活：通过纪晓岚的鬼魂揭示 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5433711.

庞弗雷特，约翰 美丽的国家与中央王国：美国和中国，从1776年到现在 麦克米伦，2016年。

波特，乔纳森 皇朝中国，1350-1900年 Lanham, MD: 罗曼和小菲尔德出版社，2016年。

蒲牧洲 文明的敌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 SUNY中国哲学与文化系列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

普利·布兰克，E.G Pulleyblank，E.G. "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及其邻居。" 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446-56页。 Pulleyblank，E.G. "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及其邻居"。收录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第446-56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齐召南 水道提纲 早稻田大学珍本收藏，无日期。

钱大昕 潛研堂集 中國基本古籍庫V8.0 北京：学海电子数字平台，无日期。

秦国经 "18世纪西方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 清史研究, 无 "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 清史研究, 1997年第01期: 37-44页.

清实录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七十一 西域闻见录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北京：博学洋海数字平台，1777年。

Rankin，威廉 《地图之后：地图制作、导航与20世纪领土的转变》 芝加哥; 伦敦: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16.

Rawski, Evelyn S. Rawski, Evelyn S的“天子：清朝对中国普世帝国模式的挪用。”收录于《普世帝国：欧亚历史中的帝国文化和表征的比较研究》，233-50页。 Rawski, Evelyn S的“天子：清朝对中国普世帝国模式的挪用。” 在《普世帝国：欧亚历史中帝国文化和表象的比较研究》，第233-50页。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 Rawski, Evelyn S. “天子：清朝对中国普遍帝国模式的采用。” 在《普遍帝国：欧亚历史中的帝国文化和表现的比较研究》，233-50页。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36952.012.

Reichle，Natasha，M 雷切尔，娜塔莎，M 乌塞尔勒，西奥多·N Foss，Mark Stephen Mir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编者 中国在中心：利玛窦和南怀仁的世界地图 出版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2016年。

Rinaldi，Bianca Maria，编 《中国园林的理念：西方记述，1300-1860》 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研究 费城，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6年 https://doi.org/10.9783/9780812292084.

罗宾逊，肯尼斯 R “朝鲜在龙谷江尼图中：对世界上最古老的韩国地图（15世纪）的年代鉴定。”《Imago Mundi》（Lympne）59，第 罗宾逊，肯尼斯R。“在龙谷江尼多的朝鲜韩国：确定世界上最古老的韩国地图（15世纪）的日期。” Imago Mundi (Lympne) 59，第2期（2007）：177-92。 罗宾逊，肯尼斯 R. "龙国江尼多中的朝鲜韩国：对世界上最古老的韩国地图（15世纪）的年代学研究。" Imago Mundi (Lympne) 59，第2期（2007）：177-92。https://doi.org/10.1080/03085690701300964。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加文·门济斯，1421年，以及龙国观日地图。” 明代研究，2010年，编号 “Gavin Menzies，1421年，以及龙国观日地图。” 明代研究，2010年，第61期（2010）：56-70页。 “Gavin Menzies，1421年，以及龙国观日地图。” 明代研究，2010年，第61期（2010）：56-70。https://doi.org/10.1179/014703710X12772211565945。

罗森塔尔，让-洛朗，和黄荣宾 在分歧之前和之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变革政治 罗森塔尔，让-洛朗，和黄荣宾，《分歧之前和之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变革政治》，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

罗萨比，莫里斯 中国的历史 霍博肯，英国：约翰威利&儿子公司，2013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从元朝到现代中国和蒙古：莫里斯·罗萨比的著作 美国波士顿：BRILL，2014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877206.

阮元 畴人传（数学天文学家的历史）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阮元集 扬州：博学洋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 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杭州：博学海文数字平台，1799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研经室集"（来自经典研究大厅的收藏） 研经室集 (来自古典研究大厅的收藏) 文选楼丛书1 扬州：博学洋海数字平台，1823年。

萨克斯，杰弗里 全球化的时代：地理，技术和制度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0年。

萨拉伊瓦，路易斯·M·R和凯瑟琳·贾米 数学科学史：葡萄牙与东亚第三部 - 耶稣会，教区和东亚科学（1552-1773）：葡萄牙与东亚第三部 - 耶稣会，教区和东亚科学（1552-1773） 新加坡，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公司，2008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681387.

舍费尔，达格玛 知识的文化：中国历史中的技术 莱顿，美国：BRILL，2011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084668.

施莱辛格，乔纳森 用皮草装饰的世界：野生事物，原始地方，以及清朝统治的自然边缘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7年。

舍顿哈默，安吉拉 “帝国与边疆？清朝与日本及琉球的关系（1644年-大约）” “帝国与边疆？清朝与日本及琉球的关系（1644年至大约1800年），一项比较。” 中世纪历史杂志16，无 "帝国与边疆？清朝与日本及琉球的关系（1644年至1800年），一项比较研究。" 中世纪历史杂志，第16卷，第1期（2013年4月1日）：139-196页。 “帝国与边疆？清朝与日本及琉球群岛的关系（1644年-约1800年），一项比较。”《中世纪历史杂志》16卷，第1期（2013年4月1日）：139-96。https://doi.org/10.1177/097194581301600106。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晚清中国和海洋东亚的马：” 亚洲的马：历史，贸易与文化，2009，229。

施瓦茨，本杰明·I 寻求财富和权力：严复与西方 哈佛东亚系列16 剑桥：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1964年。

塞贝斯，约瑟夫 耶稣会士和《尼布楚条约》（1689年）托马斯·佩雷拉的日记 罗马，1961年 http://hdl.handle.net/2027/mdp.39015008602743.

塞拉，奥里 中国的语文学转向：十八世纪的学者，文本主义和道 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的研究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

是，谢 “十一至十六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与市镇发展。”全球环境 9，无 “十一至十六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管理、运输和市镇发展。”全球环境9，2016年4月1日，第36-57页。 “十一至十六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管理、交通和市镇发展。”全球环境 9，2016年4月1日，第36-57页。https://doi.org/10.3197/ge.2016.090103.

Siebert，Martina，陈凯俊和Dorothy Ko，主编。 使宫殿机器运作：在清朝帝国中动员人员，物品和自然 第一版 亚洲历史11 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21年。

史密斯，理查德·J "绘制中国，管理世界：晚期帝制时代的文化，地图制作和宇宙学" 伦敦，英国：泰勒和弗朗西斯集团，2012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092693.

斯奈德，约翰·帕尔 使地球变平：两千年的地图投影法 平装版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

索默，马修H 清朝中国的一妻多夫制和卖妻现象：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 伯克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5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2068205.

宋年深 “想象的领土：晚清地图和文字中的白头山。”《园林与设计景观历史研究》第37期，无 宋年深。“想象的领土：晚清地图和文字中的白头山。”《园林与设计景观历史研究》37卷，2016年，第2期：157页。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在现代东亚划定边界：图们江划界，1881-1919，2018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从多边和多层面看'朝贡'。"《国际政治中国学报》第5期，无 "从多边和多层面看‘朝贡’。”《中国国际政治学报》第5卷，第2期（2012）：155-182。 "从多边和多层面的视角看‘朝贡’。"《国际政治中国杂志》第5卷，第2期（2012）：155-182。https://doi.org/10.1093/cjip/pos005.

斯宾塞，乔纳森·D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纽约：克诺夫，1974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陈氏的大陆：西方心目中的中国 陈氏的大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 陈氏大陆：西方心目中的中国 诺顿公司，1999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马泰奥·利奇的记忆宫殿 企鹅，1985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改变中国：西方顾问在中国 改变中国：西方顾问在中国0版 哈蒙兹沃思，英格兰；纽约：企鹅书籍，2002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叛逆之书》 纽约，纽约州：维京，2001年。

斯塔特曼，亚历山大 “扶桑：中国发现美洲的启蒙故事。” Isis 107，第 “扶桑：中国发现美洲的启蒙故事。”《Isis》107卷，第1期（2016）：1-25页。 “扶桑：中国发现美洲的启蒙故事。” Isis 107, no. 1 (2016): 1–25. https://doi.org/10.1086/686247.

杉山清彦 大清帝国的形成和八旗制度 初版 名古屋市千種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

孙喆 "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到中朝长白山定界——穆克登查边定界动因再探." 求是学刊 41，编号 "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到中朝长白山定界——穆克登查边定界动因再探." 求是学刊 41，第03期 (2014): 166–72.

桑德兰，威拉德 驯服荒野：俄罗斯大草原上的殖民和帝国 美国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6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517879.

塔克特，尼古拉斯 塔克特，尼古拉斯，《中国民族的起源：宋朝中国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形成》 第一版 英国剑桥；美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中国民族的起源：宋朝中国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形成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

泰勒，基思·韦勒 越南历史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

特拉尔，玛丽 那个把地球压平的人：启蒙时代的莫佩尔蒂乌斯和科学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 https://doi.org/10.7208/9780226793627.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中国的核工业和高速列车是世界一流的。”2020年1月2日 《经济学人》：“中国的核工业和高速列车是世界一流的。”2020年1月2日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RCEP的含义，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2020年11月15日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0/11/15/the-meaning-of-rcep-the-worlds-biggest-trade-agreement.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2017年5月14日 https://www.economist.com/the-economist-explains/2017/05/14/what-is-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在中国。 世界银行 访问于2023年8月4日 访问于2023年8月4日。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overview.

雍正皇帝 大义觉迷录 清雍正间(1723-1735)版 北京：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无日期。

特奥博尔德，乌尔里希 Theobald，Ulrich。“清朝中国的军事就业”（2014）“清朝中国的军事就业”，载于：Erik-Jan Zürcher（编），《为生活而战：欧洲、中东和亚洲不同形式的军事就业的起源、实践和后果（1500-2000）》（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于2021年9月7日访问 https://www.academia.edu/10122402/Military\_Employment\_in\_Qing\_Dynasty\_China.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第二次金川战役（1771 - 1776）：重要的清朝边境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 第二次金川战役（1771 - 1776）：重要的清朝边境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2009年1月1日。 “第二次金川战役（1771 – 1776）：重要清代边境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 第二次金川战役（1771 – 1776）：重要清代边境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2009年1月1日。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晚期清朝的战争财政与后勤：第二次金川战役（1771-1776）研究 荷兰莱顿：BRILL，2013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319103.

Thiriez，雷吉娜 野蛮的镜头：乾隆皇帝欧洲宫殿的西方摄影师 记录图像，v 6 澳大利亚：戈登和布雷奇出版社，1998年。

汤猜·温尼查库尔 《暹罗地图：一个国家地理身体的历史》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4年。

投掷者，诺曼·J 投掷者，诺曼·J 地图与文明：文化与社会中的制图学，第三版 芝加哥，IL，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8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432305.

托伯特，普雷斯顿M 清朝皇室内务府：1662-1796年的组织结构和主要职能研究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1977年。

托格，沃尔夫冈和于尔根·穆勒 大地测量学 第四版 柏林; 波士顿: 德格鲁特, 2014.

托因比，阿诺德，和D 托因比，阿诺德，和D 托因比，阿诺德，和索默韦尔 历史研究 由D.C缩写的第七至第十卷的研究 索默韦尔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

蔡世山亨利 永乐皇帝：明朝的永恒幸福 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444272.

范戴克，保罗A 广东贸易：1700-1845年中国海岸的生活和企业 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5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677561.

费尔南多·维尔比斯特 费尔南多·韦尔比斯特，坤舆全图（世界的插图和解释） 第1版。 “坤輿全圖”研究叢書 保定市：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未知日期的《坤輿圖說》（地理測量和地圖製作的插圖和解釋）

费尔南多·维尔比斯特，约翰·W 费尔比斯特，费迪南德，约翰W.维特克，蒙尼塔塞丽卡研究所和费迪南德·费尔比斯特基金会，编辑。 费尔南多·韦尔比斯特 (1623-1688): 耶稣会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和外交官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系列30 Nettetal：Steyler出版社，1994年。

韦克曼，弗雷德里克·E 韦克曼，弗雷德里克E。“中国与17世纪的危机。”晚清中国7，无 韦克曼，弗雷德里克E。“中国与17世纪的危机。”晚清中国7，第1期（1986）：1-26。 瓦克曼，弗雷德里克E。“中国与17世纪的危机。”晚清中国7，第1期（1986）：1-26。https://doi.org/10.1353/late.1986.0006。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视角 中国研究中心 出版物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伟大的事业：十七世纪中国满族重建帝国秩序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

乔安娜·瓦利-科恩 清朝中期的流放：被流放到新疆，1758-1820年 耶鲁历史出版物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中国的战争文化：清朝时期的帝国与军事 战争研究国际图书馆7 伦敦; I.B 伦敦：I.B.陶里斯，2006年。

沃尔顿，C 沃尔顿，C “普遍帝国的地理：战略视角的革命及其教训。”比较战略24，无 “普遍帝国的地理：战略视角的革命及其教训。”比较策略 24，第3期（2005）：223-35。 “普遍帝国的地理：战略视角的革命及其教训。”比较策略 24，编号 3 (2005): 223–35. https://doi.org/10.1080/01495930500197817.

万明 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王翱 中唐时期中国的空间想象：地理、制图和文学 柯美利亚汉语世界系列 纽约州阿默斯特：Cambria出版社，2018年。

王长松，张冉，张帅 王长松，张然，张帅。“中国长江流域2000年的时空模式以及城市与洪水之间的关系。”河流研究与应用，无卷号。 “中国长江流域城市与洪水之间的2000年时空模式和关系。”河流研究与应用，无期刊号。 访问于2022年3月16日 “中国长江流域城市与洪水之间的2000年时空模式和关系。”河流研究与应用，n/a，无。于2022年3月16日访问https://doi.org/10.1002/rra.3893。

王大文 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文件编译和大一统的观念—大清一统志的研究）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

王辉 想象亚洲的政治 由Theodore Huters翻译 美国坎伯兰：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300954.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现代中国思想的崛起：由迈克尔·吉布斯·希尔编辑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23年。

王辉和迈克尔·希尔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中国 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 https://doi.org/10.4159/harvard.9780674736306.

Wang Qianjin 汪前进 “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一期中。 "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02期：186-194页。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三角测量"地图，不。 03 (1987): 59.

王文胜 白莲教反叛者和华南海盗：清朝的危机与改革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 https://doi.org/10.4159/harvard.9780674726611.

王一帆 "清末地理大测绘：以光绪《会典舆图》为中心的研究." 于2020年12月16日访问。 "清末地理大测绘：以光绪《会典舆图》为中心的研究." 于2020年12月16日访问 https://oversea-cnki-net.oca.ucsc.edu/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1184356.nh&dbcode=CDFD&dbname=CDFD2011&v=.

王元崇 重塑中国帝国：满族与朝鲜的关系，1616-1911 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

王章涛 "阮元年谱" is already in Chinese. 第1版 合肥市：黄山书社，2003。

Wang Zhong 汪中 汪中集（汪中的集结作品） 出版。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古籍整理丛刊4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

瓦尔德加，阿图尔·K.，和安东尼奥·瓦斯孔塞洛斯·德·萨尔丹哈 在皇帝的光明与阴影中：汤玛斯·佩雷拉，SJ（1645-1708），康熙皇帝和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 纽卡斯尔-泰恩，未知：剑桥学者出版社，2012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1133003.

魏佩琪 阮元，1764-1849：鸦片战争前十九世纪中国一位重要学者官员的生平和工作 香港：伦敦：香港大学出版社；Eurospan [发行商]，2006年。

温铁军 温铁军的《十次危机：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1949-2020）》 全球可持续发展大学图书系列 新加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21年。

温铁军 编辑 编者：温铁军 第1版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怀特曼，斯蒂芬 "康熙的吉祥帝国：早期清朝地理一体化的修辞"。杜永涛和杰弗里·京-麦克克莱恩编辑，《地理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兰翰，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图书，2013年） 访问日期：2021年3月12日 https://www.academia.edu/2107965/\_Kangxi\_s\_Auspicious\_Empire\_Rhetorics\_of\_Geographic\_Integration\_in\_the\_Early\_Qing\_.

请提供要翻译的英文内容。 "《康熙的吉祥帝国：早期清朝地理整合的修辞》" 杜永涛和杰弗里·京-麦克克莱恩编，《中国历史的地理视角》(兰翰，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图书，2013) "《康熙的吉祥帝国：早期清朝地理一体化的修辞》" 杜永涛和杰弗里·京-麦克克莱恩编，《中国历史的地理视角》(兰翰，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图书，2013年)。访问日期：2022年11月12日。 https://www.academia.edu/2107965/\_Kangxi\_s\_Auspicious\_Empire\_Rhetorics\_of\_Geographic\_Integration\_in\_the\_Early\_Qing\_.

怀特曼，斯蒂芬·H 《龙脉相交：康熙皇帝与他在热河的庄园》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9 https://doi.org/10.2307/j.ctvtt78x4.

Wigen，Kären "易变的地图：1600-1912年日本中部的恢复地理" 伯克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566761.

威尔，皮埃尔-艾蒂安 威尔，皮埃尔-艾蒂安，《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饥荒》 威尔，皮埃尔-艾蒂安。《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和饥荒》。斯坦福，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

威尔，皮埃尔-艾蒂安，和黄荣斌 滋养人民：中国1650-1850年的国家民用粮仓系统 密歇根中文研究专题，编号 60号 安娜堡：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1年。

威廉姆斯，弗雷德里克·威尔斯 威廉姆斯，弗雷德里克·威尔斯：萨缪尔·威尔斯·威廉姆斯，LL.D的生平和书信：传教士，外交家，汉学家 地点未知或未确定：G.P. 地点未知，出版商：G.P.普特南之子，1889年 https://hdl.handle.net/2027/nyp.33433082398185.

威廉姆斯，S 威廉姆斯，S 中华帝国：对中国帝国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调查 牧师 修订 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中国帝国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 纽约：斯克里布纳之子，1907年。

威尔逊，多米尼克，和鲁帕·普鲁沙塔曼 威尔逊，多米尼克，和鲁帕·普鲁肖塔曼。“与BRICs共梦：通往2050年的道路。” 在Subhash Jain的《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商业的转型》中，3988。 威尔逊，多米尼克，和鲁帕·普鲁肖塔曼。“与金砖国家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在Subhash Jain的《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商业的转型》中，3988页。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6年。 威尔逊，多米尼克，和鲁帕·普鲁肖塔曼。“与BRICs共梦：通往2050年的道路。” 在Subhash Jain的《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商业的转型》中，3988页。Edward Elgar出版社，2006年。https://doi.org/10.4337/9781847202987.00008.

威尔逊，托马斯A 道统的谱系：晚期帝制中国的儒家传统的构建和使用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温特博瑟姆，威廉 《中国帝国的历史、地理和哲学观察》；包括对中国十五个省份、中国塔塔尔、附庸国的描述；中国的自然历史；政府，宗教，法律，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学，制造业等。 早期美国印刷品 第一系列；编号 31648号 费城：伦敦印刷：费城，为理查德·李邓宁、海尔和帕尔默重新印刷，1796年。

呜，梅雷迪思·郑恩 呜，郑恩梅雷迪思 “新东亚（经济）。”新左派评论，第47期（2007年）：57。

伍德赛德，亚历山大 失落的现代性：中国，越南，韩国与世界历史的风险 "失落的现代性：中国，越南，韩国与世界历史的风险" 赖施豪讲座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吴一立 吴怡莉的《再生妇女：晚清中国的医学、隐喻与分娩》 伯克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572071.

怀亚特，唐·J.和尼科拉·迪·科斯莫 Wyatt, Don J.和Nicola Di Cosmo的《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界、民族边界和人文地理》 伦敦：RoutledgeCurzon，2003年。

徐, 松 徐松 初版 中国边疆丛书 第二季23 台北：文海出版社，55。

许有壬 至正集 (Chinese Basic Ancient Books Database) 北京：北京艾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2009。

杨奎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第一版 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杨立红，和朱正业 “清实录馆人员的构成”历史档案，没有 “清实录馆人员的构成”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123-127页。

杨绍云 野蛮人的道路：重新划定唐宋中国的族群边界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

郑扬文 海上的中国：海洋世界如何塑造现代中国 海洋如何塑造现代中国 21卷 中国研究，第21卷 荷兰，波士顿：Brill，2012年。

杨杰, 马西亚 在早期现代日本的绘制：德川时期（1603-1868）的空间，地点和文化 第一版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 http://www.jstor.org/stable/10.1525/j.ctt1pphzc.

永林，江，和永林江 天命与大明律 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444313.

于逢春 “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6，无 “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关于中国领土的最终空间和时间坐标)。”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6，第1期 (2006): 1–13.

余治平 春秋公羊夷夏论：儒家以文明教化为本位的一种天下秩序设计（春秋公羊夷夏论：基于儒家文化主义的全球秩序设计理论）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袁枚 袁枚的作品 China Basic Ancient Books Library V8.0 北京：博雅天海数字平台，无日期。

云丽，是 "康熙时期后的天文改革和编纂皇家科学：《御製曆象考成後編》的社会维度。" 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无 "康熙时期后的天文改革和编纂皇家科学：《御制历象考成后编》的社会维度。" 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第28期（2008）：36-81。

扎卡里亚，法里德 “新的中国恐慌。”外交事务99，无 “新的中国恐慌。”外交事务99，第1期（2020）：52-69。

张家峰 张，家峰。“疾病及其对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影响：以天花和满族（1613-1795）为例。”医学与相关科学历史杂志，第57卷，无。 张，家峰。“疾病及其对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影响：以麻疹和满族（1613-1795）为例。”医学与相关科学历史杂志，57卷，第2期（2002）：177-197。

张琼 打造属于自己的新世界：发现时代中国人与耶稣会科学的相遇 莱顿：Brill，2015年。

张伟伟 中国视野：文明国家的荣耀与梦想 霍博肯，新泽西州：世纪世界，2016年。

张伟伟 《中国崛起：文明国家的崛起》 Hackensack, N.J: 世纪出版社，2012年。

赵秉忠和白新良 “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社会科学战线》，无 “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165-169页。

赵刚 赵刚，《清朝开放海洋：1684-1757年的中国海洋政策》 檀香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3413477.

赵路 追求大和平：汉代古典主义与早期中世纪文人文化的形成 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9年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ucsc/detail.action?docID=5784220.

赵穗生 "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帝国周期与中国的崛起。"《当代中国》杂志，第24期，无 赵穗生。“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帝国周期与中国的崛起。”《当代中国》杂志，第24卷，第96期（2015年）：961。

赵汀阳 天下为公：可能的世界秩序的天下体系 天下为公：可能的世界秩序的天下体系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21年 https://doi.org/10.1525/9780520974210.

赵汀阳 天下体系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赵欣，和曲晓范 “武默讷与清朝官方对长白山天池的首次考察” 东北史地，无。 “武默讷与清朝官方对长白山天池的首次考察。” 东北史地，2009年，第03期：38-40页。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1版 北京：地图出版社：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1982年。

周方银 "朱方胤，《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中国国际政治学报》第4期，无 周芳银，“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中国国际政治学报》4，第2期（2011）：147-78。 周方银。“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中国国际政治学报》4，第2期（2011）：147-178。https://doi.org/10.1093/cjip/por005。

周积明 纪昀评传 Beijing : Zhonghua shu ju, 2012. 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170 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邹怡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的清代多民族治理 - 清代农耕与游牧地区整合背景下的多民族治理研究。”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无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的清代多民族治理 - 清代农耕与游牧地区整合背景下的多民族治理研究。"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03期: 13-22页。

邹逸麟 “论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 浙江学刊 2010, no. "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 浙江学刊 2010, no. 2 (2010): 5-8.

邹振环 “蒋友仁的《坤舆全图》与《地球图说》(Michel Benoist的坤舆全图和地球图说)。”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无编号 01 (2017): 111–21.

“奏议（报告和备忘录）”。在《御制历象考成后编》（《观测和计算天文学的补编》）中，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奏议” 在《御制历象考成后编》（《观测和计算天文学的纲要》的补编）中。中国基本古籍库V8.0

河北省沧州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纪晓岚年谱（纪云的年代生平） 北京第一版。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整理出版。" 清史研究，无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整理出版。" 清史研究，第3期（2023年）：157页。

"《大清一统志》整理点校本出版。”访问日期：2023年9月2日 "《大清一统志》整理点校本出版。”访问于2023年9月2日。

Cui Changmo “反思朝鲜王朝的世界地图中的阿拉伯-非洲：基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的统一版图和各国首都地图）的研究。”日本中东研究协会年鉴28，无 “朝鲜王朝的世界地图对阿拉伯-非洲的反思：基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的研究。”日本中东研究协会年鉴28，第2期（2013）：27-50。 https://doi.org/10.24498/ajames.28.2\_27.

Xi Huidong "康熙年间绘制的《黄河图》及相关历史事实考证."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9, no. "清康熙绘本《黄河图》及相关史实考述."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9, 期号 5 (2009): 104–26.

席会东和Xi Huidong “席会东和习惠东——台北故宫藏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 - 水利地图，洪水和水道治理官员＂江南省黄河地图＂于成龙和康熙中期的水道治理政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号 “河图、河患与河臣——台北故宫藏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 - 水利地图，洪水和水道治理官员‘江南省黄河地图’的于成龙和康熙中期的水道治理政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04期（2013）：130-138页。

席会东和XI Hui-dong "席会东和习辉东"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3, no. 4 (2013): 142–46.

Zhang Xinmin "《大清一统志》中'滋生男妇大小'考——以江苏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无 "《大清一统志》中‘滋生男妇大小’考——以江苏为例."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2年第03期: 161–70页.

张鑫敏，和侯杨方 "《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 清史研究 77, no. "《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 清史研究 77, no. 01 (2010): 37–46.

Zhu Fangzeng Zhu Fangzeng

Zhu Hongbin "《哥廷根大学藏李明徹《大清万年一统经纬舆图》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38, no. “哥廷根大学藏李明徹《大清万年一统经纬舆图》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38, no. 2 (2023): 15–27.

牛润珍，和张慧 "牛润珍"和"张慧" “《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 清史研究, 2008年第01期: 136–48页.

秦丽娜，和 季秋华 "秦丽娜"和"季秋华" 06 (2001): 105-6.

船越昭生 "在华耶稣会士制作地图和闭关锁国时代的地图--'坤兴万国全图'，'康熙图'的评价和围绕传统研究的讨论。" 人文地理 / 人文地理学会 编辑 24, no. 2 (1972): 59-79.

船越昭生和葛蓬天 "船越昭生"和"葛蓬天" “康熙《黄河图》考说。”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8年第01期: 44–44.

卡尔·巴赫祖力 英卡尔·巴合朱力 02 (2022): 101–14.